

两广总督 叶名琛

黄宇和◎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LiangGuang Zong'Dui YeMingChen

ISBN 7-80678-096-3



9 787806 780961 >

定价： 20.00 元

两广总督 叶名琛

黄宇和◎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广总督叶名琛/(澳)黄宇和著;区钲译. —修订
本.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2
ISBN 7-80678-096-3

I. 两... II. ①黄...②区... III. 叶名琛(1807 ~
1859)—人物研究 IV. 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5774 号

责任编辑 完颜绍元
封面设计 程 钢
技术编辑 毛志明

两广总督叶名琛
黄宇和 著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cwen.cc

上海财经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9 × 1194mm 1/32 印张 8.375 字数 233 千

2004 年 2 月第一版 2004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ISBN 7-80678-096-3/K·22

定价:20.00 元

修 订 版 前 言

今年七月笔者再度访华,承中山大学林家有教授相告,上海书店出版社的金良年先生希望为拙著《两广总督叶名琛》出版修订本,至以为荣为幸。该书原是笔者在牛津大学念博士时(1968-1971)的毕业论文。毕业后留校继续研究,并把论文修订,1974年定稿后即到悉尼大学任教,而招稿则在1976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作为专著出版了。1979年5月笔者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太平天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华书局的李侃副总编辑知有是书后,毅然决定出版汉语本。以当时的政治气候来说,是非常勇敢而又深具眼光的决定,笔者至今极为钦佩。1979年12月,笔者应中山大学历史系胡守为代主任邀请到该系讲学,即由其同仁骆宝善先生介绍与当时还在念外语系研究生的区铨先生,由他翻译。汉语本顺利地于1984年出版。责任编辑刘德麟先生在“出版说明”中第一段说:“本书中文本的出版,可以说是中澳两国年轻学者的合作成果。”在最后一段又表达了这样的愿望:“本书中译本的出版,如果能为中澳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起到点滴作用的话,这就达到了我们的愿望。”今年是澳中建交30周年,澳中关系经历了飞跃的发展。借金良年先生决定为拙著出版第二版之际,祝愿

中澳关系迈开更大的步伐前进。

笔者同时借此机会对原汉语版作修订。最大的分别是原汉语版定稿时,英国国家档案馆还没按庞伯腾教授为藏于该馆的叶名琛档案所编的目录作重新安排,故原汉语版只得沿用旧编号,以便读者追查。现在该馆终于把文件按新编号整理了,故拙著第二版的注解就全部按新编号处理,同样是为了方便读者追阅。

现在距离原著出版的时候已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笔者研究范围也从原来的叶名琛扩大到整个鸦片战争时代的历史,并于1998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鸩梦:鸦片烟、帝国主义、亚罗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探索》,现在正由金良年先生负责组织翻译暨出版事宜。像李侃先生一样,金良年先生热心文化,造福学林,功德无量。笔者在此特致崇高敬意。

黄宇和 谨识

2002年9月15日于悉尼桥畔

修订版序言

在中国的史籍中，叶名琛的声誉不佳。长期以来，他被史家论定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顽固而惧外的典型人物。

澳大利亚籍华裔学者黄宇和院士，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出版了他的青年成名之作，英文版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八十年代初，由我的好朋友区铁先生翻译介绍到中国，于今屈指已经二十年了。叶名琛在广东十余年之所历经，几乎是他的政治生涯之全部，《两广总督叶名琛》实际上就是叶名琛评传。黄宇和院士穷八年的精力，完成了他这部力作，从而获得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

《两广总督叶名琛》的独步之处，是十分广泛地运用了当时英国人的官私记述和英国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掠走的广州档案，论据翔实，并与当时中国人的笔记进行了对比研究。近年，黄宇和院士的新一部力作《第二次鸦片战争探索》又在英国剑桥出版社问世。时至目下，学术界似尚无别人做更进一步的挖掘性研究。

黄宇和院士的研究，对于叶名琛处理国内事务诸问题，同中国学术界的著述似无本质性的差别，只是学术视角与话语系统的不同而已。其最主要的不同之处，是叶名琛对外交涉中的所作所

为。黄宇和院士对薛福成综合时人记述所做的叶名琛“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著名概括,逐项进行了深入的检讨,依据翔实的史料,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与中国传统史籍不同,本书基本上全面肯定了叶名琛的对外交涉,以及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部署、策略运筹和悲壮的结局等等。

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大陆的近代史学界,对于论定为反面的历史人物,似乎没有出版过根据客观史实予以公允评论的学术著作,海外学者著述的少量翻译,亦多属于供批判用。《两广总督叶名琛》是“文革”以后最早公开出版的一批以不同学术观点重建史实的学术著作之一。尽管它是海外学者著作的翻译,同样也在国内学术界起到推动学术思想解放的开风气的作用。

《两广总督叶名琛》出版以后的三十多年间,黄宇和院士对鸦片战争以及叶名琛的研究在不断拓展和深入,时有新论发表。他反复申论一点,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叶名琛比起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林则徐,没有丝毫逊色之处,在史籍中应当得到相等的地位。对于时人对叶名琛的记述之失实之处,黄宇和院士花了很大精力去探求它们的来源,认为诸如李凤翎《洋务续记》、赵沅英《平夷策》、七弦河上钓叟《英吉利广东入城始末》等,多系出自英国人的诱导,乃至英国人同已经投降的广东当局如柏贵等合谋下,有意嫁祸叶名琛,并从而消除其积极影响的产物。史家面前无定论。黄宇和院士不随俗流,重建历史真实的不懈努力,十分令人赞赏。

在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士人独具特殊的社会地位和条件,舆论导向是他们的专利。除了档案以外,他们对时事的记述和时人的臧否,就成了那个时代最生动的史料。在档案史料不易获得的情况下,它们就成了后世著述的史料依据。就叶名琛来

说,士人们的笔下,他来粤履任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前的十年中,政声很好,声望与时俱增。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两三年的对外交涉,则一落千丈,几乎无一赞词。现代史籍亦据以论定叶名琛为“顽固派”。士人们依据传统的社会伦理观念和文化情结所做的记述,再加上道路传闻,甚难完全客观真实。以薛福成所概括的“不和”来说,在朝廷和外国强敌之间,叶名琛就没有抉择的主动权。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叶名琛的父亲叶志诜,被叶名琛接来广州迎养。据时人笔记所说,叶名琛靠扶乩料敌之举,均来自乃父指授,叶氏父子之愚昧守旧,相得益彰,从而留下了“霜降风高,天下难容老叶;宵雨暗入,人间争怨初春”(叶志诜字初春。陈伯陶纂修《东莞县志》卷卅五)这样一联谤词。其实叶氏家族,书香门第,进士、翰林,父子祖孙,数代连出,具有较浓厚的学识素养。叶志诜翰林出身,曾游翁方纲、刘墉诸名家门下,博览群书,学问该博,是一位有相当造诣的文人,而且颇善货殖,并非冥顽之冬烘腐儒。《遐迩贯珍》有则消息称,西人合信所著《全体新论》1851年出版后,1853年,叶志诜就以两广总督太尊的身份,出资刊刻了该书中的八幅人体骨骼图,并跋以赞语,广为散发推介。赞语曰:“万灵备具,细验全身。中边分析,表里详陈。由形识性,似妄实真。图称创见,术逊仁人。”(《遐迩贯珍》咸丰四年正月第一号)可见,叶志诜亦在积极接纳西方文明,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当时,他对西学的认识和态度,应该说是堪称前卫的。有对西学的此等了解,有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前车之鉴,叶氏父子当不至愚昧迂妄到靠扶乩应对西方国家的炮舰,并决定“一切军机进止”(薛福成语)的地步。前此,叶名琛在广东十年处理对内对外事务中,亦未见有靠扶乩决策的记载。

相同的事例也出现在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某些记述。琦善明明派遣大量兵勇增援关天培,虎门前线已有兵满之患,而

时人的记述则说,琦善到广东后尽撤林则徐的珠江布防,仅以数百名老弱残兵应付关天培的哭求。等等。

叶名琛、琦善等在当世都是著名的能吏干员,他们办理国内事务,都曾经表现得十分得心应手,政绩显赫,而面对西方来的新对手,则无不左支右绌,力不从心。这显然就不是他们个人的能力与品德原因了。时人对他们办理内外事务的记述也判若两人,对于他们国内事务政绩曲尽溢美之词,对于他们对外交涉的过程,则广肆搜罗其恶迹,某些情节甚至近乎以己意周纳。史家有责任厘清这些史实,并探求这些记述的思想与文化背景,而不应根据这些记述简单地冠上一顶投降派顽固派的帽子,就算完事。

《两广总督叶名琛》是一本纯学术著作,且研究对象是一个在史籍中不获好评的历史人物,出版二十年后,竟有再版的机会,仅此就足以说明,它得到了史学界以及社会上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关注。二十年前,区铁先生的译稿,我就是第一个读者。二十年后再版之际,应黄宇和院士之嘱,为此短文,权充序言。

骆宝善

2002 年金秋 10 月

为译稿序

今天是1981年12月24日。一百三十三年前的今天，英国全权公使额尔金向清朝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叶名琛发出最后通牒，威逼他举广州城以降。今天作者来到广州，在广州将军衙门旧址附近为《两广总督叶名琛》的译稿作序，缅怀古人，不胜唏嘘。

两次鸦片战争当中的钦差大臣，林则徐碑传甚多而叶名琛则无一专著。这自有其各种不同原因，其中之一，是历史文献的存亡。林则徐遗下了大量奏稿、公牍、书信等等，而叶名琛的遗作，则似乎只有刻在广州越秀山上镇海楼的两首诗为世所知。

其实，有关叶名琛的公私档案同样大量地保留了下来。英法联军在1858年1月5日攻陷广州后，既俘虏了叶名琛，又把他的文件一并劫走。这批文件后来由英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编号为F. O. 682（外交部第682种文件）。从1966年开始，庞百腾先生（D. Pong）就为这批文件重新编号。惟本书英文版1974年交剑桥大学出版社时，庞先生的新编号还未面世；而且，作者在去年重访英伦时，发觉这批文件亦未曾按庞先生的新编号重新整理。因此，本文所引这类文件，直到交给中华书局时，只能按我在英文版中用过的原来编号。

原著还大量引用了英国外交部有关中国的文献。这些文献亦藏于英国国家档案馆,共分两大部分,编号分别为 F. O. 17(外交部第 17 种文件)和 F. O. 228(外交部第 228 种文件)。前者通称为《外交部与驻华使节的通讯及其他文件》;后者则通称为《驻华使节与诸领事通讯及其他文件》。当时英国驻华外交人员及英国政界要人的私人文件,以及商业机构如怡和洋行的档案等等,亦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本书也尽量应用。

中外文献互相参照,不但有利于了解叶名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起过什么作用,而且对叶名琛如何打击太平天国和镇压广东洪兵亦有很大帮助。这本书译成中文是 1979 年 5~6 月在南京举行的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期间提出来的。当时,与会的同行们对叶名琛其人其事及其公私档案都极感兴趣,作者就向中华书局李侃先生商定出版事宜,之后即通过中山大学历史系骆宝善先生介绍,邀请该校外语系的区锑先生翻译。

经过两年多的辛勤劳动,译稿终于在今年,即太平天国起义一百三十周年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脱稿,实在令人高兴。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与我经常保持联系,我两次访华期间又和他多次面商。译本脱稿后,我再次访华,住在舅父陈裕华先生家里,蒙舅父舅母两位老人家无微不至的照顾,得以集中精神,在半个月内在把译稿校改完毕。在这段期间,区锑先生数度前来面商,舅父舅母对区锑先生亦同样关怀备至。特此向两位老人家致谢。

我在写作此书时参考过不少国外华裔学者用英文写的书籍和论文,这些著作的署名都是他们的英文名字。感谢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东方部部长罗伯兹先生(A. D. S. Roberts)与悉尼大学东方系系主任戴维思教授(A. R. Davis)分别帮助查出了大多数华裔学者的中文名字。此外,英国伦敦大学亚非

学院图书馆副馆长拉斯特先生(John Lust)亦在这件事情上帮过忙,一并致谢。

黄宇和

1981年12月24日于越秀山下

译 者 的 话

原书主要对象是外国读者,征得作者同意,译本删去了一些介绍中国文化传统的文字,如何谓儒家,何谓八股之类。

译本中所有“广州档案”的中文引文片断均由作者提供。这样不但避免了从英文倒译回中文的赘烦,更重要的是尽可能保持史料本来面目。所引英国档案馆的档案,其编号中第一个数字是札数,第二个数字是分札数,第三个数字是文件号,例如:253A.3.109号即第253A札第3分札第109号文件。编号只有两个数字的就是札数与分札数。

原书引自柯克《中国》一书的关于叶名琛的英文材料,译本原则上是用简又文《叶名琛浮海记》的译文(《大风》第57—59期)。作者参考的马士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是英文版,为了方便中国读者,译本采用张汇文、章巽等翻译的中文版行文及页码。再,咸丰朝《实录》在译本注释中用HF代替。

全部译稿经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骆宝善老师过目,又蒙作者亲自校改,特此致谢。

尚存错误,均由译者负责。

区 铁

1981年12月19日于广州

中山大学外语系

目 录

第一部分 在广州任职以前	1
第一章 早年经历	3
第二章 任职广州概述(1847—1858)	9
第一节 1847 年前后的清王朝	9
第二节 广东与广西	12
第三节 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概述	17
第四节 1847—1858 年的广州	19
第二部分 政绩	25
第三章 政绩(一):驾驭士绅	27
第一节 职责与实践	27
第二节 办学与考试	37
第三节 士绅的作用	41
第四章 政绩(二):宣德布威	50
第一节 社会福利	50
第二节 执法	53
第三节 武装	58

第四节 结论	67
第三部分 军功	73
第五章 1850—1853 年的起义	75
第一节 1850 年 5 月—1851 年 4 月的清远与英德	75
第二节 1850 年 7 月—1852 年 6 月的廉州	77
第三节 1851 年 7 月—1852 年 7 月的儋州	79
第四节 1851 年 1 月—1852 年 8 月的高州	79
第五节 1852 年 10 月—1853 年 1 月的韶州	82
第六节 结论	84
第六章 1854—1858 年的洪兵大起义	90
第一节 1854 年 6 月—1855 年 3 月的珠江三角洲	91
第二节 珠江流域	106
第三节 韩江流域	112
第四节 结论	112
第四部分 理财	123
第七章 传统的理财方法	125
第一节 1849—1853 年广东财政支出	125
第二节 1850—1853 年对其他省份的财政援助	127
第三节 妥善管理现有税收	130
第八章 叶名琛的理财应急措施	146
第一节 控制支出	146
第二节 增加额外收入	149
第三节 结论	156
第五部分 外交	163

第九章 任外交事务钦差大臣概述	165
第一节 “不和……不降”	165
第二节 “不走”	174
第十章 重新评价叶名琛在“亚罗”战争中的“无为”政策 ...	181
第一节 “不守”	181
第二节 “不战”	191
第三节 结论	202
 第六部分 捐躯	 213
第十一章 被囚印度	215
 参考资料	 222
后记	250

第一章 早年经历

家 世

叶氏原籍江苏溧水。明朝末年,在汉口开了一家药铺,牌号叶开泰。这家药铺经营得法,自制的各种丸散膏丹名闻远近,后来成了全国著名的药店之一。到十八世纪初,叶家在汉口、汉阳等地已购置了不少产业。店主叶廷芳就从溧水迁到汉阳定居,从此遂为湖北汉阳人。

叶名琛的曾祖叶廷芳,为“溧水诸生”,是叶家第一位有功名的人。他的祖父叶继雯,号云素,少有才名,“早岁名噪江汉间”。1777年考取拔贡,担任过蕲水等县的教谕。1785年蕲水大旱,他“变产三千金易米以赈,并施药糈,蕲人绘像祀之”,可见其家道殷富。1790年中进士,此后一直做京官,最高的职务是给事中,而先后有二十年之久担任会典馆、玉牒馆的纂修。他“绩学嗜古,守礼仁义”,“治经尤邃于三礼”;所为诗文,“才气纵横,词华跌宕”。嘉庆帝不止一次赞赏他的学问,称他“学有根柢”。除纂修官书外,他的著作有《读礼杂记》、《朱子外纪》和《菰林馆诗文集》。他还是一个孝子,1824年“举孝行,旌表建坊,祀孝义祠”。^[1]

叶名琛的父亲名志诜,字东卿,曾官“内阁中书,洊升兵部郎中致仕”。他“学问该博,尤肆力金石文字。尝从秦汉印藪推求官制异同,足补《史》、《汉》书所未逮”。著作很多,除《简学斋文集》、《平安馆诗文集》外,多为金石考订的专书。他收藏图书金石甚富,所编的《平安馆藏器目》,是颇有名的,已收入《丛书集成初编》。叶志诜的文名更在他父亲之上,《湖北通志》把他和他的次子叶名沅的事迹列于“文学传”中。据说,他笃信占卜扶乩。1849年叶名琛迎养他去任所,在广州观音山麓专门建了一座精舍,名为长春仙馆,让他在这里修身养性,占卜扶乩为乐。^[2]

叶名沅字润臣,1837年中举,官内阁中书,1857年擢侍读。他“于书无所不窥”,尤“好吟咏”,为诗“清微遒厚,有鲍、谢风”,著有《敦夙好斋诗集》。^[3]

叶家“旧籍溧水,迁楚三世,而于吴人乡谊尤笃”。^[4]在叶名琛的文件中,有一封江苏大吏写给他的信,感谢他捐银五千两在该省放赈救灾。湖北同时也遭大水,他也捐款五千两用以加固汉阳堤防,所以信中赞扬他把两省都视为故里,毫无偏颇。^[5]

仕 履

叶名琛字昆臣,是叶志诜的长子,生于1809年12月21日。^[6]他从小受到家庭的熏陶,父祖的教诲,加上自己勤奋攻读,在年轻的时候就与他弟弟名沅“以诗文鸣一时”。1825年,他十八岁,乡试考取副榜贡生。“旋充武英殿校录,议叙教谕”。1835年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对当时汉族知识分子说来,编修是非常荣耀的职称,也是今后得有机会飞黄腾达的起点。1838年,京察一等,外放陕西兴安知府。兴安是个山区,与

民风强悍的湖北、四川接壤,三教九流以及无业游民汇集于此,号称难治。二十九岁的叶名琛,却能钳制“不法之徒”,因而博得“能名”。第二年就擢升雁平道,他也胜任愉快。1840年调江西盐法道。1842年初,他升至云南按察使。同年,江西巡抚裕泰保奏他在江西时“防堵捐资出力”,得以“下部优叙”。年底,又超擢湖南布政使。1843年调江宁,因原籍溧水,例需回避,不久改为甘肃布政使。1844年1月,以丁母忧去职。他家乡的县志——《汉阳县志》,称他“所至兴利剔弊,察吏安氓,口碑溢数省焉”。但是,1842—1843两年间,叶名琛几次迁调,历经数省,行程几及万里。就当时交通条件而言,他花在旅途中的时间定然不少,也由此可以推知他在各处任职的期间均极其短促,所以他到底有多少政绩,其他书籍,包括胡风丹所写的“叶公家传”,都缺乏具体记载。

居丧三年,1846年服阙后,他被授为广东布政使,“旋命暂署顺天府尹,充武乡试校射大臣。以武举弓石力不符,下部议处”,到11月才去广州上任。1847年擢广东巡抚。那时,他年未及四十,已成了方面大员,在按资迁升的封建时代,可称得上青云直上,早年得志。这除了叶名琛个人的才能外,充分反映了道光帝对他的信任和宠幸,也可能得到朝廷中某些当权大臣们的支持,所谓“朝中无人莫做官”。从他的文件中,得知他与军机大臣文庆、彭蕴章,部院大臣倭仁、卓秉恬等都有联系,而与祁寯藻的关系尤密切。^[7]1852年署两广总督,次年2月实授,他担任这一职务,直到1858年1月5日成为英法联军的俘虏为止。^[8]叶名琛在广东任职的那段经历,是本书研究的重点,将在以后各章详细加以探讨。

形象、性格及其他

英人柯克在叶名琛被俘后,曾访问过他。柯克所著《中

国》一书中,对叶名琛的形象和性格有详细的叙述。现在扼要转述如下:

叶名琛身高1.8米,肥硕,留着中国式长而薄的胡须,前额缩入,头颅甚大,耳轮圆形,后脑稍涨满,头发稀少,不留长指甲。杏圆眼是他相貌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他意志坚强,性情顽梗。

他不抽鸦片,只饮热茶,早餐素食。生性检朴,所穿之袍褂油渍光硬,据他自己说已穿了十年;他在中国的家属要求给他三千元作为在印度的零用,但至死未动用过分文。所以柯克认为,在私人生活方面,叶名琛是一位极可敬的中国人。

叶志诜笃信扶乩,又据说“亚罗”战争中叶名琛所有军机要事都是由他父亲所居住的长春仙馆中求藏扶乩所决定的,这就引起了柯克的兴趣。他们之间有过如下一段问答:

问:叶相信占卜吗?

答:有时信,有时不信。

问:是否为预测某些政治事件而亲自求过签?

答:我公事忙得很,哪有闲功夫搞这些事!

问:在缴获的文件中有求神问卜的记载,它们是怎么来的,对此您是否认为很重要?

答:不错,占卜之徒曾到我那里去过,可是他们绝对不能影响我的公事。

在叶名琛的文件中,有关占卜的记载计六件,其他迷信活

动的五条,也许散失了一些,但就卷帙浩繁的“广州档案”而论,可谓沧海之一粟。以此推知,他在处理政务时,所受占卜扶乩的影响甚微。表一和表二是他的文件中有关占卜与其他迷信活动的提要:

表一 关于扶乩卜占的记载

日 期	问 何 事	档案编号
1851 年	江西峡江县曾教职所占六壬问广西贼匪何时可平。	81
1851 年	占获清远县首要各犯何日得手。	1596
1853 年 7 月 23 日	关于南昌能否避免太平军围困事,江西李凡来信有“谨得两次请仙判语抄录,祈将此意转达”。	1506
1855 年 11 月 29 日	丁卯,命卜占潯州府城可保兵勇得力否。	247
1855 年 11 月 29 日	丁卯,命卜占援救潯州府城利于何日进兵。	1579
1857 年 2 月 15 日	占天下大势何时清靖。	1619

表二 有关迷信的记载

日 期	内 容 摘 要	档案编号
1853 年	访闻得洪秀全有祖山在花县清远之界石角里鸡舍坑胡姓客家村左右,系土堆北向,万山罗列,宜密谕花县行查,令人速速发掘。 查得粤城入脉之处在东得胜炮台山下,自道光三十年有刘恒泰插葬祖坟一穴,名为骑龙格,其后旗人亦插一穴于上,自此省中多事。据堪舆家言,有损粤城风水,亦宜令伊迁去。	1042
1853 年	督署后堂扩建并改动若干房舍,以善两院风水。	1619
1855 年	[叶名琛、柏贵]具奏关圣帝君显应请加封号。	1536
1856 年 10 月	《合省绅士讨英夷檄文》:“惟时天色晴朗,大风无云,占之天文书,主有急兵,彼来侵我,我利彼不利。”	1822

家庭生活

他十分孝顺,曾为他父亲建造一座长春仙馆,已如前述。“兄弟之情出于天性”^[9]。元配李氏早逝,没有留下儿女。续弦汪氏,是嘉庆年间当过上书房师傅汪廷珍的女儿。她性情贤淑,管理家务井井有条,使丈夫能专心操持公务而无后顾之忧。叶、汪两家关系怎样,史料无征,在叶氏文件中仅留下一封妻舅汪报闰给他的信,当时汪报闰在江西做官,信中感谢叶名琛派兵救援江西,并请求能拨予协饷。^[10]

汪氏只生三女,故叶名琛把他弟弟名沆之子恩颐过继为子。这在当时的封建世家似乎是一大憾事。

注释:

- [1] 有关叶继雯的资料,引自程鸿诏《有恒心斋文》卷9《叶给谏事迹》;《湖北通志》卷138,“叶继雯传”;李垣《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13。
- [2] 叶志诜《叶氏宗谱》卷20;柯克《中国——泰晤士报1857—1858年特派中国记者之报导》(伦敦,1858)页336。
- [3] 有关叶名沆的资料,见《湖北通志》卷152;《续碑传集》卷79。
- [4] 《续碑传集》卷79。
- [5] F. O. 931/187号;据《续碑传集》卷4,胡凤丹《叶公家传》云:“尝捐廉俸银一万两修汉阳拦江堤,水不为患”,可能就是指这件事。
- [6] 何姆:《清季名人录》页904。
- [7] F. O. 931/336号-352号,应受年礼名单(1856年3月26日);F. O. 931号,叶名琛致祁寓藻函,自称年侄。
- [8] 有关叶名琛的资料,据胡凤丹《叶公家传》;《湖北通志》卷138;《清史列传》卷40;F. O. 931。
- [9] 《续碑传集》卷4。
- [10] F. O. 931/1110号。

第二章 任职广州概述(1847—1858)

叶名琛毕生最重要的一段时间是在广州度过的十一年(1847—1858)。在仔细分析叶名琛这期间扮演的各类角色之前,简单介绍一下清王朝 1847 年前的政治形势、社会及经济的不安因素、两广的具体情况;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王朝同西方列强,尤其是与英国的关系,这有助于理解叶名琛自 1847 年以后所起的作用。本章的结尾是 1847—1858 年大事记,可以把它看作一份提纲,目的在于使随后几章的分析容易明白。

第一节 1847 年前后的清王朝

清朝开国于 1644 年,鼎盛期是乾隆朝的六十年(1736—1796)。乾隆帝是个野心勃勃的皇帝。他曾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进行了多达十次战争,即所谓“十全武功”。^{〔1〕}这些战争劳民伤财,使国家经济负担过重,政治日趋腐败。官员贪污腐化的丑闻越来越多,其中臭名昭著的恐怕要数和珅一案。正如史家指出,这种腐败的风气大大削弱了乾隆以后的政府。^{〔2〕}

鸦片进口日益增长,加速了这个腐败过程。十六世纪时,最

早私贩这种毒品的是葡萄牙人。吸毒给人的精神和肉体造成的恶果很快就被觉察,于是乾隆帝在1792年降旨禁烟。但由于这种生意有暴利可图,鸦片走私一直不能杜绝。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参加走私鸦片活动,并很快就赢得垄断地位。鸦片输入量逐年增加,1729年为二百箱(每箱约重一百四十磅);1767年为一千箱;十九世纪初为每年四千箱;到了二十年代已高达每年八千箱;1828年至1835年间每年一万七千箱;1835年至1839年间更猛长至每年三万余箱。^[3]1826年以前,中国因为出口茶丝,对外贸易一直出超,但从此以后,由于鸦片输入激增,外贸急趋入超,只能以白银作为补偿。白银是贵重金属货币,仅在大笔交易如政府税收、开支时使用;民间日常使用的是铜钱。而白银大量外流,不可避免地提高了它对铜钱的兑换率,从而又引起了慢性通货膨胀。十八世纪时一两白银约换一千枚铜钱,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兑换率提高了近一倍。1831年至1834年间,中国每年购买鸦片所花的白银高达二千万两,相当于同期全国税收的半数。^[4]清政府决定采取严厉的禁烟措施,结果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中国战败,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作出许多让步,包括赔款二千一百万元。但条约本身并没有涉及鸦片贸易问题。尽管中国的法律仍然禁烟,但政府却无力把它付诸实践。更有甚者,这种违禁走私毒品完全逃避了关税。难怪史学家邓嗣禹把四十年代的中国描述成一个衰弱、战败、贫穷的国家。^[5]

通货膨胀加剧,人民生活就愈来愈苦。老百姓平时使用的是铜钱,而纳税却需缴白银。三十年代银钱比价近倍增长,意味着他们要缴纳双倍的赋税。另外,大地主乘个体农民之危,大量兼并田地。他们手眼通天,纳税只是象征性的。于是,地方官就巧立名目,强迫农民缴纳各种苛捐杂税,这样一来,既补了亏欠,又饱了私囊。税吏明知这样做无理,所以下乡逼税时总带着兵丁,

暴行屡见不鲜。农民也以牙还牙,十九世纪后税吏被杀的事经常发生。^[6]

另一个使形势恶化的原因是人口猛增,据何炳棣估计,1741年全国人口约一亿四千三百万;1784年约二亿八千六百万;1850年达四亿三千万,而国民经济的发展却裹足不前。据他分析,中国在1750—1775年间已达到最佳状态,即就当时的技术水平和人口条件,经济财富的生产已达到最大限度。^[7]随后,人口的继续增长只会降低生活水平。马克·艾尔温则另持一说,他认为,早在十四世纪,中国具备的科学条件已发挥到最大限度,要想进一步发展就要来一个技术上的突破,这需要大量投资。^[8]从根本上来说,中国一直被人口和粮食问题所困扰。到了十九世纪,人口经过数十年的迅速增加,引起了一连串社会问题。失业是其中之一。过多的人口逐渐结成秘密会党,这些组织古已有之,他们在民不聊生时出来杀富济贫、仗义疏财。^[9]社会动乱导致了这种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早在1773年乾隆帝在位时就有几千白莲教徒揭竿而起;1783年,甘肃出现过回民起义;台湾的秘密会党也在1786年举义,一直坚持到1788年。乾隆帝在位的最后一年即1796年,白莲教徒在山东再起,围攻临清。临清是战略要地,扼守着北京的粮食补给线——运河。如果该城失陷,就等于割断了北京的命脉。尽管清政府任命一名总督统重兵镇守于此,临清仍被攻破。义军占领该城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被逐出。每次起义的口号或是官逼民反,或是反清复明,或两者兼而有之。^[10]起义军常常一呼百应,发展很快,人数多达数万。

天灾使形势更加恶化,最突出的是黄河多次泛滥。其实,黄河上游是很清澈的,但它流过土质疏松的黄土高原后,冲刷下大量泥沙,沉积在下游的河底,使河床日益增高。河床泥沙太多,根本不可能疏浚,只好加高两岸堤防;天长日久,竟然高出地面。于

是,山洪一来,堤防告急,华北平原就受到威胁。历代统治者都要花大量人力物力来加固黄河大堤。事实上,黄河的事情是否办得好,已经成了考验中国历代政府是否治国有方的重要标志。1796—1820年,黄河大决口多达十七次。^[11]更糟的是三十、四十和五十年代。据地方志载,这期间自然灾害接二连三,很少间断。^[12]

总之,政府无能,经济衰退,人口过多,连年灾荒,以致社会日见不安,严重威胁着清政府。叶名琛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第二节 广东与广西

广 东

地理 广东是华南的一个沿海省份,海岸线约长二千五百公里,约占全国海岸线总长的23%。丘陵、山地约占全省面积70%,且多集中在北部。通往北方各省的门户都是些陡峭的峡谷。省内两大水系,东部的韩江较小;珠江则长得多,是全国三大水系之一,它有东、西、北江三条支流。西江发源于云贵,流经广西,然后进入广东,是珠江最长的支流。广东平均年降雨量为一千六百毫米,大半集中在每年4月至9月。西江与东江差不多处在同一纬度,两条江的暴雨期几乎同时到来;而北江与韩江则自北向南流,它们上游地区的雨季在5月,等大水到达下游时,正好遇到那里的雨季。东、西、北三条江都在珠江三角洲会合。由于整个水系容纳不了如此大的水量,就经常发生洪涝,^[13]因此也必须妥善维护堤防。

历史 广东比诸中原开发较晚,秦朝才平定岭南。在此之前,那里一直是少数民族聚居之所。汉末中原连年战乱,迁到广东来的人越来越多。唐朝时修了大庾道,通往广东的交通发达

了,也给移民提供了方便。但是,广东的大规模开发则在宋末以后。十七世纪,明朝的一位亲王于1647年逃到广州,当地士绅聚众勤王,并拥他为帝。因此,清兵挥师南下,在广东遭到顽强抵抗。广州陷落后,士绅们仍然千方百计驱逐清兵。他们有不少领袖被俘被杀,但其事迹鼓舞着后人成立起忠于明室的秘密帮会。1648年,驻广州的清军统帅汉人李成栋倒戈,也许是受了广东强烈反满情绪的影响。1649年李成栋战败。翌年,广州城再次被清军围困,被围达八个月之久,最后城破被屠。据说在屠城中有十万居民被杀。^[14]

忠于明室的广东人,还有福建人、浙江人和江苏人大量迁往台湾,在郑成功领导下继续抗清。清廷的对策是强迫沿海五十里内的居民全部迁入内地,禁止一切船只出海。这道禁令害苦了靠海为生的百姓。^[15]1673年,广东、云南和福建三藩兵变。这次兵变到1681年才被平定。这些事件“使清统治者一直提防南方对他不忠”。^[16]公开的反抗和起义被平息了,但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秘密会党却展开了地下活动。^[17]清朝统治者采取笼络汉族上层分子的政策,在政治上、社会地位上和经济上维护他们的传统特权,并且几乎全盘接受了明朝政府体制,这样就逐渐取得了汉族上层人士的支持。但秘密会党仍是各种反清力量,特别是一贫如洗、怨气冲天的农民的旗帜。

人口的压力 平定了三藩后,广东有过一段太平、繁荣的日子。于是,人口马上激增,1787年为一千六百万;1850年则多达二千八百万了。^[18]这些都是官方数字,可能比实际数字要缩小,因为士绅们经常贿赂书吏逃避登记;另外,“不在册的流动人口”也越来越多。^[19]人口不断增长,而耕地面积却没有相应扩大,移民在所必行。广州人不断向北江流域迁徙,逐渐把那里的土著逼进深山。后来瑶族曾经反抗,那就是三十年代徒劳无功的瑶民起

义。原来居住在广东东北部嘉应州的客家人同样遇到人多地少的问题,过多的人口大量流入已住满了本地人的广东中部。双方不断摩擦,到了十九世纪中叶,终于在广州以西的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械斗,这就是所谓“土客之争”。最后,客家人意识到他们无法赶走本地人,便继续涌向西部,进入广西、贵州和四川。^[20]就连那些早已在广州地区定居的客家人也觉得僧多粥少,耕地不足。太平天国的一位领袖冯云山,就曾以广西平叛战争后闲置的耕地很多为借口,劝说家人搬到广西去同他一块生活。结果他的妻儿和他弟弟一家都决意离开花县,去碰运气。^[21]

瑶族起义和“土客”冲突的根源是人口问题,这预示着社会大动荡已经迫在眉睫。

社会结构 农村的社会基本单位是村,而一个村常常又是一个宗族。^[22]这就是说,一旦与外村发生土地或水源纠纷,全村就会迅速行动起来,一致对外。事实上,村与村之间械斗在广东是司空见惯的事。械斗之多,竟使一位有名望的人类学家得出以下结论:“宗族维系是组织械斗时举足轻重的因素。在中国,如果某地的械斗尤为突出,则此地肯定是宗族组织最严密的地方。”^[23]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广东人,包括在宗族仇杀中同样是核心人物的士绅在内,都那么好勇狠斗。^[24]由于士绅在一族之内备受尊敬,权力极大,所以历任巡抚都不敢对他们等闲视之。各公尝^[25]是省内最大的土地拥有者。出租公田所得的收入一般用来为族人办学校,提供奖学金,补贴有功名的人和考生,同时也用以赈济老弱病残和发放给械斗中丧生族人家属的抚恤金。^[26]于是,一个宗族就是一股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族人“安其土,乐其谣俗”,^[27]极少例外。另一方面,土地高度集中意味着大多数农民变成了佃农。^[28]从十九世纪初开始产生的人多地少的问题,导致地价和地租上涨。^[29]佃农们的日子很不好过。“有些几代当佃

户的人,为了谋生,除耕种田地外,还兼当劳工、仆人和更夫”。^[30]难怪这些佃农“对用收地租和放高利贷盘剥他们的族内长老恨之人骨”。^[31]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秘密会党。这些组织从成立之日起就成为受压迫者的旗帜,同时,它们还把不同宗族的人联系在一起。^[32]保甲制度一向是治理农村的一种重要手段,它要人们互相监督,“不致有违法行为”。但是,“清政府常常感到无法贯彻这个制度,就连建立划一的保甲都不可能”。^[33]1814年,由于保甲制度在广东行之有效,使一些犯人落网,皇帝曾为之龙颜大悦。其实,按萧公权所说,“如果确实有些效果的话,这些报喜不报忧的奏章也很可能是夸大其辞的”。^[34]乡约制也是为管理农村而设的。规定村民每月必须集会两次,听当地的塾师讲解儒家经典。叶名琛在广东利用了乡约制,作为维系乡民、保卫村坊、抵御洪兵义军的手段。(见第三章)

经济 宋朝之后,广州就成了商业、手工业和对外贸易的中心。制糖业高度发达,主要集中在广州、潮州和廉州。到1700年,这里出产的糖不但可以满足全省和一些邻省的需要,而且还向南洋出口。宋朝末年,棉花由海外引进广东,棉纺织业很快就与早负盛名的丝织业并驾齐驱。佛山、汕头和琼州一跃成为纺织业中心。佛山同时也是铁器、爆竹和纸伞的重要产地。其他如潮州和东莞的瓷器;广州、惠州和韶州的刺绣都很著名。廉州、雷州和高州也是商业和手工业中心。在对外贸易方面,十六世纪葡萄牙人最早来中国经商,接踵而来的是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1757年,清政府关闭了除广州以外的所有口岸。中国中部和东部的茶、丝出口,银钱、枪炮和其他洋货的进口,无一不经过广州,广州便更加发达兴旺了。这些对外贸易全部由名为公行的若干中国商行包办,这些公行总称为十三行。^[35]

由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十三行被取消,除广州外,又开

放了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四个口岸。虽然新开放的口岸,特别是上海,分去了广州的一部分对外贸易,但广州仍然是繁荣的。江苏、安徽、浙江出产的丝、茶虽然都运到最近的口岸销售,但江西、湖北和湖南的货物继续流往广州。至于进口方面,“新的口岸只是创造了新市场,并没有造成广州贸易的衰退”。^[36]

稻米是广东的主要农产品,一年两熟,甚至三熟。但是早在1723年,广东就要从外省和外国——主要是泰国,进口大米。^[37]这是因为人口不断增加,可耕地短缺,全国都感到粮食紧张。^[38]广东的丘陵地区,问题尤其严重。那里不但耕地面积少,而且相当一部分又种植经济作物。1727年,广西巡抚向皇帝上奏,对“广东人大量购买广西的大米”,表示不满。他认为“广东粮食短缺主要是因为该省相当多的农田种上了如水果、甘蔗、烟草和靛蓝等经济作物”。^[39]毫无疑问,这些经济作物给本来就腰缠万贯的大地主和大商人又增添了财富,而平民百姓却因粮价飞涨而遭殃。

广 西

广西全省大都是纵横交错的高山深谷,只有在东南部西江支流下游,两岸的狭长谷地里才有少量平地。^[40]广西同广东的惟一交通大动脉就是西江,梧州是这条大动脉上的咽喉,也是最重要的商业中心,那里大部分生意都由广州人包办;其利润又通常投资于购买土地。这样一来,这个地区的土地也集中到少数人手里。^[41]

广西东南部所处的环境非常特别。它东边是富庶的广东,西边却是贫瘠的山区。那里的深山幽谷成了山贼水寇和秘密帮会的天然藏身之所。《南京条约》规定除广州外添加四个通商口岸,这自然也改变了中国内部的货运路线,使广东的脚夫苦力大

量失业,流民不断渗入广西。尤有甚者,广东当局于1847年采取高压政策,肃清滨海地带和珠江三角洲的水寇,迫使他们沿西江溯流而上,进入山区。因此,到了1850年,广西省的绿林好汉已是五花八门、多如牛毛。

更严重的是,这个地区的汉族人分成了对立的两派——本地人(包括许多广州人)和客家人。客家人是从华北迁来的,迟至十七世纪才在广西落脚。到十八世纪,大量客家人便寻踪而来。十九世纪时,客家人越来越多,同本地人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对比之下,本地人比较有钱有势,他们中间有相当多士绅、商人和大地主;客家人因为来得迟,只能靠当佃农、雇工和银矿工人谋生,很多人家徒四壁,无奈“沦为盗匪,捞几个钱来解救燃眉之急”。^[42]作为佃户和雇工,客家人备受本地人的剥削;作为草寇,他们同本地人直接发生武装冲突。天长日久,双方结仇愈来愈深。到了1850年,流血事件已成经常。本地人到官府去告状,说客家人是贼,请求干涉。客家人则求助于一个名叫拜上帝会的秘密帮会,这个组织的不少首领本人就是客家人。于是,本地人与客家人的怨仇变成了官府同一个势力强大的秘密会党的较量,这就是太平天国起义的开端。

第三节 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概述

从立国年代久远、领土幅员辽阔、文化高度发达和国家富强等方面来看,中国无疑是亚洲东部各国之冠。它的邻邦要派使节到中国去向天子朝贡,承认中国是宗主国。中国皇帝则赏赐这些邻国很丰厚的礼物,并允许它们同中国贸易(只限于这些使节在中国停留期间)。所以,当欧洲国家初次同中国打交道时,“中国也认为它们理所当然地是它的属国,应当朝贡”。^[43]可是,这些欧

洲国家只对贸易感兴趣,在外交上则要求平起平坐。随着十八世纪贸易的发展,双方矛盾加剧了。由于最初到中国来的外国商人和水手行为极为不端,他们除了做生意外,还是海盗、酒鬼和暴徒。所以,中国在1757年关闭了除广州以外的所有通商口岸。即便在广州,外国人也受到很大约束,致使他们非常不满。英国于1793年派马戛尔尼,于1816年派阿美士德到北京同中国政府谈判,企图缓和对中国对外国人的严厉约束,但是都毫无结果。

与此同时,称之为中国——印度——英国之间的三角贸易日益发达。中国出口茶、丝到英国,英国商人则从印度运鸦片到中国倾销。如上所述,因鸦片战争而签订的《南京条约》中,规定取消在广州对外国人的种种限制,增开了四个通商口岸。大部分西方历史学家都认为这个条约是“新曙光”,但费正清却认为这只不过是“夕阳残照”。他指出,清政府之所以签订这个和约,以后又分别同美国和法国签订条约,其指导思想是希望实行传统的羁縻政策。他说:“追求实利的外国人得到的特权会变成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要依靠皇帝的力量来保护这些利益,这样皇帝也许就能控制他们。”^[44]这个观点很有见地。实际上,收在道光晚期和咸丰期间《实录》里的大量上谕都证明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其实,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认为:《实录》和当时中国官员的其他著述都反映出执笔者不但没有自觉地执行这个新政策,^[45]反而对条约所作的让步耿耿于怀。的确,停战后的一段时间里,清政府是实行过羁縻政策,^[46]但那是无可奈何的。1849年,中国取得了所谓入城危机的胜利后,^[47]道光皇帝终于说了心里话。他说,忍辱负重将近十年,如今外交上取得胜利,喜悦之情,难以名状。大臣们同样欢喜万分,有人甚至说高兴得“纵跃三百”。^[48]因此,当叶名琛任钦差大臣时,他以坚守成约为己任:不亢不卑,既不开罪外国人,但也决不再作让步以沽辱国体。比如“亚罗号”事件发生

后不久,皇帝对军机大臣们分析形势道:英人“若悔祸求和,必仍事羁縻,不使决裂,但不可先行迁就,致启要求”。^[49]当英国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在1857年初从广州撤兵之后,^[50]皇帝传旨叶名琛“总宜计深虑远,弭此衅端,既不可意存迁就,止顾目前,又不可一发难收,复开边患。该督于洋务情形素所熟悉,谅能慎密妥筹,不负委任也”。^[51]

第四节 1847—1858年的广州

1846年叶名琛被任命为广东布政使。1847年4月2日,香港总督德庇时率大队炮舰直捣广州城下,胁迫两广总督耆英答应两年后让外国人进入广州城。不及一年,发生了黄竹歧事件,七名英国人在殴斗中被村民打死,德庇时又借此羞辱耆英。1848年,徐广缙接替不称职的耆英,任两广总督,叶名琛亦擢升巡抚。1849年4月6日,原定让外国人入城条款的生效期将到。徐广缙和叶名琛深知履行这一条款,势必引起广州百姓公开造反。于是他们决定,不惜任何代价,坚决抵制。一时间官兵戒备森严,练勇集结待命,形势十分紧张,这就是所谓的人城危机。然而,英国并不想在这个时候打仗,便把人城要求搁置了起来。在中国人看来,这是外交上的一个大胜利,清廷封徐广缙为子爵,叶名琛为男爵。

外侮未除,内乱又起。上述的一系列事件,实际上已使民心浮动,给蓄意谋反的人壮了胆。1849年,这些人开始在北江流域(清远和英德一带)积聚力量,甚至伏击过一队官军,连广东提督都被派到这个地区去进行镇压。但这仅仅是个开端,1850年,大量起义者从广西来同当地的义军会合,提督无法控制局势,叶名琛只好亲临战场,经过一场苦战,才把起义镇压下去。自1850年

6月以后,广东最西部的廉州也受到广西盗匪的侵扰,历时两年才恢复安定。局势最严重的是广西,1850年11月,太平军在金田集结,不久即正式起义。与此同时,英使文翰于9月到了上海,要求同耆英和穆彰阿就入城问题会谈,对清政府施加压力。

1851年,广东义军声势愈来愈大,除清远、英德和廉州外,又增加了海南岛和高州两股。高州的局势尤其吃紧,迫得徐广缙亲往指挥清剿。在广西,官兵对太平军简直束手无策,专门负责对义军作战的钦差大臣周天爵被革职,由赛尚阿接替。

1852年的战事仍然十分激烈。徐广缙对高州凌十八的清剿并无多大进展;赛尚阿在军事上也是个庸才,4月份竟让太平军包围了广西省城桂林。于是,在6月,皇帝把徐广缙调到广西,由叶名琛接替他指挥高州战事。仅仅两个月,叶名琛就打败了凌十八。然而这时太平军已攻入湖南,大有从粤北挥师南下之势。叶名琛又立刻赶到韶州,稳定了局面。到年底,叶名琛接替徐广缙任两广总督并兼办理外交事务的钦差大臣,而徐广缙则改任专事征剿太平军的钦差大臣。1853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太平军于3月攻陷南京,改名天京,定都于此,顿时全国震动。叶名琛奉命派出一批又一批军队到华中同太平军作战。而太平军则不满足于占领南京,继续派兵北上,远征北京;并派遣细作潜入广东,企图煽动大规模起义。叶名琛在广东已面临“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可是,他也许没有意识到危险,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他已身受君命,不由自主,故仍忙着调兵遣将,派出大批军队、调拨大量物资到华中帮助征剿太平军,与此同时,他还不得不分心于外事。包令于1854年4月任英国驻远东全权公使后,要求与叶名琛会面,叶无可奈何,以自己要主管几省戡乱事宜分身乏术为理由,拒绝了包令的要求;^[52]而包令坚持要会见叶名琛。可是,当叶名琛同意在虎门或者就在广州城外的商业区同他会面时,包令又变卦

了,他一定要在广州城内会见叶名琛。后来包令在9月份去上海,要求修改条约。清廷则要他返回广州商议。叶名琛被包令搞得心烦意乱,那时国内的危机又大大削弱了他的力量。所以,1854年广东发生大动乱时,他显得准备很不充分,精兵都不在广东,又缺军费。当时,数以万计的秘密会众揭竿而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省城。叶名琛不得不为生存而搏斗。他坚定沉着,一步一步地击溃了义军。叶名琛指挥果断、有胆有识,终于解了广州之围,博得了大学士的加衔,这是他一生事业的巅峰。

1855和1856两年仍然烽烟遍地,因为官军千方百计要重新控制珠江流域。逐渐地,西江一带的义军主力被赶到广西,北江一带的义军被驱入湖南,东江一带的义军被迫转进江西。大股的义军被击退,并不等于可以高枕无忧,无数的小股义军仍然威胁着乡村地区,要控制这些地区非常困难,收复广大乡村的恶战延续到1856—1857年;离开了广东的义军主力,还不时有突破叶名琛的防线沿西、北、东三江顺流直下广州的可能。为了先发制人,叶名琛不得不派大批部队,越过省界,把主要的几股义军拒于省外。就在这时,爆发了中英之间的第二次战争。这场战争是由1856年10月8日发生的“亚罗号”事件引发的。叶名琛陷入了困境:他不但无法调回在广州被围前后派赴华中地区的军队,而且在英国的军事挑衅开始之后,广东仍要“调兵济饷”支援江西;^[53]他的另一部分军队正在乡村同义军周旋,还有一部分军队则要守卫省界,如果撤回这些军队,义军就可能重新集结,再次包围广州,甚至可能与英国人联手。这样,官兵从农村、从国外都得不到给养,省政当局就难以维持了。因此,叶名琛只得在几乎没有任何正规军可供调遣的情况下,同外国人讨价还价,解决争端。他先是想说服敌人,继而又下令中止同他们的贸易关系,企图借此慑服他们。这两手都失败后,叶名琛只好尽量使用可以调动的

兵力,包括练勇在内,同英国人打持久战。所以亚罗战争停停打打,足足拖了一年零两个月,直到英国人突然来了大量增援部队,并同法军联合起来以后,战局才发生了根本变化。叶名琛猝不及防,终告失败。1857年12月29日广州陷落,1858年1月5日叶名琛本人也束手就擒。

注释:

- [1] 萧一山:《清代通史》(台北,1963年)卷2页87—146。
- [2] 同上,卷2页209—227、261—270、276—280;何姆:《清季名人录》页288—290。
- [3] 张歆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页16—19;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1页200—208。
- [4] 邓嗣禹:《太平天国与西方列强:比较研究》(牛津大学出版社,1971年)页29;F. H. H. 倾恩:《中国之货币与货币政策,1845—1895》;W. J. 彼德逊:《十九世纪初货币观与铜银兑换率》,载《哈佛东亚研究中心中国文化》1966年第20卷页23—53;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上海,1955年)。
- [5] 邓嗣禹:《太平天国与西方列强:比较研究》页20。
- [6] 见第六章。
- [7] 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附录1;同书页270。
- [8] 马克·艾尔温:《中国历史之规律》,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
- [9] W. 拔拉夫:《马来亚之中国秘密会党》页16—20。
- [10]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2页246—351。
- [11] 同上,卷2页289—293;胡长度:《清季对黄河之治理》,载《远东季刊》1955年第14卷4号页505—513。
- [12] 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页229。
- [13] 梁仁彩:《广东经济地理》(北京,1956年)页1—5。
- [14] J. A. G. 罗伯兹:《土客械斗》(牛津大学博士论文,1968年通过)页23所引 M. 马蒂尼《满汉战争史》(巴黎,1654年)页155。

- [15] 谢国桢:《清初禁海内徙》,载《中国社会与政治科学导报》1932年第15卷4号559—596页。
- [16] 罗伯兹:《土客械斗》页26。
- [17] 邓嗣禹:《太平天国与西方列强:比较研究》页16;陶成章:《教会源流考》,载罗尔纲《天地会文献录》;韦文:《门前怪客:华南之动乱,1836—1861》页117—125。
- [18] 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页283。
- [19] 同上,页52。
- [20] 罗伯兹:《土客械斗》页2、37、11;H. J. 文恩 L:《中国向热带迈进》;C. P. 弗兹佐鲁德:《中国人向南扩张》;罗香林:《客家史料汇编》(香港,1965年)。
- [21] F. O. 931/163号,冯阿茂的供词(1851年春)。冯阿茂为冯云山弟,往广西途中发现哥哥的真情,便带领全家返回花县,后被捕。
- [22] 弗雷文:《中国东南部之公尝结构》,伦敦,1965年版,页1。
- [23] 弗雷文:《中国的公尝与社会:福建与广东》,伦敦,1966年版,页115;郎擎霄:《清代粤东械斗史实》,载《岭南学报》1935年第4卷2期。
- [24] 萧公权:《中国农村:十九世纪中央对地方之控制》,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页365。
- [25] “公尝”在英文原著写为 lineage,有“血统”、“系统”之意。
- [26] 何炳棣:《王朝时代晋身之阶》纽约,1962年版,页209—213;陈翰笙:《中国最南部之农业问题》(上海,1936年)第2章。
- [27]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7页5—6。
- [28] 萧公权:《中国农村:十九世纪中央对地方之控制》页383。十九世纪广东佃户占农村人口比例为75%。
- [29] 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日记》,引自萧公权《中国农村:十九世纪中央对地方之控制》页385。
- [30] 陈翰笙:《中国最南部之农业问题》页58;仁井田陞:《中国法制史研究》(东京,1962年)第3册,页217—226。
- [31] 胡先晋:《中国的同宗及其作用》,纽约,1948年版,页90,引自韦文

《门前怪客》页110。

- [32] 韦文认为:“到了1854年,中国社会向贫富两极分化,‘宗族’也无法调和阶级利益冲突。”(《门前怪客》第10章)
- [33] 萧公权:《中国农村:十九世纪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页46—47。
- [34] 同上,页52、59。
- [35] 梁仁彩:《广东经济地理》页9—10;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上海,1937年);蒋廷黻:《广州政府与公行,1839》,载《中国社会与政治科学导报》第15卷4号(1932年)页602—607。
- [36]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1页410。
- [37] 萧公权:《中国农村:十九世纪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页381。1723年的一份上谕。
- [38] 罗尔纲:《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载《中国社会经济季刊》第8卷1期(1949年)页49—52。
- [39] 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页203。
- [40] 文恩士:《中国向热带迈进》页11。
- [41] 千家驹:《广西省经济概况》(上海,1936年)页1—22。
- [42] 罗伯兹:《土客械斗》页82。
- [43] 费正清编:《中国之世界观》,哈佛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页4。
- [44] 同上,页261。
- [45] 见《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北京,1963年)。
- [46] 费正清:《满清之怀柔政策,1843》,载《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第14卷4号(1939年)页469—484;费正清:《中国之通商与外交:五口通商,1842—1854》,哈佛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7章。
- [47] 见第4章。
- [48] 同上。
- [49] HF卷213页15。
- [50] 见第10章。
- [51] HF卷222页29。
- [52] F. O. 931/1695号,叶名琛致包令照会(1854年4月25日)。
- [53] HF卷217页10。

第二部分 政 绩

第三章 政绩(一):驾驭士绅

第一节 职责与实践

叶名琛 1846 年底到广州任广东布政使;1848 年 7 月擢任广东巡抚;1852 年署两广总督兼外交事务钦差大臣,次年 2 月实授,直到 1858 年 1 月被俘前,他一直担任此职。要了解他担任这四个不同官职时都起了什么作用,就要知道当时清朝制度规定这些官职的责任范围是什么,而更重要的是要弄清楚叶名琛就任这些官职时实际上做了什么事。

钦差大臣与两广总督

办理外交事务的钦差大臣一职,自 1842 年签订《南京条约》以来一直是由两广总督兼任的。首任此职,乃是以妥协政策著名的耆英。他的妥协政策收到一定效果,直至 1847 年强烈反对他的外交政策的徐广缙和叶名琛先后到广州赴任,他才无法继续实行。^{〔1〕}第二年,徐广缙终于接替了耆英的职务,叶也当了巡抚。耆英把钦差大臣的职务看得比两广总督重要,而徐广缙则与之相反,这种变化是与当时国内危机越来

越突出的形势相适应的。

总督与巡抚

总督“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巡抚则“提督军务兼理粮饷”，但巡抚又非总督属官，因此督抚同城，时有矛盾。^[2]1847年徐广缙等反对耆英，迫使耆英去职，即是一例。^[3]所以考察叶名琛先与徐广缙，后与柏贵相处的关系，很有必要。他与两人关系融洽与否，是他作为行政长官的成败关键。

同僚之间的亲密关系说到头是建立在施政观点和方法一致的基础上的。徐广缙和叶名琛于很多问题的态度非常一致。1849年柏贵在一份奏折中说：“两院议决公事，诚信无二言，督抚协调如此，实属前所未见。”^[4]〔原件是英文，此为倒译。——译者〕例如，在外交政策上，他们都认为应采取强硬路线。1849年入城危机时，尽管皇帝已答应暂时让步，但两人上奏，言词激烈，力主不能让英人进入广州。他们还向英国方面递交了关于继续不准外国人进广州城的所谓“假圣旨”。^[5]他们这样做显然要冒丢官的危险，但是危机一过去，两人都受了封爵。从此之后，就有所谓“叶巡抚与徐总督时常在公议堂暗中设计，必有预防之策”的佳话。^[6]他两人志同道合，成了莫逆之交。

但是，使他们伤透脑筋的不仅是外忧；当他们来粤赴任之初，内患已连袂而至。与入城危机同时，广东北部，不久后是西部，都爆发了起义。陆路提督无力剿灭义军，^[7]督抚尽管政务繁重，迫于形势，也不得不亲临战场指挥。于是，徐广缙和叶名琛轮流坐镇广州。1851年，叶名琛到粤北作战，徐广缙在广州督理政务。1852年，徐广缙赴罗定作战，叶名琛则留在广州。两人虽各处一方，平均二至三天就有一次书信往返，^[8]随时商议大计。在信中，他们或讨论政治财经问题，或评论下级优劣，或研究奏稿内容并

商定上奏的适当日期;有时则交流军事情报,传递机密文件,徐广缙在一封信中说:“李北社等犯似应赶紧具奏,免落后手。”^[9]他在另一信中写道:“刘守之事,诚如来示,总俟罗境蒇功,开入请奖单内,此刻自以不奏为妙。”以下内容则摘自徐广缙给叶名琛的另一些信件:“顷接青莲密咨,折档未知何日拜发,兹特附呈,阅后仍望发还。”“今续读来示,始知种切,前函自毋庸议。”“清协才具过赖,竟难胜此重任,是以折内不得不斟酌其词。考语即用年终密考,一字不移。倘南雄赵协年前回省,拟即令其接署。”^[10]由于信件不全,很难确切弄清他们讨论什么问题。但从这些断笺残简,也不难看出徐、叶二人合作十分融洽。

徐、叶私交也日深一日。徐广缙在罗定同义军作战时,其妻染病在家,叶名琛亲往探视两次,并把医生所开的药方和病情好转的情况写信告知徐广缙。徐致叶的信中也总要写上“老伯大人前祈叱请□安”的话。^[11]徐广缙在罗定督战近一年,进展不大,而广西的形势又越来越吃紧,于是皇帝就派他赴桂会剿。^[12]罗定战场必须有人接替。此事成功的希望甚微,而战败后失宠于皇帝的可能性极大。尽管如此,叶名琛决意挑起这副担子。徐广缙十分感激,在信中对叶名琛说:“忠荃为怀,不分畛域,俾得抽身赴梧,上符圣意,下顺輿情,虽至好不事浮词,而抚衷莫名感激。”^[13]

1852年底,徐广缙因战争中“畏葸不前”,被革职拿问。叶名琛就继任两广总督,柏贵升任广东巡抚。以后徐、叶二人的关系就没有什么史料记载了。^[14]在此以前,两人亲密无间,是有大量事实为证的。当叶名琛名义上只是巡抚的时候,这种友谊使他有大量的机会行使最高行政长官的职权。

现在我们来研究叶名琛同柏贵的关系。两人自1853—1858年在广州分别担任督抚近五年。叶名琛与柏贵虽然均是方

面大员,但是极不相同的两种人。叶名琛是钦差大臣、太子少保、两广总督和一等男爵,柏贵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巡抚,并且叶名琛又比柏贵年轻有为。单就这些差别,已足使柏贵自惭形秽,更不要说他在1848年任过广东督粮道,1849年任过按察使,同年9月又任布政使,这些都是叶名琛属下的职务,他早就习惯于听命叶名琛。再者,柏贵是蒙古人,叶名琛却是汉人,这也是一大差别。柏贵认为叶名琛是位难以接近的上司,正如有人批评叶“性木强,勤吏事,治两粤久,属吏惮其威重,皆不敢违”。^[15]柏贵每接谕旨,都必须送给叶名琛一份副本;^[16]反之,则未必尽然。除非叶名琛所接的谕旨同柏贵有直接关系,才抄送柏贵。叶名琛在“亚罗战争”中栽了跟斗后,柏贵和同僚就联名具奏,指责他搞外交独断专行,从不征求同僚的意见。^[17]

省级文官

省一级文官有四名:布政使、按察使、盐法道及督粮道,另有一名独立性很强的官员(至少按制度来说是如此)——粤海关监督。^[18]

布政使的主要职责之一,是督促各地方官按定额征收地丁和各种杂税,并按时上缴。^[19]1847年叶名琛任此职时,除了督促各道台和知府外,还亲自委员催征。^[20]升任巡抚后,仍要管这件事。1848年,他就因所征额税尚差一成而被罚俸三月,共罚银三十八两七钱五分;1852年,他又因征税差二成而被降薪两级(两年约少收入三十七两五钱)。^[21]总督本不必再亲自顾问此事,但叶名琛升任此缺后,正处在动荡不安的五十年代,为确保财政收入,他仍加紧督促属下官员尽可能多征税收。他还不断派专人催逼地方官员办好此事,同时要求布政使每十天给他一份有关税收的报告。^[22]从1852年起,由于经

常发生起义,税款每每不能按期上缴,每逢出现这种情况,叶名琛就恳求皇帝宽限时日。^[23]

按察使,顾名思义,是省内的执法长官。但他的职责也不仅于此,比如,他也可受命带兵打仗。事实上,五十年代广东按察使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戎马倥偬中度过的。1850年和1851年,按察使祁寯藻在粤北同叶名琛并肩作战;按察使沈葆辉是员勇将,在1854—1856这关键的几年里,在好几场大战中都冲锋陷阵。这期间,一切执法事务都由臬局负责。臬局是叶名琛为了发落大量押往广州的义军俘虏而建立的特别法庭,按察使只是个挂名头头。叶名琛要臬局每隔十天给他报告一次义军俘虏被正法、正在服刑、已释放或仍被拘留的人数。^[24]叶名琛经常亲自提审他认为可以提供重要情报的俘虏。^[25]他声称“凡杀一人,必经他亲自审判过”。^[26]

盐法道负责另一重要的税收来源——盐税。叶名琛任总督期间,由于财源极度枯竭,他要求盐法道每天给他一份盐税收支清单。^[27]运同驻潮州,与广州相去甚远,虽不能如盐法道一样每天报告,但每月循例向叶名琛递交月报,汇报天气以及食盐生产和销售情况。^[28]

督粮道掌管漕运,^[29]兼及屯垦。^[30]对于漕运,叶名琛连一些细节问题都亲自过问。^[31]

上述四位官员,在广州各有各的衙门,各谋其政,但叶名琛同四个人的关系都很密切,管得也宽。事实上他不是一个单纯的治官之官,而是个做实际工作的行政官员。更重要的是,叶名琛为统一思想和行动,以对付各地义军,1854年6月把这四名官员联合起来,组成了军需总局。这是一个应急的机构,极少处理民事,主要是制定作战计划,组织练勇,筹措粮草,即凡与清剿义军有关的事项都得办理。

粤海关监督在省里是较为独立的官员,他在外贸中征收的税款不通过藩库,而直接上缴北京。然而,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朝廷为了应付庞大的军费开支,皇帝再也无法具体规定广东应从何处敛财养战,他干脆只提出一个数目,至于通过什么渠道弄到这笔款项就不管了。这样叶名琛就可以控制一切财源,包括粤海关收得的税款在内。自五十年代初起,粤海关监督每隔五天就要给叶名琛写一份有关财政的咨文。^[32]

表三 两广主要文武官员薪俸及养廉数目

官 职	薪 俸(两)	养 廉(两)	养 廉(粮食,担)
(广东)			
总督	180	15000	
巡抚	155	13000	
布政使	155	8000	
按察使	130	6000	
盐法道	130	6000	
盐运使	105	2000	
督粮道	105	3400	
粤海关监督		2500	
道台	105	3000	
广州将军	605	1500	120 石
副都统	511	700	105 石
陆路提督	605	2000	
水师提督	605	2000	
总兵	511	1500	
(广西)			
巡抚	155	10000	
布政使	155	6000	
按察使	130	4920	
盐法道	105	2200	

此表数字来自 F. O. 931/337(III 编号) 札,时间可能是 1865 年,稍后于叶名琛任两广总督时。不过,由此表我们仍可推知当时官员的薪俸及养廉收入情况。

省级以下的地方官

道台:共五员。^[33]道台所辖地域辽阔,督抚对他们不敢放松。比如1851年,新任的惠潮嘉道曹履泰自京抵穗,徐广缙和叶名琛都亲自召见。曹到任后,徐和叶专门派人监视新道台的一举一动,直到他们对曹满意为止。^[34]叶名琛任布政使时,署肇罗道刘浚被控贪污暴虐,因为刘浚以前当过潮州知府,所以叶名琛就在1847年利用去潮州的机会调查他的情况,次年春,叶去高州,搜集了更多有关他的情况,当查据所控不实,叶名琛就会同徐广缙具折为刘浚辩诬。^[35]

知府:各府之中,以广州府的权力最大,威望最高,他时常参与省一级的政务。例如,叶名琛任布政使时,就曾嘱广州知府列出全省拖欠税款的府县名单;当了巡抚以后,仍然保留这个习惯。^[36]

知县:地方最低级的行政官员。叶名琛对这一级的问题也要管。比如1856年,洪兵在陆路被击溃,移师海上,骚扰沿海一带。若要安定这些地方,抵御侵扰,沿海各县必须同心协力,各派战舰若干,在海上联合巡逻。但是,各地知县对这问题一直不能达成协议。主管官员无可奈何,只好稟请叶名琛传谕各有关知县通力合作,并且表示,如果不这样做,则此事势必告吹。^[37]由此可见叶名琛连县一级事务也得具体管到。

在人民大起义期间,知县也管军务。下面是一个例子:1850年,安徽布政使蒋文庆向皇帝建议,各道台和知府应以台湾的同僚为榜样,因为他们可以指挥军队作战。皇帝责成徐广缙和叶名琛研究这一建议,他们回答说,在广东,不仅道台和知府可以用兵,就连知县也常常亲自带兵到乡村去搜捕不法之徒,这是为了对付好勇狠斗的当地居民而被迫采取的办法。^[38]广东的知县因

熟习军事,在五十年代镇压洪兵时为叶名琛出了大力。长江一带的地方官员,为太平军积威所慑,望风而逃。对比之下,珠江一带的朝廷命官,在洪兵进攻时极少弃城出走的。他们或是力战死守,或是先失了城池然后又收复回来。这并非说一介书生只要到了广东便可以在一夜之间变成能征惯战的勇将,根本的问题在于上级如何下功夫训练他们。1853年6月,署潮州知府吴均向叶名琛禀称,惠来知县优柔寡断,实际上纵容了犯上作乱之徒,但他又说,鉴于该知县还年轻聪敏,可以依例调到形势不是那么吃紧的地方去,边干边学,积累经验。^[39]

叶名琛一开始外放,就做知府,故对于知府和知县的提职与调任那一套规定,早已熟悉;任督抚后,对地方上的事情又甚为关注,所以,极少出现他推荐错人的事。在他的档案里也有一份文件,记录了他因不按规定保举而被罚俸的事。^[40]但是,这些破例保举的人,如吴昌寿和车任重,后来在镇压洪兵时的表现都很突出。叶名琛坚持量材录用、各得其所的原则,而不把那些妨碍政府提高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陈规陋习放在眼里。

军法规定,失陷了城池的官员都要处死。朝廷不甚清楚在镇压起义时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因而强调要执行上述法令。叶名琛却处在第一线,对形势更为了解,某个城池失守后,他总是千方百计把前因后果搞清楚。听取多方面的报告,包括负责守城的主要官员本人、城内的士绅、他布置的眼线或派出专门搞调查的官员的报告,如果能找到目击城破的人写给亲朋的私信,他也要仔细研究。^[41]也许这些材料互相矛盾,但一旦叶名琛认为这个部下是无罪的,他就不顾来自上面的压力,竭力为此人辩护。^[42]如果他的下级能把城池收复,叶名琛就更加理直气壮,朝廷也无话可说了。就这样,他手下许多官员不但没有丢掉脑袋,而且保住了顶戴。^[43]叶名琛这样做不只是因为他通情达理,还因为他受形势

所逼,不得不如此。如果他把丢了城池的官员一一处死,攻打洪兵的军事行动就会半途而废,因为关键时刻调换官员会给战事带来极大的困难。此外,人们都不愿意到那些动乱的省份去做官,即使被委,也借故拖延,不去赴任,以致后任脱节。

另一方面,县官战死也是件大事。以署鹤山县令马斌为例,考察一下叶名琛是如何处理这一类事情的。1854年,马斌力战不敌,城破被擒,骂声不绝,终于被杀。叶名琛知道以后,下令广州知府调查此事,广州知府又委派南海知县华廷杰具体承办。后来叶名琛根据华廷杰的报告奏请赐恤。皇帝同意赐给马斌谥号,马斌之子受荫并领其俸禄。办理这项手续的命令通过叶名琛转辗到华廷杰手里,他让马斌的儿子写一份说明自己是已故知县儿子的材料,然后签名,华廷杰以证人身份也在这份文件上签字。这些文件又一层层送到皇帝手里,然后才正式颁赏。^[44]叶名琛手下的稿吏为数并不少,但因为阵亡的官员太多,所以办理此项事情也忙得不可开交。可是,为了保持士气高涨,叶名琛在为这些人请赏时尽量做到不使有所遗漏。

广东和广西

广东和广西名义上统归两广总督管辖,实际上并无太多紧密联系。总督行辕向来设在比广西富庶得多、重要得多的广东省,所以总督很自然就把大部分时间化在处理广东的事务上。自1844年起,两广总督要兼任外交事务钦差大臣,这样就更难有时间管广西的事。另外,两省省城相距遥远,这又增添了一重困难。1852年3月,皇帝命徐广缙为参加平定何名科起义的两广文武官员论功。徐广缙复奏说,广东方面的工作他一定去办;至于广西方面则建议由钦差大臣赛尚阿和广西巡抚郑祖琛负责办理。^[45]

在镇压农民起义时,两省各扫门前雪,这样又扩大了分歧。后来,广西日益穷困,广西的官员竟提出对广东的食盐征税,广东官员极为愤慨,两省的不和便公开化。这就表明,广东官员把广西看成同其他邻省一样,是彼此独立的、甚至是不友好的紧邻。^[46]

叶名琛于两广由省到知府各级官员的情况,照例每年要出具考语,密奏皇帝。这件工作虽年年及时完成,然而他主要负责反映省一级官员情况,至于省级以下的官员情况,他就靠省级官员提供。^[47]叶名琛的足迹从未到过广西,可想而知,他根本就不可能很了解广西各道台。难怪广东的洪兵平定以后,叶名琛派官员沿西江进入广西,帮助镇压那里的起义时,广东军队竟被视作路人。所以,与其说叶名琛是统管两广的最高行政长官,还不如说他只是广东一省的最高行政长官。

叶名琛同北京的关系

朝中大臣常因不察下情而乱发号令,地方官员对此只能小心应付,以免开罪他们。这既要有圆滑的政治手腕,又要在京师有人帮忙、撑腰。两个条件叶名琛都具备,这在第一章里已经说过。比如:1852年,叶名琛在广州向各富户募集军费,工作进展顺利,这时,户部突然下达一道命令,制造许多阻力,使募捐活动趋于中断。叶名琛既没有把情况奏报皇帝,也没有直接给当时在朝中权势显赫的祁寯藻写信,而是请也参加了募捐活动的、祁寯藻的门生王汉桥给祁寯藻写信,详细地阐明了这道命令引起的困难。祁寯藻很自然就向叶名琛了解详情,叶名琛便抓住机会说服祁寯藻收回成命。事实上,祁寯藻是他的父执,信中自称年侄,他满可以就此事直接写信给祁寯藻,但他却不那样做,这显示了叶名琛手腕之圆熟。^[48]

第二节 办学与考试

一省的教育和考试,由学政专门负责。时局动荡之秋,督抚常无暇顾及。而叶名琛则不然,仍积极过问。他这样做是希望得到士绅阶级的支持。一个人是否属于绅士阶级,在欧洲由其血统决定;在中国则需通过考试。考生于赴考前都在学校或书院里读书。叶名琛就在很艰难的岁月里仍然关心、资助这些学校和书院,考试时他又主持公道,于是,他不但保障了人才的来源,而且培养了这些人对他的耿耿忠心。如果没有绅士阶级的全力支持,叶名琛可能早就被洪兵的浪潮所吞没。因此,绝不能认为办学与叶名琛关系不大,相反,就是说关系最大,也不为过。叶名琛能注意及此,足见他是很有政治眼光的。

办 学

清代,每省都有两种教育机构,一是学校,一是书院。学校古已有之,只起督促学生自学和举行考试的作用,并不传授知识。因此,宋、明以后,旨在进行真正的教学活动的私立机构——书院,就应运而生,“以匡翼夫学校之不逮”。^[49]由于对外贸易发达,广东积累了雄厚的资金,书院便越来越多。到了清代,这些书院由国家统管了起来,在政府的扶持下,继续发展。至1847年,广东有298所。叶名琛在广东任上新增设的为28所。^[50]

书院又可分为二种:一种是只管讲学的,另一种除讲学外,还兼管“乡约”。^[51]第一种书院旨在“养士”,“士行为风化之本,国家以得士为先,民俗转移,而天下承平,胥由于此”。^[52]所以它起了效率很高的宣传部门的作用,书院的大部分学生成了当时政权死心塌地的卫道士。叶名琛作为一个有见地的行政官员,于国家

板荡之秋,仍然保障书院几乎不受影响。他不让军费开支危及教育经费,确保书院的预算和教师的束脩不减。清代向有指拨某种收入作某种支出的惯例。书院同其他许多机构一样,经费来源有一部分是政府存在钱庄里的钱的利息。起义发生以后,收入来源减少,从而影响到许多部门的开支。但是叶名琛力持己见,不让教育部门受过大的损失。他拒绝以教育经费充作军费。^[53]他认为即使办学不能说比养兵更重要的话,至少是同等重要的。例如:1854年南雄府形势危急,眼看就要落入义军手中,当地官员和士绅决定从该府的书院经费预算中拨出大部分钱(约600两)作为城防经费。但是,因为他们知道叶名琛的政策不容许这样做,所以此后再也没有采用过这种应急办法。^[54]

叶名琛手中有足够的钱,就有可能精心挑选那些热烈拥护他的人来当教师。甚至在1857年——他在广州的最后一年,同时也许是处境最困难的一年——他还命有关人员给他作个报告,内容是各主要书院聘请教师的情况,其中还附了一张没有上缴的季度汇报的书院名单。^[55]大多数学生都领膏火银,这一项是书院最大的财政支出。1745年有一道谕旨规定:“通行各省督抚会同学政,将现在书院生徒,细加甄别,务使肄业者,皆有学问之人……”^[56]这样,叶名琛就更可以执行上谕为理由,名正言顺地挑选合他意的学生。每年的书院入学考试就是叶名琛挑选学生的好机会。已经在学的学生也要参加这一考试,如果不合格就要辍学。整个考试过程和每年的启馆仪式要由总督主持,其中繁文缛节不少。^[57]尽管如此,叶名琛似乎仍然一丝不苟地按时出席了所有这些仪式。这也许是他意识到,要赢得公众舆论(其实是士绅的舆论)的好评,履行这些公职必须一丝不苟,在关键时刻尤需如此。后来,他花在这些书院上的时间、金钱和精神终于得到了酬报,为了帮助他镇压义军,学生和士绅们不惜变卖田产,甚至牺

牲性命。

另一类书院叫乡约,更通常称之为社学,是政教合一的机构。比起前一种书院来,这一种的政治色彩更浓,政治影响更直接。它们是基层的政治组织中行之有效的自治形式,帮助解决争端,培养老百姓的社会责任感。^[58]1854年洪兵大起义时,一切机关团体都军事化了。在叶名琛敦促下,全省成立了数以千计的乡约,这些乡约已不再是什么书院,根本不可能上课,它们只不过是把四乡百姓组织起来保卫村坊的练勇队伍。在番禺县慕德里司,叶名琛曾派专人去组织社学,在当地士绅的协助下,把该司的360个村庄组成17个社,目的是成立练勇并征集练勇所需的军费。^[59]

学校的作用和课程设置同书院大同小异,它们的学生也参加科举考试。但是,如上所述,学校只监督学生自学,并不授课。学校里的学生如果想到书院去听课,必须通过书院的入学考试,成为书院的学生,才有权那样做。学校的学生必须是通过童试的生员,学校的教师都是有等级的文官。十九世纪中叶广东的学校学生额数为39116人。^[60]到了叶名琛在广东时,如果学校的毕业生人数众多,而官职有限的话,就会成为政府伤脑筋的问题,因为这些人肯定对政府积怨日深。叶名琛的办法是利用这些人的过剩精力为他服务。他委派他们担任各种专差,或充当练勇的领导。于是他们不因无官可做而对政府不满,反而群集于叶名琛门下,要求干份外的工作,不计报酬,甚至无偿地工作也愿意。因为这样他们就有机会显示自己的才干,希望最终能得到政府的任命。

科 举^[61]

科举制度是施政的重要环节,因为那是政府挑选官员的渠

道,绝不可掉以轻心。1854年与福建省毗邻的广东几个县城被起义军包围,各知县向广东潮州知府吴均求救。时值潮州举行科举考试,吴均明知唇亡齿寒,然他考虑再三,担心对考试处理不当会引起严重后果,故拒绝出兵。^[62]同样,1856年,署理惠州知府海廷琛正在龙川、和平同义军大战,可是府试时间到了。如果再坚持一阵,他便稳操胜券,但他决定不那样做,向叶名琛禀明原委,撤兵回府,主持考试。海廷琛撤兵之后,形势急转直下,但他对告急文书置之不理,继续主持考试。^[63]到1855年,连叶名琛自己也面临着是否停止对洪兵作战来按期举行乡试的抉择了。那时,广州刚解围,其他地方仍为洪兵所占据。考生们恐怕到不了广州就会在路上送命。考虑到这些情由,叶名琛最后只好奏请皇帝将乡试推迟一年,“特开一科”。^[64]

按制度乡试只需巡抚监临,但叶名琛被提拔为总督后仍然过问此事。1856年举行考试时他亲自审定试题,监督印卷工作。不过,说到清除乡试中的各种弊端,那还是他在巡抚任内所办的事。

1849年乡试期间,叶名琛派出的细作遍布广州,大量搜集考生作弊的情报。在此基础上,开列了一份有行贿钻营、请枪代庖嫌疑的考生名单。^[65]随后,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完全粉碎了违法乱纪者的计划。于是,连最大胆的卖关节老手也不敢轻举妄动了,而“外间积惯枪手如陈梅修、杨懋建等均各退手不敢代作。……积弊一清,寒士戴德无涯矣”。^[66]这也许是士绅们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协助叶名琛镇压洪兵的原因之一吧。

叶名琛的除弊措施并不限于贡院之外,^[67]在考棚内也有预防作弊的办法。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他采纳了一些建议。通常考卷是天还未亮时就发给考生,而考生则在前一天晚上就进了考场。在夜色昏暗之中,想作弊的考生就容易把考卷递出场外。针

对这种情况,叶名琛决定不那么早发考卷,先拿出约一百份考题张贴在考棚里,让考生们先看,然后到第二天天色大亮才发考卷。^[68]并且还定出详细的防止考棚内外通同作弊的措施。

从这件事看来,叶名琛做官确是一丝不苟。当然,他也希望因此而能在士绅的心目中留下好印象。在广东任职期间,叶名琛真是渴望广东的考试能够搞得公正严明,考试的财政预算能不受某些军事方面紧急开支的影响。^[69]

第三节 士绅的作用^[70]

当时广东人口二千一百万,其中士绅只有三万八千六百三十八人,^[71]仅占极小部分。然而士绅一直是各自宗族的领袖,也是宗族械斗的策划者、指挥者。上面讲过,广东的士绅同其他省的不同,他们是族姓之间械斗的领头人,因此,也是动乱的制造者,而不单是和平卫士。广东的宗族械斗非常普遍,至使刑部不得不于1823年规定,处理集体械斗命案要与一般的命案有所区别。^[72]但是,叶名琛在五十年代的任务却不是去区别集体械斗和个人仇杀,而是分清什么是械斗,什么是谋反。事实上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要知道他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来广东以前对这里的民风不甚了了。如果他把集体械斗也看成是向他的权力挑战而加以镇压的话,那就很可能把械斗双方都逼反。比如在动乱的五十年代,他就把土客之争同武装暴动区分开来。但是,两种战争同样都引起大破坏,而且前者的破坏性更大,因为这种械斗的目的往往是毁灭整个村庄,不分老少斩尽杀绝。只有这样,胜利者才能霸占对方的田产。如果叶名琛像广西当局一样盲目地支持本地人的话,客家人就很可能群集于秘密会党的大旗下,壮大了起义军的力量。然而,叶名琛首先是对付那些打起旗号公

开同朝廷作对的队伍。直到 1856 年他基本上掌握了主动权,遏制住义军以后,才把注意力转到西江两岸不断发生的非政治性暴力行动上。他首先派人去调查引起冲突的原因,冲突双方有哪些村庄或宗族,打了多少次仗,有多少人参加,死了多少人,烧毁了多少村庄等等。另外,最重要的是查明这战争是暂时的还是长期的。然后,他派按察使沈棣辉率大军开入西江两岸地区,但并非前去作战,仅为慑服冲突双方,帮助他们解决争端,同时把领头人交给官府。^[73]

叶名琛很有办法驾驭士绅,使这批人无报酬地为他服务。起义还在酝酿的时候,他们就把本村图谋造反者的名单呈送叶名琛。起义发生后,叶名琛又命令他们阻拦族人,不让参加。他重兴保甲制度,命令士绅们在各家门前钉上门牌,上写各户姓氏人数,以便检查居民流动情况。^[74]士绅们还帮助叶名琛做了一件很重要的瓦解义军的工作。他们为村中被裹胁参加义军的农民作保,为他们领取免死牌。这样,很多一度参加过起义的农民又得到重做良民的机会。当洪兵起义被平息以后,参加过洪兵的人陆续回村,士绅们又受委把嫌疑分子名单交给叶名琛,从中搜捕洪兵首领。另外,他们重新安顿那些以前违心参加过洪兵,现已被赦罪的人。^[75]对于那些特别动乱的村庄,叶名琛派密探监视,随时向他报告形势的变化。东莞县司马乡即是一例。密探负责打探该乡周围三十里内的情报,开出这一地区十九个村庄的清单,标明每村有多少族姓,多少人口,谁是煽动闹事的人等等,并且汇报各村士绅或族中长老的情况,特别是他们在族人中的威望如何。最后,他还要估计一下各村距离动乱最厉害的司马乡有多远。^[76]

如果发现某姓族人藏匿被通缉者,当局就以掘祖坟、毁宗祠相威胁,强迫他们逮捕这些要犯。在一个名叫九江的小镇发生过

这样的事,一位名叫关巨的洪兵首领以该地作为大本营,后因官府缉捕甚紧而逃离。叶名琛认为,关姓士绅对关巨的所作所为袖手旁观,实质上已犯了纵容包庇之罪,他们在关巨逃走之后,虽悬厚赏捉拿,仅为掩人耳目而已。也许关姓士绅并没有这种想法,但叶名琛就这样认为,或许他们是力不从心,可在叶名琛看来他们就是纵容盗匪。因为他要的是士绅们积极主动地效忠于他,甚至不惜性命。如果他们做不到,那就强迫他们去这样做。于是,他命令正在率兵追捕关巨的广州知府开具关姓士绅名单,革去他们的功名,查封他们的宗祠;如果他们再迟迟不交出关巨,就把他们拿赴广州严办。^[77]换句话说,叶名琛在村一级范围内的统治办法,就是让士绅们按照先贤训海,作平民百姓的表率,然后通过他们控制百姓。

在各村之间,叶名琛又说服各姓士绅联合起来,把他们的族人组织成自筹粮饷维护治安的练勇。“人则相亲,联其情而为比闾族党;出则相友,作其气而为伍两卒徒”。^[78]1854—1855年大起义期间,特别是起义后,这种组织纷纷出现,按规模大小分为屯、甲和社。社即社学,是最小的单位。上面讲过,社学本来是一种教育机构,到了五十年代,讲学活动已根本绝迹,它只不过是若干村庄村民集会之所,其作用仅是为了安定民心。这种新组织形式有时称为局或公局。在广州档案里,很多文件都是社、局通用的,都指同一种组织形式。不论是社还是局,在那些动乱的日子里起的作用是相同的,那就是招募兵勇,筹措军饷,协助官府对义军作战。它们还负责本地区的巡更保卫,盘查行人,捉拿败逃回村的洪兵战士,将他们捆送官府;更重要的是,社或局按照叶名琛的指示招抚裹胁,安置流亡。^[79]社、局其实等于官府在农村的代理机构,这样,官府就可以腾出手来全力对付洪兵。当然,这种政策也有副作用。士绅们在行政管理中有这么大的权力,这使本来

已经难以驾驭的地方主义情绪愈演愈烈,几乎不可收拾。不过那都是叶名琛继任人的事了。当然,叶名琛在任上曾同滥用权力的士绅打过交道。这是个很敏感的问题,因为士绅们手中有练勇,他们又是自筹粮饷的,不依赖官府供给,所以稍一处理不慎,就很容易逼反他们。广西的修仁县就发生过这种事情。^[80]

每当叶名琛听说某士绅有不法行为,总是先派心腹去了解事情经过。若查有实据,他就命心腹用甘言诱骗该士绅,说他有功,请他到广州去谒见叶名琛,接受奖赏。这个小军阀一旦离开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叶名琛就拿他开刀,惩一儆百。例如:1855年,张崇恪被命为位于粤北的连州知府。离穗之前,叶名琛就接见了,他向叶汇报了前任连阳车游击之二子盘踞州城,多行不法之事。叶名琛表示,张崇恪可见机行事,也可把车氏兄弟请来广州。张一到连州,进行周密调查,发现车氏兄弟在1854年9月22日连州城被洪兵攻陷以后,打着练勇的旗号,搜罗了惠潮嘉道的一帮无业游民,大肆抢劫、绑票。1855年4月2日城池收复后,他们又以追捕逃贼为名,变本加厉地为非作歹。最后,张崇恪列出了他们同案犯的名单,并把车氏兄弟一伙诱至广州。大概他们都被叶名琛绳之以法了。^[81]

不幸的是,尽管叶名琛在推行他的政策时对士绅恩威并施,有办法使他们服服帖帖,但是他却不能阻止他们维护并行使传统的特权,剥削广大农民。比如,1854年,博罗知县谢玉汉命令县城居民和附近九个乡的农民组织练勇,以对付人多势众的洪兵。为此,城里的士绅也组织起来,成立公局,帮助组办团练,把来犯的洪兵击溃。但是,那九个乡的村民却因此而要负担军费开支,以致生活窘迫。那一年又正遇上歉收,村民们只好请求住在城里的地主(其中韩姓最富)暂时只收六成的地租。韩姓士绅,以贡生韩师文为首,拒绝了佃户们的请求,并要知县代为逼租。谢玉

汉知道村民确有困难,劝韩师文接受他们的请求,暂时减租,并保证平息洪兵后一定让佃户们补交暂欠部分。韩师文大为不满,同其他地主商量后,以公局名义处决了不肯就范的佃农首领,声称他抗租,诬告他留下四成租子准备接济义军。这样,到年底洪兵再度围城,邻近九乡村民拒绝救援,县城终被攻破。1855年2月11日城池收复以后,县署惟一可以动用的资金只剩下留作赈济用的粮食。这些粮食既要用以救济无家可归的人,又要抽一部分用作修补城墙的费用。韩氏早就窥视这批粮食,提出要由公局掌握,给募勇发饷。谢玉汉不允,他们就联名上书叶名琛,控告知县贪污,还请一个在京做御使的同宗弹劾谢玉汉。

叶名琛下令详查此案,当确知谢玉汉无罪而系贪婪的韩氏士绅诬告时,他成功地保护了谢玉汉。至于1854年的地租纠纷,最后决定佃户们暂交七成,这是一个折衷办法。可是到了1855年,韩姓地主又扬言佃户们不但要交足当年的租子,就连上一年缓交的三成也要一并补齐,谁敢违抗,就以谋反论处,逮捕法办。至于这一次的纷争如何解决,史料无征,大概又是来一个折衷吧,因为身受盘剥的佃户根本不可能交那么多租子。^[82]

由此可见,士绅同百姓的关系就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一直充满着矛盾。甚至在战乱的时候,士绅的特权丝毫不受影响,因为叶名琛为了维持和平安定,不得不给予他们新的权力。

注释:

- [1] 胡凤丹:《叶公家传》;《怡和公司档案·私人信件》B4/7种352号,德·亚尔丹致当·麦迪逊的信,1848年2月24日。
- [2] 《清史稿》,北京中华本,页3336、3343;傅宗懋著《清代督抚制度》(台北,1963年)。
- [3] 《怡和公司档案·私人信件》B4/7种352号,德·亚尔丹致当·麦迪逊的信,1848年2月24日。

- [4] 转引密迪乐:《华人与其起义》页135。
- [5] J·劳地:《1849年“伪旨”》,载《亚洲研究》第20卷3号(1960年)页299—315。
- [6] F.O.931/830号,无署名奏稿,1850年。
- [7] 同上931/1006号,1849年4月22日上谕。
- [8] 由徐广缙给叶名琛写信的日期得出这个结论。
- [9] 这里徐广缙暗指钦差大臣赛尚阿和广西巡抚邹鸣鹤。李北社部活跃于西广边界,由两省合力围剿。
- [10] F.O.931/752号;1301号—1303号;1317号;1327号;1331号。这些都是1851年9月21日—1852年5月10日徐广缙致叶名琛函。
- [11] 同上1301号;1369号,1852年徐广缙致叶名琛函。
- [12] 同上1335号,1852年6月2日徐广缙的奏稿。
- [13] 同上1304号,徐广缙致叶名琛函,1852年6月14日。
- [14] 见第九章;F.O.228/第215卷,第107号附件1,包令致格拉兰顿的信,1854年8月1日及3日。
- [15] 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载《庸盦文续编》卷2页14—21。
- [16] F.O.931/1392号,1853年5月一份上谕的抄本,以及1453号,柏贵1854年春致叶名琛函。
- [17] 《清史列传》卷43页30。
- [18] 梁廷枏:《粤海关志》。
- [19] 瞿同祖:《清季地方政府》,哈佛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页130—147;王业键:《中国地税估计:1753与1908》,哈佛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
- [20] F.O.931/433号,秘密报告(1847年)。
- [21] 同上197号,对叶名琛罚款的清单(1855年)。
- [22] 同上276号及277号;1013号及329号,1853年8月14日—1856年11月8日藩库收支平衡表。
- [23] 同上264号,四会知县的报告(1852年)。
- [24] 同上1469号;1634号;1430号及1250号;1581号,审讯报告(1854—1856年)。

- [25] 同上 1757 号,关于顺德捕获一名盗贼的报告(无日期)。
- [26] 柯克:《中国》页 407。
- [27] F. O. 931/173 号;421 号;402 号、403 号、175 号—176 号,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盐法道报告。
- [28] 同上 274 号;1364 号,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一份运同的报告。
- [29] 王业键:《中国地税的估计:1753 与 1908》页 16。
- [30] 文恩士:《中国向热带迈进》。
- [31] 简单说,80% 的货物是粮食,船主可在空余的舱位里装上免税货物,还可以拨出一定数量的粮食供路上食用。对这种船只检查甚严,因为许多商人钻空子。
- [32] F. O. 931/318 号;319 号;175 号、320 号—342 号;322 号;328 号,1854—1855 年粤海关监督咨文。
- [33] 《清史稿》页 3354;《广东通志》卷 43 页 4。
- [34] F. O. 931/228 号,徐、叶合署的奏稿,1851 年 1 月 24 日。
- [35] 同上 126 号,1848—1849 年徐、叶合署奏稿。
- [36] 同上 174 号;262 号,1847 年—1848 年、1853 年广州府给叶名琛的报告。
- [37] 同上 1121 号,1856 年海盗为患的报告。
- [38] 同上 828 号,1850 年 11 月 27 日徐、叶合署奏稿。
- [39] 同上 1727 号,1853 年 6 月 9 日署潮州知府呈叶名琛禀。
- [40] 同上 345 号,1847—1856 年对叶名琛罚款之清单。
- [41] 比较 F. O. 931/1365 号;1535 号及 1175 号;1526 号,1852—1855 年呈叶名琛的各种禀帖。
- [42] 比较 HF 卷 168 页 16;F. O. 931/1662 号,1857 年 7 月 5 日及 10 月 6 日上谕。
- [43] F. O. 931/1527 号,洪兵攻陷城池一览(1855 年)。
- [44] 同上 356 号,叶名琛给吏部咨(1856 年);253A. 5. 49 号,华廷杰呈叶名琛禀(1856 年)。
- [45] 同上 1322 号,1852 年 2 月 18 日徐、叶奏稿。
- [46] 同上 252 号,关于盐务的报告(1853 年)。

- [47] 傅宗懋:《清代督抚制度》页103。
- [48] F. O. 931/59号,王汉桥致祁离藻信(1852年);378B.1.62号,叶名琛致祁离藻信(1852年)。
- [49] 梁瓯第:《宋代的书院制度》,载《社会研究季刊》1卷1期(1938年);另见梁的《明代的书院制度》,载《现代史学》2卷4期(1938年)。
- [50] 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页2、7、70—72、78。
- [51] 萧公权:《中国农村:十九世纪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页184—208。
- [52] 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页80。
- [53] F. O. 931/302号;403号,财政报告(1854年)。
- [54] 同上1636号,1854—1855年南雄军费报告。
- [55] 同上369号,1857年广东各书院发薪情况。
- [56] 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页309。
- [57] 同上,页157—158、306。
- [58] 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柯克:《中国》;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页80、437—438。
- [59] F. O. 931/1762号,番禺县丞禀呈(1855年)。
- [60] 张仲礼:《士绅阶级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之作用》,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55年版,表6。
- [61] 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北京,1958年);J. M. 孟苏:《中国文官制度:用人唯慧?》(波士顿,1966年)。
- [62] F. O. 931/274号,1851—1859年署潮州运同顾炳章禀。
- [63] 同上1666号,1856年11月7日叶名琛与柏贵合署奏稿。
- [64] HF卷167页1,1855年6月14日上谕。
- [65] F. O. 931/1316号,1852年武举考试程序;325号—326号,十名试官名单以及考试备忘(1856年)。
- [66] 同上,387号,乡试中的受贿、舞弊案(1849年)。
- [67] J. G. 奇雅:《广州贡院》,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5卷3期(1866年)。
- [68] F. O. 931/387号,乡试中的受贿、舞弊案(1849年)。

- [69] 张仲礼:《士绅阶级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之作用》;何炳棣:《王朝时代晋身之阶》;瞿同祖《清代的地方政府》。
- [70] 张仲礼:《士绅阶级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之作用》表 32。
- [71] F.O. 931/1193 号,1850 年 1 月 31 日徐、叶合署奏稿。
- [72] 同上 1193 号,1850 年 1 月 31 日徐、叶合署奏稿。
- [73] 同上 316 号,严禁土客仇杀的告示(1855 年);346 号,关于恩平土客仇杀的报告(1856 年)。
- [74] 同上 1080 号、1081 号,探报(1855 年)。
- [75] 同上 1107 号、1525 号,关于反贼的报告(1854、1855 年)。
- [76] 同上 1752 号,关于司马乡军事情报(1853 年)。
- [77] 同上 378B. 1137 号,捉拿关巨的指示(1856 年)。
- [78] 同上 1751 号,防匪法规(1855 年)。
- [79] 同上 1493 号、393 号;1522 号;1142 号、1143 号,关于反贼的报告(1855 年)。
- [80] 同上 1432 号,广西匪情(1854 年)。
- [81] 同上 1482 及 1483 号,张崇恪呈禀;1527 号,失陷城池清单。
- [82] 同上 1501 号—1441 号、188 号,关于博罗失陷的文件(1855 年);378B. 5. 7 号;HF 卷 168 页 16,1857 年 7 月 5 日及 10 月 6 日上谕。

第四章 政绩(二):宣德布威

第一节 社会福利

第二章讲过,广东因为雨季时节来得很特别,地形也很特别,所以很容易发生水灾。更有甚者,夏天经常刮台风,发大水,至使庄稼受损。因此,修堤筑坝之类的防汛措施对当地百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些事务历来由士绅负责。但到了清初,官府就把这项工作接了过来。满族人作为征服者,显然不愿意让汉族士绅自由行事,更不能容忍他们组织起来成为一股力量。官府接管私学可能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这样一来,士绅们就不再为维修保养堤坝操心,而完全依赖官府。随着国家衰落,堤坝也不可避免地破损失修,水灾一年比一年严重。

叶名琛任广东巡抚后,意识到要立刻着手加固堤围。1851年,他奏请修补南海县的堤坝,因该县地处珠江三角洲,最易受洪水袭击。咸丰帝准其所请。^[1]绅商伍崇曜捐献了大笔款项,叶名琛利用这笔款子立刻着手工作。次年工竣后,马上来了特大雷雨,省内其他地区一时措手不及,都蒙受损失,惟独南海安然无恙。^[2]后来一位商人记述道:“修了堤坝,广州附近的禾稻就不大

受雨水积潦威胁,但其他乡村却损失惨重,死人甚多。”⁽³⁾祸不单行,1853年夏季又遭到特大洪水的侵袭,无数灾民无家可归,庄稼几乎颗粒不收。叶名琛向各级官员募捐,自己带头捐输了三千两银子,作为救灾修堤之用。

表四是募捐所得款项的开支情况。用以维修堤坝的钱是赈济款的三倍。叶名琛派员勘测堤坝损害情况,以受害轻重分别拨款维修。他于这项工作确是尽心竭力,当然,也要士绅们协助。⁽⁴⁾

表四 1853年各官捐输银两(一)

收 入	
捐 输 人	银 两
爵督宪叶	3000
抚宪柏	1000
粤海关曾	3000
本署(布政)司崔	3000
兼署臬司督粮道王	3000
盐运司赵	3000
广州府张	3000
卸南海县冯	1000
署南海县胡(未据解司)	2000
番禺县李(未据解司)	1000
合 计	23000
实 收	20000

1853年各官捐输银两(二)

支 出			
县	赈济银(两)	县	修筑基围(两)
南 海	1500	高 明	700
三 水	2000	三 水	10000

(续表)

支 出			
县	赈济银(两)	县	修筑基围(两)
清 远	500	高 要	1000
大 埔	280	四 会	
饶 平	210	海 阳	2300
丰 顺	210	澄 海	
合 计 支 出			18700
余 额			1300

本表根据 F. O. 931/1378 号制成, 拨给高要和四会两县修筑基围的 1000 两原计划作赈济用, 后来两位县令及押款委员禀复不必施赈, 该款便用来修缮两县的堤围。

叶名琛把修补堤坝看得比赈济灾民还重要, 这样做正确与否, 则见仁见智, 很难一概而论。但他是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的。在他看来, 修好堤坝, 保证下一年五谷丰登, 这比什么都重要, 否则要年年放赈, 则是个无底洞。徐广缙和叶名琛都非常关注气候变化, 很担心农业生产受威胁。徐广缙给叶名琛的信中曾说: “申刻又雷电交作, 大雨如注, 年岁大好。”^[5] 为了教化农民, 他们还作了一首描写丰年快乐的歌, 印出来, 劝励农人勤力耕作, 安居乐业。^[6] 另外还规定, 给予老农奖赏。^[7] 同修堤筑坝一样, 这也是鼓励发展农业、保证粮食丰收、取消赈济的长远措施。不幸的是, 有这种长远目光的饥农极少。早在 1852 年, 清远县知县程兆桂就暗暗担心大面积的灾荒会导致一场起义。^[8]

除募捐外, 叶名琛本可在各县的常平仓里提取粮食作为赈济之用, 起义发生前, 这些仓库都经过检查, 大多数存粮仍很可观, 全省积存达 2135165 石。^[9] 但是, 在很多县里, 这些粮食只有很小一部分用于赈济。增城就是一个例子。^[10] 也许, 叶名琛误信了部下的汇报, 以为那里灾荒并不严重;^[11] 也许, 他还没有处理这些

粮食的全权,因为不在战时,朝廷对这一类事情仍要直接过问;^[12]也可能是朝廷或叶名琛自己决定要留着这些粮食,以备急需。^[13]不管什么原因,这样打算无论从政治的还是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显然错了。终于,程兆桂不幸而言中,从1849年起就发生的零星造反,发展到1854年,成了大规模起义。

当然,也不能说当时就没有搞一点社会福利。广东运库的一份报告说,番禺育婴堂每日开支银1.6两。粤海关曾给一个名叫普济堂的慈善机关捐银51430两(可能是全年累计数),并给某育婴堂捐银1943两。肇庆有两个同样是慈善性质的机构,其开支(具体时间不详)是400两;南雄也有一所养老院。藩库每季度都拨出一定数目的银两救济南海、番禺两县的“鳏寡孤独”。^[14]

第二节 执 法

叶名琛认为在动乱时期,有必要改革执法制度,简化程序,1854年6月25日,他组织了谳局,专门处理押解到广州的大量洪兵战俘。他亲自监督该法庭行使职权,要求它定期上交各种报告。汇报押到广州的俘虏人数、姓名、籍贯(有时还要附简历)、供词以及未经审讯就死亡的、处决的和仍在拘禁中的俘虏人数。^[15]时间长了,这种报告慢慢被两种正式表格所代替。第一种表格每旬填写一次,内容是该旬审办总数,并分别开列处决、释放、监毙及待判、待复审的人数。第二种为累计表格,也是每旬开列,项目同第一种。两表起算日期均是咸丰四年闰七月中旬(1854年9月3日)。^[16]至于表格的起算日期为什么始于是日而不是谳局成立的那一天,则不得而知。也许是谳局初成立的头四十天只有雏形,正式表格还未采用的缘故。

表五 臬局自咸丰四年闰七月中旬起至五年九月底止
收到审办并现押各犯清数开列

年(咸丰)	月	旬	审办	处决	释放	监毙	待判	待复审
四	闰七	中	109	39	53	16	—	1
		下	164	76	56	28	1	3
		上	149	92	34	18	2	3
	八	中	129	78	37	13	—	1
		下	142	92	25	19	1	5
		上	148	78	52	15	1	1
	九	中	139	105	15	19	—	—
		下	112	71	30	7	—	4
		上	254	95	27	28	3	1
	十	中	137	108	10	12	3	4
		下	134	82	32	15	—	5
		上	261	111	118	31	1	—
	十一	中	220	107	76	34	—	3
		下	194	127	28	33	4	2
		上	401	190	113	88	3	6
	十二	中	408	280	54	66	5	2
		下	468	332	48	78	8	2
		上	442	345	40	51	3	3
五	一	中	636	516	62	52	—	6
		下	1361	1207	26	110	11	7
		上	1280	1188	12	64	11	5
	二	中	618	556	12	43	1	6
		下	690	589	5	73	16	6
		上	498	442	9	38	2	7
	三	中	512	445	14	44	3	4
		下	705	630	14	50	1	10
		上	1379	1284	15	64	5	10
	四	中	1856	1684	5	148	9	10
		下	904	830	3	56	15	—
		上	1056	1009	1	40	5	1

(续表)

年(咸丰)	月	旬	审办	处决	释放	监毙	待判	待复审
	六	中	1225	1158	4	48	7	8
		下	943	890	3	38	3	9
		上	908	733	20	130	15	10
	七	中	768	702	6	42	7	11
		下	999	935	4	38	19	3
		上	1658	1579	4	54	19	2
	八	中	1612	1490	3	70	37	12
		下	963	909	1	40	6	7
		上	1393	1319	9	37	24	4
	九	中	754	703	3	34	11	3
		下	880	795	6	37	32	10
		上	772	688	—	32	32	20
		中	690	583	2	35	54	14
		下	426	359	—	25	31	11

此表数字来自 F. O. 931/299 号, 藏局审办人犯清单(1855 年)。

表五采用的数字是从一份较完整表格里截取出来的, 截取的日期止于咸丰五年九月下旬。咸丰五年五月下旬至七月上旬, 这段时间里俘虏空前的多, 以至不得不在广州府加设公堂进行审讯, 见表六。

表六 广州府自咸丰五年四月中旬至六月中旬
收到审办并现押各犯清数开列

年(咸丰)	月	旬	审办	处决	释放	监毙	待判	待复审
五	四	中	779	717	3	32	23	3
		下	793	712	3	40	30	6
	五	上	926	856	1	37	27	4
		中	948	880	2	39	19	3
	六	下	748	692	3	25	22	4
		上	820	775	1	18	24	1
		中	586	545	1	21	19	—

表五、六合计

	审办	处决	释放	监毙	待判	待复审
合计	35097	30808	1105	2225	575	263
在押犯合计					838	

也许有人以为像臬局这样一个机关所需的人员和经费,一定在人力财力上会给官府造成负担。然而,叶名琛利用那些热衷仕途的士绅们的方针又奏效了。有一张为臬局工作人员报功请奖的名单,严格说来,所开列的全是候补官员。所请之奖亦不过是一些虚衔或者是在候补官员名单上升一级。就连号称审讯过二万五千件案子以上的臬局头头,也仅从候补知州升为候补知府罢了。^[17] 臬局的大量开支是俘虏的生活费,叶名琛把这一笔费用转嫁给囚犯原籍的县,让县里负担。^[18]

自咸丰四年闰七月中旬至五年九月中旬,臬局处决人犯三万余。毫无疑问,这仅是全省被处死洪兵中的一小部分,因为只有广州附近抓到的洪兵或可以提供有战略价值的情报的俘虏才会押到臬局审问。比如韶州,就有本地的法庭,只有重要的俘虏才送往广州。俘虏实在太多了,就连这个地方法庭也很难全部审理。为了避免在押解广州的途中因暑热和拥挤而造成不必要的死亡,许多俘虏都发回原籍的县(在韶州范围内)受审。^[19]《广州档案》里没有接收从潮州解来俘虏的纪录,看来因路途遥远,运输困难,韩江流域的官员是独立审理他们抓到的俘虏的。另外,在太平时期,凡处死刑的案子,知县都要层层上报,经刑部核准,方可执行。但在五十年代,这些手续实际上已无法实施。于是,一名普通地方官对俘虏就有生杀之权。^[20] 某知县(姓名已无法辨认)曾向叶名琛报告,在他上任的头十五个月内就抓获 10744 名洪兵战士,处决 8757 人,押解广州 631 人,释放 386 人,拘留待审 211 人,监毙 468 人。^[21] 那时全省有八十多个县,尽管上面所举的

例子不一定有代表性,但我们亦可想而知那时有多少人死在执法机关。

起义期间,社学和公局在执法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比如,由三十二村组成的同仁社学,就曾奉叶名琛之命将俘虏就地处决,然后割下耳朵送交广州军需局。^[22]随着起义逐步平定,社学和公局的任务也由镇压起义转为围捕战败的洪兵残部,根据指令把俘虏递解到广州或当地官府依法审讯。^[23]

大多数被处决的犯人都是在1855年夏官兵基本上稳定全省后行刑的。当时,广州城内的刑场上“无首之尸,纵横遍地”,“地上之土吸血既饱,皆作赭色”,“空气恶劣如毒雾”,“令人欲作三日呕”,^[24]真是惨不忍睹。不难想象,外地府县刑场当然也是同样景象。一位英国领事馆官员写道:“命令下来了,除匪首(要押解广州以外,其他统统)就地处置。”^[25]叶名琛正因为办事大刀阔斧,杀人心狠手辣,才被清政府特别赏识,并得到英国人所谓“全国第二号人物”的评价。他也因此在民间博得了“刽子手”的绰号,我们知道官府对义军是一向不从宽发落的。

必须指出,如果士绅证实某人是反贼,这就足以致他于死地。事实上,按察使沈棣辉在1855年初讲过,自从谳局成立以来,审讯并处决了一万多反贼,都是由士绅和族中长老作证的。^[26]对反叛者的惩罚常殃及其祖先。叶名琛经常派人查明著名洪兵首领的祖坟,掘坟焚尸。例如:周春的三代祖坟就被挖了。^[27]洪秀全的祖坟当然也没有被放过。^[28]这种掘墓焚尸的做法本身就是对活着的子孙后辈的惩罚。

司法部门遇到牵涉官军的案件,就很棘手。1854年,当清政府岌岌可危时,大量官兵投向洪兵;而当洪兵失势时,他们又倒戈投向官兵(至少表面如此)。处置这类反叛者,会牵连有关军官。在佛山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例:1855年5月25日,在一次挨户搜查

中逮捕了三名嫌疑犯。犯人供认他们既是附近一支驻军的兵丁,又是会匪,上年陈开占领佛山时,他们参加过陈的队伍。佛山同知谢效庄复审,确认他们有罪,判以死刑。据谢效庄的记述,那三名官兵处决后第二天,该营营官代理千总孔继安见访,声称他们早已被开除。但三天后(即1855年5月29日),孔继安又通知谢效庄说,那三名官兵是捕错了,要求立刻释还;还要求上级出面干涉。此事导致了军民不和,因而引起叶名琛的关注。与此同时,五十一名负责组织佛山练勇的士绅联名上书,证明那三名被处决的官兵确是会匪,他们还带来了人证。

叶名琛饬令按察使和一些专人负责调查此事。再三考虑后,他们发现司法部门进退维谷:如果采纳民间的说法,确认那处死的三名官兵是反贼,那么军方的处境就很难堪。其顶头上司若真的知情不报,就要被杀头;若是因疏忽大意失于察觉,也得革职。他们的上级,尽管对此事不负直接责任,也应降两级调任;提督也要降一级。但是,如果确认军方的指控属实,谢效庄和那五十一名士绅的带头人都得斩首,其他人则要充军。按察使等无法就此案下结论,只能在报告中委婉地说,通常处理犯罪士兵,都说此辈已被开除,以便为上级军官开脱。在下一章我们就会讲到,谢效庄终于调离广东,到广西打仗去了。这说明叶名琛领会了按察使的暗示,照准办理了。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同军队里的各级军官作对是不明智的,但如果因处分五十一名士绅而去失去整个士绅阶层的支持,对叶名琛来说也不合算。^[29]

第三节 武 装

叶名琛任两广总督时,武装力量分四类:八旗、绿营、募勇和练勇。这一节就谈叶名琛与这四种武装力量的关系。

八 旗

人们向来认为总督的权力只及于绿营,与旗兵毫无干系。^[30]其实并非如此,至少徐广缙和叶名琛在广州时不是这样。比如在1850年,徐广缙任两广总督,但同时被命为两广阅伍大员。他同广州将军和两位副都统一道,亲临校场检阅旗兵,并奏请皇帝提拔了一些人,也降了一些人的职。然后他同巡抚叶名琛一起视察了驻在广州的绿营兵,也同样向皇帝具奏,略有奖惩。^[31]三年后(1853年),叶名琛接过了同样的职务,也革了一些不善骑射的军官的职。^[32]到1857年,循例又该校阅广东的军队,叶名琛再次被任命为阅伍大员。但他奏准推迟这一活动,因为大部分军队已派出与洪兵作战。^[33]

定期校阅军队,并非叶名琛对八旗兵行使权力的惟一方式。1849年人城危机期间,他担负了保卫广州城的主要责任,除了指挥绿营、募勇和练勇以外,他显然有权指挥八旗兵。^[34]1854年广州被洪兵围困,他曾部署各旗分别防守广州的各个城门。^[35]在亚罗战争中,联军进攻广州,八旗副都统双龄曾向他的两位上级——广州将军和叶名琛求援。^[36]此外,旗兵对文官政府的独立性并非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强。他们的军费要依靠文官政府的供给。他们的薪饷、恤金、军粮以及购买军马、军衣的费用等,都由叶名琛全权掌握的藩库和运库支付。1855年,一些如旅差补贴和购买军装等不太重要的开支竟拖欠了四年多,^[37]因为叶名琛决定把钱用在其他更需花钱的地方。另一个使叶名琛能掌握旗兵的原因是他们都驻在广州,其行为稍不检点,都难逃叶名琛的眼睛与法网。最后,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旗人的生活水准相对降低。^[38]终日无所事事的青壮旗人在广州城内来回游荡,惹事生非,成了叶名琛和广州将军伤脑筋的问题,因为他们共同负有解

决民、旗争端的责任。有人建议叶名琛,趁1854年广州被围、兵源缺乏的机会,招募无业旗人,成立分别隶属于各旗的旗人募勇,以加强广州城防。^[39]然而,这样做意味着触犯历朝恪守的关于旗人社会地位的律例,这些律例规定旗人是上等人,他们祖辈传下来的规矩是不能改变的。叶名琛和他的幕僚们竟敢考虑走这一着棋,足见他们确实有些胆量,但亦可说是为形势所迫而出于无奈。^[40]

绿 营

广东的绿营,分为陆路与水师,各由一名提督统率,最高指挥官则是两广总督;此外,督抚尚有各自直接管辖的督标和抚标。陆路提督驻在惠州,他的部队分驻韶州、潮州、高州和琼州四镇,卫戍范围大概就是同名的五个府。水师提督驻虎门,统四镇,虎门沿海两边各设两镇。由于绿营兵分散于全省各地,叶名琛无法过问治军的每个细节,但他有各镇及其属下各协的兵力布防地图,^[41]并很可能就像要求各级文官政府那样,要求各镇定期向他汇报工作。平时,带兵的任务由军官负责,但发生了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时,叶名琛是肯定要亲自处理的。^[42]至于督标,则每年春秋两季他都要视察,^[43]事无巨细,一管到底。例如,驻在蛇头湾炮台的把总曾呈交叶名琛一份禀帖,开列了当值的两个兵目和二十七名士兵的名字,另外还提到刚在广州执行过特别任务回来的五名士兵和两名在其他单位工作结束回营的士兵。禀帖不仅写出军官的姓名,就连每个士兵的名字也写得清清楚楚。^[44]不过,叶名琛是否真的连督标里普通士兵的姓名都知道得一清二楚,还是这种禀帖本来就要求写清楚士兵的名字,这仍需进一步考证。

同文官政府一样,军队也要进行全面考查,名曰军政。^[45]在

叶名琛衙门里主管这项工作的机关是东卷房,负责人是刘升。每逢对督标和抚标进行例行考查时,刘升草拟一些表格呈送叶名琛,经批准后,刘把这些表格分发给各营的录事,让他们详细填写有关军官的籍贯、年龄和简历。表格填毕,交回给刘升转呈叶名琛,以便核实情况。最后,刘升把表格誊写清楚,装订成册,好让叶名琛在表上给各个军官写评语。^[46]

毫无疑问,军政制度使叶名琛能定期考查军官们的表现,但是,在非常时期,仅有例行的考查是不够的。其实,在这种时候,与其监督军官的一举一动,不如给他们灌输一点主动精神,但这就要求总督比较机动灵活,知人善任。看来叶名琛是具备了这些品质的。1854年7月,他预见到一场大起义马上就要爆发,便奏请有权不通过兵部来任命军官,填补空缺。咸丰帝准奏,但上谕直到1855年4月12日才传到广州,^[47]这显然是因为广州被围的缘故。等上谕到达广州,洪兵已经逐步走向下坡,叶名琛几乎稳住了战局,特别是在广州附近地区。如果叶名琛不是当机立断撤换不称职的军官,并选派新人代替阵亡将官的话,他是根本不可能取得胜利的。例如:1855年肇庆代理都司战死,叶名琛马上派一名千总去补缺,这就意味着把一名正六品武官提拔为正四品。然后,叶名琛把这一决定通知了巡抚、广州将军、陆路提督、布政使和兵部。^[48]叶名琛这样做显然僭取了皇帝的权力,但在洪兵空前强大节节进逼的形势下,已经没有时间商量来、商量去,更不能让官僚主义的层层关卡贻误军机。叶名琛能在仓促之间作出这样的用人决定,说明他对考查过的武职五品以下的军官也很了解,也可能他手头存有这些军官的详细的最新档案。

极少人是天生的帅才,大多数都是通过学习才会用兵。叶名琛于府道任内已积累了治理乱民的经验。在广州任职期间,有许多机会同军官打交道,这一方面靠他自己的实践经验;另一方面

也得到徐广缙的帮助。徐比他年长、待人接物更老练。例如：有一次叶名琛对徐广缙说有两名委员作战不力。徐广缙解释说，他们很可能需要上级的鼓励，他还说他已经下了一道手谕，并说叶一定能看出里面的奥妙。^[49]叶名琛自己也有处理人事关系的才能。当了两年总督之后，他就能够写出一封很委婉的复信给广西提督惠庆。这封信证明叶名琛已经学会了同军官打交道的灵活手腕。惠庆写信向叶名琛报告广西这个赤贫省份的形势，他本人几乎丧失了信心，因为军队已经欠饷数月，随时都可能发生哗变，更别提去镇压日益壮大的起义军了。^[50]叶名琛的复信充满了同情、关心和许诺。他指出，唯一彻底解决长期欠饷的办法就是把起义镇压下去，“要知粮从地出、土赖民耕，但将匪徒扑灭，各路银米陆续解到，自当发与领足，断不少欠分厘”。^[51]

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人都能说出得体的话，这是叶名琛之所以能独揽大权的重要原因之一。他权重一时，使下属望而生畏。比如在1854年，虎门水师同附近的村民发生武装冲突。水师提督洪名香很担心叶名琛会过问此事，便写信给在广州的一名亲信，叮嘱他，“制军不问东莞情形则已，若有询及，不妨从容露出”。^[52]可是事与愿违，叶名琛的情报网效率之高，就连洪名香的这封信也落入了他的手中。经过全面调查，^[53]叶名琛奏准，“广东水师提督洪名香年老休致”。^[54]

在中国的军事术语中，将将之材和将兵之材是不同的。叶名琛无疑是个将将之材。他采用治理百姓的办法来处理行伍之事。同诱导士绅去约束百姓一样，在军队里他对军官施加压力，要他们管束士兵。然而这个对他来说惟一可取的政策，却并没有收到多大效果。有时军官们不但不能掌握住士兵，相反却被士兵所挟制，随士兵之所欲。有这么一件事：雷州营一名把总同十二名士兵合谋威胁长官，企图控制全营。最后叶名琛

只得命令雷琼道调查处理此事。^[55]水师将官也不比陆路将官强多少。例如:讹诈恫吓附近村民,这已经成为虎门水师的家常便饭,谁要是对他们稍加约束,便会引起强烈抗议,甚至可能发生兵变。在一次类似事件中,他们竟袭击了参将。该参将恐事态扩大,又怕上级知道后自己会因统兵无能而被革职,便决定不追究这帮犯上作乱的士兵。这样处理,结果使水师士兵们更加胆大妄为。^[56]

其实,军官治兵不力仅仅是使叶名琛伤脑筋的事情之一,真正的问题在于士兵本身。上面曾提到过三名身为官兵却参加了秘密会党、最后在佛山被处决的士兵,这一类的事件其实很普遍。^[57]就该案所作的证词还揭露出有士兵吸鸦片。^[58]处决那三名士兵所引起的轩然大波,使人们更深刻地看到叶名琛的下属给他带来的问题的严重性。三名死者的母亲到各个衙门告状,控告九十六乡的士绅。士绅们恐怕到头来自己地位难保,便答应让她们继续支取死者的薪饷,该款项来自赌场和妓院的收入。^[59]总之,吸毒、赌博、嫖妓、敲诈勒索和拉帮结派,所有这些军队都有份。他们贪得无厌,当然不把军纪放在眼里。一有机会,便乐得把义军掳掠来的财物据为己有。例如在顺德,官兵与陈吉作战时,不管要他们追赶义军、务必全歼的命令,而只管争抢敌人丢下的金银细软。^[60]对植根于当时整个社会的这种风气,叶名琛回天乏术。当时最紧要的是要有一支得力的军队,以便镇压迅速发展起来的洪兵,而不是改造整个社会。迫于形势,叶名琛只好对士兵们的一些胡作非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官府所招的募勇

所有雇佣军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纯粹为了钱打仗的,他们的贪婪常使雇佣他们的人伤脑筋。尽管如此,叶名琛因为正

规军兵力不足,不能单独对付洪兵,还是得使用雇佣军——募勇。由于募勇同正规军并肩作战,前者的胡作非为一定影响后者。叶名琛约束募勇的办法是,把他们的地址和职业都记录在案,使他们知道,如果行为不端,他们的家属就会被牵连受罚。^[61]但叶名琛发给募勇的薪饷比正规军高得多。一旦某个特定任务完成之后,就把他们解散,以避免日久天长而形成一种同当局对峙的力量。在有关报告中,常常可以看到在解散某支募勇的同时,又招收了同样数目的新兵组成另一支募勇。^[62]当然,也有特别善战、打仗必不可少的募勇,但这些队伍一般都是目无军纪的。在这些情况下,叶名琛认为首先要考虑打仗,所以不解散他们,但犯了军法的人要重办。这种处分经常是暂缓执行的,如果这些人痛改前非,转变成遵守纪律的士兵,就无需处罚。他曾用这种办法对付过一群在收复佛山时立过功的募勇。这帮人犯了军法,叶名琛记下了他们的名字,要他们将功赎罪。他们真的立了功,就被宽恕了。^[63]

叶名琛使用这个办法,究竟收效多大,很难估计。但与毗邻各省比较,就看出高低。广西的一位官员孙锵说过,募勇根本“不受节制”。他们利用贼兵势大、当局惶恐不安的心情要挟政府。两军对垒,他们胆小如鼠;战云甫散,他们便胡作非为,“并有暗中通贼者”。^[64]事实上,被疑为贼而被捕的募勇不在少数。^[65]就广西而论,1854年有四千名募勇进入了广东北部,帮助解韶州之围。事后他们声称自己平定了广东主要的几股贼兵,解了广州之围。于是他们要求赏银十四万六千两,以补偿他们在作战中的费用,并扬言如果政府不答应这个要求,他们就要占领北江沿岸所有渡口,切断两广交通。同其他各省相比,广东的募勇对当局较为尊重,作战较勇猛。这个事实,似乎可以说明叶名琛使用募勇的办法要高明一些。

士绅所招的募勇

叶名琛在洪兵刚兴起时即招收了大批募勇。但战争旷日持久,政府财源逐渐枯竭,叶名琛便以名誉、官衔和官职为诱饵,鼓动士绅们用他们自己的钱招募族人充当募勇。为此,还专门发予委任状,准许这些士绅率领自己的军队同正规军并肩作战。这一类的募勇大部分也是临时性的,一旦队伍解散,委任状便需交回当局。^[66]士绅们因为同当兵的族人讲一样的方言,向来又为他们所敬服,所以这样的兵一般都带得很好,^[67]其中最出色的一支要算是香山县林福盛部。林福盛表现十分突出,从一名普通士绅屡保至知府衔。他治军的办法可说是这一类队伍的楷模。他的部队纪律严明:他要求下级在战时不折不扣地执行他的命令,平时在营里则不断练兵习武;如有口角、赌博、酗酒、吸毒及欺诈百姓者,立即除名;如有强奸、抢劫、通敌、造谣者,军法从事;所有兵丁都得随身携带腰牌,离营归家必须请假。^[68]林福盛战功卓著,林部军威极盛,这都表明他的部队确实是遵纪守法的。

当然,也有一心只为自己发财的募勇。陈肇庆部就是如此。陈的财力有限,不能给士兵按月发饷,只能隔一段时间发给他们一点伙食钱。士兵们便用这笔钱作本钱,利用兵船贩运私盐,希望能挣得些小外快。陈肇庆很清楚部下的所作所为,但毫无办法,如果他真要认起真来,就意味着无法执行战斗任务,当官的希望就将化为泡影。他决定按原计划沿北江溯流而上同洪兵作战。可是他的兵船在途中被截留检查。士兵纷纷跳水逃遁,陈肇庆本人被逮捕。^[69]如果远离家乡作战,带兵的士绅又因经济困难连伙食钱都发不下的话,问题就更严重了。有名叫冯汝骥的士绅,率部在广西梧州作战,士兵们饥饿难忍,不得不劫掠村坊。^[70]其实

这类事情很普遍,不过叶名琛所关心的只是如何镇压起义,对这些无损大局的弊端,他就只好把它看作是执行任何政策时都不可避免的缺点,不了了之。

练 勇^[71]

1854年广州被围,促使叶名琛恢复练勇这一组织,并把它作为地区性的防卫力量。当时包围广州城的是活跃在郊区的几股洪兵。他们溃败后散入乡间,到处流窜,打家劫舍。派大部队追剿,既无济于事,又浪费人力物力。这些小股洪兵又随时都有可能重新集结,成为难以对付的力量,这又是十分危险的。再者,由于洪兵的劫掠,导致无家可归的村民为生活所迫,易于沦为盗贼。有鉴于此,叶名琛命令各村士绅把族人武装起来,按军队的形式编成战斗单位,相邻的几个村庄组成一个社,相邻的几个社每月定期集合,进行军事训练。^[72]前面我们曾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详细研究过“社”这一组织的形成。在这里只需补充一点,即“社”不仅在敌兵来犯时负有保卫村镇的任务,而且还要在官兵节节胜利追击敌兵时,截断敌兵退路,以免官兵疲于奔命。

广州城北南海、番禺两县是各路洪兵集结围城的地方,也是大多数洪兵撤退的去处,这些地方的练勇也最活跃。不少洪兵在失利后,沿珠江扬帆出海,劫掠沿海村庄。叶名琛一方面动员水师剿捕,另方面檄令这些村庄的士绅组织练勇,保卫乡里,协助水师作战。这一类的命令传下后,士绅们便聚在一起,选举那些大家认为秉公正直的人作领导。文武绅士分工不同,前者主管练勇的行政事务,后者则主管练兵,指挥作战。^[73]

最出名、最强大的是称之为九十六乡的练勇。这些村庄位于广州与佛山之间。练勇组织严密,战斗力强,叶名琛曾多次亲自接见他们的首领,供给他们大炮和弹药,去攻打佛山陈

开率领的洪兵。结果,他们不但成功地保卫了家乡,而且挡住了进逼广州的陈开部队。这就阻止了陈开同围困广州的其他洪兵会师,对广州守城战斗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74]练勇一般是不敢冒险离开家乡的,但他们对阻击义军、保卫乡村,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第四节 结 论

本章和前一章论及叶名琛在行政、教育、执法和军事等方面的工作,也谈了他同士绅们的关系和利用他们的办法。那么结论是什么呢?

经文纬武,帝资为海国干城;宣德布威,众仰为人间山斗。^[75]

这个评价取自写给叶名琛的一封信,尽管多谄媚逢迎之词,但也反映了同时代人对他的看法。叶名琛肯定勤勉过人而精力充沛,既扎实苦干,又机敏灵活,绝不让习惯势力和官僚主义影响他的办事效率,而且不断地使他的方针政策适合形势。同大多数官僚因循苟且、明哲保身的坏习气相比,确是难能可贵的。叶名琛办法很多,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勇于创新。但他不是一个改革家,他仅仅致力于弥补现存制度的不足,而不是要改革它。这方面,可以说他取得了较大成就。他对考试制度的漏弊的防范和他训练手下的文武官员办事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方法都是例证。他对付洪兵所采取的措施是有成效的。在下一章里我们将会看到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义军在广东省遇到的对手要比华南其他地方的对手强有力得多。

同时,也不能说叶名琛的政府廉洁。也许,越低级的官吏越是凶相毕露。叶名琛任布政使时,曾发现有些知县侵吞税款,他毫不留情地处分了他们。这样做,或许真的使贪污得最厉害的人

有所收敛。从后来各府所上的呈文看,抱怨知县舞弊的少了,更多的是说洪兵给收税带来了困难。^[76]当然,到农村去催逼税款的税吏被杀事件仍有发生。^[77]年复一年,这种横征暴敛的现象并非某个人的力量所能根绝的,尽管叶名琛希望如此,并努力去做。再者,他的注意力很快就转移到对付农民起义、筹集军费等上去了。鉴于经济来源极为有限,能收到一些税已经差强人意,在烽烟连天的年代里,当官的哪里还顾得上深究这些款项是严刑逼迫下硬夺来的、还是老百姓自愿交纳的呢?

军队的情况也是如此。一切弊端都来自那个制度。靠着一股坚韧不拔的劲头和顽强的意志,叶名琛充分利用了他所能调动的力量,使他本人和他为首的广东当局能够经受得住洪兵的冲击而且生存了下来。对士绅也一样,叶名琛可以杀掉那些谋反者,惩罚那些滥用特权的人,迫使中立派完全倒向他,可以诱使野心勃勃的人为他的事业服务,但是他无法制止士绅们扩大特权,因为这是当时那个不管百姓死活的政治制度容许的,无论后果多严重,也没有别的选择。

尽管叶名琛在广东任上有这些缺点,但他仍不失为一个干练的封疆大吏。最能说明问题的一点就是他不但能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而且不断加官进爵;与此同时,不少总督都因为在这大动乱的岁月里不能随机应变而一个接一个地出乖露丑。上面引用的那一联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成的。

注释:

- [1] HF 卷 34 页 5, 1857 年 6 月 15 日上谕。
- [2] F. O. 931/302 号, 财政报告, 1854 年; HF 卷 67 页 19, 1852 年 9 月 11 日上谕。
- [3] 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怡和公司档案·私人信件》, B4/6—15 种 707 号, 1852 年 6 月 12 日 A. 伯西维尔给德·亚尔丹的信。

- [4] F.O. 931/417号;418号;409号,关于堤坝状况及拨款维修的报告(1852、1853年)。
- [5] 同上 1296号,1851年10月4日徐广缙致叶名琛函。
- [6] 同上 443号,歌词(无日期)。
- [7] 同上 192号,应咨文件一览(1850年)。
- [8] 同上 1134号,匪情报告(1851—1852年)。
- [9] 同上 254号,广东谷仓的详情报告(1853年)。
- [10] 同上 118号,关于增城县谷仓的报告(1855年)。
- [11] 见表四及注。
- [12] 比较任以都:《中国十九世纪之户部》,载《哈佛亚洲研究》第24卷(1963年)页176。
- [13] F.O. 931/1501号,惠州府禀(1855年)。
- [14] 同上 173号;238号;402号、403号;1636号;302号,1851—1859年间的财政报告。
- [15] 同上 1634号;1688号—1689号、1700号、1469号;1430号;1055号,藏局报告(1854—1857年)。
- [16] 同上 1688号、1469号;1430号;1581号,判词(1854年)。
- [17] 同上 1673号,为筹饷局官员请功(1857年)。
- [18] 同上 302号,财政报告(1854年)。
- [19] 同上 1755号,肇庆地区法庭关于战俘的报告(1855年5月)。
- [20] 同上 1522号,佛山处决反叛嫌疑犯的报告(1855年)。
- [21] 同上 1728号,关于被俘贼人的报告(1855年)。
- [22] 同上 1093号,练勇关于被俘贼人的报告(无日期)。
- [23] 同上 1533号,由各地解往广州的俘虏数目(1855年);1142号,关于贼人活动的情报(1851—1859年)。
- [24] 容闳:《西学东渐记》。
- [25] F.O. 17/231卷,208号公牍附件,1855年6月8日墨里逊的报告。
- [26] F.O. 931/1522号,佛山处决反叛嫌疑犯的报告(1855年)。
- [27] 同上 1614号,关于挖掘反贼首领祖坟的报告(1856年5月1日)。
- [28] 同上 1042号,关于洪秀全、刘恒泰祖坟位置的报告(1851—1859

年)。

- [29] 同上 1522 号,按察使给叶名琛的报告(1855 年);1493 号;1133 号,关于在佛山处决三名反叛嫌疑犯的报告(1855 年 6 月)。
- [30] 由于缺乏 F. O. 931 这样的原始材料,傅宗懋在他已发表的论文《清代督抚制度》中也作如假设。
- [31] F. O. 931/1191 号,1850 年 1 月 30 日徐、叶合署奏稿。
- [32] 同上 307 号,关于陈肇庆的革职问题(1855 年)。
- [33] 同上 1659 号,1857 年 9 月 24 日上谕。
- [34] 同上 784 号、808 号;159 号—798 号,1849 年入城危机期间广州与北京之间的通信。
- [35] 同上 420 号,守卫各城门的旗兵的供给情况(1855 年)。
- [36] 同上 1835 号,双龄致叶名琛函(1857 年 12 月 29 日)。
- [37] 同上 1782 号;1611 号;1300 号;302 号,关于广东正规官军的军俸及粮草的报告(1851—1856 年)。
- [38] 旗人生活水平下降,除了全面通货膨胀外,旗人人口不断增加是另一个原因。各旗的士兵数额有限,而法律又规定多余的人力除习骑射以外,不得从事任何其他事务,所以领薪饷的旗人不得不与没有薪饷的亲人共享其收入。
- [39] F. O. 931/1744 号,关于保卫广州的五点建议(1854 年)。
- [40] 同上 1495 号,广州城内及四周部队登记册(1857 年)。不过,这些募勇是从旗人或非旗人中募得,就不清楚了。
- [41] 同上 1900 号、1907 号—1909 号、1912 号—1916 号、1925 号、1928 号—1934 号、1942 号、1950 号及 1951 号,军事地图及有关文件(无日期)。
- [42] 同上 1416 号,关于那扶营治军不严案的报告(1853 年)。
- [43] 同上 318.5.38 号,1850 年 1 月 30 日徐、叶合署奏稿。
- [44] 同上 1801 号,蛇头湾水师禀帖(1856 年 10 月)。
- [45] 详见傅宗懋:《清代督抚制度》页 104。
- [46] F. O. 931/1735 号,对各文武官员的评语部(无日期)。
- [47] 同上 1554 号,军中空缺及胜任补缺的军官名单(1855 年 4 月 12

日)。

- [48] 同上 1560 号—1561 号,任命都司谕(1855 年 6 月 3 日)。
- [49] 同上 1316 号,徐广缙致叶名琛函(无日期)。
- [50] 同上 1475 号,奏稿(1854 年);378B.1.16 号,广西来信(1856—1857 年)。
- [51] 同上 1609 号,叶名琛复惠庆函(1855 年 6 月 19 日)。其实那时广东藩库差不多是空的(见第七章)。
- [52] 同上 1708 号,洪名香写的信,收信地址不详(1855 年)。
- [53] 同上 1399 号,关于虎门守军与当地民众关系紧张的报告(1854 年)。
- [54] HF 卷 162 页 10,1855 年 4 月 28 日上谕。
- [55] F. O. 931/1760 号,关于不法士兵的报告(无日期)。
- [56] 同上 1163 号,关于虎门驻军与当地民众关系紧张的报告(1854 年)。
- [57] 同上。
- [58] 从这期间中国消费鸦片的估计,吸毒相当普遍。另外,包令爵士 1854 年 6 月 5 日致格拉兰顿的信也说:“看来,乱世只会增加而不是减少鸦片的销路。”(F. O. 17/214 卷)。
- [59] F. O. 931/1522 号,佛山处决三名反贼嫌疑犯案(1855 年)。
- [60] 同上 1722 号,广东沿海的反叛组织(1855 年)。
- [61] 比较同上 1593 号,开除一名募勇的报告(1851 年)。
- [62] 比较同上 1488 号,关于在灵山部署军队的报告(1851 年 12 月)。
- [63] 同上 1553 号;1087 号,关于募勇的报告(1855 年)。
- [64] HF 卷 52 页 6—8,1853 年 3 月 8 日上谕。比较 F. O. 931/1328 号,广西把上谕抄本送给叶名琛时的附言(1852 年)。
- [65] 比较 F. O. 931/1419 号,开除三名反贼嫌疑犯的决定(1855 年 9 月)。
- [66] 同上 307 号,关于革去陈肇庆职务的决定(1855 年 9 月)。
- [67] 同上 338 号,无署名的探报(无日期)。
- [68] 同上 1429 号,林福盛的告示(1854 年)。
- [69] 同上 307 号—309 号,革去盐枭职务的决定(1855 年 9 月)。
- [70] 同上 1418 号,革去冯仲儒官职的报告(1853 年)。
- [71] P. A. 孔菲力:《晚清之动乱与平乱:军事化与社会结构,1786—

1864》,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这一节专讲广东练勇情况。

- [72] F.O. 931/1713 号;1762 号;1156 号;1616 号;1143 号,练勇的组织及其活动的报告(1855 年)。
- [73] 同上 1519 号、1568 号,组织练勇的报告(1855—1856 年)。
- [74] 同上 1455 号,三名士绅首领所写的与来自佛山的贼兵作战的报告(1854 年 8 月)。
- [75] 同上 339 号,全庆致叶名琛函(1856 年)。
- [76] 同上 434 号;264 号,税收报告(1848 年及 1853 年)。
- [77] 同上 1627 号;361 号,潮州运同禀(1856 年 10 月 4 日、14 日)。

第三部分 军 功

我们说过，叶名琛驾驭军官的本事是通过他个人的实践，又在好友徐广缙潜移默化下逐步熟习的。然而，要成功地组织军事，仅有这些还不够，他必须熟读兵书，精通韬略。由于每个战役都各有特点，所以不能死搬教条或套用以往经验，必须具有敏锐的军事判断力。这一部分将专门探讨叶名琛的军功，他在对付 1850—1853 年间零星起义以及 1854—1858 年间大规模洪兵起义，都表现出他的军事才能。

第五章 1850—1853 年的起义

广东向来是一个特别难以治理的省份,在清王朝国势日趋衰落、动乱越趋频繁的岁月里尤其如此。1849 年,清政府又受到来自外国的压力,内乱就更加频繁。他们结成大帮,活跃在清远、英德两县,该两县地处广州和韶州两府之间山区。第一次派去剿捕的守备被杀,手下的许多兵丁和同行的知县都受了伤。徐广缙和叶名琛认定这支队伍是反贼而非一般盗匪,便派陆路提督祥麟和按察使赵长龄率大军前往,才把起义暂时地平定下去。

随后,起义军从形势比广东还乱得多的广西省获得了增援,对政府不满的农民和矿工、烧炭工等也纷纷参加。太平军成立于此时,他们中间许多人在广东省都有亲朋故旧,有些人本来就是广东去的季节工,其家人仍居住在广东。五十年代初,他们渗入广东,同广东的义军合兵一处,围攻城池,伏击官军。本章主要按时间先后论述叶名琛是如何对付这些骚乱的。

第一节 1850 年 5 月—1851 年 4 月的清远与英德

广西义军给广东官兵的第一次打击始于 1850 年 5 月。到了

8月,一支四千多人的义军在英德^[1]伏击了一队官兵,然后化整为零,组成游击小组,进入山地。他们打算在当地义军的协助下,居高临下地向各城池发动突然袭击。9月,他们击溃了官府派来围剿他们的一支大部队。^[2]其后,一些人潜回广西,引来数以千计的援兵。起义军在集结兵力,等待时机,企图一举推翻广东当局。形势确实危急,以至负责防卫该地区的游击忧虑成疾,终于自杀。^[3]叶名琛决定亲自指挥作战,便到了英德。他首先把部队展开,遏制义军,封锁了一切通往广西的退路,继而派精锐部队进山,准备遇到义军,便一律剿灭。十多天过去了,这个办法并不奏效。叶名琛马上改变战术,命令部队停止追剿,采用引诱义军前来攻城的策略,这样就可以部署一支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官军同义军进行阵地战。义军不知是计,当他们进攻自以为防卫薄弱的清远县城时,遭到三千多官兵的迎击,损失惨重。

继清远之役,义军又连败数阵,士气大挫,内部不和,特别是从广西来的和本地的义军之间,分歧更深。前者拟折回广西,但由于所有退路都有重兵把守,只好绕道粤北。在省界上,这支队伍又被大队官兵堵住去路,后面叶名琛部队又穷追不舍。到1851年2月,这部分义军就被击溃了。

为了对付本地的义军,叶名琛把部署在两广交界的军队撤回境内,紧缩对义军的包围圈。他带领军队,从不同的据点出发搜山。但是交通不便引起了许多困难。首先,在深山里作战的六千人马的粮草供应就很成问题,一般的运输工具根本无用,只能就地筹措。所以他也严令部下同当地居民买卖要公平,以保障粮食来源。^[4]其次,地形不利,有时在荒野中无路可寻,官兵很容易迷路或中伏。针对这一情况,他要当地士绅给他准备该地区的详细地图,利用这些地图来部署军队。^[5]仅仅两个月,剩下的义军就全部被杀被俘。

战争以叶名琛的全胜告终。他打了七次大胜仗,歼灭了六千义军,其首领无一漏网。^[6]为此,咸丰帝降旨:“以剿办广东英德等处贼匪,地方肃清,加巡抚叶名琛太子少保。”^[7]皇帝的极度恩宠使叶名琛更加声威显赫。但更重要的是,他在指挥这次战斗时取得了经验。^[8]在这些战役将近结束之际,他曾致函徐广缙,说如果他真能消灭这股贼兵,那么将来再同其他贼兵作战,就更有信心打胜仗。^[9]

表七 1850 年 7 月—1852 年 6 月廉州府义军首领一览表

姓 名	活 动 时 间	部下人数	结 局
李士奎	1850. 7—8	不详	作战被俘
方 晚	1850. 7—10	不详	逃跑时被俘
陶安仁	1850. 10	1000	战死
黄 八	1850. 8—1851. 8	2400	被沈棣辉活捉
黄 大	1850. 10—1851. 4	2000	被陶煜文杀死
颜品瑶	1851. 8—10	不详	战死
王锡从	1851. 8—10	不详	被沈与陶杀死
苏凝三	1851. 9—1852. 6	不详	作战被俘
李士青	1851. 9—1852. 6	不详	战死

本表资料来源: F. O. 931/1325 号, 徐广缙和叶名琛联衔奏稿, 1850 年 12 月 25 日—1851 年 3 月 10 日。《道光朝实录》卷 13 页 1; 卷 14 页 2; 卷 17 页 2; 卷 20 页 16, 1850 年 8 月 8 日—1851 年 1 月 11 日上谕。《咸丰朝实录》卷 39 页 25—29; 卷 40 页 14; 卷 44 页 22—23; 卷 61 页 12; 卷 61 页 34, 1851 年 9 月 10 日—1852 年 6 月 30 日上谕。本表列出之活动时间是个约数, 人数亦时有变化。

第二节 1850 年 7 月—1852 年 6 月的廉州

叶名琛很快就发现, 他在军事上大显身手的机会多得很, 因为不仅在清远和英德, 而且在同广西交界的所有地区都爆发了起义。早在 1850 年 7 月, 广东最西部的廉州就遭到义军进犯, 随后

的三年里,仍然不断被骚扰。当时形势很紧张,叶名琛忙于对付清远和英德的义军,徐广缙留在广州主政,均无法抽身去廉州。另外,徐、叶分处两地,很难沟通战略思想。清远和英德的战事又牵制了相当多的官兵,以致廉州防卫薄弱。进犯廉州的义军同清远、英德一样,在当地得到支持,有人为他们提供粮草,打探情报。为了弥补兵力不足,徐、叶在廉州组织团练自卫,以压缩义军活动的范围。这些团练十分得力,有支队伍还查获了一名叫叶方晚的著名义军首领。一些民团还被招为壮勇,补入官兵。比如有一个时期驻在灵山的五千六百九十二名官兵中,正规军只有五百六十二名,其余都是这类壮勇。^[10] 尽管官兵得到了壮勇的支援,人数仍然比义军少得多。义军人多势众,完全有力量包围许多重要城池。但是,由于官兵严密搜捕胆敢与义军通声气的本地人,除掉了义军耳目,削弱了他们攻城掠地的信心。徐、叶确信团练足以自卫地方,就集中兵力,准备各个击破敌军。至1852年6月,这个地区就完全被肃清。在这段时间里,徐广缙和叶名琛是通过书信来往进行作战部署的。尽管这种联系方式有不足之处,但他们仍然成功地指挥了这次战事,就连咸丰帝都赞赏“该督抚调度有方”。^[11] 与之相反,广西的官员却互相掣肘,军事上节节失利。两相比较,徐、叶的真诚合作就显得尤为突出。到1851年,起义在广西风起云涌,咸丰帝不得不派钦差大臣周天爵前去讨伐。可是广西军界的头头如提督向荣之流拒不合作,更有甚者,连各镇总兵也不听周天爵的号令,以致师老无功。皇帝一恼之下,说“周天爵勇于任事,而不能用人”,^[12] 便派赛尚阿接替了他的职务。

徐、叶二人拒敌得胜,证明他们善于用人。例如:廉州知府畏葸不前,不敢率部与首次来犯的义军对阵,马上被革职,改由沈棣辉署任。沈在1849年镇压义军时就显出卓越军事才能,皇帝还赏给他一支花翎。在廉州,处处表现出他确系将才。他擒获了敌

首黄八〔查据《实录》，应为刘八——译者〕，^{〔13〕}击溃了其他几股义军。战争接近尾声时，他已升任高廉道。叶名琛到高州后，沈亦受命乘胜率部前来，^{〔14〕}参加镇压由凌十八率领的一股强大的义军。在分析这一新的作战行动之前，我们顺便提一下与高州起义几乎同时发生的儋州事件。

第三节 1851 年 7 月—1852 年 7 月的儋州

在海南岛的儋州也有一股义军。徐广缙和叶名琛就像对付廉州的义军一样，主要是靠用人得当取胜。“庸儒无能”的知州张亨铤以及因镇压义军“畏葸不前”的琼州镇总兵，均予革职查办。徐、叶起用了雷琼道江国霖，又任命龙门协副将吴元猷代理琼州总兵。这两人都是很干练的，用兵仅一年，就把起义镇压下去。^{〔15〕}日后亚罗战争时，江国霖是布政使，吴元猷是水师提督。

第四节 1851 年 1 月—1852 年 8 月的高州

1851 年 4 月，叶名琛自清远、英德击败义军回到广州。此时高州又遭几股强大的义军袭击，其中最出名的是以凌十八为首的一股。形势危急，徐广缙决定亲自指挥作战，于 1851 年 7 月动身前往。^{〔16〕}

凌十八是高州府人，1847 年去广西参加了当时设在金田村的拜上帝会（即后来的太平军）。1849 年返回高州纠集了约三千人马，同官兵发生过一些小的冲突。1850 年 2 月 14 日他率部离开高州再去金田，途经博白，该县境内许多拜上帝会会员和盗匪纷纷来投，队伍一下扩充到约一万人。但是，他在广西被官兵截堵，不能与太平军会师，于是急派人潜往金田求救。太平军派来

一支援兵,但同样被官兵挡住。^[17]因而凌十八部在广西境内流窜多时,其间曾围攻过几个城池。最后,他决定回师高州,于1851年5月在罗镜扎下大本营。^[18]当时广东所有义军中,凌十八部对官府威胁最大,因为他们不但有政治目标——推翻清王朝,而且有宗教信仰维系人心,使他们紧密团结,甚至连叶名琛都感到吃惊。^[19]另外,罗镜山高势险,凌十八的大本营几乎坚不可摧。义军筑堡垒,修炮台,在山坡上广掘陷阱,加强防卫。从1851年7月至1852年6月,依仗天险,严密防守,凌十八在徐广缙的攻势面前岿然不动。徐广缙想把他诱出据点,凌又不上当。^[20]这时,广西的形势每况愈下,太平军攻占永安州,并挥师包围了省城桂林,击杀总兵四员。咸丰帝急命徐广缙火速率精锐开往广西会剿,叶名琛接替他指挥高州战事。^[21]

叶名琛接任后,首先查明他前任久攻凌十八不下的原因,关键之一在于行辕设在信宜,离前线较远,于是决定把它移至罗定,尽量靠近第一线,以便指挥。他在奏报中说,这样“侦探较切,情形冀可周知,方得以资调度”。^[22]经过调查,叶名琛了解到罗镜的防守半径约六英里,防地内堡垒林立,层层相接。树林内,壕沟中,甚至在装了机关的民房里,都有配备了大炮和火炮的义军防守。只有几条羊肠小径通入罗镜,小径两旁通常还是大水塘。这样的地形不利于大规模正面仰攻。再者,这些小路上还布满了陷阱,陷阱底下尽是竹签铁钉。义军拒不与官兵对阵,只等官军进入炮火射程,予以火力杀伤。徐广缙指挥战争的一年内,官兵损失惨重,死约三百人,伤约三千人。此外,大部分官兵在清远、英德打了一年仗,在高州又作战一年,已经疲态毕露。摆在叶名琛面前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接手带好这支筋疲力尽、士气低落的军队。他强调要振奋军心,所以冒险把驻在两广交界战略重地封川的六百名官兵调到罗镜。叶名琛认为罗镜与封川相距不远,万

一有事,还可以飞兵回救。同时,又调来佛山壮勇一千五百六十人。他还决定休整军队,让伤员把伤养好。同时,他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充分收集敌军的情报,以便制定作战计划。搜集情报的方法是捕捉义军细作,仔细研究他们的口供。叶名琛到罗定不足二十天,便提讯了二百名敌探。他们供出了义军如何安营扎寨和具体布防等十分重要的情报。叶名琛还答应这些俘虏,只要他们愿意在官兵发动总攻时充当向导,概免死罪。

俘虏证实了义军缺粮。为了进一步动摇义军军心,叶名琛大举搜捕那些敢于给义军提供粮草的人,切断罗镜的秘密补给线。义军战士无奈,只得出来割取稗子充饥,叶名琛马上雇了三百民工,把罗镜附近漫山遍野的稗子全部割去。虽然敌兵多方骚扰,企图阻挠这一行动,但都为叶名琛挫败。这时凌十八犹如一头困兽,叶名琛必须防备他冒险突围。终于,叶名琛认为时机成熟,命令部队把总攻日期定在7月28日晚。从7月16日起,官军日夜不停地发动佯攻。起初,义军当然不敢掉以轻心,后来几乎天天如此,也就习以为常了。

叶名琛不断召见手下的文武官员,告诫他们要爱护士卒,与他们同甘共苦,这样他们才会服从命令,勇敢作战。他还提倡同僚之间要谦虚谨慎,共议方略。他警告他们,谁要是心存妒忌,拒不与同僚合作,就将受到严惩。他总是把所有的情报都告知手下将官,好让他们了解最新的形势发展情况。士绅们同样被动员参战。他们受命组织练勇,以辅助官军,并把罗镜及其周围地区的地形绘成地图,供叶名琛制定作战计划时参考。^[23]

一切准备就绪,叶名琛就召集属下文武,简要地分配了任务。他命令,在大部队发起冲击之前要把敌军所有堡垒夷为平地,以免进攻时遭到火力拦截。叶名琛早就看出总兵福兴是个将才,经常同他讨论作战方案,委任他为前敌总指挥;对福兴来说,能够得

到叶名琛的青睐比什么都强。总攻一开始,福兴一声号令,万炮齐发,猛轰敌垒。为了报答知遇,福兴作战极为勇猛,身先士卒,直捣敌营。在冲锋中,他不慎堕马,折断了一根肋骨,口吐鲜血,但又返身上马,继续进击,福兴的行动大大鼓舞了他的部下。由于部署周密、士气高涨,官兵很快就摧毁了全部敌垒,从三面进逼罗镜。次日中午,攻陷罗镜,歼灭敌二千余,凌十八也战死沙场。^[24]

咸丰帝十分重视罗镜之役。他曾说过,凌十八和韦正(当时韦正被看成是广西太平军的领袖)是太平军中非常重要而且“声势相倚”的两支部队。“凌十八一日不除,则韦正得借资援应”,“西省剿办,亦难得手”。^[25]所以,当罗镜大捷的奏报抵京,咸丰帝极为欣喜,立刻加叶名琛总督衔,十天后,命他署理两广总督、钦差大臣。叶名琛能够在短期内取得了徐广缙费时一年都无法得到的胜利,这一事实完全说明了叶名琛是有军事才能的。当然也不是说徐广缙是个草包。他也因为能把凌十八困在罗镜而立了功,得到了太子太保的加衔。^[26]

第五节 1852年10月—1853年1月的韶州

1852年7月,叶名琛正拟自罗镜班师回穗,有消息说太平军已攻入湖南,威胁粤北。的确,太平军在6月10日已经深入到永州。永州同他们刚刚攻克而又放弃了的全州一样,是湘江沿岸的城池。太平军没有溯流直下长江,反而向南攻破道州。^[27]他们把大本营扎在郴州,在湘、粤交界的一些城镇之间徘徊了三个多月。洪秀全同太平军其他领导人留在郴州,西王萧朝贵则率领了三、四千人马北上进攻长沙。如果不是萧朝贵在9月11日攻城时中炮身亡,从而引起太平军的复仇狂热的话,洪秀全还不一定离开

郴州。^[28]

这里有两个重要问题：第一，如果太平军的目的是要北上作战，为什么在攻下永州之后要挥师南指广东？^[29]简又文和郭廷以的解释是因为太平军在全州和永州之间损失甚大。可是细读简著《太平天国全史》，就会发现，太平军沿江而下时，战船虽遭西岸官军炮击，但他们在东岸集结，^[30]若要北上，还是有可能的。上面讲过，有一部分太平军事实上已经北上到了永州，然后才南下道州。后来又有一部分太平军北上，可已经是 8 月 26 日了，而且仅有三、四千人的偏师。^[31]这就引起了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洪秀全竟然在广东的北边停留三个月之久，直到西王在长沙战死后才移师北上？显然，简又文单方面的解释不能成立，真正的原因恐怕是简又文轻轻带过的因素，就是太平军需要一些时间来调整部署。^[32]

郭廷以认为太平军在广东北部逡巡不前时，他们的领导人正在争论是打回广西还是北上湖南，因为许多人开始思乡了，只有能左右局势的东王杨秀清赞成北上。郭的这种解释比较合理。^[33]不幸的是，简在引用郭所述关于这场辩论的材料时，没有深究其原因，而把它忽略了。《广州档案》表明郭的说法是对的。档案里有材料说，洪秀全曾向一位亲信表示过想打回家乡广东，在那里建立东都，另外在广西建立西都。^[34]也许这条材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太平军在永州附近失利后就南下欲向广东进发，后来又在广东的北面逗留了一百多天。在这期间，太平军的领袖，包括洪秀全，派了许多细作潜回广东。^[35]这些细作在粤北韶州府煽动不满政府的百姓，终于引起了起义。

叶名琛匆匆赶赴现场。他到底是哪一天到达韶州的，我们不清楚，但是在他写给英国公使文翰的一封信稿中，说将在 10 月 30 日前往韶州。^[36]其实，这都无关重要，因为叶名琛早在指挥平

定清远、英德义军的战役中,就大大加强了省界上的防卫力量。闻得太平军陈兵粤北,叶名琛预见到太平军会派探子过来,早已下令严拿务获。结果,太平军的细作,无论是单独行动的还是成群结队的,扮成商贾的还是扮成旅客的,大都一一落网。^[37]这样,叶名琛到达韶州后,只要对付本地的义军就行了。他从罗镜带去了三千官兵,但遗憾的是骁勇善战的总兵福兴已经遵旨前往湖南讨伐太平军。于是,叶名琛便让原任韶州总兵、新任提督的崑寿暂时不去惠州赴任,留在韶州协助自己。^[38]像以往一样,叶名琛令人把该处的不同地区都绘成地图,仔细研究,^[39]还派人去搜集情报,了解敌军的目的及动向。然后,他推断出同湖南和江西交界的地区要特别防范,于是兵分两路,一路在西,专门对付来自湖南的威胁;另一路在东,专门对付来自江西的敌兵。他很快就解决了本地的义军,^[40]企图逃往广西和江西的敌人都在省界被赶了回来。叶名琛同逃窜的敌军打了五场大仗,斩杀了一千七百余。^[41]叶名琛势如破竹般的胜利,连江西巡抚张芾都十分钦佩,他写信给叶,称赞叶的军事天才使江西也受益不浅。^[42]

1852年底,太平军已经往北推进到长江流域一带,这无疑是因为他们知道在广东斗不过早有准备的叶名琛。此后,叶名琛就返回广州,让崑寿留在韶州主持军事。

第六节 结 论

对于那些要推翻清王朝的人来说,在广东起事最为理想。广东是全国最富庶的省份之一,其对外贸易又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战略上,广东可以同外国人友好来往,就算得不到他们在外交上的承认,也可以从他们那里买到军火和给养。如果起义者囿于内地省份如湘、桂,他们就得不到上述的有利条件。地理上,广

西北部全是高山大峒,向桂林推进则需仰攻(太平军就是这样的),比顺西江而下直取富饶的珠江三角洲要困难得多。最后,在广东有许多秘密会党成员、对政府不满的农民、失业的码头工人和盗匪,这些人随时都愿意参加大起义。不少太平军领导都是广东人,他们自然很了解这些情况,下一章所谈到的洪兵大起义就是例证。

鉴于上述原因,太平军之上策应先取广东。这一章所提供之史实,对于解答为什么他们不那样做,或许有些帮助。首先,他们的友军攻入粤北,但在清远和英德被叶名琛击溃。在粤西廉州起义的队伍运气也不佳,同样被叶名琛歼灭。凌十八率领的太平军的一支重要队伍也在罗镜为叶名琛所全歼。当太平军占领了湘南,准备从北面攻入广东时,派进广东的细作几乎是有去无回。在他们策动下举事的大多数秘密会党都被镇压。终于,太平军不指望占领广东了,便挥师他去,沿长江下南京,并定都该城。^[43]这样,叶名琛在太平天国起义初期的历史中起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叶名琛,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历史可能不是如此了。

然而,太平军从未忽视过广东的战略地位。1853 年定都天京后,他们就开始派人回粤联络秘密会党,企图使之“同时并起”。^[44]再者,本章所述叶名琛几处军事上的胜利并不等于尔后这些地区就能太平无事。尽管叶名琛消灭了大股义军,但随后还有小股起义发生。广西的义军仍然不断渗入清远和英德。^[45]谢三等人率领的义军不断从广西来袭扰廉州。高州的形势更为严重。由宋七大、邱大、杜大降等率领的几千广西义军竟敢进攻高州城。^[46]受叶名琛之命暂留韶州的提督崑寿一直拖到 1855 年才能到惠州上任。

更糟糕的是,当地对政府心怀不满的人,特别是秘密会党成员,看到地方官员为对付起义而疲于奔命,也蠢蠢欲动。现存英

国外交部档案馆的一份秘密会党宣言写道：“古书云，五百年一度圣人出，国家之希望所在也。自明初以来，五百年已过；此正是英雄出现，救国救民的时候了。”^{〔47〕}〔原件是英文本，现倒译为中文——译者〕秘密会党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就是要推翻清王朝。他们认为早就应该行动了。整个广东就像一堆干柴，一颗火星就会引起熊熊大火。

注释：

- 〔1〕 HF 第 17 卷 3 页、23 卷 16 页，1850 年 10 月 5 日及 11 月 25 日上谕；F. O. 931/1248 号，1850 年 12 月 25 日徐、叶合署奏稿。
- 〔2〕 F. O. 931/1225 号，1850 年 10 月徐广缙奏稿；1226 号，1850 年 10 月 20 日上谕。
- 〔3〕 同上 1221 号、1245 号，1850 年 9 月 24 日及 12 月 19 日徐、叶合署奏稿。
- 〔4〕 同上 1326 号，1851 年 2 月 25 日徐广缙致叶名琛函。
- 〔5〕 同上 1901 号、1919 号、1922 号、1923 号、1940 号、1942 号，军事地图（1851—1859 年）。
- 〔6〕 同上 1324 号，1852 年 1 月—2 月清英战役详情文件；HF 第 23 卷 16 页，1851 年 1 月 12 日上谕。
- 〔7〕 HF 第 48 卷 21 页，1852 年 1 月 18 日上谕。
- 〔8〕 同上第 23 卷 16 页，1851 年 1 月 12 日上谕。
- 〔9〕 F. O. 931/1303 号，1852 年 5 月 10 日徐广缙致叶名琛函，其中复述了叶名琛的话。
- 〔10〕 同上 221 号，1851 年 12 月关于在灵山部署军队的报告。
- 〔11〕 HF 第 61 卷 34 页，1852 年 6 月 30 日上谕。
- 〔12〕 同上第 33 卷 7—9 页、28 页，1851 年 6 月 1 日及 12 日上谕。
- 〔13〕 同上第 39 卷 28 页，1851 年 9 月 10 日上谕。
- 〔14〕 同上第 61 卷 35 页，1852 年 6 月 30 日上谕。
- 〔15〕 同上第 38 卷 17 页，1851 年 8 月 18 日上谕；F. O. 931/740 号，1851 年

9月8日徐广缙致叶名琛函。

- [16] 同上第37卷5—6页;第34卷1—3页,1851年6月15日及7月29日上谕。
- [17] 简又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第216页。
- [18] F. O. 931/1190号,关于凌十八的三个文件(1850年);1281号,1850年4月10日徐、叶合署奏稿;HF第32卷11页,1851年5月25日。
- [19] F. O. 931/1348号,1852年8月7日徐、叶合署奏稿。
- [20] HF第45卷16页、第46卷11页、第47卷3页,1851年12月3日、15日及13日上谕。
- [21] 同上第56卷1—6页,1852年4月5日、29日上谕;F. O. 931/1749号,1852年6月2日徐广缙奏稿。
- [22] F. O. 931/1336号,叶名琛奏稿(1852年6月);1322号徐、叶合署奏稿。
- [23] 同上1362号,为上绅首领及练勇请功名单(1852年底);1907号、1912号、1915号、1950号及1955号,军事地图(无日期)。
- [24] 同上;同上1342—1348号,1852年7月16日及8月7日叶名琛奏稿;1797号及1138号,高廉道台致叶名琛函(1851年);480号,1851—1852年徐广缙致叶名琛函。韦文在《门前怪客》第133页中声称凌十八自杀身死,但F. O. 931的文件证明他是被叶名琛手下的一员将领杀死的。
- [25] HF第38卷7—8页,1851年8月13日上谕。
- [26] 同上第66卷5页、67卷11页,1852年8月25日、9月5日上谕。关于凌十八起义的另一详述可见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4章247—262页。但是,简根据的是第二手材料和一些地方志,似认为主要的恶战都是徐广缙指挥的,叶名琛接手时已是胜利在望。事实并非如此。F. O. 931证明,叶名琛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
- [27] 《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第182页。
- [28] 同上,192页。
- [29] 《太平天国全史》第390页。
- [30] 同上,第389页。

- [31] 《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第186页。
- [32] 《太平天国全史》第390页。
- [33] 《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第185页。
- [34] F. O. 931/1041号, 一被俘太平军密探的供词(1850年)。
- [35] 同上1375号, 被俘太平军探子供词(1852—1853年); HF第68卷14—15页、19—20页, 1852年9月19日上谕。
- [36] F. O. 931/935号, 叶名琛致文翰照会, 1852年10月24日。
- [37] 同上1375号, 被俘太平军探子供词(1852—1853年)。
- [38] HF第66卷12页, 1852年8月29日上谕; F. O. 931/1355号及1358号, 1852年10月3日、11月5日叶名琛奏稿。
- [39] F. O. 931/1907号、1912号及1925号军事地图(无日期)。
- [40] HF第74卷8页, 1852年12月1日上谕。
- [41] F. O. 931/1385号, 1853年1月7日叶名琛奏稿; HF第93卷4页, 1853年6月8日上谕。
- [42] F. O. 931/1486号, 张芾致叶名琛函(1853年)。
- [43] 太平军从广西北上是公认的史实, 但北上的原因却从未得到深究。简又文的《太平天国全史》可以说是关于太平天国最详尽的记述了, 但他也把太平军的北上看成自然而然的事。简又文惯于对史实一丝不苟地探求, 这本来是很有必要, 而且也很有用, 但正因为这一点使他看不清大问题。如果广东防卫不力, 唾手可得, 洪秀全为什么还要从金田村远征南京呢? 定都南京并不见得比广州强。就太平军看来, 定都南京的惟一的好处是离北京比较近, 但万一打了败仗, 这点好处也就不成其为好处了。关于这个问题见本书作者评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的文章, 载《现代亚洲研究》第9卷4期(1975年)第557—566页。
- [44] HF第142卷11页, 1854年10月8日上谕。
- [45] 同上第31卷16—17页、36卷第5页、第38卷5—6页, 1851年5月13日、7月17日、8月13日上谕。
- [46] F. O. 931/1442号, 叶名琛、柏贵合署奏稿(1854年); 112.4.17号, 关于剿匪的报告(1855年)。

- [47] F. O. 17/226 卷, 1855 年 1 月 9 日包令致克拉兰顿的信(第 18 号公牒)。韦文在《门前怪客》第 139 页中错引了这段话, 他把“自明初以来”说成是“自明末以来”。另外, 明朝灭亡是在 1644 年, 到 1854 年时仅二百年。

第六章 1854—1858 年的洪兵大起义

1853 年发生之几件大事,促成 1854 年的洪兵大起义。首先,1853 年夏,广东遇到了历史上罕有的暴雨和洪水。^[1] 上年夏季,就因洪水泛滥而庄稼失收。^[2] 就算稍有积蓄的农民,也支持不到 1853 年冬,更不用说贫苦的佃农了。上面提到叶名琛对付自然灾害的政策,花钱的重点是修堤筑坝,而不是赈济灾民。历史上由饥荒导致起义的事屡见不鲜,这一次广东大规模起义,很重要的原因也在于此。

其次,残暴的税吏更增加了农民对政府的怨恨,叶名琛是个手腕强硬的总督,当时又值财政拮据,税吏自然变本加厉地催逼农民交足税款,同时也肆无忌惮地中饱私囊。他们或用武力强抢,或用严刑催迫,总之,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当然,农民也不甘任人欺压,于是杀死税吏的事件就层出不穷。^[3] 大地主一般都是士绅,他们的利益也受到洪水的侵害。他们的对策是硬要农民交纳同正常年景一般多的租子,交不出租的农民就要挨打,甚至被杀。第四章里,讲到在博罗发生的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士绅们为了保卫他们既得利益而干的另一件事,是大规模的抗粮运动。他们还常常抵制府试,甚至乡试,企图引起公众注意他们所谓的苦楚。^[4]

尽管这些不近情理的抗议全都被徐广缙和叶名琛驳回,但他们敢于向当局挑战,不把政府放在眼里的行动,客观上也增强了农民造反的胆量。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广西义军扰及广东,也大大鼓舞了对政府心怀不满的广东百姓。不少农民和盗匪都曾参加过这些义军。的确,太平军迅速攻陷武昌、安庆和南京等重要城市的消息在广州也引起了强烈反响。只要有人领头,百姓马上就会揭竿而起。而太平军派来的细作及广东的秘密会党就是很好的领头人。太平军从南京派来的人都是些职业煽动家。他们知道来广东要完成的与其说是宗教使命,不如说是政治使命和战略使命。所以他们并不把宗教活动强加于人,而是以一个重要的兄弟团体的面目出现,努力加强同广东秘密会党的联系。他们自称是曾经参加过攻克南京战斗的太平天国英雄。这样,就成功地渗入了秘密会党,在最强大的起义军如甘先和李文茂等人率领的队伍里,他们占得一席领导地位。^[5]

活跃在农村的煽动人员,到处传播五百年出一圣人救国救民的理论,还特别点明,现在已经是时候了,将有一位领袖把百姓从清朝暴政下拯救出来。到 1854 年初,叶名琛的密探就不断地给他送呈紧急情报,告诉他广州城郊每天都有数以百计的人秘密聚会,然后悄悄散去。^[6]这是秘密会党接收新会员的仪式。其实何止在广州城郊,全省各地都有。叶名琛同柏贵会衔出示禁止非法集会,告示广为散发。^[7]但要制止这场大起义,为时已晚,不久广东就陷入了历史上罕见的大动荡之中。起义首先在珠江三角洲爆发,转瞬间整个珠江流域和韩江流域也落入义军之手。本章将依次论述这三个主要地区的大起义。

第一节 1854 年 6 月—1855 年 3 月的珠江三角洲

除了怨恨政府的农民和佃农外,广州还有另一部分人随时都

准备参加起义,他们是码头工人、苦力和因生意萧条而于1853年失业的买办。^[8]城乡的反政府力量都汇入了秘密会党。大起义的烽火是一个秘密会党的首领何禄点燃的,他在1854年6月17日聚众攻占并洗劫了离广州二十英里的东莞县城。^[9]7月4日,陈开率领七千部众攻陷离广州西南面约二十英里的佛山镇。他的队伍迅速扩大到数万人,其中有三千是自广西远道来投的。^[10]广州北面约二十五英里的花县被甘先攻下,西面约二十五英里的三水被陈金钢包围,^[11]南面的顺德于8月1日落入陈吉手中。于是,整个三角洲烽烟遍地,广州处在战火中心。更危险的是,在广州郊区发生的起义,如江村李文茂、燕塘陈显良、河南林洗滢。那些洗劫了邻近各县的小伙也陆续加入了上述几股义军,现在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目标——攻占广州。

当时到底有多少股起义军,难于确计,但围困广州的人数当不下于二十万。所有义军战士都头裹红巾,旗号也是红色的,^[12]所以称之为“红兵”。^[13]但义军在文告中的正式自称是“洪兵”。他们组成一个松散的联盟,公推最强大的一股洪兵首领李文茂为盟主,其实李文茂对别股洪兵只能稍施影响,而不能号令一切。李文茂的攻城部署如下:陈显良率部约三万人从东面,甘先从北面,李文茂自己从西面攻城;林洗滢则控制城南的珠江河面。本来李文茂还同陈开商定,让他的十万多人马也参加攻打广州。^[14]李又约请刚刚洗劫了东莞和增城的何禄率部一万余人,协助陈显良从东面攻城。^[15]

叶名琛这时的处境真可谓山穷水尽。尽管咸丰帝下令从邻省调来了一些部队增援,如广西的一队战船,福建的二千兵勇,湖南的一千人马,江西的四千官兵。但是这些部队进入广东,每前进一步都要和当地的洪兵打仗。虽然他们也为镇压这次大起义卖了力气,但远水救不了近火,他们根本无法杀开一条血路,接近广州,协助解围。^[16]

广东其他各府县也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无法增援广州；相反，向叶名琛告急之书，接踵而来。更糟糕的是，太平军直接间接地牵制了叶名琛的精兵良将。例如：为了镇压凌十八，从各协抽调了共一万精锐，但到战争结束时，有三千多人丧失了战斗力。另外有三千多人，包括骁将福兴在内，被派往湖南与太平军作战。其余的人马以提督崑寿为首，都被派往粤北，^[17]抢在太平军兴师犯境之前加强那里的防卫，那是因为韶州的形势仍然极其严峻，咸丰帝对之十分关注的缘故。咸丰帝不了解广州面临的危险，还命令已回广州的叶名琛在万一形势危急时再赴韶州。^[18]再者，南京陷落后，清王朝已危如垒卵，因此不断要广东派兵北上讨伐。对此，叶名琛也禁不住发牢骚，抱怨他所有的精锐几乎全被调出省境，无一人能回广东帮他镇压洪兵。^[19]

面对这种形势，叶名琛只得孤军作战。为了生存，他必须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尽量利用手头仅有一点点兵力来对付庞大的洪兵队伍。他一定得赢，因为赌注太大了。尽管内心有点紧张，但他绝不能形诸言表。他的一举一动都要装出稳操胜券的样子，借以稳定军心，鼓舞士气。他把指挥部设在俯瞰全城、雄视江面的观音山镇海楼。^[20]在这座楼上，他指挥了许多关键性的战斗，目睹了无数次恶战。这是他戎马生涯中的光辉顶点。

军事部署

洪兵联军同叶名琛的部队相比，众寡悬殊。据记载，那时广州只有旗兵五千，绿营四千，潮勇二千（其中半数迟至7月19日才到达），以及来自珠江三角洲的募勇四千。^[21]力量对比是一万五千对二十万。叶名琛实际上已从全省抽调了一切可以抽调的兵力，不管是正规军还是募勇。这样凑成的一支军队，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些士兵所讲的方言不同，风俗习惯各异，所以很难

合作。叶名琛的办法是让不同的部队防守不同的地段,任命他们原来的军官为指挥官,而不是把他们混编后组成新的战斗单位,任命新的指挥官。这些指挥官只贯彻叶的指示,指挥的又是自己熟悉的部队,所以能打胜仗,经过长期艰苦的战斗,为击退围城洪兵作出了贡献。

表八 调来省城各起官兵(一)

陆 路				
来 源	军 官	兵 丁	余 丁	壮 勇
督标六营肇庆协兵丁	12	1000	—	—
抚标左右营兵丁	9	490	—	—
陆路提标五营兵丁	5	200	—	—
潮州镇标十营余丁	3	—	300	—
增城营左右营兵丁	5	200	—	—
潮州镇标兵勇	5	—	400	—
新会营左右营兵丁	9	350	—	350
绅士伍崇曜招募新安壮勇	3 ⁽¹⁾			800
合 计	51	4090		

注(1):从绿营诸将中挑选。

调来省城各起官兵(二)

水 路					
来 源	纛 拖 船	军 官	兵 丁	水 手	壮 勇
香山协左右两营	9	9	240	120	30
水师提标	11	15	593	—	—
阳江镇	3	4	145	—	—
琼州镇	25	7	250	—	—
督标水师营	—	2	100	—	—
合 计	48	37	1478		

本表根据 F. O. 931/1098 制成。

士绅们也总动员起来。叶名琛要他们招募族人,组织募勇,并允许他们作为大军中的一标人马,独立作战。总的看来,潮勇都很善战,其中以候补同知郑锡琦部最为著名。来自珠江三角洲的募勇中,东莞武举人朱国雄部和香山林福盛部也表现突出。^[22]

但是,有了军队以后,还得有人指挥。陆军提督仍在韶州,所有的总兵副将都忙于对付各自防区内的洪兵;水师将领要围捕海盗,有些则早已被调往长江与太平军的水师作战。^[23]叶名琛认为,曾在廉州和高州战斗中表现出卓越才能的肇罗道沈棣辉可以胜任总指挥一职。事实证明,叶名琛确是知人善任,因为沈棣辉后来成了威名显赫的勇将。

叶名琛为什么不让广州将军出任总指挥,我们不得而知。有人讽刺这位将军是“腐败无能的大清朝的活标本”,^[24]这也可能有几分真实。事实上,在叶名琛的档案中几乎没有提到过1849—1853年间动员旗兵镇压零星起义军的事。广州被围时,旗兵的任务是防守老城,^[25]保卫新城则是绿营和壮勇承担的任务。^[26]仅仅到把洪兵逐至广州城东、西和北面的时候,“副都统来存亦率军出战”。^[27]

建立战时机构

叶名琛认为非常时期不能分权而治。平时省一级的权力分别在布政使、按察使、盐法道和督粮道手中,现在叶名琛把他们组织起来成为一个临时性的新机构——军需总局,这个机构实际上成了一个只听命于叶名琛、全权掌握广州一切事宜的战时政府。^[28]军需总局下面分好几个部门,有提调局、兵房、声色科、捐输局、支应所、军装局等。^[29]

在军需总局这个中枢机构里,叶名琛听政议事,运筹帷幄,其他人员只是一班谋士。该局的首要任务是部署广州城防,于是开

了个会,会上提出许多建议。有人提出,守卫广州的水师力量仅可与洪兵水师匹敌,所以对作战有功人员的奖赏要高,即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另外,广州附近的士绅向来有在督抚监督下组织民团的传统,所以建议叶名琛亲自接见他们,鼓励他们率部积极守城或留村待命;为了加强保安措施,要派认真负责的官员分区进行挨户搜查,并要提标逐日报告他们辖区内居民的动态;他们还建议招募闲散的八旗子弟,组织隶属于各旗的募勇。^[30]

军需总局除了为叶名琛出谋献策外,有时也受叶名琛的委托决定一些事情。比如,1857年1月,清远城被义军围困了两个月,知县求救,并请拨银五千两为军费。叶名琛把此文转给军需总局,并批示:“所请委员带兵前往剿办,业已另行调拨前往在案,仰即知照。此檄。等因。印发外,合就檄行;为此牌仰该总局,即将所请筹拨银五千两是否经拨清远之处,核议详夺,速速。”^[31]接到叶的批示后,稿房马上作出安排,请军需总局的主要官员共同开会研究。经过详细讨论,决定只拨二千两。叶名琛照准后,军需总局就派员护送该项银两前往仍被包围的清远县城,并通知沿途各协驻军妥为保护。^[32]

治安措施

广州被围前,叶名琛一直打主动仗,从未在被包围的逆境中作过战。他向民众和下属了解桂林是如何顶住太平军的围攻的。他得知,当时桂林重新成立了保甲,附近的团练轮流守城,流落在桂林的外乡人(其中大部分是商人)主动组织起来,盘查生人,以防奸细。^[33]叶名琛参考他自己在1849年入城危机时负责保卫广州的教训和别人的经验,着手规划广州的治安措施。

像1849年一样,广州组织了联街团练。同练勇一样,联街团

练的指挥官,包括队长、旗头、值事和协理值事,都来自民间。叶名琛不愿让一支民兵完全由民众自己掌握,所以除了登记各队负责人的姓名、籍贯以外,^[34]他还在广州的四个城区各组织一个监督委员会,轮流掌管全城的联街团练。这些委员会都由知名人士组成,统一由军需总局中四位主要官员之一来主持。^[35]组织这种团练,需要登记全城人口。当时一位英国观察家写道:“昨天,知县下令,各家各户都需在门口悬挂由官府发给的一个小牌,标明该户的人数及各人年貌,以便侦查奸宄。”^[36]联街团练的主要职责是沿街巡逻,盘查生人。在这方面,他们做得比正规军还有效,因为正规军并不一定认识附近的居民。1855 年春节将临,叶名琛下令加紧街道巡逻,以免传统的年关闹市给敌人可乘之机。每条街道都设了关卡,在大、中、小街道巡逻值勤的团练分别增至六十、三十和二十人。“已联之街,分设定式木签,分派各街值事,一闻告警,遇事之街即持公签通知,前后各街立即持公签带领民壮奋勇救护,遇事之街作为前队,其余各街以次继进,所通各卡验明公签放行”。^[37]联街团练对维持广州的治安起了重要作用,除在城内城外小心提防之外,还腾出了大批官兵上城御敌。联街团练之所以能成立,叶名琛是付出了不少精力的。办好这种团练,是一个相当繁重的任务。比如在财政方面,尽管联街团练自筹饷薪,但为了不挫伤士气,叶名琛也亲自审查其收支账目,以杜绝贪污。^[38]

叶名琛的情报触角也伸展到广州城的每个角落,仔细探查可能同洪兵勾结的嫌疑分子。1854 年 10 月,一些参加了秘密会党的衙役密谋从广州北门接应洪兵入城,即被查出,^[39]其他潜伏在城内的洪兵密探也暴露了。^[40]这都证明叶名琛的情报工作效率相当之高,而情报工作大多由士绅干的。他们最轰动一时的功绩,就是诱捕了秘密会党的首领陈松。陈松是当时各主要秘密会

党的领导人都极为尊敬的人物,他曾为何禄、李文茂、陈开和甘先等人领导的重要起义出谋划策。^[41]历史家一向认为洪兵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缺乏统一领导和互相协作。如果陈松不死,成败或许又当别论。叶名琛争取了士绅们坚定不移的支持,使他们不辞劳苦地为他服务,其精明能干,也于此可见。

筹措给养

军队后勤补给是需要叶名琛亲自过问的又一重要事情。专管军火的机关分许多不同部门,平时八旗和绿营中的一些协是允许生产火药的。^[42]叶名琛知道,弥补兵力不足的一个办法是取得火力优势,所以他订购了能够制造出质量最好的火药的机器设备。^[43]生产出来的火药都运到火药局,然后才分发到各部队。一旦形势危急,全军各部都有权无限量地制造火药。叶名琛还下令将所有的小炮全部熔铸成新式火炮。^[44]军装所则造炮弹、子弹头及其他远射兵器,然后依次运往大有仓、永丰仓和海珠炮台等三个弹药库。^[45]另外还有军器局,专管贮存藤牌、铁棍、铜锣、绳网之类作战物资。叶名琛命令军器局清查所有库存物资,把不再适用于作战的东西卖掉,腾出地方存放新武器。^[46]他还要求上述各单位每月呈报,^[47]以便他随时都能了解军器装备的供求情况。1854年对广州的威胁主要来自陆路,特别是城北和城东,所以叶名琛从战船上拆下许多大炮,把它们装在城墙上,以加强防守力量。^[48]他还从香港和当时在广州的各国商人手中购买了大量军火。^[49]

另一个问题是粮食补给。一般广州人的存粮都不足半年之需。洪兵并没有完全切断广州同四乡的贸易,比如,他们允许花生油、生猪和家禽等运入广州,但要抽税。税率,花生油每桶二钱银子,生猪每头一钱,鸡鸭每笼一钱;但是柴薪、蔬菜 and 主食则不

准通过各路关卡。^[50]其实,就是没有洪兵起义,从农村运往广州的粮食也很少,因为年前受了灾,1854 年年景又不好。大米要靠进口。要让一万五千人的队伍和将近百万的广州市民吃饱饭,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51]叶名琛对此不存半点侥幸之心,他命人准备了一个有关东南亚不同地区的稻米生产条件、近年的收成情况以及把大米运到广州需要多长时间等的报告,^[52]材料很可能是由一些常年同东南亚国家做生意的商人所提供的。然后,叶名琛就鼓励这些商人从国外进口大米。他们的粮船进入珠江口以后,便租用英国或其他外国船队来拖运,以便避免封锁珠江的洪兵船队的盘查。^[53]许多外国人都因此而大发战争财。一船船大米和其他货物源源不断地运入广州。^[54]据说有个叫安德可特的美国人就是靠了做这种买卖而成为百万富翁的。^[55]虽然大米也还有短缺和昂贵的时候,但由于叶名琛实行打击囤粮、控制价格等办法,总的说来米价是稳定的。^[56]事实上,他关心的不仅是军队能够吃饱,而且连市民也要不挨饿,以防因饥饿而引起动乱。在这段时期,他要求有关官员每隔五天就向他呈报一次大米进口数量。^[57]

洪兵想让广州断粮,然后迫其就范,然而适得其反,连他们自己也要派人秘密入城购买弹药、物资,但这些细作都很快被查出严办了。^[58]

战 斗^[59]

从战略上看,如果佛山陈开的十万之众也参加围攻广州,那么广州城必陷无疑,因此叶名琛不惜任何代价,坚决拦截陈开。8月6日,他召见位于广州与佛山之间的大沥、四堡等乡的著名士绅如刘炳垣、欧阳泉、何应春等人。他们还会见了军需总局的主要官员,共同讨论,计划如何拦截陈开,并从筹饷局得到大炮和弹

药补给。他们刚回到各村,就碰上陈开兴兵来犯。8月19日,陈开因为急于同李文茂会师,派两标人马进攻四堡。这一带的士绅早有戒备,他们有已经组织起来的团练,有上面提到过的九十六乡联盟,有从广州得到的军火装备,所以成功地击退了陈开的先头部队。经此一战,士绅们确信陆上作战已不必畏惧,担心的是水路来犯,于是请求军需总局派出一队战船,扼守珠江岸上的一些战略要冲,万一敌兵企图渡江,可予火力制止。8月30日,陈开率领十万大军,竭其全力进攻九十六乡,但仍遭挫败。^[60]这是珠江三角洲战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斗之一,它打破了陈开同李文茂会师的计划,使广州免遭沦陷。

在广州,7月30日开始了守城战。形势危急,人心波动,正如一份英国领事馆报告所描述的那样:“从广州向四乡及澳门、香港逃难的人络绎不绝。开始是有钱人,现在则不那么富裕的人家也大量出逃。”^[61]而叶名琛却岿然不动。他命令部队坚守阵地,击退一切来犯之敌,但诫切勿远追,“以防中计”。“总督、巡抚及广州将军经常在城墙炮楼上或其他制高点上观察作战情况,亲手向得胜归来作战出色的官兵颁发奖赏”。^[62]叶名琛的部队尽管远不及洪兵之多,但训练有素,炮火猛烈,而洪兵却缺乏有威力的火器。^[63]经过一个月的小规模战斗,洪兵丝毫占不了便宜。他们便决定从广州东面和北面发动全面进攻,但均被挫败。叶名琛趁着官兵得胜后的余勇,在城东突然反攻,大获全胜:陈显良设在燕塘的司令部被攻克,陈显良本人逃往新造,从此他的力量大为削弱,只能在珠江河面上活动。^[64]官兵在城东得手,便集中兵力应付城北之敌。10月28日,城北洪兵的一个重要据点牛栏岗被林福盛的募勇所夷平。副将卫佐邦率各部穷追溃敌,又攻克了两个据点,烧毁了六百多座营寨。西面,沈棣辉率一队战船向北迁回到李文茂设在佛岭市的大本营后边,发动突袭,洪兵向北方溃

逃。约至12月底为止,各路洪兵便被逐离广州近郊。尽管仍未彻底粉碎包围,广州已脱离险境。^[65]

洪兵在北面仍远远地窥伺着广州。据1855年1月14日捕获的一名洪兵俘虏称,各路洪兵首领图谋再犯广州,主要是从水路进攻。林洗滢从东面率一百四十五条战船溯江而上,何禄的船队则经澳门入珠江从南面进攻;甘先和周春合兵一处,约有二十条船,将自西面来犯;李文茂则从北面卷土重来。叶名琛不给敌人以还手机会,乘胜把洪兵全部逐离广州近郊。1月7日,北面敌兵的最后几个据点石井、大冈和官桔分别被曾廷相、来存和卫佐邦攻下。^[66]与此同时,沈棣辉在西北之佛岭市得手后,即将兵锋转向佛山。他同两名杰出的指挥官——候补知县谢效庄和同知张金鉴一起,在九十六乡和顺德的团练协助下,经过二十三天苦战,于1月17日收复佛山。陈开率残部逃往顺德,之后他与从广州北面败回的李文茂合兵一处,沿西江进攻肇庆。^[67]

陆路肃清之后,便要对付水上的敌兵。陈显良在9月8日,何禄在12月7日在广州城东先后战败,便同广州南面的洪兵首领林洗滢合兵一处。^[68]这三股人马联合起来,其力量当然不可忽视。当时英国驻广州领事曾写信给公使约翰·包令爵士,“请求海军上将派遣他认为能够足以保障英国臣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兵力来广州,因为一股强大的艇匪正威胁着该城”。于是巴拉古达号军舰就被派到广州。^[69]实际上,广州城在四个月前被洪兵从三面进攻时的形势,比此时要危急得多。不过,对居住在城南珠江口岸边的外国人来说,当时的危险则不如现在来得直接。直到12月2日,他们看见洪兵船队时,才感到大事不好,慌乱不堪。在此形势下,叶名琛史无前例地请求在省河上执行护卫任务的英国军舰共同消灭“艇匪”,这一请求使包令公使认为城内一定是“惊恐万状,窘迫异常”。当时包令认为这是“请求”女皇陛下的

军事援助,此后许多中国历史学家则认为是“乞援”。^[70]对于这种流行的说法,这里斗胆地提出几点不同意见。

的确,仅林洗滢的水师就比官兵水师的实力强大得多。守卫澳门水道——“通过广州最后一道门户的官兵舰只不超过五十条;而叛军的大小船舰就有二千艘”,^[71]显然称霸水上。可是从另一方面看,洪兵在陆上却远非叶名琛军队的对手。稍后,何禄的船队曾试图从东面驶近广州,一到黄埔就被该处炮台的强大火力所击退,无法前进。^[72]城内百姓“在被围初期异常惊慌,现在却丝毫不见有慌张的神色了”,^[73]这更证明广州的形势已经有所缓和。所以对于“叶名琛不顾一切,请求英国海军干预”^[74]的说法,这里持保留意见。

以后的事态发展,也支持这种保留意见,包令接到叶名琛的来函后,在回信中除了表明英国政府的绝对中立政策外,但又说“鉴于情势急迫,我将与海军上将并战船数号,于下星期三前赴省垣”。^[75]可是,包令广州之行却徒劳无功,因为中国当局拒绝与他见面,“讨论他们深感兴趣的事情”。^[76]那么,为什么叶名琛向英国求助呢?当时一位官员曾在广州讲过,叶名琛向英国求援的决定是在沈棣辉的力劝下作出的。^[77]很难想象,一位“性如烈火”^[78]的陆路统帅会低三下四地乞求外援,何况当时也并非走投无路。而且一个被任命为讨贼统帅的道台在有关外交事务的问题上对性格刚毅的钦差大臣叶名琛有多大影响,也很值得怀疑。也许研究一下叶与包令的信件原文,会帮助弄清这个问题。

事情是由自称为广州绅商写给包令爵士的一封既无日期又无关防的信引起的。该信仅请求包令派舰队参加消灭对中英商人都带来极大危害的艇匪。^[79]包令说,如果该信是叶名琛发出的,他便会“认真考虑,尽快回复”,^[80]后来,叶名琛于2月7日给包令一道照会,全文如下:

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叶等

前据领事罗伯逊申陈,高栏盗匪为患,求本大臣合力剿灭。为此,本大臣曾调遣官兵,拿获贼人甚多,自首者亦复不少,此乃两国同仇敌忾之明证也。可喜可赞,不胜快慰。如今,省河上贼势猖獗,扰及外国人住处。虽则本大臣已派官兵练勇前往堵截剿杀,惟得悉贵国兵舰此刻亦泊省河护卫。为此,照会贵公使,通力剿匪。即颂时祉。^[81]〔原件系英文,倒译如上。——译者〕

由上引之照会可见,中国当局主要关心的是消灭对商人造成危险的水寇。当时政府财源枯竭,广州的富商大户不断捐输,一力承担作战费用。^[82]因而有理由设想,这些人形成一股力量,促使叶名琛寻求与英国方面的合作,以便尽快恢复贸易。^[83]从叶名琛的角度看来,恢复通商,重收关税,对政府也有百利而无一害。他认为外国人也绝不会反对这个计划,因为他们的贸易也大受洪兵,特别是水路洪兵之害。仅仅一个月前,英国海军还请求中国水师协助剿灭以珠江口高栏为基地的海盗。^[84]叶名琛认为,礼尚往来,英国方面也应协助中国官兵讨贼。再者,叶名琛从不认为广东战事是一场内战,他认为这是官府清剿盗贼,讨平艇匪,英国军舰到广州来主要也是为了保护英国的臣民和财产。因此,如果中国商人真的建议叶名琛向英国人寻求合作的话,叶名琛是没有理由反对的。这可能就是他允许商人们就两国合作之事致函包令的初衷。叶名琛当得知包令说了如以他的名义发去照会,即予“认真考虑,尽早回复”,感到包令的反应是积极的,所以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了。可是包令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这大出叶名琛意料之外。他肯定是认为上了当,^[85]因而更加认定外国人诡计多端,不可捉摸。同样,包令在广州城外吃了闭门羹,更觉得清朝官

员都是“自大无知顽固不化”的人。^[86]

现在回过头来且看珠江河面的战斗。12月17日打了一场大仗后,断断续续还有战斗。十五天后,林洗滌在河南战死,^[87]翌日,陈显良从新造赶来,全力攻打河南,想为死去的战友复仇,可是又遭挫折。1855年1月,从广州北面得胜归来的官兵又大败洪兵于珠江之上,陈显良退回新造。2月,沈棣辉也从佛山凯旋。官兵重新整顿,在统一指挥下,于3月5日从水陆两路向仍然在南面威胁着广州的洪兵发动进攻,^[88]——攻克了洪兵在河南的据点。三天后,新造洪兵“被彻底击溃,他们损失了全部大型战船,后勤基地新造乡连同一应辎重物资,也统统落入官兵手中”。^[89]

广州转危为安,叶名琛如释重负,住在广州的外国人也松了一口气。领事罗伯逊写信给包令说:“我极其希望这次作战能粉碎几个月来一直威胁着广州城的叛军,这样从此便可平安无事,阁下和我也就不至于坐卧不宁了。”^[90]或许叶名琛比他们更感欣慰,也更值得感到欣慰,因为这是他竭尽心力换来的成果。几乎每打一仗,他都要人绘制地图,图上不但标明战区的地形,并要标明居民分布状况和双方的军事态势。如果是在水上作战,那么地图上还要注明可能影响船只进退的风向。^[91]这些地图使他能够准确地了解形势,精明地指挥战斗。广州城边的许多场战斗他都亲自督战;如果在他目力不及的地方打仗,就派遣密探(大多是他的侍从)到战场,直接向他报告所了解到的战况。^[92]这样,他对双方的作战表现和士气都心中有数,能够如实考虑可能影响战斗结果的各种因素。毫无疑问,叶名琛是一个不怕吃苦、有能力的军事家,他的成功绝非侥幸。

结 论

尽管有全国各地派来的援兵,长江一带的城池仍然被太平军

一一攻陷,那里的总督、巡抚、八旗将军和绿营也纷纷垮台;惟独广州岿然不动。我们还可以把叶名琛同其他派去攻打太平军的钦差大臣作一比较。第一位是周天爵,他于 1851 年被命为钦差大臣,但因治下无能,几个月后就被召回。^[93]接替他的赛尚阿,也不得不很快地承认力不胜任,请求朝廷另选高明。^[94]于是徐广缙走马上任。可是,就连这位“沈毅有为,朕所深悉”^[95]的人也在 1853 年被撤换了。接手的是向荣,最后也落得个损兵折将,自缢身亡。到 1855 年初,叶名琛的前辈或同僚不少人都一一倒了下去,而像曾国藩、李鸿章这些晚辈中的佼佼者还只初露头角。当时的一位英国观察家竟把叶名琛誉为“现在全国之第二号人物”,^[96]其意是指他的声威仅次于皇帝。如果广州失守,全国官兵的士气、战略和补给都将会受到致命打击,清王朝能否继续存在下去,也很成问题。

广州之所以能守得住,有很多原因。叶名琛对军队部署,成立战时政府,采取治安措施,筹措给养,以及直接指挥战斗等各方面表现出来的军事才能,当然是主要的。将官们,特别是主帅的出色表现,以及同政府有共同利益的绅商的捐款也非常重要。但是将官是叶名琛挑选的,团结绅商的政策是叶名琛制定的,所以其中也有叶名琛的功劳。

另一方面,洪兵的弱点也是叶名琛成功的因素。他们人数虽多,但是缺乏训练,纪律松弛,武器落后,补给困难,所以并不占多大优势。起初,他们采取比较温和的政策,在攻占的地区只收人头税;但是,任何课税都不太受人欢迎的。后来,他们乞灵于劫掠,就更迫使广大平民百姓跟他们对立起来了。于是未受洪兵侵扰的村庄纷纷响应官府号召,组织团练自卫,阻截洪兵。由于补给困难,各洪兵首领之间常因战利品分配不匀而引起争执。外国人也看出,“各股叛军之间似乎目标和行动都不一致”。^[97]这个观

察大体上是正确的,因为他们仅是一个松散的联盟。李文茂就是在自己的队伍内部也并非说一不二,更不用说向其他各股发号施令了。实际上,与其说他统领各股洪兵,不如说是他是“邀请”各股洪兵首领与他一齐行动。^[98]如果陈松还在,凭着他无可争议的威望,他可能会充当起义的总头领,那么形势也许完全两样。可惜,他早在组织起义时就被叶名琛逮捕了。

外国人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所提供的或在他们帮助下取得的军火和粮食,是广州得以幸存的基本因素。另外,外国船只出现在珠江河面,已牵制了洪兵水师的行动。英国驻广州领事馆翻译墨里逊在评论12月7日的战斗时写道:“叛军并没有充分利用他们的优势压倒官军,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出现在珠江上的外国军舰有所顾忌,所以不敢妄动;此外就很难找出其他的原因了。”^[99]对此,陈显良向包令表示了不满,但包令不予理会。^[100]陈显良后来决定采取严厉的措施,要在农历新年以前完全封锁珠江。他“通知英国臣民在限期内把财产运离广州,过此期限,即封闭珠江,不准通行”。^[101]包令拒不承认陈显良有权如此做。此后,“挂着英国国旗的船只几乎没有一天不被所谓的起义军拦截,许多还遭到劫掠”。这时,包令认为,“如果要保护我们的贸易,一场冲突就在所难免”。^[102]八天之后,由于叶名琛即在新造大败陈显良,这才避免了这场冲突。

第二节 珠江流域

广州重新获得安全,叶名琛才有暇顾及其他地方,特别是珠江流域。这时珠江流域的县城,有许多已落入洪兵手中,有不少也岌岌可危。肇庆府的陷落使形势尤为严重。由于珠江三角洲是北江、东江和西江的汇合处,所以洪兵很容易沿这三条支流直

犯广州。分别位于北江、东江和西江上的韶州、惠州和肇州三府城以犄角之势拱卫广州,对于保卫广州的安全有着极重要的战略意义。此三城如果失陷,全省大部分洪兵就可以长驱直扑广州,广州绝难幸存。如上所述,肇庆已失陷,西江沿岸甚至远自广西而来的义军顺流而下,同陈开汇合,他的人马成千上万地激增。幸好陈开的部队被九十六乡练勇所挫败,不能参与围攻广州;韶州和惠州也打退了洪兵的围攻,所以叶名琛在广州只须对付珠江三角洲的洪兵就行了。

对叶名琛来说,珠江三角洲的平定,只不过意味着整个珠江流域战争的开始。他深知这场战争将是一场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而且,他的部队大部分时间将会在三江的上游打仗,所以他下令制造了许多适宜在浅水中行驶的战船。^[103]同时,他还命令沈棣辉不要把队伍全面展开,而要集中兵力在各条支流逐步肃清。首要任务,是开往西江收复肇庆;叶名琛自己则留在广州。经过六年多东征西讨,叶名琛对部下的能力已经做到心中有数,深信他们是多谋善战的。再者,统兵主帅谋略过人,更使他十分放心。在叶名琛看来,作为一个总督,统率文武官员,应该坐镇省城,综观全局,以便必要时在大的方面给部下一些指示,这才是良策。何况,他还要保证军队的给养。一份英国驻广州领事馆报告写道,大米“时价已是平日两倍,人们都担心会发生饥荒”。^[104]为保障即将出发到农村去平乱官兵有充足的粮秣,叶名琛派遣了一些官员到马六甲海峡两岸和马尼拉购买大米,还从广东西部海岸调了一支舰队去为粮船护航,以便打破盘据在航线上各港口海盗的封锁。^[105]这个办法十分成功。“大米大量进口,使粮源重新充足起来了,加上及时降雨,结束了长期干旱的气候,粮价有所下降”。^[106]与此同时,因茶叶失收,来广州没有做成这项生意

的外国商人也参加了粮食贸易。到 1855 年 7 月外商已发现，“大米市场仍然呆滞，米价又见下降，……米商现正在大量抛售”。^{〔107〕}

表九 失城各处殉难革职功过相抵事前病故事后
病故各员弁清单(1854—1855 年)

城池	失陷日期	收复日期	守城文官	守城武官
广州府				
东 莞	1854. 6. 17	1854. 6. 30	革职	战死
增 城	1854. 8. 10	1854. 9. 21	受伤	功过相抵
花 县	1854. 7. 13	1854. 10. 16	事前病故	(不详)
龙 门	1854. 9. 20	1854. 10. 27	战死	(不详)
清 远	1854. 8. 4	1855. 4. 18	功过相抵	战死
顺 德	1854. 8. 1	1855. 5. 4	战死	战死
从 化	1854. 11. 17	1855. 1. 18	烧死	(不详)
佛 冈	1854. 8. 9	1855. 5. 21	战死	(不详)
惠州府				
河 源	1854. 10. 8	1854. 12. 27	事前病故	战死
博 罗	1854. 12. 20	1855. 2. 11	功过相抵	(不详)
长 宁	1854. 10. 12	1854. 10. 12	功过相抵	功过相抵
海 丰	1854. 9. 2	1854. 9. 18	战死	战死
韶州府				
英 德	1854. 8. 3	1855. 6. 12	革职	功过相抵
乐 昌	1854. 9. 8	1854. 9. 25	革职	革职
仁 化	1855. 2. 26	1855. 2. 26	革职	革职
乳 源	1854. 10. 15	1854. 10. 17	革职	革职
南雄府				
始 兴	1854. 9. 25	1854. 10. 18	革职	功过相抵
肇庆府				
肇庆府城	1854. 8. 5	1855. 5. 21	战死	革职留任
德 庆	1855. 4. 3	1855. 4. 3	功过相抵	功过相抵
鹤 山	1854. 8. 4	1854. 9. 10	战死	(不详)
封 川	1854. 8. 29	1855. 5. 21	战死	革职

(续表)

城池	失陷日期	收复日期	守城文官	守城武官
四 会	1854. 8. 13	1855. 4. 27	功过相抵	功过相抵
广 宁	1854. 8. 15	1854. 8. 15	功过相抵	功过相抵
高 明	1854. 7. 22	1854. 7. 25	功过相抵	功过相抵
开 平	1854. 8. 12	1854. 10. 27	战死	战死
新 兴	1854. 8. 1	1854. 8. 2	功过相抵	功过相抵
罗定府				
东 安	1854. 8. 5	1858. 8. 5	受伤	战死
廉州府				
廉州府城	1854. 9. 22	1855. 4. 2	功过相抵	(不详)
阳 山	1854. 9. 25	1855. 1. 25	功过相抵	战死
连 山	1854. 9. 25	1855. 1. 25	(不详)	(不详)
潮州府				
惠 来	1854. 6. 7	1854. 10. 6	战死	战死
嘉应府				
长 乐	1854. 7. 26	1854. 10. 17	战死	(不详)

本表根据 F. O. 931/1527 号制成。

然而,叶名琛坐镇广州,筹办军粮,并不等于他就不管战局的发展。他要求各地将领每打一仗都要向他呈交报告,绘出战区地图。他还密派亲信对一些重要的战斗进行现场观察,向他报告作战指挥的优劣和敌我双方的表现。^[108]

西 江

上面提到,叶名琛在珠江流域的第一个作战目标是收复肇庆。与此同时,陈开在佛山战败后率部向西溃退,途中与围攻广州受挫的李文茂部会师。他们到达肇庆时,受到占领该城义军的欢迎,陈开被选为联军首领。但是,不等他把队伍整顿好,沈棣辉率装备精良的新式轻便战船就衔尾紧追而来,一路势如破竹,一个接一个地攻陷义军据点。陈开派七百艘战船顺流而下,企图堵

截沈棣辉,但于1855年4月20日被击溃。第二天正值大雾弥漫,沈棣辉乘机一面向守卫肇庆最后一道防线的义军船队发动佯攻,一面派精兵登陆,奇袭两岸炮台。突然间,义军水师发现自己三面受敌,仓皇驶回城里,草草收拾辎重,弃城沿西江驶入广西,连其他守城义军也置之不顾了。^[109]

北 江

叶名琛的下一个目标是北江。韶州是战略要地和贸易中心,已被围三次:第一次是1854年7月25日至10月15日,第二次是10月下旬,第三次是1854年11月29日至1855年5月22日。这几次围城,义军除了完全切断了它同外界的联系外,还进行过猛攻。第三次围城已是千钧一发,因为当地义军得到了从广州败退下来的何禄、甘先、陈金钢以及其他队伍的支援,声势浩大。幸好江西派来五千募勇(四千募于江西,一千募于广东始兴),湖南派来二千官兵,以及南韶廉道各协绿营兵及时驰援,韶州才得解围。义军此番未能攻克韶州,便兵分两路,一路向北进入湖南,参加太平军,另一路则南下英德。^[110]因此,产生了北路义军联合太平军进攻广东和南路洪兵再犯广州的危险。所有北江沿岸的战略要冲,必须尽快收复。从贸易的角度来看,北江是茶叶运往广州出口的主要通道。正如墨里逊所说,义军“切断了由韶州往北和往西的主要道路,阻挠了商品的运输。去年生产的茶叶大量滞留在韶州府。只有少量在使了很多‘黑钱’之后运抵广州,其中部分还被叛军劫去”。^[111]结果,外商纷纷抱怨“很难买到价钱公道的茶叶”。^[112]

因此,收复肇庆之后,立即移师北江。沈棣辉率得胜之师,驾轻便战船向北横扫,沿途的敌船和据点均被一一摧毁。面对如此强大的官军,占领英德的洪兵再次撤向韶州。到6月中旬,其主要

首领如甘先、周春和陈金钢都先后逃往湖南。至此,叶名琛认为粤北业已稳定,便命令自 1853 年来因形势所迫而一直留在韶州的提督崑寿,撤兵回惠州任所;并立刻着手攻打东江的洪兵。^[113]

东 江

东江地区的起义始于 1854 年 6 月 26 日。同其他地区一样,这里的义军也是攻城掠地,来势凶猛。县城纷纷失守,惠州几度遭围。地方官员束手无策,直到第二年援兵到达,才有力量发动反攻。1855 年 3 月,广州派来一小队战船。5 月 5 日,来自福建的援兵也开到此地。但是,直到 8 月 29 日崑寿返任后,才计划进行大规模反攻。

崑寿是位有能力的指挥官,在北江地区作战时就因战功卓著而加太子少保衔,然而,他也觉得东江战事既费精力又旷日持久。直到 1856 年 6 月 7 日由翟火姑率领洪兵主力被迫撤往江西参加太平军,这个地区才告平定。^[114]崑寿又立刻被叶名琛派往西江,接过沈棣辉未能完成的任务。

结 论

珠江流域的战事可以说是成功的。战事开始之前,叶名琛同幕宾们商讨战略大计。击溃叛军呢?还是把他们成股地逐出广东?就这个问题,一位幕宾引证了十五世纪末两广大起义时的一次关于战略的辩论。^[115]他认为两种战略都言之成理。我们看到,叶名琛的军队于这两种战略兼采并用,均著成效。他们击溃了围攻广州的洪兵,把陈开和李文茂的队伍沿西江赶入了广西,把甘先和陈金钢的队伍沿北江赶入湖南,把翟火姑沿东江赶入江西。他们还收复了失陷的城池,迫使洪兵溃退农村。

但是,叶名琛并没有获得全胜。例如:在西江地区,陈开等人

攻下广西浔州,后来又占领了附近的梧州、贵县、平南以及其他一些府县,扩大了地盘。受叶名琛之命、率领一千募勇前往平南帮助守城的谢效庄,在平南之战中战死;^[116]这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因为谢效庄在打败佛山陈开时是沈棣辉的左右手。叶名琛派往广西对付洪兵的战船也同样受到重创。^[117]1856年整年都是在战火中度过的,官兵不断失利。有一段时间,叶名琛甚至还担心洪兵会卷土重来,所以派遣几队战船镇守封川,并在西江两岸修筑了许多炮台。^[118]幸而,得胜后的洪兵并不再度进入广东,而是开到了广西北部,他们在1857年底就计划进攻桂林,并在1858年初发起了攻击。^[119]与此同时,广州却被英法联军攻陷。

第三节 韩江流域

1852、1853年的夏天和1854年的春天,韩江流域也遭了严重水灾。整个地区——潮州府和嘉应州——约三年来一直受义军的侵扰。著名首领有陈娘康、吴忠恕和何阿梅。地方官员从广州得不到多少增援,他们在道台曹履泰和知府吴均的率领下,靠自己的兵力对抗洪兵。吴均治下甚严,竭力地把知县们训练成头脑灵活、办事效率高的行政官员。他没有白费心血,尽管韩江地区许多县城屡受攻击,而落入敌手的只有两个。

没有多少史料证明叶名琛曾积极过问韩江地区的战斗。也许只有一事例外,即1857年5月他指示潮州的官兵溯江而上开入福建,攻打意欲进犯广东的太平军。结果太平军大败,五天之内至少有三千具尸首顺韩江漂入南中国海。^[120]

第四节 结 论

总的看来,在大规模洪兵起义爆发时,叶名琛的战略是部署

兵力重点保护一些集中了全省大部分财富的或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如广州、韶州、惠州、潮州、高州和肇庆等。这些城市如能坚持到敌兵因久攻不下而焦躁不安,或因军粮短缺、军心浮动而引起内部分裂的时候,叶名琛的军队便从城内发动反攻。这个战略是成功的。除了肇庆以外,所有的城市都顶住了义军的反复猛攻。围攻广州的洪兵被打退后,叶就把军队派出去援救其他城池。至于农村,则暂时放弃给洪兵。在这里,士绅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在自费所办团练的支持下,率领族人协防府县城池,解围救险,并帮助收复那些失陷了的行政中心。但是,重新控制城市并不等于完全平定了起义,无数股义军继续肆虐乡村。迟至1857年底广州被英法联军攻陷前夕,叶名琛仍在进行收复农村的恶战,但他已经没有时间完成这个任务了。

然而,他的成就已经足以影响那个时代的历史。他不但镇压了1850—1853年的零星起义,遏制了后来广东的大起义,而且挫败了太平军从西、北、东三面攻占广东的计划;否则,各路洪兵一定会纷纷响应。凭着广东的财富,广州的对外贸易,又有强悍的粤民补充兵源,他们也许更有希望取得最后胜利。在这一点上,叶名琛可以清王朝一拯救者的身份,与僧格林沁和曾国藩媲美。他的悲剧在于“亚罗”战争的败绩。由于这一奇耻大辱,他的一切功劳都被抹煞了。

其实,他在“亚罗”战争中的败绩,部分可以直接归咎于广东和全国的大动乱。1849年在广东各地开始的零星起义把叶的大量军队牵制在农村。太平军起义和1853年南京失陷给广东增加了极大的负担(见下一章)。当洪兵大起义爆发,1854年7月广州被围时,叶名琛手下只有一小部分正规军可供调遣,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保住了城池。但是,农村的形势仍然十分严重,他不得不冒险把原来集中起来守卫广州的军队全数调往农村,这

样,1856年10月底英国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进攻广州时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后来,只是由于缺乏占领广州全城的足够兵力,又被中国方面的游击战术所困扰,才撤了兵。叶名琛不能抢在英国人重新发起进攻之前,从内地调回他的军队,因为那样将意味着把广大农村放弃给洪兵,甚至可以说意味着他的政府的垮台。再者,1857年5月太平军仍严重地威胁着韩江地区,这更促使他下决心不把军队调回。叶名琛千方百计地设法和平解决这场外交纠纷,所以当1857年年底英国人同法国盟友一道,率领大量增援部队突然发动进攻时,叶名琛只能落得个当俘虏的下场。

注释:

- [1] HF104 卷 25 页,1853 年 9 月 26 日上谕。
- [2] 同上 67 卷 19 页,1852 年 9 月 11 日上谕。
- [3] F. O. 931/361 号、1627 号,1856 年 10 月 14 日、4 日署潮州运同的报告。
- [4] 同上 237 号,徐、叶合署奏稿(1851 年)。
- [5] 同上 1599 号,审讯甘先的记录(1855 年)。
- [6] 同上 1376 号,探报(1853 年)。
- [7] 同上 1427 号,叶与柏贵合署告示(1854 年)。
- [8] 比较 F. O. 17/203 卷,1853 年 7 月 6 日,文翰致格拉兰顿的信(第 63 号公牍)。
- [9] F. O. 931/1558 号,一名洪兵首领的供词(1855 年 4 月)。
- [10] F. O. 17/215 号,1854 年 7 月 20 日墨里逊的报告(第 122 号公牍 1 号附件);《怡和公司档案·私人信件》B4/6 种 15 号,788 页,1854 年 7 月 13 日约瑟夫·亚尔丹的信。
- [11] 同上;F. O. 931/1093 号,练勇的报告(无日期)。
- [12] 简义文:《太平天国全史》页 830—838。
- [13] 最早这样叫的是韦文,见《门前怪客》第 14 章。
- [14] 《太平天国全史》页 838。

- [15] F. O. 931/1558 号,一名贼首的供词(1855 年 4 月)。
- [16] 比较 F. O. 931/1511 号,江西省府关于调查滥报军费的命令(1856 年);HF 第 161 卷 7 页,1855 年 4 月 17 日上谕;同上第 142 卷 13 页,1854 年 10 月 8 日上谕;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 852 页。
- [17] F. O. 931/1355 号,1852 年 10 月 3 日叶的奏稿;比较 F. O. 17/217 卷,1854 年 11 月 9 日墨里逊的报告(第 59 号公牍附件)。
- [18] F. O. 931/1391 号,上谕(1853 年)。
- [19] 同上 1609 号,1855 年 6 月 19 日叶名琛致广西提督的信。
- [20]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页 842。
- [21] F. O. 17/215 卷,1854 年 7 月 31 日墨里逊的报告(第 122 号公牍附件)。旗兵其实只有 4158 名士兵和 106 名军官(见 F. O. 931/1782 号,关于旗兵年饷的报告,无日期)。其他细节见表九。
- [22] F. O. 931/1094 号,为有功练勇请赏的报告(1854 年);《东莞县志》72 卷页 4;F. O. 931/1429 号,林福盛签署的告示(1854—1855 年)。
- [23] 同上 1047 号,广东水师提督的报告(1854 年);HF 第 98 卷 24 页,1853 年 7 月 29 日上谕;比较 HF 第 105 卷 15 页(1853 年 10 月 5 日),第 164 卷 8 页(1855 年 5 月 19 日),第 176 卷 10—11 页(1855 年 10 月 15 日),第 176 卷 16 页(1855 年 10 月 17 日)等类似的上谕。
- [24] 柯克:《中国》页 343。
- [25] F. O. 931/1744 号,保卫广州的五点建议(1854 年底);420 号,向广州各城门卫戍部队发放给养清单(1855 年)。
- [26] 同上 1103 号,关于守卫广州新城的报告(1854 年底)。
- [27]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页 843。
- [28] 柯克:《中国》页 344。
- [29] F. O. 931/1673 号,为军需总局等官员请赏(1857 年)。
- [30] 同上 1744 号,保卫广州城的五点建议(1854 年底)。
- [31] 同上 1647 号,宪牌,1857 年 1 月 30 日。
- [32] 同上 1648 号,1857 年 2 月 2 日军需总局的报告。
- [33] 同上 1380 号、1155 号、1157 号、1173 号,桂林的保安措施(无日期)。
- [34] 同上 351 号,驻广州新城的练勇头人及文职人员名单(1854 年底)。

- [35] F. O. 17/215 卷, 1854 年 7 月 31 日墨里逊的报告(第 122 号公牒附件)。
- [36] 同上。
- [37] F. O. 931/1541 号, 关于在广州组织团练的补充规定(1855 年 1 月)。
- [38] 同上 1837 号, 关于 1855—1857 年为保卫广州而捐的款项。
- [39] F. O. 17/217 卷, 1854 年 11 月 10 日墨里逊报告(第 59 号公牒附件)。
- [40] F. O. 931/1439 号、1137 号、1500 号, 情报(1854—1855 年)。
- [41] 同上 1439 号关于绑架陈松的报告(1854 年)。遗憾的是我们一直很少知道陈松的背景。简又文在《太平天国全史》中记载了一个名叫陈松年的秘密会党首领曾率众围攻过新会县城, 但简的记载与 F. O. 931 有关文件大不相同, 很可能指的是另一个人。
- [42] 同上 1748 号、1265 号、1400 号, 关于制造、储存和分发弹药的报告(1847—1854 年)。
- [43] 同上 1723 号, 生产火药所费款项的报告(无日期)。
- [44] 同上 1789 号、1727 号, 关于校检军器的报告(1854 年)。
- [45] 同上 1727 号、1306 号、1764 号、1765 号、1766 号、1790 号, 关于库存及生产军火的报告(1851—1859 年)。
- [46] 同上 1166 号、1167 号, 关于出售多余军用物资及军器局库存物资的报告(1851—1859 年)。
- [47] 同上 1723 号、1748 号、1397 号、1400 号, 关于军火的消耗、制造、储存及分发的报告(1847—1854 年)。
- [48] 同上 1462 号, 1854 年 8 月发放大炮的清单。
- [49] 同上 1787 号、1795 号, 盘点军火清单(1854 年)。
- [50] 同上 1468 号, 关于洪兵的情报(1854 年底)。
- [51] T. T. 密迪乐:《华人与其起义》第 xxii 页。
- [52] F. O. 931/395 号, 关于可能进口粮食的报告(无日期)。
- [53] F. O. 17/227 卷, 1855 年 2 月 3 日包令致格拉兰顿的信(第 73 号公牒及第 1—4 号附件)。
- [54] F. O. 931/978 号, 关于三艘外国船上的货物的报告(无日期)。

- [55] 同上 1874 号,关于美商安德可特的报告(1855 年)。
- [56] 同上 951 号,香港萧定安写来的报告(1855 年 4 月 14 日)。
- [57] 同上 320 号、322 号、327 号,关于进口大米的报告(1854—1855 年)。
- [58] F. O. 931/1749 号,情报(1854 年);F. O. 17/215 卷,1854 年 7 月 20 日墨里逊的报告(第 122 号公牍附件)。
- [59] 简又文的《太平天国全史》主要根据地方志,韦文的《门前怪客》主要根据领事馆报告。两人都写了战役的概况,但对于官兵取胜、洪兵失败的原因都谈得不能令人信服。如本书所述,叶名琛个人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他在战前所做的准备(见上一节)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 [60] F. O. 931/1455 号,在佛山附近抗击洪兵的三位士绅首领的报告(1854 年 8 月);比较《太平天国全史》页 832。
- [61] F. O. 17/215 卷,1854 年 7 月 20 日墨里逊的报告(第 122 号公牍附件);亦可比较《怡和洋行档案·私人信件》B4/6 种/15 号,页 792,詹姆士·惠特尔致约瑟夫·嘉丁纳的信(1854 年 7 月 23 日)。
- [62] 同上,1854 年 7 月 20 日。
- [63] 比较同上,1854 年 7 月 20 日。
- [64] 同上 216 卷,1854 年 9 月 11 日墨里逊的报告(第 142 号公牍);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页 843。
- [65]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页 842—843。
- [66] F. O. 931/1480 号,一名被俘洪兵的供词(1855 年 1 月);1086 号,广州北面的战况报告(1855 年 1 月)。
- [67]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页 859—860;F. O. 931/1692 号、415 号、1075 号、1577 号,被俘洪兵名单及请赏人员名单(1855 年)。
- [68]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页 844。
- [69] F. O. 17/218 卷,1854 年 12 月 2 日及 5 日罗伯逊致包令的信(第 226 号公牍附件)。
- [70] 同上,1854 年 12 月 11 日包令致克拉兰顿的信(第 230 号公牍);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页 224。
- [71] F. O. 17/218 卷,1854 年 12 月 9 日墨里逊的报告(第 231 号公牍附

- 件)。
- [72]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页844。
- [73] F. O. 17/218 卷,1854 年 12 月 9 日墨里逊的报告(第 231 号公牍附件)。
- [74] 韦文:《门前怪客》页 148。
- [75] F. O. 17/218 号,1854 年 12 月 11 日包令致叶名琛照会(第 230 号公牍)。
- [76] 同上,1854 年 12 月 25 日包令致格拉兰顿的信(第 237 号公牍)。
- [77] 华廷杰:《触藩始末》,载《近代史资料》,1956 年 2 期,北京版。
- [78] 《广州府志》卷 108 页 26—27。
- [79] F. O. 17/218 卷,第 226 号公牍,广州绅商致包令书(无日期)。
- [80] 同上,附件,1854 年 12 月 5 日包令致罗伯逊函。
- [81] 同上,218 卷,第 230 号公牍附件,叶名琛给包令的照会(1854 年 12 月 7 日)。
- [82] 见本书第七章。
- [83] 下面这份英国领事馆的报告证明这一怀疑不是没有根据的。“广州形势的改变带来了给我印象很深的后果。我指的是公众舆论对外国人的看法改变了:外国人旗帜鲜明,决心还击任何人对商馆的进攻,他们的海军在自己同胞的住宅区附近停泊,万一住宅区有危险,随时可以采取强有力的手段进行救援。这一切都使中国人对我们产生一种敬畏的心情,这种心情之深是从来没有过的。昨天对我们还是态度傲慢甚至轻蔑的人,今天一反常态,直言不讳地议论政府的缺点以及前途的暗淡不明。他们宁可忍受外国干涉,使生产财产不受威胁,而不愿像现在这样两头落空。这种情绪上的一百八十度的转弯竟出自一个向来妨碍外国利益扩张的阶级,其背后一定有一种很大的力量在起作用。这些人就是有钱有势的商人中产阶级。”(F. O. 17/216 卷 17 号公牍,1854 年 10 月 10 日罗伯逊给汉门德的信)。
- [84] 同上,217 卷第 60 号公牍并附件,1854 年 11 月 10 日罗伯逊给汉门德的信。

- [85] 韦文看了这些文件后得出相同的结论(《门前怪客》页147—148)。
- [86] F. O. 17/218 卷, 1854 年 12 月 25 日包令致格拉兰顿的信(第 237 号公牍)。
- [87] F. O. 931/1628 号, 一名有通匪嫌疑的士绅的供词(1855 年 4 月 21 日)。
- [88] 同上 1745 号、1549 号, 建议奖赏人员名单(1855 年)。
- [89] F. O. 17/288 卷第 130 号公牍附件, 1855 年 3 月 8 日罗伯逊致包令的信。
- [90] 同上。
- [91] F. O. 931/1892—1896 号、1898—1899 号、1903 号、1911 号、1920 号、1924 号、1938 号、1044 号, 军事地图(1854—1855 年)。
- [92] 同上 1133 号、1142—1573 号、1457 号, 情报(1854—1855 年)。
- [93] HF 卷 33 页 7—9、28, 1851 年 6 月 1 日及 12 日上谕。
- [94] F. O. 931/1361 号, 训斥赛尚阿的上谕抄本(1852 年底)。
- [95] 同上 1352 号, 徐广缙就 1852 年 9 月 7 日上谕呈咸丰帝的奏稿(1852 年 9 月 26 日)。
- [96] 柯克:《中国》页 396。
- [97] F. O. 17/218 卷, 第 235 号公牍, 包令致格拉兰顿的信, 1854 年 12 月 23 日。
- [98] 比较 F. O. 931/706 号、1510 号, 缴获叛贼信件(1854 年); 253A. 3. 34 号, 关于叛首不和的情况(1854 年)。
- [99] F. O. 17/218 卷, 第 231 号公牍附件, 1854 年 12 月 9 日墨里逊的报告。
- [100] 同上, 第 235 号公牍及附件, 1854 年 12 月 23 日包令致克拉兰顿函。
- [101] 同上, 228 卷第 108 号公牍附件, 1855 年 2 月 23 日罗伯逊给叶名琛的照会。
- [102] 同上, 第 108 号公牍, 1854 年 2 月 28 日包令致格拉兰顿的信。
- [103] F. O. 931/1780 号、1788 号, 关于建造轻型战船的报告(1855 年)。
- [104] F. O. 17/229 卷, 独立号 15, 1855 年 4 月 15 日伍德盖特致汉门德的信。

- [105] 同上。
- [106] 同上, 231 卷, 第 208 号公牍附件, 墨里逊的报告(1855 年 6 月 8 日)。
- [107] 《怡和公司档案·私人信件》, B4/6 种 15 号, 页 954、977, 1855 年 7 月 1 日、28 日约瑟夫·亚尔丹的信。
- [108] 比较 F. O. 931/1918 号, 东江军事地图(1854—1855 年); 1590 号、1142—1143 号, 探报(1856 年 7 月)。
- [109] 简义文:《太平天国全史》页 873—875。
- [110] 同上页 888—893。
- [111] F. O. 17/231 卷第 208 号公牍附件, 1855 年 6 月 8 日墨里逊的报告。
- [112] 《怡和洋行档案·私人信件》B4/6 种 15 号页 962, 1855 年 7 月 16 日詹姆士·威特尔致约瑟夫·亚尔丹的信。
- [113] F. O. 931/1056 号, 为保卫肇州有功人员请赏名单(1855 年); 1548 号、1509 号、1142 号及 1143 号, 关于洪兵的报告及记录(1855 年); 1761 号, 关于提督崑寿由肇州到惠州旅费的报告(1855 年 8 月); 比较《太平天国全史》页 893。
- [114] 同上 1597 号、1479 号, 关于海丰洪兵及其财产的记录(1855 年); 1666 号, 叶名琛与柏贵合署奏稿(1857 年 11 月 25 日); 1937 号, 惠州及附近地区的地图(无日期); 1175 号, 附有洪兵进攻惠州情况的信件(1854 年); 1501—1441 号, 关于博罗失而复得的报告(1855 年), 比较《惠州府志》卷 30 页 3;《肇州府志》卷 30 页 5—6;《太平天国全史》页 883—884。
- [115] F. O. 931/1114 号, 录自明朝一本关于镇压起义方法的书, 书名及作者不详。
- [116] 简义文:《太平天国全史》页 920。
- [117] 同上页 921; F. O. 931/1136 号、1608—1567 号、1573 号, 情报(1855—1857 年); F. O. 17/250 卷, 第 280 号公牍, 1856 年 9 月 11 日包令致格拉兰顿的信。
- [118] F. O. 931/1927 号, 军事地图(1856 年)。
- [119] 同上 1134 号, 给叶名琛的无署名的信(1857 年); 1135 号, 就广西

军事形势给叶名琛的报告(1856—1857 年)。比较《太平天国全史》页 818—829。

[120] 饶宗颐:《潮州志》页 35—59。

第四部分 理 财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叶名琛要想征集足够的军队来对付起义军,他必须大量开发财源。因为,其他省份和北京都无力给予他财力上的支持;相反,不少省份因镇压太平军,军费开支庞大,而不断地向叶名琛额外需索。这一部分将探讨叶名琛如何扮演后勤部长的角色。

第七章 传统的理财方法

第一节 1849—1853 年广东财政支出

按规定,财政不为总督所管,而属于巡抚的职责范围。值此多事之秋,叶名琛便决定接管这项工作。这并不等于说,他在支配款项时比巡抚更能便宜行事。一切用度均由中央政府决定,所以万一发生意外事情而急需用款时,从全省财政预算里是挤不出几个钱来的。就在零星小股起义发生之前,广东也出了不少意外事情,表十所示仅为 1849 年的非常支出。这部分非常支出全都要挪用财政预算中的其他专用款项。为此,督抚只好请求皇帝批准向广东的绅商募捐筹款,以资补偿。^[1]对于政府来说,这是十分危险的征兆,它意味着长此以往,广东的财政预算将一片混乱,后果不堪设想。然而,1849 年只不过是开头,随后就是 1850—1853 年的零星起义。第五章所列举的五大战役,仅是其中主要的,还有无数小规模动乱在其他地区不断发生,比如北部的从化、南雄;东部的惠州、东莞;西部的肇庆、封川等。表十一列出的是 1850—1853 年藩库拨解各处用以镇压零星起义所花的经费。

表十 1849 年非常支出

事	由	银 两 数
(陆路提督祥麟)剿捕清远、英德匪徒用银		47000
二十九年二、三两月防夷用银		32000
剿捕洋匪用银〔洋匪指海寇——译者注〕		46000
西洋兵头被杀防堵用银		17000
高廉两府剿防广西横州滩匪用银		30000
合	计	172000

本表根据 F. O. 931/1256 号徐广缙与叶名琛的奏稿制成。表中数字为整数,千位以后银两数均省去,以便咸丰一目了然。“西洋兵头被杀”系指澳门总督哑吗嘴被刺身死一事。

表十一 道光三十年秋间至咸丰三年十一月底止办理

防堵并各案先后由藩库拨解银两赴军营备支

及文武各衙门领用经费银数分析

事	由	支出银两数
清远、英德		506256
廉州		227557
儋州		71399
高州	前督宪徐	994674
	官 保叶	374092
韶州		40000
从化		6000
南雄		4000
惠州		33178
东莞(司马乡)		26858
肇庆		44000
封川		226235
各府县代西省雇勇		18785
合	计	2573033

本表根据 F. O. 931/1431 号制成。

实际上,每仗的开支比表上所列的要多得多。以 1850—1851 年清远、英德战役为例,从藩库拨银,如表所列为五十万两余。然而各府县自筹二十四万两余,其中仅八万五千多两在上述之五十万两内作正开销。所以这一仗的花销比表上所列数字约多出十六万两,即达六十六万五千余两。由于有四个县没有公布数字,故实际军费开支可能还要多一些。地方政府所负担的十几万两,当然又得转嫁到老百姓头上。^[2]

清远、英德之役是五大战役中的第一仗,仅此一役,藩库就差不多掏空了。大学士祁寯藻来函询问,叶名琛复信说:

广东藩库业已告匱,非独筹之无可筹,垫之无可垫,并挪之亦无可挪。只因军兴以来,除藩关两库拨解广西不下二百七八十万两,从此存款一空。而广东军务,仅动用库存海关酌留尾数二十余万两,暂拨海关税餉二十万两,又三次指输四千一百余两,其余八十余万两皆由各州县先行垫发,均已筋疲力尽,势难再支。^[3]

既然 1851 年广东“藩库业已告匱”,各州县也“筋疲力尽,势难再支”,那么在 1850—1853 年,叶名琛是用什么办法平定零星起义的呢?从 1854 年起,他又是靠什么手段镇压了洪兵起义的呢?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事实上,叶名琛不仅解决了在本省所需的军费,而且还能拿出大量的钱来支持在华中作战的官兵。让我们先看看 1850—1853 年间叶名琛到底为后者提供了多少财政援助,然后再详细探讨他的理财方针。

第二节 1850—1853 年对其他省份的财政援助

在大规模起义前,广东先后拨解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和福

建等省大批银两,作为同太平军作战的官兵的薪饷。具体数字及用途请参看表十二和十三。

表十二 司库自道光三十年起至咸丰三年六月止拨解各省饷银数目

日 期	银 两 来 源	银两数(千两)
	(拨往广西)	
1850.10.16	广东省秋拨实存地丁	50
1850.11.17	同上	50
1851.2.28	广东省春拨实存地丁	75
1851.3.1	同上	75
1851.3.14	广东省杂项各款	65
1851.3.15	同上	65
1851.4.23	广东省秋拨留备地丁	43
1851.8.20	广东省辛亥年兵饷	59
1851.11.8	同上	40
1851.11.11	广东省杂项各款	70
1851.11.12	同上	70
1851.11.13	同上	70
1851.11.14	同上	70
1851.12.23	同上	75
1851.12.30	同上	75
1852.4.14	广东省壬子年兵饷(广西军需备用粮)	50
1852.5.13	广东省捐输助饷等银	62
1852.5.14	同上	60
1852.6.13	同上	20
1852.8.26	同上	53
1852.8.27	同上	53
1852.12.23	同上	15
1853.7.23	广东省捐输团练银	11
1853.7.24	秋季亟拨等银	129
1853.7.28	广东省许辉祖缴停办火药支剩及盐课等	56
	(拨往贵州)	
1850.4.16	广东庚戌年应征地丁拨(贵州庚戌年兵饷)	40
1851、1852	广东省杂项各款解赴贵州协饷	被广西截留(1)
1853.5.8	司库清查各款(为贵州兵粮银)	27

(续表)

日 期	银 两 来 源	银两数(千两)
	(拨往湖南)	
1853. 1. 27	盐饷(2)	25
	(拨往湖北)	
1853. 2. 20	司库各款拨湖北军需银	70
1853. 2. 22	同上	70
1853. 2. 24	同上	66
	(拨往江西)	
1853. 6. 3	广东省捐输赴江西军需银	7
1853. 7. 7	同上	10
1853. 7. 30	杂项各款	16
1853. 7. 31	广东省捐输赴江西军需银	10
	(拨往福建)	
自 1853. 8. 4 后	杂项各款	43
1853. 9. 15	捐输银	43
合 计		1863

本表根据 F.O. 931/1379 号、1399 号、1357 号、1363 号、1627 号、1364 号、1305 号、1039 号、1447 号制成。年月日是银两日广州起解日期。除“辛亥年兵饷”、“壬子年兵饷”及拨往贵州的一批款项,系规定解拨协饷外,其余都是额外拨款。

注:(1) 总数为 130000 两。

(2) 运库按例每年要拨给藩库一笔款项供其支用。关库则与藩、运二库无类似往来。

从表十二可以看出:一部分银两来自捐输。广东地丁所入根本不敷应用。关税亦源源不绝地流入广西,但这一财源也是有限度的,如表十三所示,1853 年 1 月 22 日至 7 月共六个月的时间里,没有从关税中拨款给广西,这一方面是因为太平军已从广西移师湖南,另方面则系对外贸易的不景气之故;以后广东发生动乱,对外贸易就每况愈下。用叶名琛复祁寓藻信中所说的话来概括,那就是“诚如尊谕,东省亦有立穷之势也”。⁽⁴⁾随后我们就来看看叶名琛如何在这种几乎绝望的条件下制订出他的财政政策,包括妥善管理现有税收,开发新财源和限制支

出等内容。

表十三 粤海关自道光三十一年十月起至咸丰三年六月止拨解广西省军需银两数目

日 期	银两数(千两)
1850. 11. 18 及 19	100
1850. 12. 5 及 7	100
1851. 2. 19 及 20	100
1851. 6. 13 及 16	200
1851. 8. 28	110
1851. 9. 3 及 10. 2	200
1851. 10. 14 及 21	490
1851. 12. 7 及 8	149
1851. 12. 20 及 1852. 2. 15	280
1852. 5. 17	70
1852. 6. 13	50
1852. 6. 16	80
1852. 8. 6	60
1852. 9. 3	60
1852. 10. 1	50
1852. 10. 3	70
1852. 12. 23	50
1853. 1. 1	50
1853. 1. 17	50
1853. 1. 30	50
合 计	2369183

本表根据 F. O. 931/1403 号、1356 号、1039 号制成。对照本表标题,可见 1853 年 2—7 月没有拨款给广西,因为到 1852 年底太平军已攻入湖南,银钱都运往湖南作兵饷。粤海关拨解湖南的第一笔款子为 200000 两。(见 F. O. 931/1354 号)

第三节 妥善管理现有税收

广东省三大税收——地丁、盐课和关税。本节分别研究叶名琛在这三方面实行的政策。

地 丁

清初摊丁入地,地主无形中多交了地税,而佃户则可免税,这是对穷人的一种照顾。在广东,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佃户在国家安定、政治清明的时候,受益过一阵子。到了十九世纪,政府财政拮据,只好巧立名目,增收苛捐杂税。士绅对增收这些税捐的不满,自不待言。不过,慢慢地他们也找到了对策,首先是增加地租,佃户稍有拖欠,就以酷刑迫租,甚至有逼死民命的。此类暴行,连叶名琛也无法制止。其次,士绅千方百计漠视地方长官的号令。前面讲过叶名琛如何驾驭士绅为他所用,也讲过士绅在这多事之秋所起过的重要作用,但这不等于官绅之间就没有潜在冲突了。事实上,只是徐广缙和叶名琛把最桀骜不驯的那些士绅降服了以后,他们才听命于督抚。事情发生在1851年,即咸丰皇帝继位的头一年。当时,有人建议咸丰帝免征1851年地丁,以笼络民心。^[5]按惯例,新君即位后都要免去当年未交的地丁。咸丰帝也不例外,他即位 in 年底,下旨免征第二年(即1851年)的赋税。所以,户部便下令继续征收1850年的赋税,直到是年年结限满为止。谕旨和户部的命令都印成了告示,四处张贴。但士绅们为了赖掉1850年还未缴的地丁,硬说告示是地方官为了中饱私囊而伪造的。东莞士绅撕毁了告示,声言要捆打胆敢下乡收税的官吏。他们还张贴长红,呼吁各地士绅抵制县试,并指控县令诬陷他们煽动事端,拒缴赋税。与此同时,南海西湖书院生徒“因挟知府改断公项之嫌,不遂其欲”,为了报复,给徐广缙投递匿名揭帖,控告广州知府违法乱纪,并扬言要集体罢考。^[6]当徐广缙“谕令举出主谋,余可免究”时,士绅却发出长红,声称督抚只会装腔作势吓人,其实并不可怕。珠江三角洲各县的士绅纷纷响应,也以罢考来威胁当局,抗议政府继续征收1850年的地丁。

徐广缙和叶名琛的态度十分强硬,他们决定惩一儆百,就拿东莞和南海的士绅开刀,于是奏准,将南海县西湖书院肄业生童,及东莞合学生员,在未查清真相、法办闹事首犯之前,俱暂停考试。广东的士绅几年来未遇到过如此有魄力的督抚,他们退缩了,风潮也就平息下来。^[7]虽然第二年10月东莞赴广州考武举的考生又向署理巡抚柏贵提出抗议,但这一次的内容已经不是拒缴地丁,而只不过是为在上次的风潮中被捕后自杀的同学黎子骅鸣冤罢了。^[8]有意思的是,1851年叶名琛在清远、英德一带镇压起义后返回广州主持乡试,^[9]生员们都乖乖地参加了考试。只是当他离开广州去别处作战时,才有少数士绅敢于再次骚动。因此,有理由认为,叶名琛在1851年事件中所采取的强硬方针,迫使士绅们就范,从而保证了全省地丁的正常收入。

官吏贪污成风,是另一个严重问题。那些小小的税吏尤其厉害,他们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苛捐杂税收来后,大都进了衙门里的那些师爷、书吏和衙役的腰包。这些人常常被指派充当税吏,下乡征税。他们是既得利益者,所以拼命搜刮民脂民膏。此外,各地的杂税又各不相同,数量不一,也给了税吏以可乘之隙,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巧立名目,甚至还向没有土地、不需交地丁的人敲诈勒索。因此,税吏在乡下经常被袭击(见第四章)。如果给叶名琛一段太平日子,也许他能整肃纲纪。然而,这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广东很快就卷入政治动乱之中,叶名琛除了依靠武力,已别无他法可施。但是,他仍不忘催促其下属及士绅重新安顿好那些被洪兵驱赶得流离失所的人,^[10]恢复农业生产,以图在叛乱平定后尽可能多收一点赋税。尽管叶名琛不断努力,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地丁收入不可避免地逐渐减少,即使在动乱早期,即零星起义的时候,形势亦已够严重。

广东的财政,如果说零星起义时已遭破坏,那么大规模起义

时就大崩溃了。1854年洪兵大起义爆发时,有关部门给叶名琛算了一笔账,这一年的军费开支达1322487两银子,但藩库只能从已征来的1853和1854年的地丁中支付261642两,赤字达1060844两(80%),其中530000两原应从该年盐税和地丁项下支付。另外,1854年附加税定323905两,实收195900两,缺征128005两(40%)。⁽¹⁾随着起义持久地进行下去,赤字和欠税越积越多。为了弥补赤字,叶名琛试图开辟新的财源,这一点后面会谈到。对于收不上税的问题,叶名琛除严饬下属,并派兵丁下乡屯驻协催外,已别无良策。表十四所示,在当时动乱的情况下,叶名琛的措施所收到的效果尚能差强人意。

表十四 司库正杂钱粮实存银两数目

已 缴			欠 缴		
年	正项(两)	杂项(两)	正项(两)	杂项(两)	上缴%
(1856年1月20日止)(1)					
1854	451986	68328	486236	113480	46.455
1855	135812	14080	787674	163416	13.614
(1857年11月29日止)(2)					
1854	657718	133642	273625	48165	80.126
1855	731176	137667	192390	39829	78.327
1856	704078	132516	219411	44981	75.985
1857	未列出				

如表所示,各年的正、杂税收额都有少许不同,可能是书吏笔误之故。但是总的看来,1854—1857年间每年的地丁税额征都不超过940000两,比王业键所列1908年地丁税额征1223000两要少得多。(《1753—1908年中国地丁税估计》页16)同样,杂项不到地丁税8%,而王业键却认为1908年杂项是地丁税的10%。(同上书,页17)

注:(1) 根据F. O. 931/351号,1856年1月7—20日广东藩库报告。

(2) 根据F. O. 931/380号,1854—1857年广东藩库收支数目表。

盐 课

食盐产销历来由政府垄断。广东食盐产地是整个沿海地区,但销售中心仅有广州、潮州两地。前者把盐销售于珠江流域,后者则销售于韩江流域。粤盐行销地区就包括了广东和广西的全省,贵州、湖南、江西的南部和福建东部。不是广东出产的盐就不准在这些地方行销。盐商行销,需领照纳课。盐课除正额外,也有许多附加税。广东额定每年盐课为 661534 两,1851 年咸丰帝即位后并没有下诏免征 1850 年的未交部分。幸而广东在 1850 年以前一直都能征收足额。1850 年因受起义影响,欠税 35450 两,占 5%,欠税在 1851 年已增至 140029 两,占 21%;1852 年为 154387 两,占 22%。^[12]

表十五 各年兵饷事拨盐课已完未完数目

年	奉 拨	已 完	未 完	拖欠%
1851	560000	446335	113664	20.297%
1852	520000	120000	400000	76.923%
1853	480000	0	480000	100%

本表根据 F. O. 931/1382 号制成。

每年的盐课额征大部分都分配给官兵作军费。表十五清楚地表明,即使是在零星起义时期,盐课收入也已经减少了相当多。尽管对官兵的拨款额每年都在削减,但军队到手的钱比削改了的拨款额还要少,积欠则越来越多。1853 年后就没有像表十五这样的专门报告了。显然,这时全省的财政收入都统一归军需总局管了。不过,既然在零星起义时期盐课收入减少如此之多,那么到了大规模起义时肯定收入更少。

表十六 各司道每年应解关盐盈余备支师
船口粮各银数分析

来 源	每年应解银	起 年	迄 年	欠 解 银
运 司	30000	1826	1853	394700
南 韶 连 道	60000	1852	1853	75000
肇 庆 府	20000	1849	1853	96000
潮 州 府	20000	1850	1853	66000

本表根据 F. O. 931/1434 号制成。

除完成额征外,运司还要上缴名为盈余的款项,以应付其他开支。盈余中一部分拨给广东水师作口粮,表十六列出了 1853 年的欠解额。韶州、肇庆和潮州三府分别为北江、西江和韩江流域的重要地区,人口逐年增长,盐的消费量自然也逐年增长,可是运司所得之盈余反而越来越少。这种按额拨款的现象可以一直追溯到 1826 年。这说明多年来盐务管理一直不善。到了 1852 年,几乎没有盈余可言了。可是水师的口粮不能不发。《广州档案》中有一份写给叶名琛的报告说,既然运司已无盈余,西部沿海两支舰队的口粮就只好从其他十种杂税的收入中拨付。^[13]

据雍正朝定例,“场灶所产盐斤,颗粒归官,不许私卖,招商充埠,定额征收”。^[14]粤盐销地分为一百八十八埠,其中珠江流域一百五十九埠(广东七十五埠,湖南八埠,贵州一埠,广西六十六埠,江西九埠),韩江流域二十九埠(广东十四埠,江西七埠,福建八埠)。^[15]广西自 1840 年起便一直动荡不安,该地盐课收入最早受到影响。1850 年盐课欠征总数 35450 两,其中 17775 两(占 50%)是因为广西盐商半途歇业或勉强坚持到合同期满后不再续约而造成的。^[16]其余的欠征,部分是由于湖南、江西和福建也遇到像广西一样的情况,更重要的原因是受广东零星起义及尔后大规模起义的影响。

领照盐商不去卖盐,私盐枭就乘虚而入。在广西,武装走私抢走了一大部分食盐生意。^[17]在广东,就连官兵(主要是募勇)也

想涉足于这桩虽违法而渔利大的买卖。^[18]与此同时,香港成了囤盐和走私进入内陆的基地。^[19]英国船只完全可以行使悬挂英国国旗的权利,那怕是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也不受干涉,^[20]就连中国商人(不一定是香港居民)也在船上雇用外国人,假冒外船,享受治外法权。^[21]

眼看食盐专卖难于维持,叶名琛的幕宾们建议一方面加紧缉私;另方面把各埠食盐销售权降价卖给盐商。^[22]他们希望通过加紧巡逻和突然检查的办法来减少走私,通过削减食盐运费,降低牌照费,减少附加税,免征亏欠的税款等措施来降低官盐售价。在叶名琛的档案中,找不到材料证明他采纳了后一项建议,也许因为这已越出了他的权力范围。但前一项建议,叶名琛是采纳了。同时,在潮州(韩江流域)发起了一个大规模的筹款运动,以便支付把食盐从产地运往销售点的运费。^[23]在广州,起草了一系列加强盐务管理、杜绝走私的新规定:

一、盐船到关,颗粒皆归官配,毋得丝毫走漏,其扫舱余盐亦俱尽数配兑,毋得存留,以杜影射。

二、东汇关及督配艇务巡役水手人等,向有打取更盐,准该船户按照卖价随时折银交给,以资津贴工食,不准颗粒取盐。

三、埠艇配盐入役,向来每五百包抽盐样一包,亦照该埠卖价随时折银交给,作为帮补饭食,不准取盐。

四、南仓艇簿艇务行人役只领工食,概不准借端取盐,以杜流弊。

五、虾舂向系船户自雇,每包工钱三厘五毫,已属不少,足资工食,不准另外索酬,如违拿究。

六、南仓澳盐,照例每正引一百包准抽三包,不得多取。

七、各厂巡役防须昼夜查缉,毋稍疏懈,每日轮流派往看秤,如有飞筹打斗及爬夜水等弊,唯该值日看秤并各巡丁是问。如有贿纵情弊,立即革役严拿。

八、上河船配足盐包之后,迅即请照过关,不准在沙罉沙头等处开驳逗留,致滋夹私之弊。

以上各款由运司示谕三厂、东关,严饬各行丁役一体遵照,实力奉行。倘敢视为具文,阳奉阴违,仍有借端勒索等弊,许该船户人等,指名具禀,随时究办。^[24]

对于走私食盐的外商以及雇佣外国人当船长以“保护”食盐走私活动的中国商人,叶名琛只要查得真凭实据,不论何时何地,马上扣留其船只。^[25]

但是,搞好盐务管理最大的障碍是法制和社会秩序的破坏。洪兵起义一旦被遏止,叶名琛立刻派员到各食盐销埠重办盐务。例如 1855 年,广州虽已解围,但广东北部仍然很不安定,叶名琛仍毫不迟疑派员到那些地区,同盐商一道重新安排食盐贸易。结果,到年底为止,卖出了十六万包官盐,完成了 1853 年的额征任务。^[26]

1856 年又出现新的问题。湖南深受太平军战事影响,该省当局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决定对粤盐入境征收厘金。^[27]每包本来已课六钱,现在又需增收厘金四钱,这就是说在湖南出售的官盐价格将大幅度提高。叶名琛担心官盐提价会使走私活动重新猖獗起来,便派运司顾炳章为代表去湖南谈判,最后湖南同意撤销厘金。但是,过了几个月,他们又提出这项要求。尽管叶名琛的幕宾有充足而有力的法律根据来证明盐厘之不合理,但朝廷却不愿出来说话,因为湖南的财政确实拮据。尤有甚者,广西当局竟然也建议改变盐务管理办法,他们说,在兵乱中盐商破产的破产,外逃的外逃,被

杀的被杀；幸存而确实只在广西行销的，他们从盐场购进食盐时就可以免去牌照这道手续。这样做，使黑市食盐贸易变成了公开的买卖，广西政府则可以对此征税而增加收入。可是，盐场在广东，食盐要沿着西江穿过广东才能运抵广西。这就难保盐商在途中把盐出手，造成同持有牌照的广东盐商竞争的局面。这个建议对粤盐销地的贸易管理非常不利，叶名琛的幕宾极力反对，^[28]不清楚叶名琛用了什么办法来否定这个建议。作为两广总督，按理他有权干预广西的事务（对湖南则不行），完全可以运用其权力予以驳回。

总之，盐务管理面临着重重危机。首先，由于法制混乱，社会不宁，不但食盐贸易被迫停止，而且食盐的运销网也遭到严重破坏，这就不可避免地使走私活动猖獗起来。叶名琛那种一经平息动乱就设法恢复食盐官配的方针是对头的。私盐大都从水路偷运，这是最经济的运输方法。叶名琛加强了水上巡缉，收到了预期效果。只要看准了，他连外国船也不放过，可见他的勇气和执法不苟。他的决心在一定程度上使外国冒险者不敢轻举妄动。驻香港的英国公使包令爵士根本无权过问叶名琛的行动。他在要求叶名琛归还缉获的两艘英国走私盐船的照会中不得不承认：

根据《通商附粘善后条款》第十二条，若英方有任何船只被发现走私活动，则任由中国方面进行缉捕，并不论价值多少，种数如何，一律没收其所有私货；同时，中国方面还有权禁止该船以后同中国贸易，并在该船付清一切款项后把船遣回。^[29]

叶名琛最不称意的，是他无法阻止湖南实行对整个盐务管理系统有损害的政策；这反映出当时清政府由于太平军的威胁，岌岌可危，已经无力控制各地方政权了。

关 税

早在1848年,叶名琛就极为关注对外贸易。那年外贸不景气,他作为布政使,即亲自主持调查出口锐减的原因。^[30]自1849年入城危机以后,他一直同徐广缙共商外交政策。在徐广缙去高州作战的十二个月里,叶名琛护理钦差大臣,全权负责对外事务。由于这段时间的外交往来主要同贸易有关,叶名琛就得到了一个熟悉海关业务的机会。1854年,起义发展很快,因而有必要统一掌握各项财政收入来源,而海关则更易直接受总督支配。叶名琛首先下令调查1848年以来每年进出口关税的收入。^[31]调查结果表明,税收在1848—1852年是逐步增长的,但1853年以后,就直线下降。下降的主要原因当然是农民起义。翻译官墨里逊写道:“在粤北,韶州府英德县一带和南雄州都被贼兵占领,处在梅岭山脉中的狭窄的交通被切断。”^[32]肇庆一收复,叶名琛立刻把部队主力从西江流域调往北江,企图打通道路,重开贸易。他的战略果然生效。“由于收复了英德县城,通往江西的道路于6月21日重新开放。1854年积压下来的茶叶又有一部分运抵广州。”^[33]与此同时,叶名琛千方百计使货物通行税的征收得到保证。整个系统,包括人事关系、责任范围、缴款手续,都重新作了明文规定与调整。^[34]

叶名琛还对贸易作了一番全面调查。尽管包令说过,在广州“偷税漏税的事向来比上海少”,^[35]但仍发现有些中国商人同外商沆瀣一气,把出口货物伪装成从外国运入广州的货物,然后以转口为理由,申请再出口免税证,企图规避出口税。鉴于上述情况,粤海关发出一篇通告,严禁这种偷税行为,并声言对违法者处以重罚。^[36]此后,叶名琛要求粤海关每五天给他送一份报告,汇报税收情况,以及从该财政年度开始后的累计税收数字,并说明

这个数字比上一个财政年度同期的税收有何增减以及增减幅度如何。^[37]

尽管 1855 年的关税收入少得可怜,但总算还有三十四万二千余两,这也是叶名琛不辞辛劳所取得的一点成绩。他对此仍感不满。第二年,叶名琛就着手对付外国人,打击来往于香港和沿海各地的走私活动。阿礼国领事在广州写过如下文字:

香港离中国沿海地区非常之近,中国人可以从边防极为松弛的沿海地区把货物运往香港,然后在这个自由港购买大量洋货,再运往其他不开放的口岸。整个过程不必受检查,不必交纳关税和贸易税,途中又十分容易逃脱缉捕。中国官员虽然愚钝,也不至于连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都不发觉。为此,粤海关监督制定了许多法令,这些法令表明他们认识到香港的贸易大大有损于中国关税收入,如果有办法的话,他们一定不会任其发展。^[38]

阿礼国的文件生动地说明了为什么有人说“沿海地区的小商品贸易,如果不是全部至少也大部分是走私活动”。^[39]可惜文件没有详细说明中国方面颁布了什么法令,不过,从中我们倒可窥知香港方面如何纵容这种走私活动的。1855 年 3 月,香港当局发布船舶注册条例,要求“所有专用以同中国大陆进行贸易的船只”注册备案。^[40]船只一经注册,不论是英国人的或是中国人的,^[41]一律可以悬挂英国国旗,得到英国保护。显然,这一条例“促进和方便了走私活动”,英国上议院议员德比勋爵意外地获悉香港政务司长的证词,竟足以证明这种说法的真实性。^[42]

诚如另一位上议院议员卡纳文勋爵指出的那样,这个条例不但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而且也从未得到过中国方面的承认。^[43]

叶名琛态度极为强硬,只要有足够的证据,对那些走私船就毫不客气。尽管船主持有香港当局发给的注册证,但船只照样被扣留,私货照样被没收,包令对此也无可奈何。^[44]

另一走私中心是汕头。它位于韩江口,是个十分理想的港口。1855—1856年间,因为通往广州的道路被洪兵截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所以汕头的非法贸易迅速发展。英商乍甸认为,汕头是无比重要的港口,它名义上虽不开放而实质上是开放的。^[45]这里的非法对外贸易是公开的,贸易额每年高达几百万银元。^[46]叶名琛同柏贵联名发布告示,禁止从内地往汕头偷运私货,因为这些货物可以在汕头“装上外国船,运到香港和澳门,在那里出手后,又把棉花、大米、洋杂货、毛料和锡走私回汕头而规避税收”。叶名琛还进一步宣布,他已命令韩江流域的地方政府同军队合作,缉拿并惩处一切走私者,把他们的船只和私货充公。他还命令停止生产可用来走私的快船。^[47]告示与其说是表明叶名琛对外国人违反条约同一个不开放的口岸通商的不安,不如说流露了叶名琛渴望多收一些关税的迫切心情。其实,如果我们细读一下这份公告,就会发现只要商人们缴纳关税,叶名琛是愿意对这种非法贸易佯作不知的。从这一点看,叶名琛可算是务实派。他知道当时的政治和财政问题积重难返,所以他很聪明,不去捅马蜂窝,只求收得一定数量的关税以济燃眉之急。如果外国人要求他开放汕头作为通商口岸,毫无疑问他必持否定态度。他会以他惯用的手法回答,这件事只有皇上本人才有权决定。但是,事实上他愿意睁一眼闭一眼,不去理会汕头的非正式开放状态,尽管这样是与朝廷旨意相背悖的。这件事同他建议招募失业旗人为募勇一样,既反映出他的魄力,又说明了他的窘境。

叶名琛对广州以及广东沿海所采取的外贸政策很快便稍著成效,使1856年的关税收入有所增加,单在广州一口税入,达一

百零八万两,约等于1855年的三倍。^[48]

贷款给钱庄所得的利息

这也是广东省的一项重要收入。当清王朝还比较强盛时,收支相抵,颇有盈余;盈余部分就存放在各钱庄。比如1796年存放了二十三万两;1825年又存放了十万两;嘉道年间,连留作官盐生产资本的一百万两也如此办理。政府存放钱庄的款项要收取利息,这些利息分别用以支付育婴堂和书院的开销、购买军事装备、支付旗人的贍息银以及缉捕罪犯所需等项费用,甚至用来支付军队的薪饷。^[49]比如,守卫珠江两岸十四座炮台的督标的年总薪饷为7680两,其中3820两来自这些利息,占43%。^[50]

许多钱庄投资于对外贸易,这在鸦片战争前是稳妥而有利可图的。然而战后,由于英国的坚持,取消了曾对中国商人起过保护作用的广东十三行制度,于是中国商人感到难于应付1847—1848年的贸易危机,大批投资外贸的商人破产,^[51]其中包括政府存放大量资金的钱庄老板。因此,到了四十年代末,以钱庄利息为财政来源的各部门的日子就开始不好过了。然而更苦的日子还在五十年代,那时起义的烽火已燃遍各地。

动荡的、时断时续的贸易使钱庄老板吃够了苦头。除此以外,这些老板有相当多资金贷给农民,收取的利息有时高得惊人,这就增加了使社会不安的因素。农民发动起义时,当铺和钱庄很自然就成为农民攻击的目标。因此,五十年代的大规模起义,除了严重破坏了政府的地税、盐课以及关税收入外,还破坏了从钱庄收取利息这一财政收入的来源。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打击相当沉重,因为一旦某钱庄老板遭劫,他的资本,包括政府存放的资金就至少要损失一部分,甚至全部。

叶名琛无法帮助这些钱庄老板(实际上等于无法帮助自

己)。在经济萧条出现之前,他没有办法阻止它;经济萧条发生之后,他又束手无策。对于大规模破坏法制的行为,他可以动用武力来解决,但是即使平定了贼寇,被掳掠过的当铺也只好永远关门大吉,除非店主人重发洋财。这并不是说叶名琛就把同政府和财政收入息息相关的钱庄老板的财产置之不理了。有史实证明,当盗贼混水摸鱼抢劫当铺后,他马上派专人到现场调查询问,了解损失情况。^[52]他甚至不厌其烦地亲自审问被捕的犯人,希望至少能追回一部分赃物。^[53]

注释:

- [1] F. O. 931/1256 号,徐、叶合署奏稿(1850 年)。
- [2] 同上 1324 号、1367 号,镇压洪兵的报告(1852 年)。
- [3] 同上 1311 号,叶名琛复祁寓藻函(1852 年)。
- [4] 同上。
- [5] 王业键《中国地税估计,1753 与 1908》页 16。
- [6] F. O. 931.
- [7] 韦文:《门前怪客》页 134—135;比较 F. O. 931/235 号,1851 年士绅抗缴地丁税案的报告;237 号,1851 年徐、叶合署奏稿;F. O. 17/126 卷第 57 号公牍,1851 年 3 月 17 日包令致文翰函。韦文叙述有误。
- [8] 削减的那部分钱原定用来为官仓储备一批粮食,后拨给书院,现又用回购买粮食。
- [9] F. O. 931/237 号、235 号;HF 卷 30 页 22—23,1851 年 4 月 29 日上谕。
- [10] F. O. 931/1143 号,情报(1855—1856 年)。
- [11] 同上 298 号。
- [12] 同上 241—222 号,关于 1851—1852 年税收的报告。
- [13] 同上 1435 号,关于高廉道四出借款以支付该道水师薪饷的记载(1831—1854 年)。
- [14] 同上 364 号,反对湖南改变盐务管理法的论辩(1856 年)。
- [15] 同上 82 号,广东盐务报告(无日期);周庆云《盐法通志》卷 6 页 18。

二者统计总数有出入。

- [16] F. O. 931/241 号, 1852 年广东税收报告。
- [17] 同上 184 号, 盐务进展的报告(无日期)。
- [18] 同上 307 号, 一贩私盐案的有关供词(1855 年)。
- [19] 比较同上 964 号, 关于香港形势的报告(1855 年); 431 号, 关于盐船抵香港的报告(1851 年 5 月 1—30 日); 汉沙德《议会辩论录》第三辑, 卷 114 页 1167。
- [20] F. O. 17/267 卷第 169 号公牍, 包令致格拉兰顿函, 1857 年 4 月 8 日。
- [21] “亚罗号”船长托马斯·肯尼迪是一被雇英国人。“他是个 21 岁的青年, 在证词中承认在船上不过是个挂名船长, 他连船主是谁都不清楚, 只知是勃洛克先生在广州的买办。”(汉沙德《议会辩论录》第三辑, 卷 144 页 1165) 在“亚罗号”事件前, 这艘快船是海盗窝赃的地方。(F. O. 17/267 卷包令致格拉兰顿函, 1857 年 4 月 8 日) 之前, 该船活动无案可查。它很可能同其他走私船是一类(汉沙德《议会辩论录》第三辑, 卷 144 页 1167)。
- [22] F. O. 931/257 号, 广东食盐官配日渐削弱的报告(1853 年)。
- [23] 绅商捐款支付食盐运费的报告(无日期)。
- [24] F. O. 931/415 号, 广州盐务管理法草案(无日期)。
- [25] 比较同上 1757 号, 1855 年 11 月 21 日包令致叶名琛照会; 同上 1777 号, 1855 年 12 月 12 日叶名琛致包令照会; F. O. 228/212 卷第 62 号公牍, 包令致温彻斯特函, 1856 年 5 月 26 日。
- [26] F. O. 931/416 号, 六地区处理食盐数量的报告(1855 年)。
- [27] E. G. 卑尔: 《厘金起源, 1853—1864》, 哈佛东亚研究中心, 1958 年版; 罗汝东《中国厘金史》(上海, 1936 年)。
- [28] F. O. 931/364 号, 反对广西改变盐务管理法的论辩(1856 年)。
- [29] 汉沙德《议会辩论录》第三辑, 卷 144 页 1167—1168。
- [30] F. O. 931/482 号, 开放五口岸以来广州贸易减少的报告(1848 年)。
- [31] 同上 335 号, 关于 1848 年 2 月 1 日—1854 年 11 月 15 日期间关税征收情况的报告。
- [32] F. O. 17/231 卷第 208 号公牍附件, 1855 年 6 月 9 日墨里逊的报告。

- [33] 同上,第242号公牍附件,1855年7月6日阿礼国致包令函。
- [34] F. O. 931/344—367号,海关官员营私舞弊的报告及改变此状的建议(1856年)。
- [35] F. O. 17/230卷第155号公牍,包令致克拉兰顿函,1855年5月15日。
- [36] F. O. 931/811号,对中英商人的通告(无日期)。
- [37] 同上318号、319号、366号、322号、328号,财政报告及粤海关关税收据(1854—1855年)。
- [38] F. O. 17/212卷第18号公牍,阿礼国致包令函,1856年2月2日。
- [39] 汉沙德《议会辩论录》第三辑,卷144页1167。
- [40] 同上,页1160。
- [41] 此指在香港的中国居民。但正如首席检查官指出,“在香港的六万中国人里,在法律上可说英国臣民的恐怕连一个也没有”(同上页1161)。
- [42] 汉沙德《议会辩论录》,页1167。
- [43] 同上,页1314;比较同上,页1160。
- [44] 同上,页1167。
- [45] F. O. 17/277卷第68号公牍附件,约·亚尔丹致额尔金函,1857年10月1日。
- [46] 同上251卷第321号公牍附件,巴夏礼致包令函,1856年10月6日。
- [47] F. O. 228/212卷第20号公牍,阿礼国致包令函,1856年2月4日;附件,墨里逊翻译的1856年1月22日叶、柏贵合署的告示。
- [48] 由于与英国交恶,叶名琛于1856年底封港,停止对外贸易,故1857年广州无关税收入。
- [49] F. O. 931/277号、294号、1521号、130号、257号,关于政府贷款给商人及商人拖欠利息的报告(1815—1855年)。
- [50] 同上。
- [51] 《怡和公司档案·私人信件》B3/16种、B4/7种(1847年)、B4/6种15辑。
- [52] F. O. 931/1763号,一家当铺被袭的报告(1855年)。
- [53] 同上1335号,顺德捕获一名盗贼的报告(无日期)。

第八章 叶名琛的理财应急措施

第一节 控制支出

叶名琛尽管采取了许多补救办法,人不敷出的情况依然十分严重。前面讲过,额征税收要如数上缴中央,叶名琛可以动用的只是额外征来的款项,这些款子本来是留给地方政府使用的。因此,他不得不像镇压起义军一样无情地压缩开支。表十的第五项(见126页)就是一个例子。这里标出的开支数为30000两,实际开销29922两。然而,叶名琛只批准了21870两(70%)。不足部分要由地方官员自己去设法解决。^[1]

至于地方官员独自同义军作战时的军费开支,叶名琛同样毫不留情地压缩,只批准他认为合理的开销。^[2] 清远、英德地区的战事结束后,还要搜捕四处藏匿的残部。叶名琛派专人进行此项工作。这些人员一律要把每日的开销造册呈报给他:无论是停留在某地执行任务,或是辗转各地查缉敌人,都得把地名写清楚;带了多少士兵,多少挑夫,亦要把数字列出。^[3] 1851—1852年攻打凌十八时,徐广缙曾悬赏一万两活捉义军首领。可是,叶名琛接替徐广缙后,只赏给杀死凌十八的那名军官一千两。这件事做得有点不近人情,引起下级军

官许多议论。^[4]可是叶名琛却认为罗镜大捷是全军上下合力作战的结果,假如把一万两全数赏给刚巧打死凌十八的那名军官,反而有伤士气。

打完仗,叶名琛认真核实军费开销。官员们都要把开销的详细情况写出来,主要的项目是军饷、脚钱、赏银、伤亡抚恤金、运输军队和制造弹药的费用等。他要求账目十分清楚、开销确系合理。高州知府李升的清册就因为不够明细而两次被退回重造。^[5]叶名琛的下属因为没有受过财务训练,不会精打细算而事后自找门路补足不被批准报销的那部分开支的,不乏其人。其实,叶名琛推行这一方针也是迫不得已,因为他要想办法以维持政府而不使它垮台。虽然这样做并非绝无道理,但却不近人情,因而引起一部分下属军官的不满,也是很自然的事。

由于动乱日益扩展,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员受到叶名琛这一强硬的财政方针的影响。让我们研究一下知县的情况:知县三年任满,就要向省政府呈送一份收支报告表,以便核销。现在报告表多出了一项支出——募勇御敌,随之而来的是一大串开销,如赏银、抚恤金、军事装备、旅差费用等等。知县必须事前垫支,事后再申请报销。他能否报销已经支出的款项,就要等候审批。为了便于分析,表十七列出了一些审批结果。从中可以看出,

表十七 各属未结交代各案

县	令	报销垫支壮勇口粮等(两)	审批结果
从化	周琦	2261	削减
曲江	符鼎庸	2728	不准报销
翁源	车任重	4647	削减
乐昌	万时喆	2800	不准报销
英德	孙时彦	11700	削减
长宁	李延銮	15000	不准报销
广宁	程兆桂	32000	由局核办

(续表)

县	令	报销垫支壮勇口粮等(两)	审批结果
德庆	胡元泰	24300	由局核办
连平	吴昌寿	5600	由局核办
信宜	夏云和	1260	准予报销
化州	王定珏	7640	准予报销
灵山	杨汝霖	5530	尚未准销
始兴	莫春晖	6600	削 减
罗定	彭邦晦	18390	削 减
西宁	王景瀛	16540	削 减

本表根据 F 0.931/288 号制成。所列县令大多于 1851 年底任满。

表十八 剿捕章程

(一) 武 官	日 支 银(两)	长 夫(1)
副 将	0.35	10
参 将	0.35	8
游 击	0.25	6
都 司	0.20	4
守 备	0.15	4
千 总	0.12	2
把 总	0.12	2
外委千总	0.08	1
外委把总	0.08	1
额外外委	0.08	1
兵丁文书识字	0.07	每百人配长夫 30 人(2)
(二) 带 壮 文 员	月 支 银(两)	长 夫(3)
知 府	28.00	12
知 州	19.14	12
知 县	19.14	12
杂 职(4)	12.00	6
(三) 壮丁一项有原雇银数,多寡不同,应照原雇之价,核实支給,亦不支給食米及一切杂费。		

本表根据 F. O. 931/1706 号制成。

注：(1) 每名长夫每用一日支银 0.08 两。

(2) 这些长夫的任务是搬运火炮、弹药。

(3) 每一百壮勇配长夫 20 人。

(4) 杂职包括县丞等其他下级文员。

十五个县的报销，照单全准的只有两个。其他各县的开支之所以不准照单报销，也许是县令花钱大手大脚，办事不够精明强干，但对叶名琛来说，理财一窍不通或庸碌无能，都不能作为乱花钱的借口。一些官员的怨气在给叶名琛的一份禀帖中表露无遗，这份禀帖的结尾是这样的：

古人之所谓理财者，以用人为大本，而审出入其末也。以需用财为要图而矜言节省，其浅也。不知大本而徒务其末，则计较锱铢，刻薄寡恩，司出入之人即召乱以耗财之人，虽雨粟雨金有不堪其枉费者，况财源有限而又自壅之也。不知要图而专务其浅，将今日当用之什一而分文吝，明日枉用之千万而泥沙弃之。^[6]

显然，叶名琛的一些下属被责为滥支后（也许不是他们的过错）对他牢骚满腹，这一点叶名琛看过了这份禀帖不会不知道。所以，为了使下属有章可循，简单明了，同时又可保证开支合理，叶名琛命令军需总局起草了一些规定，其大概内容见表十八。

第二节 增加额外收入

正常的财源日趋枯竭，开发新财源就成当务之急，但这并不是唾手可得的。为了筹措在广东和在全国镇压起义所需的军费，叶名琛不得不多方征发民财。主要的手段有三：捐纳（捐输）、增

税和籍没起义者的家产。

捐纳(捐输)

正常情况下,清政府的岁入勉强可与支出相平衡,早期大概还略有盈余。但是现在有四项额外支出:军需(主要是镇压起义)、河工(特别是黄、淮一带水患常使民不聊生)、赈灾(遇天灾时)、营田,^[7]于是只好向民间募捐,按捐款多少分别授予捐款人虚衔或实职作为报酬。然而,皇帝认为捐纳类于卖官鬻爵,有失朝廷尊严。另外,正如一些大臣所指出,卖官鬻爵直接导致政治腐败。^[8]因此,皇帝经常很为难。幸好这种捐纳只是临时措施,在规定时期内才可以进行,逾期无效。不过,随着清朝日趋没落,人口猛增,生产又跟不上,政府的正常财政收入便大大减少。1850年咸丰帝即位,两个几乎无法解决的难题就摆在他面前,一个是各地动乱,特别是广西;另一个就是财源短缺。于是又有人提出搞捐纳,但他拒绝了。^[9]而且他下令免去一年地丁,以示皇恩浩荡。这样一来,据户部奏报,1851年上半年征收入库仅六十四万两,下半年不足二百万两。^[10]这两笔款项简直不配算作政府的正常收入。^[11]所以当咸丰帝命令户部和广东省拨款支援广西镇压起义时,大学士祁寯藻^[12]奏称库款无多;另外他已接到广东报告,那里的每两银子都已用在加强防卫两广之间几百里长的交界上,以防起义者从广西窜向广东。事实上,祁寯藻已亲自写信向叶名琛了解过广东的财政情况,叶名琛复信说广东藩库已空空如洗。于是,祁寯藻和同僚们商量之后,于1851年11月28日向咸丰帝建议向广东的商人、百姓募捐,帮助解决两广军费。^[13]咸丰帝勉强同意,捐输的期限从1851年12月22日起至1853年1月26日止,为期十二个月(阴历)。到了1853年1月底,募来的钱仍不敷用,于是期

限延长九个月；到 1854 年 1 月限满，再次延长九个月。此后，年年延期，捐输（捐纳）就几乎成了永久性的了。^{〔14〕}

叶名琛所搞的捐输可分三类：向商人募捐、向官员募捐和向士绅募捐。

向商人募捐：自唐以来，广州就是一个生意兴隆的港口，即使在清初，海岸还未开放时，广州也是例外，所以广州的商人可以说是富甲全国。如果向他们募捐，毫无疑问能得到大笔款项。在这一点上，叶名琛确实走运。可是如上所述，皇帝认为向庶民百姓募捐来维持政府的财政支出是不光彩的事情，只是由于大臣们的敦请他才勉强答应让广州的商人帮助承担广西的军费。皇帝的的不悦还有一个原因，募捐一事向来都由朝廷直接办理，但是祁寯藻认为贼兵远在广西，最好是由广东当局办理，这样更加简捷。咸丰帝勉强批准了祁寯藻的请求，但他觉得朝廷都不能染指此事，实在有失颜面，所以又命令户部再发一道公文，规定广东募捐所得扫数解送广西，必须待广西收到后再把捐款人的名单报给户部，户部据此才给捐款人安排职衔。

叶名琛接到重开捐纳的上谕，就把它发给全省各地的官员，让他们广为印发。为此，他还在广州城内各区任命了一些愿意解囊资助的士绅组成捐输局，并命令各府、县说服当地士绅参加这项工作。捐输局的代表们走访各位富商，怂恿他们捐款，理由是：表面上是捐款给广西作军费，实际上也是为保卫广东而出力。一方面是虚荣心作祟，因为捐了款就可以买到一官半职，进入士绅阶层，另一方面是害怕一旦广东的农村也遭动乱而会使贸易中断，所以商人纷纷响应，短期内，仅在广州一地就募得三万两以上。但是，户部追加的公文一来，捐款之热情马上冷却下去。原因是多样的，首先是捐官的手续繁琐了，另外是钱要花得多了，比如现在捐一个从九品文官衔就比以前要多花 37.5% 的钱。捐款

人出了钱后,最快也要过五、六年才能得到职衔。谁有这样大的耐心等那么久呢!再者,捐款人希望所捐款项至少能有一部分用来加强本省的防卫力量,而不是全数解送广西。

祁寯藻有一位叫王汉桥的门生,在叶名琛手下任职,当时已被叶名琛任命为捐输局负责人员。叶名琛自己不直接向皇帝或祁寯藻陈情,而是让王汉桥写私信给祁寯藻反映情况。祁寯藻又把情况奏明皇帝。咸丰帝筹款心切,迫于无奈,收回了户部追加的公文。使咸丰帝丢脸的事并不止这两件,以后几年中他所作出的让步更大。1853年全国陷入更严重的财政和政治危机。财政上,镇压太平军花去了二千七百万两,部库几尽,大部分藩库也存银寥寥。需要再次指出的是,1851年全国的地丁税收入大约只有二百五十万两(不到额征的9%)。政治上,太平军攻下南京后宣布定都该城,这给了清政府一个沉重打击。更危急的是,没多久太平军又分兵西征、北伐。咸丰帝急需军费,便以八折价格出售官职,以六折四的价格出售官衔。捐纳已经成为清王朝赖以活命的手段,一切顾忌都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由于叶名琛及其同僚不断地努力,到1857年止,仅售衔一项就达2431079两。^[15]

向官员募捐:1852年5月,徐广缙和叶名琛带头,各从私蓄中捐款一万两,^[16]下属文武官员只好仿效。逐渐地叶名琛就把这种捐款制度化。他命令会计从咸丰三年初一日起,每隔十日向他开列一份捐款的官员的清单,单上写明他们的捐款数目。每单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五品以上官员,另一部分是五品以下官员。至于叶名琛本人则每隔三个月向北京奏报一次他自己及其下属的捐款情况。捐款人按其所捐款额分别得到褒奖或晋升。自1852年徐、叶带头捐款到1853年底,广东的文武官员共捐款23520两。^[17]

尽管如此,叶名琛早就不满意自动捐款,因为当时军费开支太大,他想从官员身上得到一笔长期稳定收入。自咸丰三年下半年(即1853年8月4日)起,叶名琛下令广东七品以上官员只准领60%的养廉,其余部分先挪作军费,等事平之后再发。官员的主要收入是养廉,薪俸只是象征性的正规收入罢了。全广东七品以上官员40%的养廉当然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无怪乎咸丰帝和户部马上同意叶的决定。^[18]采取了这一措施后,从1853年起就不再采用官员自动捐款的办法了。

向士绅募捐:叶名琛不满意官员自动捐款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都已是朝廷命官,虽然慷慨解囊可以得到褒奖,由吏部记录在案,但并不能马上得到晋升。对于已经有了功名但未授实职的人来说,就大不相同了。由于粥少僧多,士绅们谁钱多谁就可以买到实职。叶名琛从一开始就把这种捐款制度化。他不但在广州而且在全省组织捐输局,每十天就有人给他呈送一份报告,列出得款数目。^[19]通过这一途径到底搞到多少银子,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叶名琛早就要士绅出钱办团练,所以他们不大可能给中央政府捐很多钱。他们首先关心的自然是自身存亡和乡土安危。那些不响应叶名琛号召、没有办团练的人,则是洪兵劫掠的目标,也不可能大宗地捐款。而且,大户士绅到底是少数,像这类捐款,只靠少数人是搞不出多大名堂来的。

增 税

无论是官员的还是绅商的捐款,都是暂时性的,数量很不稳定,而且没有保证,所以叶名琛很不满意。他希望有一笔稳定的、有保证的收入,以便财政预算量入为出。再者,他希望把捐输运动铺开,而不是仅仅依靠少数富贾和士绅。基于这样考虑,他下

令强行增税。这项政策先在广州被围时实行,尔后随着各城市的收复而推广到全省。

广州被围期间,城内店铺以捐赠的形式缴纳了一大笔款项,房产主们也“捐赠”了相当于一个月的租金收入。战争旷日持久,叶名琛觉得必须把这项来自店铺的收入长期固定下来,使之成为一种制度。于是,有人向他提议:对出口货物征收相当于其售价2%的税。广州的中国商人每月必须按成交总额来缴纳这笔税款。为避免外国商人的抗议,这种增税措施被说成是中国商人自愿捐款,所以不该相应提高出口货物价格;等到事平税收正常后,就取消这一措施。^[20]叶名琛是否采纳了这一建议,不太清楚;很有可能是采纳了。尽管这个办法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出口商品涨价,但因只提高2%,相信也不易引起外商多大异议。对国内商人,就不那么便宜了。叶名琛派人在珠江三角洲各贸易中心都设立了捐输局,对各商号每年的收入作了一番估计,然后要他们上缴总收入的20%,是为“派捐”。派捐的主要对象是经营日常生活必需品如布匹、棉花、食油等项的商人(见表十九)。

表十九 派 捐

石龙镇等七埠布店				
县		埠	每年生意约银(两)	拟派捐(两)(1)
东	莞	石 龙 镇	120000	24000
顺	德	大 良	40000	8000
顺	德	陈村新旧墟	10000	2000
香	山	石 岐	20000	4000
香	山	小 榄 市	20000	4000
新	会	江 门 墟	50000	10000
三	水	西 南 墟	40000	8000
合 计				60000

(续表)

佛山镇等五埠棉花行				
南海	佛山			7000
东莞	石龙			15000
顺德	陈村			5000
新会	江村			6000
三水	西村			—
油行		每月约销油(坛)	计可捐银(两)(2)	
东莞	石龙	50000	3500	
三水	西南	10000	700	
新会	江门	30000	2100	
顺德	陈村	10000	700	
南海	佛山	20000	1400	

本表根据 F. O. 931/1711 号、1164 号的资料制成。

注：(1) 拟派按各店年收入约数的 20% 计算。

(2) 每坛油抽捐 0.07 两。

所谓捐款,其实就是抽税。捐输局的人不得不同当地知县一道,逐家挨户去催缴,就像税吏穿乡过村催缴地丁一样。^[21]多数商人无论内心多么不愿意,都得服从政府的新规定,但也有少数人逃避,捐输局把这些在逃者看作罪犯而加以追缉。^[22]那些为躲避贼人洗劫而离开家乡逃到广州或别处的大户人家也是叶名琛派出的官员搜刮钱财的对象。^[23]

韩江流域商人也逃避不了这一命运。^[24]上面讲过,汕头每年公开进行的走私贸易额高达几百万元,也提到了叶名琛抑制这种非法贸易的措施。即使这些措施并不能完全生效,至少他也从吃肥了的商人身上挤出一点油水来补回一部分关税损失。

为了把士绅捐款变成一项经常性收入,有人向叶名琛提出,士绅以往都要向国家交纳“力役之征”,此项捐纳虽早蒙圣上鸿

恩已经豁免,但值国家有难,士绅自当知恩报国,恢复缴纳。^[25]增税也增到了一般平民百姓头上。洪兵战败退到海上后,有人向叶名琛建议,沿海地区每亩田地应多征三钱银子的税,用作剿捕军费。^[26]叶名琛是否采纳这两项建议,尚无实据,很可能是采纳了。如果如此,那就意味着各村庄都要集体捐款,以保卫地方之用。^[27]

最后,有一项收入值得一提,即抄没起义者家产。当起义者的家乡一旦被官兵收复,叶名琛经常要当地士绅协助开具曾加入义军队伍的人的家产清单,然后把它们没收。^[28]

各种形式增税和抄没起义者家产的一切收入,都用于当地开支。前面讲到,广州商人对把他们的捐款全部送到广西这一做法大为不满。由于乡土观念,可以说增税反而比捐纳收效更大。另外,无论是商人、官员或士绅的捐纳,事无巨细都得向北京报告,所以从行政管理角度来看,在局部地区以增税来增加收入就简单得多,从而也比处处同中央官僚机构联系着的捐纳更容易成功。

第三节 结 论

税务系统软弱,官员无能,天灾频繁,都危及税收。咸丰帝即位第一年(即1851年)按惯例免征欠缴地丁,这意味着损失了一笔可观收入。地丁、盐课及关税这些常规收入在政局飘摇、经济萧条的时候(如1853年)都减少了。在这种情况下,指望长期依靠捐纳来弥补财政赤字和支付额外费用是非常不可靠的。因此,在战争时期,国家税务机构就受到严峻考验。如上所述,1849—1853年,仅在广东本省作战支出的军费就是个天文数字;同期,先后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江苏等省同太平军作战的官兵还不断要求广东供给大量装备及粮草。幸得叶名琛理财有术,才部

分满足了本省和全国范围内的紧急需求。然而,广东财源已经大为匮乏。到1853年,整个华南的动乱对广东省经济的破坏已经很清楚,地丁、盐课、关税等常规收入和投资大大减少。这一年,广东财政真可说接近油干灯灭。即使是在1850—1853年相对平静的零星骚乱时期,无论谁来掌权,都难以应付这种困难局面,更何况1853年以后起义已全面发展了呢。叶名琛以极少的钱财,度过了这场政治大风暴,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的确,他度过了难关。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了叶名琛的理财手段,紧缩开支和开发特别税源是成功的。他不仅能够负担广东省军费开支,而且很快就重新扮演了在华中地区作战官兵的后勤部长角色。1853—1854年叶名琛不断派出水师和陆路兵马到江苏、安徽、湖南、湖北、福建和北京,^[29]并且向这些战场上的官兵提供了大量钱粮军火。^[30]这种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补给,尽管由于1854年下半年和1855年初广州被围而暂时中断,一旦解围,就又恢复了。^[31]

可以将叶名琛的理财能力同其他省份长官作一比较。江苏钦差大臣向荣多次向朝廷要求广东协饷,结果惹恼了咸丰帝,他于1854年5月17日降旨:

至广东协拨各处饷银,需用浩繁,又岂能专顾江南,且路途遥远,断不能克期解到,该大臣并不于江苏地丁、盐、关税务及捐输各款内筹办,以本省之银供本省之用,惟知坐待邻省接济。^[32]

江苏省可能比广东更富庶。可是向荣竟依赖叶名琛接济。这一事实证明,他们处理经济和财政事务的能力与态度与叶名琛相去甚远。再看江西。1855年,江西巡抚张芾写信告诉叶名琛

说,江西省受反贼荼毒极深,盐法道和督粮道简直不知所措。言外之意,无非伸手要钱。^[33]广东受洪兵的破坏不亚于江西,但叶名琛没有计穷力竭。最严重的动乱一过,他就逐步恢复部分正常税收,加上他采取特别措施征集到的款项,很快就给江西送去五万两银子。^[34]浙江也是中国最富庶的省份之一,该省布政使椿寿却因无法解决财政困难而自缢身死。他自杀的另一个原因,是漕运的许多行政管理问题因该地区动乱而变得更为棘手,使他无能为力。^[35]最后,我们引用一个曾受过叶名琛接济的军官给他的一封信,来结束对叶名琛与他同事们的比较。信中说:“接奉惠函,敬悉种种,当炊烟欲断之时,忽得此佳音,已令人不食自饱。”^[36]因此,称叶名琛为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广东及其他一些省份的后勤部长,似不为过。

然而,叶名琛也不是有求必应的,至少他没有满足内务府。从前,每年要从关税收入中拨出三十万两给内务府作杂支费用。1853年,户部奏报财政拮据,内务府预感到收入会受影响,便设法从咸丰帝那里得到允诺,保证户部不会把拨给他们的款项挪作别用。后来,叶名琛与粤海关监督奏明,难以每年都拨解内务府三十万两,他们建议只送四分之一,即七万五千两。朝廷接受了这项建议。第一次执行是在1854年,可是后来就没有执行过。直到1856年4月25日,粤海关在朝廷再三催迫下,不得不奏称有一万两银子正在解往北京,另有应拨解内务府的五十七万六千二百两已经用来支付了饷银。尽管内务府不断威胁叶名琛,说他犯了轻君之罪,但他既不分辩也不让步,仍按自己的方针办事。^[37]他这样做显然有失宠丢官的危险,幸得咸丰帝很赞赏他这种先天下后皇室的忠君爱国精神,而没有处分他。

广东也有部分人怨恨叶名琛的财政方针。我们已经讲过,由于叶名琛制订了紧缩开支条例,一些低级官员吃尽苦头。高级官

员也不见得喜欢他。他们的主要收入养廉,被叶名琛砍掉了40%;虽然对他自己也不例外,这项措施肯定不会使高级官员们高兴。广东士绅向来目无法纪,可是他们在1851年拒缴地丁风潮竟被叶名琛镇压了下去,这使他们感到很丢脸。至于商人,无论是搞外贸的还是在内地经商的,都被政府榨去大量钱财。先是向他们募捐,后变成迫捐;最后,“志愿募捐”竟变成了一种新税,出口货物要纳2%,国内贸易按总额纳20%。最使他们不能忍受的,是1856年叶名琛彻底停止与外国通商的决定。老百姓在连天烽火中已经吃够了苦,叶名琛还要增加地丁,并以募捐形式逐个村庄实行变相集体征税,这肯定不得人心。于是叶名琛就处于这样一种地位:人们既怨恨他,又惧怕他。^[38]许多广东人巴不得他离开广东。所以,出现像第五部分开头引用的那首诋毁他的民谣,实不足为怪。而且这些民谣在广州人中间肯定是不脛而走的。

注释:

[1] F. O. 931/1082号,军费开支报告(1850年)。

[2] 同上1324号,军费开支报告(1852年)。

[3] 同上1774—1775号、1776号、1122—1123号,军费开支报告(1851—1855年)。

[4] 同上1371号,某道台关于军费的信(1851年)。

[5] 同上1368号,驳回高州知府李升第二个财政报告的理由(1852年)。

[6] 同上1621号,为请准开支军费事上叶名琛书(无日期)。

[7] 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页13—22(北京,1950年)。

[8] 这种做法在法国大革命前的欧洲是很普通的。

[9] HF第22卷页4—5,1850年12月20日上谕。

[10] 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页60。

[11] 全国地丁税应征额为30,419,000两,见王业键《中国地税估计,1753

与1908》表27。

- [12] 任以都《中国十九世纪之户部》，载《哈佛亚洲研究》24卷（1963年）页177—179。
- [13] F. O. 931/59号，王汉桥致祁离藻信稿（1852年）；同上1380号，关于广西捐纳的规定（1853年）；同上1631号，户部致叶名琛函（1857年）。
- [14] 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页60。
- [15] F. O. 931/59号，王汉桥致祁离藻信稿（1852年）；同上1380号，关于广西捐纳的规定（1853年）；同上1631号，户部致叶名琛函（1857年）。
- [16] 同上1349号，1852年9月7日叶名琛奏稿；1332号，1852年5月5日徐、叶合署奏稿。
- [17] 同上1492号、1388号、1401号、1406号、1408号、1447号，1852—1853年关于官员捐款的各种报告。
- [18] 同上1445号，1854年1月10日户部给叶名琛等人函。
- [19] 同上1829号、302号、279号、1631号、1402号、1405号、1404号、1407号、1546号，有关士绅捐款的各种文件（1851—1857年）。
- [20] 同上1177号，增加军费款的建议（1855年）。
- [21] 同上1112号、1770号、1777号，关于商人捐款的报告（1855—1856年）。
- [22] 同上1601号，关于两名商人逃避捐款的记述（1856—1857年）。
- [23] 同上953号，萧定安送来的情报（1856年6月12日）。
- [24] 同上1706号，1856年10月14日潮州运同的报告。
- [25] 同上1259号，关于士绅捐款的建议（1855—1856年）。
- [26] 同上1519号，在沿海地区额外征税的命令（1856年）。
- [27] 同上1113号，各村捐款的报告（1855—1856年）。
- [28] 同上1597号、1514号、1479号、1646号、1653号、1066号，抄没反贼家产及课以罚金的有关文件（1854—1857年）。
- [29] 比较HF卷98页1；卷105页15；卷106页50；卷111页12—13；卷125页10；卷128页6；卷131页6；卷140页28；卷141页12，1853年

7月26日—1854年9月25日上谕。

- [30] 同上卷121页4;卷125页18、页53—54;卷136页16、23,1854年3月10日—8月9日上谕。
- [31] F. O. 931/1518号,记述江西形势的信件(1853年6月)。360号,1856年10月16日福建塘报;1784号,关于两湖作战军费的报告(无日期)。
- [32] HF卷128页3,1854年5月17日上谕。
- [33] F. O. 931/1387号,1855年3月11日张芾致叶名琛函。
- [34] 同上1110号,汪报闰致叶名琛函(1857年3月22日)。
- [35] HF卷77页2,1852年12月31日上谕。
- [36] F. O. 931/186号,致叶名琛函片断(无署名,无日期)。
- [37] 同上353—354号,1856年3月27日、4月25日内务府给广东的指示。
- [38] 比较柯克目睹广州将领及柏贵“闻叶名琛之脚步而战栗”的记述(《中国》页344);另见伦敦印度殖民部图书馆藏《1858年度秘密来信》L/PS/5,卷164。

第五部分 外 交

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

这首广州民谣，给叶名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表现下了一个结论。尽管这六点是专指这次战争而言的，但“不和”这点却与他任钦差大臣的整个过程都有关连，在这一部分的第九章里我们就谈这个问题；第十章则详细研究叶名琛的攻防措施。

第九章 任外交事务钦差大臣概述

第一节 “不和……不降”

第二章里讲过,叶名琛在 1846 年年底到广州后才慢慢取得处理外交事务的经验。他的外交思想也是在广州、特别是上任后的头一年里才逐渐形成的。这一年发生了两桩重要外交事件,即 1847 年 4 月的人城危机和同年年底的黄竹岐事件。关于人城危机,怡和洋行的职员德·乍甸是这样记载的:

午夜二点钟,马额峨先生把我叫醒,告诉我,舰队已到达黄埔,一路上破坏了虎门各炮台所有的五百门大炮。^{〔1〕}

暴徒们曾试图骚乱过一、两次,但都被〔英国〕士兵驱散……^{〔2〕}

惟一难办的事是入城。耆英的处境十分尴尬。他不反对英国人入城,但他的意见遭到所有其他官员和百姓的反对。^{〔3〕}

耆英慑于英国人的武力,不顾公众舆论反对,应允两年后,即 1849 年 4 月 6 日让英国人人城。对此,乍甸又写道:“在我看来,

这一事件是引起耆英卸任或者可能就此失宠的原因,因为他遭到这里所有的士绅以及其他官员的反对。”^[4]

黄竹岐事件是一次武装冲突,有六名英国人被击毙,两名中国村民被杀。^[5]这一事件对叶名琛外交思想的形成有深刻的影响。当时,英国公使德庇时爵士威胁说,清政府如果不立刻赔偿损失,就要撤走广州的全部英国侨民,作为可能发生的战争序幕。^[6]耆英再次妥协,但村民们无视耆英的命令,拒不交出肇事首领。他们在村里筑起街垒,向邻村传达告急柬帖,号召所有精壮男儿集合起来保卫家园。^[7]耆英派了大队官兵去弹压,其结果如何,说法不一。耆英声称官兵逮捕并就地正法了四名为首的肇事者。^[8]广州英商却认为,耆英对闹事的村民是无可奈何的,除非诉诸武力;但因为公众舆论支持村民,所以耆英不会铤而走险,那四个被砍头的人并非肇事首领,而是因其他罪名早已下狱的囚犯。^[9]

叶名琛当时任布政使,其职责与外交事务无关。但他极为关注这一事态的发展。他看到德庇时是如何欺侮耆英的,也看到民众对耆英一味让步政策的激烈反应,这种反应已经达到要造反的地步。总之,他看到两股力量在起作用,一股是外国人的高压,另一股是国内的强烈反抗。他主张走中间道路,即一方面尊重民众的愿望,尽力赢得他们的支持,同时又避免同外国人发生无谓的衅端。可能就在这时,他的外交方针已经形成。下面所引的叶名琛奏折,说得很清楚:

查夷性贪利,惟以通商为主,懋迁有无,断不能舍内地百姓,别图交易,尚不敢显与民抗……查广东民情,原属浮动,全在地方官平日团结,联成一体。无事则安民以抚夷,有事则用民以防夷,方为正办。至于琐屑细故,亦不得不量为变

通,借示羈縻。固不可失之操切,致启衅端;亦不可过于俯从,有损国体。^[10]

显然,叶名琛是反对耆英的绥靖政策的,因为他认为那样做则有损国体。但是,他又不像许多西方历史家所描绘的那样,是一个仇外狂。他的外交思想是被动而不是主动的,丝毫没有任何挑衅性。

如上所述,耆英已经明确答应英国人在1849年4月6日起可以入城。但是,徐广缙在1848年接替了耆英的职务,叶名琛也晋升为广东巡抚。随着时光流逝,实践耆英诺言的日期愈来愈近,这个任务就落在徐、叶的肩上。现在叶名琛已经有机会直接过问外交事务,他以1847年就已形成的观点来制定政策。他的态度非常简单、明确:“抚夷原为保民,亦惟安民乃可抚夷也。”^[11]他和徐广缙都认为让外国人进城有害无利。他发现他和他的同僚们像当年的耆英一样,在内外压力下进退维谷。如果对外国人让步,就会引起内乱,政府面对外国人更苛刻的要求将会孤立无援。如果站到老百姓一边,则可以得到他们的支持,抵抗外国侵略就更多一重希望。叶名琛的主张得到了大多数人同意。

抵抗方针一旦决定,主要的省级官员就分头行事。徐广缙在督粮道柏贵、督标副将崑寿^[12]和著名中国商人伍崇曜陪同下,到虎门同德庇时的继任者文翰谈判。叶名琛则由广州将军、八旗都统、陆路提督和水师提督协助,全力以赴作好守城战斗准备。^[13]各路练勇亦整装待命。英国海军司令柯利尔报告说,大量武装村民开进广州城,并在商馆附近示威。《中国丛报》编辑卫三畏于3月26日写道:“身着号衣,手执长矛、火炮和滑膛枪的百姓开始在晚上沿街列队行进。可能有一万人应召入伍。”^[14]几个星期后所

发布的一张揭帖回顾那时的形势道：“人自为守，家自为战，戈矛耀路，锣鼓震天。”^{〔15〕}耆英的绥靖政策长期以来使广州人感到屈辱。当武装村民的命令传到四乡后，人们高兴得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们要保卫家乡的愿望，不但不再受各级官员压制，而且实际上受到政府的鼓励。数以千计的精壮农民，集合在叶名琛等官员的周围，静听号令。他们扬眉吐气地在广州街道上，特别是在城外外国人住宅区附近列队巡逻。经过冗长费时的谈判，文翰最后给徐广缙一份照会说，“双方有争议的问题就谈判到这里为止，暂且把它搁置起来。日前，阁下和我无法进行更深人的讨论”。^{〔16〕}

广州人认为他们取得了外交方面一大胜利。^{〔17〕}他们兴高采烈，搭起了六座宏伟的彩牌楼来为徐、叶庆功。^{〔18〕}道光帝也为之动容：“洋务之兴将十年矣。……朕深恐沿海居民蹂躏之虞，故一切隐忍待之。……本日由驿驰奏，……入城之议已寝。……不折一兵，不发一矢，该督抚安民绥外，处处皆扶根源。……朕嘉悦之忱，难以尽述，允宜懋赏，以奖殊勋。……叶名琛著加恩赏给男爵。”^{〔19〕}徐广缙则赏给子爵。

许多达官显贵亦纷纷写信给徐广缙和叶名琛，祝贺他们的卓著功勋。下面摘录致叶名琛的贺信：

阁下与仲翁同心协力，大局主持，不拂輿情，此为探骊得珠，深为心服。二年之约，当可勿记。不战而屈人，非至勇其孰能之。^{〔20〕}……

与仲升制府同心筹国，消夷酋之反侧，扬中夏之威声，十年无此快意之事。此不独国谱之光，实载籍之寿也，能不纵跃三百！^{〔21〕}

信中提到的“仲翁”、“仲升制府”都是指徐广缙。叶名琛的政策取得了巨大胜利,而胜利又使他的观点进而化成一个外交公式:遵从民意,团结百姓,同心协力,抵御外侮。

半年之后,即1849年9月,文翰再次企图迫使徐广缙实践1847年之约。这实在使徐大惑不解,他原以为文翰已彻底放弃了入城要求,所以根本不把他的照会转呈朝廷。^[22]于是,文翰于1850年4月27日动身前往上海。临行前他给徐广缙一份照会,声称此行目的是视察五个通商口岸的贸易情况。然而,从北京传来的消息却说,文翰是想到北方找耆英和穆彰阿,这更加深了徐、叶对文翰此行的怀疑,认定了他确是另有企图,同时也使他们深信外国人是言行不一致的。^[23]1850年6月18日文翰返回香港。三天后文翰写信给徐广缙,也没有提到他曾想同耆英和穆彰阿联系的事;而徐、叶竟又认为这是外国人狡猾的表现。^[24]文翰此行另一个目的,是想开发台湾的煤炭资源,声言“福建港口不好,亏折甚多,因思另换台湾地方作为港口”。这当然被朝廷看作是“该夷窥伺台湾”。面对外国人的新要求,徐、叶的反应是要外国人恪遵条约办事;^[25]直到1854年所谓的修约谈判时,叶名琛仍然坚持这一点。由于叶名琛和包令爵士(文翰的后任)是这一事件中的两位主要人物,所以有必要将他们俩人的态度作一比较。

包令自1849年起任英国驻广州领事,1853年底升为全权公使,^[26]1854年正式赴任。刚上任,他就要求会见叶名琛。叶名琛在1852年担任办理外交事务的钦差大臣。他对是否会晤包令一事并无成见,但考虑在城里会见将引起严重后果,于是便提出在伍崇曜的货栈或在虎门见面。^[27]然而,包令坚持要叶名琛在城内会见他,他认为:“只有解决了入城问题之后,双方关系才可置于令人满意的基础上。”^[28]双方各不让步,会谈一直无法进行。他们之间恐怕只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互不信任。叶名琛是怎么

想的,为什么会这样想,已如前述。至于包令,他曾声言,“中国官员的一切企图都明显地同我们的利益根本对立,所以同他们打交道只能立足于怀疑猜忌”。^[29]这是他的对华方针。包令要见叶名琛的主要目的,是想修订中英两国于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南京条约》本身并没有规定可以修订的条款,但包令说,1843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有这一条,根据最惠国待遇原则,《南京条约》也应该可以修订。尽管如此,叶名琛仍然准备同他会面,与他讨论这个问题。如上所述,包令坚持要在城内会面,这就为自己完成这一外交使命设置了障碍。但他仍不甘心,便北上想直接谒见咸丰帝。可是咸丰帝的意思是一切有关谈判的事宜都由叶名琛负责,包令应该同他接洽。^[30]他回到香港,派麦华陀到广州进行初步接触。叶名琛再次表示非常愿意会谈,并派了两位“有名望的重要知县作为合适的人选”,去会见麦华陀。^[31]但是,包令却指示麦华陀,无论如何首先要叶名琛答应在广州城内或在香港会见他,然后再商谈修约事宜。^[32]叶名琛答复说,他委托那两名知县安排他本人“同英、法、美外交使节会面,商谈修订条约问题。地点在海珠炮台,或在停泊于广州城外的一艘英国军舰上;其中任何一处均可”。^[33]随后,麦华陀执行了包令的另一个指示,拒绝谈判即行返回香港。如果包令耐心一点,或者少考虑一点入城问题,他起码能在那时就开始同叶名琛谈判。至于让叶名琛去香港见他,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包围广州的义军已经开始攻城,他如果在这时离开广州,则后果不堪设想。然而,包令要么视而不见,要么就是漠视这些事实。他再次北上,要求咸丰帝另派钦差大臣同他谈判,理由是叶名琛拒绝同他谈判。^[34]这显然与事实不符。

包令的再次北上,仍是徒劳无功。他在恼怒之余,回到香港,刚好收到叶名琛的那封所谓求援信。此信在第六章已经提及。

其结果,叶名琛加深了外国人是诡计多端、不可捉摸的印象;包令也更加深信清朝政府的官员都是顽冥不化、傲慢无知的人。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罗伯逊领事在包令离港赴沪期间代理公使职务,他曾要求叶名琛派水师协助他镇压艇匪;一个月之后,叶名琛也要求英国方面帮助他镇压洪兵。但叶名琛的这一要求,被刚回香港的包令所拒绝,其理由是要保持中立。对此,叶名琛已不能理解。更有甚者,包令竟以为利用这种情况可以迫使叶名琛就范,便同海军司令一起率领几艘军舰前去广州,要求正式会见叶名琛。^[35]叶名琛仍然不卑不亢。包令刚到,他就派两位县令代他向包令问好。^[36]包令再次强调要在广州城内叶名琛的官邸里会见,叶当然不能答允。后来,叶名琛在黄埔打败了洪兵水师,把他们逐离广州,包令却又照会叶名琛,表示愿意商谈“英、中两方海军协同镇压艇匪”的问题。^[37]如果叶名琛懂得国际法,知道“中立”意味着什么的话,他一定会觉得奇怪,英国方面葫芦里究竟卖些什么药。不管怎样,他根本不考虑包令的意见,认为这是外国人居心叵测的又一例证。但是,遵照一向以礼相待的原则,叶名琛复照包令,说他已派水师去歼灭那些艇匪了;而英国方面有英、中合作的愿望,是令人高兴的,这是两国友好的表现,值得赞赏。^[38]

包令听了这些带刺的恭维话,当然不会高兴。他的同胞也将不让他高兴。英国商人很快对包令不耐烦了,认为他“判断能力差,又不具备通过谈判达成新协定所必不可少的才干”。^[39]包令在中国既碌碌无为,就要寻找新的活动场所,以树立其声望。他便到暹罗,强迫暹罗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40]这次成功使他确信“如果没有一支相当强大的舰队作后盾,一切谈判都是徒劳的,令人失望的”。^[41]于是,包令准备率领一支由轻型武装轮船组成的“准海军”第三次北上。他认为这支船队是此行要获得成功的

最重要因素。^[42]正在他忙于做准备工作时,发生了所谓“亚罗号”事件。包令对中国的失望及他在暹罗的成功,都使他很快就决定在这个时候采取强硬手段。

“亚罗号”事件十分复杂,需要专门论述。^[43]在这里只简单提一下。这一纠纷是由于清朝水师在广州逮捕了一艘称为“亚罗号”船上的船员引起的。这艘船的船主是中国人,船员也是中国人,但船是在香港注册的,因而取得悬挂英国国旗的权利。据说在这一事件中,英国国旗受到了侮辱。同其他的国际争端一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后人颇难判断事件本身的真相。其实,事件本身并无多大意义,关键在于当事人如何处理问题。碰巧这时英国驻广州领事休假,由一个惯于好勇狠斗、惹事生非的名叫巴夏礼的年轻人署理。他马上抓住这一事件,想乘机扩大英国在中国的利益。他似乎根本没有作过调查研究,就一口咬定英国国旗被辱。事实上,如果他稍动一下脑子,就会发现一些重大的漏洞。^[44]当然,尽管他发现了漏洞,他也未必会轻易放弃这个讹诈机会,因为他是完全致力于帝国主义扩张事业的。^[45]他接二连三地向叶名琛提出要求,弄得这位钦差大臣应接不暇。^[46]发生了这一事件,包令也很高兴,因为他可以利用它来满足他的人城愿望和其他的要求。他对他的儿子说:“我希望能在混水中摸到一些鱼。”^[47]因此,他完全支持巴夏礼咄咄逼人的做法,甚至求助于炮舰外交也在所不惜,终于导致两国武装对抗的局面。

叶名琛则认为逮捕“亚罗号”船员完全是个内政问题。另外,他有大量事实证明并没有侮辱英国国旗。所以他觉得英方提出的全是无理要求,特别是包令那露骨的人城要求更与这一事件风马牛不相及。他坚决顶住英方威迫。包令无可奈何,只有大发牢骚,抱怨叶名琛冥顽不灵。他说,“虽然我们不断地向广州的这位总督大人施加压力,但到目前为止,他仍不为所动。对待这

样不可雕琢的愚顽之辈,可真没有办法”。^[48]包令在另一封私函中,更是不加掩饰地流露出他的无可奈何、甚至是绝望的心情,他说“真不知要用多大的力量才能压倒这位钦差大臣,也许就是把广州城摧毁了也不行,因为他似乎决心不作一点让步,而我们则无法强迫他同我们接触”。^[49]

这段时间的英中关系显然是由于互不信任而恶化的。从一开始,包令就不相信中国官员会有诚意。特别是叶名琛,包令认为他简直是固执和狡诈的化身。^[50]包令一个接一个的要求和喋喋不休的抱怨,只能使中国方面更确信外国人是贪得无厌的。对此,叶名琛报以不卑不亢的态度。这种态度更使包令恼羞成怒。此外,包令企图同叶名琛谈判,但又自设障碍。他要求在广州城内谈,这无异是说要先解决了人城问题再进行谈判,因而谈判无法进行。包令却得出结论:除非使用武器,否则不会有什么结果。

就叶名琛来说,经过 1847、1849 年初和 1850 年同外国人的初步接触,他已经完全不信任他们了。当外国人用武力相迫时,他原先的怀疑更被证实。再者,他并非不愿意会见外国使节,也不是不愿亲自同他们谈判。其实,他任何时候都乐意会见他们。但是他们全都同包令一样,每次都要求在城内会谈,这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是完全不可想象的。^[51]由于包令的条件太苛刻,面对面的谈判不可能实现,但叶名琛还是愿意谈的,他写给包令的长信表明他已经准备通过其他渠道来交换意见。^[52]在“亚罗”战争爆发后,叶名琛仍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他先是派伍崇曜通过英商斯多吉斯同包令接触,^[53]后来又命水师提督探询包令到底要什么条件才能使他满足。^[54]不幸的是,傲慢的英国公使对此一概置之不理。这时他早已决心不作任何谈判了。^[55]然而,叶名琛并不灰心,他于 1857 年 7 月又派两名官员去香港,设法打开

僵局。^[56]这时额尔金勋爵已被任命为特命全权公使,英国外交部已不准包令同任何国家进行谈判,也不准他同中国当局通信。^[57]额尔金到任后,叶名琛再次建议和解。^[58]看来即使举行谈判也不会有结果,因为按中国方面的理解,条约是“既称万年和约,便当永远信守”,修约只不过是经过一段时间后在原有的条款上作一些必要的小小改动罢了。^[59]而英国提出的要求简直等于重新签订一个条约,比如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在中国沿海及长江两岸开辟更多通商口岸,在北京设立外国使馆等等。所有这些,叶名琛是既无权,也无法接受的;而且咸丰帝也是无论如何不愿再作重大让步的。^[60]屈服于贪得无厌的外国人而沽辱国体,也违背了叶名琛的方针,何况经他手再签订一个丧权辱国条约,全广州以至全国的公众舆论都会攻击他。尽管叶名琛是个能干的官员,但在这件事上,他只能持强硬态度,无法让步。中英双方的对峙延续了一年多,尽管给叶名琛的工作和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困难,叶名琛仍然寸步不让。所以说叶名琛“不和”是不确实的。

至于讥笑叶名琛“不降”,这简直令人不可思议。说这话的人,难道是希望叶名琛在英国人的步步进逼和最后通牒面前屈膝投降?历史家们一味指责叶名琛,而从未体谅过他所处的逆境和遇到的困难。他坚持不懈地想通过谈判保持和平,当和平被破坏以后,他又千方百计去恢复它。直到目前为止,或许可以说,叶名琛的这些努力还少为人知。

第二节 “不走”

说叶名琛“不走”,同样是没有道理的。叶名琛懂得:封疆大员弃城逃跑是要抄家灭族的,且会被当时及后世所唾骂。再者,叶的庭训师教也使他一向恪守圣贤之训,是不会轻易事君不忠

的。当然,历史上有过许多上大夫降敌的事,当时也有不少朝廷命官在太平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弃城出逃。在使大多数人惊慌失措的形势下,能够保持镇定沉着,这需要坚强的意志和性格。叶名琛就是如此。当英国人在河南的大炮射出第一排炮弹时,爆炸声震动了整个校场,也震动他部下的心弦,叶名琛仍然面带微笑。^[61]当他的官邸遭到炮轰,随从都吓跑了的时候,叶名琛仍然端坐在议事厅里。^[62]如果我们记得他在1854年广州被围,他的政府和个人都岌岌可危时的表现,对叶名琛的上述举动就不觉得奇怪了。可惜的是,在当时的政治制度下,他的这些品质都得不到充分发挥。比如亲自指挥游击战等,因为这类行动会被认为是弃城逃跑。相反,这些品质竟变成了他的诟病和笑柄。

其实,叶名琛如果先考虑自己的生命安全,也许他可以借口离开广州。1857年8月包令写道:“真担心叶名琛找借口逃出广州城,比如他可以说上京觐见咸丰帝,也可以说出巡全省,也可以说率军讨贼等等。”^[63]就在决战前不久,叶名琛把家眷送出了广州城,足见他已清楚自己处境危险。他太诚笃、太负责了,所以在形势需要他挑起重担的时候,他决不擅离职守。但是,他与城池共存亡的决心却引起人们严厉的指责。为了坚守岗位,他必须保持镇静,既不能稍萌自杀之念,也不能害怕被俘。所以他被俘后,当巴夏礼领事叫他随警卫前往联军司令部时,他的回答是:“你是什么人,竟用我的语言对我讲话?”^[64]在联军司令部,他仍穿着朝服,顶戴花翎,端坐在太师椅里。其他官员不断涌入房内,侍立两旁,尤如在堂上议事一般。^[65]叶名琛虽然做了阶下囚,但在洋人面前,仍俨然是接见外交官的主人。被押上“无畏号”军舰后,他很快就平静下来。他说,他上船来是为着会见额尔金爵士的,但不知他如约来会否,他决不再等候了。^[66]这种姿态并非单独叶名琛一人作过。拿破仑当了战俘,被押在“别雷和封号”上时,也

以同样的姿态提出抗议。^[67]“无畏号”停泊在香港时,包令去见他,请他题字,他拒绝了。理由是写一句毫无意义的中文是不可取的,每个字都可能被人曲解。

叶名琛的这些行动,使柯克得出结论,那就是,“大概他仍自信我们还以为他是一个大吏,想求其签订约章,而他还准备作外交上的斗争”。^[68]可是,叶名琛的希望落空了。额尔金根本无意同他谈判并签订条约。他在“无畏号”日复一日地等候着,但毫无结果。据报导,一位随员曾用手指指海水向叶名琛使眼色,意思是建议他投海自尽以存名节,^[69]但他不为所动。

“向戍何必求免死,苏卿无恙劝加餐”。叶名琛被囚在英国军舰上,而不是在河南的联军兵营中,这一点一定使他相信他将被押往英国。所以他决定活下去,以便像苏武那样可以为国家再作点事。

注释:

- [1] 《怡和公司档案·普通信件》B2/16 种页 1392,1847 年 4 月 3 日德·乍甸致德·麦弗逊的信。马额峨当时是英国驻广州领事。
- [2] 同上,页 1396,1847 年 4 月 4 日的信。
- [3] 同上,页 1397,1847 年 4 月 5 日的信。
- [4] 同上,页 1402,1847 年 4 月 12 日的信。
- [5] 韦文根据英国领事馆的报告,在《门前怪客》页 86—89 中详细描述了这一事件。笔者只是想利用《怡和洋行档案》所提供的资料作进一步的探讨。
- [6] 《怡和公司档案·私人信件》B4/7 种页 306—307,1847 年 12 月 6—7 日德·乍甸致德·麦弗逊的信。
- [7] 同上,另可比较同上页 311,1847 年 12 月 11 日致麦弗逊的信。
- [8] F. O. 228/73 号,第 261 号公牍附件,1847 年 12 月 10 日著英关于逮捕并处决肇事者的公告。
- [9] 《怡和公司档案·私人信件》B4/7 号,页 316、326,德·乍甸致德·麦

弗逊的信(1847年12月14日、21日)。

- [10] F. O. 931/389号,1847年9月叶名琛奏稿。
- [11] 同上810号,1849年,叶名琛奏稿。
- [12] 他后来擢升为韶州总兵,继又升为广东提督。
- [13] F. O. 931/159号,1849年3月11日给叶名琛的报告;325.4.2号,1849年6月28日上谕。
- [14] J·劳地《1849年“伪旨”》,载《亚洲研究》第20卷3号(1960年)页299—315。
- [15] 同上,原件现存《博伦斯普通手稿》BO/85号中。
- [16] F. O. 17/154卷第45号公牍第4号附件,1849年4月18日文翰给徐广缙的照会。
- [17] 他们把文翰的照会理解为他已放弃入城要求。这封信的中文本的行文就是这个意思。
- [18] 《拉伦英文手稿》第1228种第162号,包令致其子吉加的信(1856年11月12日)。
- [19] 《清史列传》卷40页44—50、卷48页10—15。
- [20] F. O. 931/187号,江苏某官员致叶名琛信(1849年)。
- [21] 同上807号,给叶名琛的信(不全,无署名,无日期)。
- [22] 同上804号,1849年9月24日徐广缙与叶名琛合署奏稿。
- [23] 同上821号,1850年6月2日徐、叶合署奏稿。
- [24] 同上822号,1850年6—7月徐、叶合署奏稿;《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
- [25] F. O. 931/824—831号,1850年9月24日、12月19日徐、叶合署奏稿。
- [26] 包令来远东的经历,见G. F. 巴图《包令爵士1820—1849年之政治生涯》(伦敦大学硕士论文,1959年通过)。
- [27] F. O. 931/1698、1684、1701号,1854年5月7日、11日、26日叶与包令的来往照会。
- [28] F. O. 17/卷231,第241号公牍,包令致克拉兰顿信,1855年7月9日。
- [29] 同上卷,216第165号公牍,包令致克拉兰顿信,1854年10月5日。

- [30] 同上,附件,1854年10月3日中、英、美上海会议备忘录。详情见巴图《包令爵士与中国及暹罗之贸易条约》,载《约翰·拉伦图书馆馆刊》44卷2号(1961)页286—308。
- [31] F. O. 17/215卷,第128号公牍附件,麦华陀致包令信(1854年9月2日)。
- [32] 同上,包令致麦华陀信(1854年8月22日)。
- [33] 同上,包令致麦华陀信(1854年9月2日)。
- [34] 同上第216号、160号、164号、169号公牍,包令致格拉兰顿的信,1854年10月。
- [35] 同上第218号,第237号公牍,包令致格拉兰顿的信,1854年12月25日。
- [36] 同上。
- [37] F. O. 931/1759号,1855年11月22日包令致叶名琛照会。
- [38] 同上,第1776号,1855年12月12日,叶名琛致包令照会。
- [39] F. O. 17/卷230,第150号公牍,包令致格拉兰顿信,1855年5月14日。
- [40] 巴图《包令爵士与中国及暹罗之贸易条约》,载《约翰·拉伦图书馆馆刊》44卷第2号页286—308;N. 塔令的《包令爵士暹罗之行的使命》,载《暹罗社会导报》卷50第2期页92—118。
- [41] F. O. 17卷250,第303号公牍,包令致格拉兰顿信,1856年9月27日。
- [42] 同上251卷317号公牍及附件,包令致格拉兰顿信,1856年10月3日。
- [43] 拙著《亚罗事件之重新估计》,载《近代亚洲研究》8卷3号(1974年)页373—389。
- [44] 拙著《巴夏礼与亚罗战争》,载《近代亚洲研究》9卷3号(1975年)页303—320。
- [45] S. 连普《巴夏礼爵士传》卷1(伦敦,1894年);G·丹尼尔《巴夏礼爵士,英国驻日代表,1865—1883》(牛津大学博士论文,1967年通过)。
- [46] 见巴夏礼自1856年10月8日起,呈送包令的公文及附件。
- [47] 《拉伦英文手稿》第1228种161号,1856年10月16日包令致其子吉

加的私信;拙著《包令爵士与广州入城问题》,载《约翰·拉伦图书馆馆刊》56卷1号(1973年)页219—245。

- [48] 同上165号,1856年11月29日包令致其子吉加的信。
- [49] 同上,1856年12月15日。
- [50] 同上,1856年11月12日。
- [51] F.O.17/267号,第168号公牒附件,1856年11月18日包令致叶名琛的照会;1856年11月19日叶名琛致包令的照会。
- [52] 包令一直指责叶不重视他的照会,而中国的一些史家也持这一观点,显然对叶有所偏见。但是,黄延毓的结论是:“在英、法方面的文件中,有足够证据证明叶名琛每收到包令照会后都马上照复。”(《哈佛亚洲研究》第6卷,1941年)
- [53] 《巴夏礼档案》,1856年10月29日包令致巴夏礼的信;比较同上,1856年10月18日。
- [54] 《格拉兰顿藏稿》第71部分,1857年5月21日包令致格拉兰顿的信。
- [55] 同上,1857年5月25日巴夏礼致卡文第绪的信。
- [56] 同上,1857年7月24日包令致格拉兰顿的信;《拉伦英文手稿》1228种190号,1857年7月25日包令致吉加信。
- [57] 同上,1857年6月11日包令致吉加信。
- [58] 同上,1857年10月21日。
- [59] 比较HF卷114页5,1854年10月23日上谕。
- [60] 同上,卷131页39—40;卷133页8—9;卷134页1—2;卷136页15—16;卷143页8—12、15、24、28—29、39;卷144页2、5、11、21—22;卷145页1,1854年6月23日—11月1日上谕。
- [61] 华廷杰:《触藩始末》,载《近代史资料》1956年期2。
- [62] 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
- [63] 《格拉兰顿藏稿》第71部分,包令致格拉兰顿的信,1857年8月27日。
- [64] 连普:《巴夏礼爵士传》(伦敦,1894年)页274。
- [65] 柯克:《中国》页344。
- [66] 柯克:《叶名琛其人其事》,载《泰晤士报》,1858年5月10日。

[67] 《拿破仑书简》(巴黎 1858—1869 年)卷 28 页 348—349。

[68] 柯克:《中国》页 400。

[69] 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

第十章 重新评价叶名琛在 “亚罗”战争中的“无为”政策

这一章探讨叶名琛在“亚罗”战争中的攻防措施。当然,这两者是同时进行的。为了避免混乱,先按年代顺序把大事列成表二十,此表在182页。

第一节 “不守”

如上所述,英国人在“亚罗”事件中搞的是炮舰外交。1856年10月21日叶名琛接到巴夏礼的最后通牒,⁽¹⁾就作了最坏打算。军需总局现在增加了一项职责——对付外国威胁。他还专门建立了一个叫广东夷务总局的外事机关,由肇罗道张百揆和前广西按察使张敬修主持。另外,他立刻派出由官兵和募勇组成的增援部队,由两名守备带领,去加强守卫从虎门到广州城这一段珠江两岸的炮台。⁽²⁾广州又一次遇到威胁,这一次的威胁来自外国人。可是能供叶名琛调遣的军队很少,比两年前同围城洪兵对仗时要少得多。那时调来守城的军队现在已被派到珠江流域去

清剿洪兵余部。就算叶名琛想调回这些军队,也为时已晚。因为这次外国人的入侵来得太快、太突然。第二天,最后通牒到期,英国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率领军舰向广州驶来。当英国舰队企图攻占岸上炮台时,镇守炮台的中国水师遵照叶名琛抗击外国侵略的命令,发炮自卫,但被英方的强大炮火所压倒。下午二时,西马糜各厘已经打通了驶往广州的通道,并让巴夏礼再次发出照会叶名琛,进行威逼。

表二十 亚罗战争中叶名琛活动大事记

1856. 10. 8	亚罗事件发生。叶名琛认为逮捕船上中国水手纯粹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当时亦无侮辱英国国旗之事。
1856. 10. 14	巴夏礼与义律虜去一艘他们认为是水师战船的中国船,企图迫叶名琛屈服,但叶不就范。
1856. 10. 16	叶名琛派伍崇曜去见巴夏礼,建议就亚罗事件达成谅解。包令指示巴夏礼拒绝谈判,并决定更进一步采取高压手段。
1856. 10. 21	叶名琛加强虎门至广州一段珠江两岸炮台的防卫,但都被西马糜各厘的舰队攻陷。
1856. 10. 26	叶名琛关闭海关(停止外贸)。
1856. 10. 27	西马糜各厘开始炮击广州城。叶名琛为鼓励广州百姓杀敌,谕示凡取一英夷首级者赏银三十元。
1856. 10. 29	叶名琛派伍崇曜通过英商斯多吉斯向包令建议停战。包令不纳。
1856. 11. 22	叶名琛下令反攻,收复失陷炮台。
1856. 12. 1	在三库海面,清军水师首次战胜英军,叶名琛在争夺珠江河面控制权的战斗中占了上风。
1856. 12. 14	广州商馆区遭火焚,西马糜各厘不得已掘壕自卫。
1856. 12. 19	新安抗敌会召集会议,一致同意在香港开辟战场。
1857. 1. 14	西马糜各厘放弃商馆区中的据点。
1857. 1. 15	英方无奈,疏散住在黄埔的英国人。香港面包渗毒事件。
1857. 2. 15	西马糜各厘被迫撤离广州,叶名琛派水师追击。
1857. 5. 21	叶名琛派水师提督试探包令是否有和意,但包令决心不同叶名琛作任何谈判。
1857. 7. 24	叶名琛派两官员去香港,再次试图议和时,包令已被英政府解职,不得与中方联系。

(续表)

1857. 10. 21	叶名琛劝额尔金爵士停战议和, 解决争端, 但额尔金不理。以后一段时间无事。
1857. 12. 12	额尔金向叶名琛发出最后通牒, 其实就是要广州城投降。叶招募壮勇, 在城头堆积石块及石灰包, 匆匆布防。
1857. 12. 24	英法联军发出最后通牒, 限广州城于四十八小时内投降。
1857. 12. 28	广州再度遭炮击。
1858. 1. 5	广州陷落, 叶名琛被俘。

根据广州被洪兵围困的经验, 叶名琛意识到自己作为执掌军政大权的领导人, 在部下面前绝不能流露出丝毫畏葸情绪, 这是极为重要的。在同外国人作战的整个过程中, 叶名琛毫无把握, 他的言谈举止却故意向部下表明广州的安全根本不成问题, 以便坚定他们的信心, 鼓舞他们的士气。巴夏礼的照会到达广州时, 叶名琛正在校场“看乡试马箭”(巡抚柏贵当时在北京)。一位下属看到叶名琛毫不在乎, 便提醒他注意将会发生的严重后果。叶名琛微笑着说: “必无事, 日暮白走耳。但省河所有之红单船及巡船, 可传谕收旗帜, 敌船入内, 不可放炮还击。”^[3]第二天, 叶名琛“仍下校场看箭”。至午, 炮声大作, 英国人已开始攻打河南凤凰岗炮台。遵照叶的命令, 防守炮台的水师将士一弹不发, 撤离了炮台。形势突变, 叶名琛仍然不动声色, 他的部下可沉不住气了, 托言“风大, 难马射, 请早收围”, 叶名琛同意, 并要所有下属都去督署共商对策。^[4]

叶名琛的态度很明确: 他要避免同外国人打仗。当战火不可避免时, 他坚持不打第一枪, 以免被诬为蓄意寻衅。英国人打到广州城下了, 他就可以奏明朝廷这是外国人人侵。叶名琛以为外国人只会欺侮官府, 不敢惹恼百姓, 甚至英军攻打城郊炮台时, 也不准守军还击, 以便让广州百姓看清英国人是侵略者。叶名琛这样做的目的有二: 一是想借此激怒百姓, 使他们奋起抗敌。这样英国人就会意识到他们在同百姓闹对立, 从而撤兵。二是如果英

国人坚持诉诸武力,那么义愤填膺的广州百姓就会完全支持政府对敌作战。但是,只有第二个目的达到了。“是时,城厢内外,各榜长红,约剿杀外人,……西关团勇数千,扬旗列队过十三行洋楼下。”^[5]叶名琛仍静观其变。英国人决定加大压力,从10月27日(星期一)起每隔五至七分钟就炮轰督署一次。他的仆人和卫士都跑光了,惟独他正襟危坐在二堂上,绝无惧色,^[6]看来,他还想以此向下属表明不必惊慌。与此同时,他意识到是采取积极方针的时候了,便发布命令:

太子少保两广总督部堂叶,为晓谕事:照得英夷攻扰省城,伤害兵民,罪大恶极。合行晓谕,公同剿捕。为此,仰合省军民铺户人等知悉,尔等务即戮力同心帮同兵勇,但凡见上岸与在船滋事英匪,痛加剿捕,准其格杀勿论,仍准按名赏银三十大元,解首级赴本署呈验,毋稍观望。各宜凜遵毋违。特示

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九日示^[7]

此后,他就积极抗击外国侵略者。在“不战”一节中我们将研究他是怎样打仗的,本节只谈他如何不遗余力地加强防卫。但是,他的一切努力,只落得孤军奋战、令人痛心的结局。

恢复团练

叶名琛加强防守广州的第一个措施是重建团练。团练是洪兵围困广州时组织起来的,对1854—1855年守城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外贸中心城西关的“联街团练”是由富商大贾出钱办的,练勇就是他们店里的伙计,所以组织尤为严密。广州解围后,练勇分散回店,各安生业,而以募勇代替他们执行任务。但是,在紧急关头,只需稍予训练,练勇完全可以重新编队作战。当1856年

10月25日英国舰队攻打海珠炮台时,全体联街团练就一并组织起来,排成纵队,在商馆附近的街道上巡逻。不久,士绅们也发出檄文响应叶名琛的杀敌号召:

我四十九街凜遵宪谕,联街团练,议出铺丁,自卫身家,众志成城。如遇夷人入境滋扰,土匪乘机作乱,刻即鸣锣为号,同心合力,奋勇争先,使只影不留,根诛尽灭。^[8]

这样,西马糜各厘不仅要同中国军队作战,实际上要同广州及四乡居民作战。因此,这位英国海军司令觉得还是撤离这块充满敌意的地方为妙。1857年2月15日,他这样做了。^[9]

然而,这种特殊的民兵组织只是为了应急才成立的,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1857年初英军撤离广州后,练勇再次放下武器,取代他们的是一批新招的募勇。^[10]但是,资金是个严重问题。自1854年下半年起,富商们为解广州之围,向政府捐了大量款项;1854—1855年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们还一直出钱办联街团练。可是在这时期内,由于战乱,外贸几乎完全停止,商人只能靠历年积蓄来办上述事情。击退洪兵,恢复内地贸易不久,又爆发“亚罗”战争。叶名琛于1856年10月26日关闭了海关,这是个致命的打击。因为一直到一年零两个月后战事结束时才重开贸易。此外,西马糜各厘在1857年1月12日又火焚西关,烧毁了相当多中国商人的栈房和货物。^[11]在长期的战争中,商人单靠积蓄是不可能维持团练的,何况他们的积蓄已经花掉不少。由于店铺关闭,没有生意可做,甚至连是否能继续雇用店员——练勇的来源——也大成问题。在叶名琛的档案中,没有提到1857年12月联军发动总攻时广州有联街团练这种十分重要的民兵组织。这说明联街团练可能已经瓦解,甚至不复存在。事实上,四十九街

是否有能力或者愿意长期维持由募勇巡街的制度,也很难说,因为这些募勇的薪饷都来自捐款;关于给他们发饷的报告到 1857 年 4 月 23 日就停止了。^[12]有人建议叶名琛派干练的官员到珠江三角洲各县去重建练勇。^[13]他也许派人去了,但无论如何也难以成功。因为当时四乡已被洪兵弄得支离破碎,士绅已经计穷力竭。过去,在 1849 年入城危机,1854 年广州被围,1855—1856 年珠江三角洲战争和 1856 年英军进攻等事件中,练勇曾起过积极的作用。然而,正是由于这一系列的事件,使练勇的元气大伤,终至无法坚持,所以到 1857 年联军经过长期准备发动总攻击时,广州城就难以固守了。

收 复 炮 台

叶名琛为保卫广州所进行的另一件大事是收复被英军占领的炮台。他整顿了原来的炮台守军,给伤员以治疗,发给养伤费,并给他们时间进行休整,以恢复元气。由于当时财政困难,叶名琛一直从多方面缩减开支,包括士兵的薪饷。现在,抗击外国人侵的战争爆发了,他出人意料地增加炮台守军的薪饷,以鼓舞士气。^[14]11 月 22 日,有报告说,这些水师战士都已随时准备反攻。^[15]由于中国军队作战勇敢,以至西马廐各厘也不愿在这块充满敌意的土地上周旋过久,所以炮台逐步都被中国军队收复。但炮台上多数重型大炮却被英国水兵毁坏或带走。表二十一就是各炮台在 1856 年英军人侵前后的火力配置对比情况。如表所示,所有千斤以上的大炮不是被运走就是被摧毁。这些炮台几乎被彻底解除了武装。在叶名琛的档案中,没有关于铸造重炮来重新装备这些炮台的报告,仅有广州城解围后弃置于东门外的七门七百斤至一千斤的小炮,加以修复使用。^[16]这显然是因为此时广东省的财政已经十分拮据。

表二十一 1856 年底英军进攻前后东路各炮台一览

炮 台	进 攻 前		进 攻 后	
	炮数(门)	炮重(斤)	炮 数	炮 重
东 靖	6	8000	30	不足 1000
	6	5000		
	1	4000		
	4	3000		
	12	2000		
	1	1500		
	2	1000		
	39	不足 1000		
东 安	6	8000	4	5000
	23	5000		
	5	3000		
	2	2000		
	4	1000		
东 固	7	8000	10	不足 1000
	7	5000		
	10	3000		
	3	2000		
	4	1000		
	(不详)	(不详)		
中 流 砥 柱	1	34000	4 (不详) 8	2000 (不详) 不足 1000
	7	8000		
	6	5000		
	10	3000		
	8	2000		
	2	1200		
	13	不足 1000		

本表根据 F. O. 931/1767 号、1768 号制成

原来装备了几千斤重的大炮的炮台尚且在 1856 年被攻下了,现在炮台上仅存的少量小炮,则形同虚设,已经可想见。所以,一年后,即 1857 年,英法联军再次发动进攻时,这些炮台根本无法守住,更不用说依靠它们来保卫广州了。虎门小横档炮台的火力太弱,射程太近,无法阻止敌人登陆,守军四散逃走。接着,大横档的水师守军也不发一炮,望风溃逃。敌军攻击的第三个目标是“三远”炮台,这是水师提督衙门所在地。水师提督吴元猷借故离开职守,他手下的兵丁,包括派来增援的募勇,均随之四散奔逃。联军登陆后烧毁军火库,然后离开,因为他们认为“三远”炮台不值一守。中国水师也认为回到这个炮台去毫无用处。虎门附近的沙角炮台,守将把大炮埋起来,不让它们落入敌手。受命驻守该炮台的三十名水师士兵,一看见敌人准备登陆,也逃跑了。“官弁贪生,兵丁思乱,一至于此,真令人发指”。^[17]这就是向叶名琛报告战况的官员所下的结论。

反 谍 报 工 作

叶名琛的防御措施也包括有力的反谍报活动。1856 年英军进攻时,他动员整个情报网去侦查敢于为敌人刺探情报或供给粮草的汉奸。大约有七十人被捕,其罪名包括为英国人收购粮食,窥探中国军队调动情况,直接在英舰上服役,企图纵火烧城或炸毁中国军队的堡垒,甚至说他们要开炮轰城。^[18]英军撤离广州后,叶下令给广州市民发放身份证,无证者一律不得进出城门。所以在香港的英国人几乎得不到什么情报。^[19]可是,要使重要情报不漏出广州并不容易办到。1857 年 4 月 4 日和 6 月 1 日,英舰袭击几艘中国战船,抢走许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文件。^[20]这些文件暴露了叶名琛在财政和兵力方面所有的弱点,^[21]包令从而得出结论——英方增援部队一到之后,广州连一天也守不住。^[22]

所以,包令坚持请求额尔金先拿下广州,再去北京,以保证取得清政府的让步。^[23]他的建议为额尔金所采纳。^[24]不出所料,广州轻易地被攻下了。

谍报工作

最后应该提一下,大规模的谍报工作也是叶名琛防御体系的一部分。“侦探情形,必常得随时之底蕴;妥为晓谕,总期合当事之机宜”。^[25]这是叶名琛对外政策的组成部分。在和平时期,他的探子也定期向他汇报香港的情况,包括贸易形势,外国船只进出港口和军队调动,有时是简单的几句话,说明一切正常。例如一个叫萧定安的人,就定期给他送情报。^[26]香港英文报纸刊登的重要消息也都尽量译成中文,誊写清楚,暗送广州。^[27]对外战争爆发后,一直在珠江流域平叛战争中为叶名琛提供情报的人员又兼负了侦察英舰在珠江河上调动情况的任务。为此,叶名琛从中特别挑选了一班人,并接见他们,要他们每五天与他联系一次,如有新情况则随时向他报告。^[28]广东夷务总局的士绅也派仆人雇船到香港和澳门去搜集情报。^[29]这个机关也有权选派军人化装成百姓去香港和澳门搜集情报。^[30]大量的情报是在香港搞外贸的商人提供的,因为他们天天同外国人打交道。^[31]叶名琛的情报来源很广泛,他曾颇得意地说:“从前,林文忠公好用探报而反为探报所误,偏听故也。我则合数十处报单互证,然后得其端绪。”^[32]奇怪的是,叶名琛竟从大量的情报中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国把英国打得大败,要求赔款多达七百八十万两。为了筹付这笔赔款,英国人才坚持要进广州城,因为他们一旦进了城,每天可以在城郊各收税一万两,另收贸易税一万两。^[33]第二,英国镇压印度兵变,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使它的力量大为削弱,无力发动第三场战争。^[34]

为什么叶名琛会得出这种离奇古怪的结论呢？其实不难解释。叶名琛的探子都不是受过训练的现代所谓的间谍。他们所报告的仅仅是一些谣言、道听途说以及从报纸上得来的材料。他们对外部世界极其无知，英语又很差，所以收集的情报极不确切也不足为怪。在香港的英国人很迟才知道克里米亚和印度的事态，他们对本国人在两地暂时的失利表现得有些惊慌失措。^[35]这种反应肯定对送给叶名琛的情报内容有影响。即使叶名琛对这些情报有所保留，但同样内容的情报接踵而来，不由得他不相信是真的。^[36]这些探子过去曾向他提供过不少准确而有价值的情报，那时因为国内的情报来自真正的调查、观察；而现在是有外国人的情报，只能得之于道听途说的第二手资料，叶名琛对这些情报又无从核实。还有，叶名琛心里明白他摆的只是空城计，同时知道英国人会卷土重来，在无法可想的时候，他一厢情愿地希望英方与他的政府同样疲弱，聊以自慰，也就不奇怪了。

结 论

尽管叶名琛有错误，最后又失败了，但指责他不守，是不完全符合实际的。首先，1856年他加强了珠江沿岸各炮台的力量，以防止英国海军侵入广州领水。当英国人打到广州城外时，叶名琛虽然先是一连三天不作抵抗，那是为了赢得民众支持。此后，他指挥军民，从水陆两路抗击敌军，使敌人穷于应付，以至西马廐各厘不得不撤离广州。额尔金也承认，“自争端开始以来，由于低估了敌人的抵抗能力，我们犯了许多严重错误”。^[37]再者，战争长达一年零两个月，在这期间，叶名琛采取了不少防御措施，其中包括收复炮台，重建练勇，开展谍报和反谍报活动等。尽管这些措施费力不少，效果不大，但是我们不能就此说叶名琛根本不准备守卫广州。

第二节 “不战”

1856年10月27日英国人炮击广州城,叶名琛也积极准备反击。从这时起,对外战争开始了。这场战争可以分六个方面来讨论:广州之战、珠江之战、香港之战,还有宣传战、贸易战以及1857年12月联军发动的总进攻。

广州之战

上面已经提过,英国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从1856年10月27日开始命令炮击广州城。第二天,一部分城墙被轰毁,城外的房屋被焚为平地,入城的道路已经打通。10月29日,西马糜各厘和巴夏礼进入城内。中国士兵顽强抵抗,从街角和房屋里向敌人射击,大约打死打伤三十名侵略者,最后他们也顶不住敌军的火力,被迫停止抵抗。英国人,接着是美国人,把已被放弃的总督衙门劫掠一空,这就是柯斯汀所描写的臭名昭著的抢劫事件。^[38]然后,他们撤出城外。随后的三天内,他们不断炮轰新城城墙。但是,白天被轰塌的城墙到晚上很快就又修补好了。因此,从11月3日起,炮击就延伸到老城里的政府建筑物,如广州将军衙门和巡抚衙门等。^[39]

中国人,特别是一些将领,都同仇敌忾。他们认为,敌人“非吃一大亏,不肯悔悟”。^[40]叶名琛不断收到详细的条陈和图册,都是为攻打英军和炸毁英舰出谋划策的。其中相当多计划都付诸实行,比如,一天晚上,一艘满载炸药的沙船在临江的一座房屋附近爆炸,在这幢房子里有三百名英军正在酣睡。另一天晚上,四只火筏顺水漂到英舰旁边,烧将起来,引起舰上一片混乱。从此以后,西马糜各厘用沙船为他的舰队筑成一道防卫圈,但这仍挡

不住具有杀敌决心的中国人向他们扔火药瓶和埋伏水雷。11月12日,一条防卫用的沙船由于火药瓶的爆炸而烧毁。第二天,两颗水雷在一艘英舰旁提前炸响。11月15日凌晨3时,几条中国战船乘着大雾炮击两艘英军炮艇达二十分钟之久,然后迅速消失在黑暗之中。翌晨,中国人还试图破坏沙船防卫圈,至使西马糜各厘不得不用粗铁索来加固它。^[41]

广州百姓一旦奋起还击,英军兵力不足的弱点就暴露无遗。巴夏礼甚至请求包令从香港派出一支由二百名客家人组成的特种部队前来支援,因为这些人痛恨广州人。但是,精乖的包令没有应允巴夏礼的请求。^[42]不过,他想出了另一个办法,要大量的香港苦力组织成一支劳动大军,以减轻因人力不足而给广州英军造成的压力;可是这些搬运工人拒绝前往广州。^[43]在广州的英军确实形势不妙。也许是感到商馆会有危险,法国人撤回了他们那支小小的舰队,^[44]这就使英军地位更加虚弱。作为一种防御手段,英军早已占领了通往商馆区的新豆栏,并在外国人住宅区前面辟出一片开阔地,^[45]他们还拆掉了住宅区后面的大量中国民房。尽管如此,12月14日晚11时,这些房屋的遗址突然起火。翌日下午5时,商馆的全部建筑物除了一幢房子外,变成了一堆灰烬。^[46]于是,西马糜各厘觉得有必要挖掘壕沟,把残存的一幢英国行房屋围起来,派兵守备,以保护英国人的生命安全。^[47]然而,西马糜各厘很快在1月14日被迫放弃这些被包令看作是金城汤池的英国行阵地。^[48]尽管巴夏礼把这叫做调整部署,但一名英军上尉贝特却认为这是彻头彻尾的败退。^[49]尤有甚者,一个月后,西马糜各厘放弃了他们在广州周围的据点,^[50]他已经“饱受数以百计的中国舢板的袭扰”和“火船以及其他设计巧妙而又凶险的兵器的攻击”。^[51]然而,叶名琛不让西马糜各厘顺利撤退,派了许多战船衔尾紧追;不过,据说这些战船的猛烈进攻都被打退了。^[52]

珠江之战

广州之役虽以西马糜各厘的撤退而告终,但争夺珠江控制权的战斗却仍然激烈异常。为便于了解这一战斗全貌,有必要从1856年12月1日讲起。当时,叶名琛得知千总苏海所率领的三十五条战船在二虎洋面大败敌军,便赏给他及部下1250元。^[53]不久,英军感到停在黄埔的军舰也无法保证安全,被迫放弃该地,用包令的话说,就是“我军兵力现在仅够保卫香港和我们在广州的地盘”。^[54]这样,中国方面在靠近内地的珠江河段开始取得优势。比如在佛山就截获一艘为广州英军运送给养的轮船。英军炮艇被迫日夜警戒。^[55]英军占领的炮台又被围困。贝特上校对被困生活有颇为生动的记述。他们缺吃少喝,席不安枕,而且与外界完全隔绝。到后来,他颓丧万分,竟然声称“宁可进纽基特和潘敦威尔监狱,都不愿意呆在这个地方”。^[56]终于,西马糜各厘惧为瓮中之鳖,决定继续往珠江口方向撤退,直至虎门。^[57]

叶名琛直接参与了这些行动,在后来被英军抢去的中国文件中,就有总兵黄开广写给一名下级军官的信,信中说,叶名琛要求他和这名军官一道即赴坪洲待命。^[58]〔原件只有英文本。——译者〕后来这名军官和其他军官一起向黄开广写了一个报告,讲述了赴坪洲后的对英作战情况。^[59]叶名琛安插在香港的探子,也向他详细报告了英国轮船载着在珠江战役中死伤人员回到香港的情况。^[60]

西马糜各厘一直在等候援军,但援军没有来。由于日夜被清军的游击战术所困扰,他以为继续占领省河两岸的炮台已毫无意义,便撤回香港,那里是第三个战场。

香港之战

叶名琛像一位干练的军人,采取的一项重要战术,就是当敌

人侵入广州时,去抄他们的后路,威胁在香港的英军基地。他派新安县士绅陈桂藉负责对香港采取行动。陈桂藉在明伦堂召开全县士绅大会,与会者一致谴责英军自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所犯的暴行,并通过决议,停止对香港的一切供给,从香港撤回全部新安人,在新安县内灭尽信奉洋教之徒。^[61]陈桂藉向叶名琛报告了会议情况,并认真执行了决议。他得到消息说,有若干传教士曾在一个村子里落过脚,战争一爆发便逃回香港。为防备中国教徒藏在村里为敌人刺探军情,陈桂藉秘密地派了一些士绅带领练勇突袭那些传教士住过的房子。他们没抓住人,但抢走了那些逃亡者的财产。^[62]陈的弟弟专门负责对香港实行禁运,为此,他在新安县城和通往九龙的交通线上部署哨卡,^[63]还组织小型船队执行任务。这一着卓有成效,包令禁不住叫苦不迭。^[64]

陈桂藉还有一步秘而不宣的棋,就是突袭香港。1月19日,他派出一小队人马乔装来到香港活动,他们向一队英军巡逻队发起突然袭击,打得敌人四散逃窜,然后安然撤退,还取来一颗首级。^[65]像这类行动还有很多。包令在给克拉兰顿的信中写道:“我们不得不时刻提防绑架、暗杀和纵火。”^[66]他还在儿子面前坦率地承认,中国人的这些手段使在香港的英国人提心吊胆。^[67]这时法国海军司令主动提出负责保卫香港最不安全的地区,包令同意了,^[68]然而,中国人还有更厉害的一手。1月15日,他们在一所面包房制作的面包里秘密下了砒霜,企图毒杀在香港的外国人。可惜,面包里含砒量过多,吃的人马上呕吐,经过一阵慌乱,立刻采取了抢救和防止措施。^[69]尽管无人丧生,但也受够了罪。中毒最深的大概是包令夫人。她一病不起,体质越来越弱,致使在1858年早逝。^[70]包令的姑母焦虑不安,她给包令写信说:“收到你最近的信,真是谢天谢地。我深切同情你的困境。……我惟有祈求上帝继续保佑你,使你免受一切伤害。倘若我天年未尽,

能看到你们一家平安返里,那就太感谢上帝的恩典了。”^[71]香港居民本来就提心吊胆,终日惧怕来自大陆的袭扰,面包掺毒一事更加深了他们的不安。^[72]无怪乎香港的英国人极为震惊,许多人把家属疏散到澳门。^[73]陈桂藉的弟弟报告说,有二十条船日夜在港外游弋,外国公司的办公室则有部队守卫,天一黑大炮就作好射击准备。^[74]每天下午六时起,大队警察和士兵就开始巡逻。香港等于实行宵禁。这些就是包令“为保卫女皇陛下臣民的生命财产”而采取的主要措施,他说,“我希望这些措施能够帮助我们度过这场风险”。^[75]这些非常措施不可避免地要加重经济负担。包令写道,“在我们这块弹丸之地的香港,财源已经枯竭了。我要找船来保卫香港,要到新加坡搬兵,还要成倍地增加警察”。^[76]

1857年,叶名琛进行的实质上是一场游击战,因为他的精兵都远离广州,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一份以东莞士绅的名义(其幕后实际是叶名琛的衙门)向沿海各地士绅发出的檄文,把叶的方针讲得十分清楚。檄文说:

夫该夷……乃敢无名出师,……夫为战为守,我中堂固有制胜帷幄之方,而自安自全,各绅民宜竭共卫桑梓之志。粤东物力素富,无直于外夷,而该夷远航来商,居止食用之需,事事借资于我。今其所聚以为窟者香港耳,所持以肆毒者船炮耳,我欲制之,不必为迎头之击,而当为探穴之谋;不必希一战告成之功,而当掺历久与持之计。诚能联众心,合众力,停止市易,绝不与交,然后集其港口近处团练,分番环攻,务倾其巢,覆其卵,当无不可以得志矣。……有一日杀英夷不绝,期以一年;二年三年不绝,期以五年或十年二十年,务使根株悉拔而后已。^[77]

显然,叶名琛指望通过一场持久战(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场人民战争)迫使不愿退兵的包令坐下来谈判。由于听信了错误情报,认为英国在克里米亚和印度损失惨重,忽视了英法联盟的可能。叶名琛也没有意识到,一旦英国的轻型炮艇开到,用以威胁香港的几百艘战船,其处境就不堪设想,因为这些战船不能再像逃避大轮船一样开到浅水区去逃避轻型炮艇。

宣 传 战

对垒双方并非一味依靠武力,他们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宣传战。1857年4月,包令企图用离间官民关系,来削弱中国方面的战斗力,印发了二千本小册子,综述1856年的战事,把引起战争的责任全推到叶名琛身上,并强调他系与中国官员理论,与百姓毫无干涉。^[78]叶名琛以牙还牙,以广东全体百姓的名义谴责英国人。这也是他的惯技,目的是使他的子民相信这场战争并不仅仅是两个政府之间的,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他们自己同外国人的。下面摘录叶名琛的一份布告:

英人前贴伪示,系与官理论,与百姓毫无干涉。试思烧毁炮台,轰击城垣,是以理论乎?焚海边一带及新城行店房屋至千余间之多,烧货物估值不啻数百万两,当与百姓毫无干涉乎?^[79]

1857年6月英国海军轰击东莞的一个村庄,击毙几十名手无寸铁的村民。当地士绅就去香港见包令,责其言行不一。^[80]这件事在上述布告中亦有提及。这个时期内双方都印发张贴了许多类似的告示、檄文,都想激起百姓对对方的仇恨。

贸易战

还有一条是贸易战线,叶名琛的办法是中止通商。他认为外国人来华无非是经商渔利。事实也确是如此,因此这一点就成了叶名琛制定外交政策时必然考虑的一个方面。10月26日(星期六)英军攻陷海珠炮台后,叶名琛下令关闭粤海关。^[81]他希望这样做能迫使英国人坐到谈判桌旁来,因为停止贸易对他们来说损失是相当大的。叶名琛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1849年入城危机。彼时停止对外贸易,使英方不再提入城要求,所以叶名琛对这件事的评价是“相持甫逾一月,而夷商已苦不支,釜底抽薪,明效大验”。^[82]这一次,叶名琛也许错误估计了形势,从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他仍确信通商是英国人的命脉,命脉一旦被割断,他们很快就要求和平。不幸的是,这一次收效不大。

首先,珠江三角洲的走私活动反因面与日俱增,茶叶、蚕丝的出口规模与停止贸易前相比毫不逊色,所不同的,现在是非法出口,不必缴纳关税。^[83]在和平时期走私活动已难杜绝,如今叶名琛的精兵都远离广州,其他的则忙于同外国人打仗,非法贸易就更难阻止。他手下的一些将领甚至知法犯法,参与走私渔利。最突出的例子是一个军官,他利用广东夷务总局派他驾船到香港和澳门进行侦察的机会,企图偷运大量茶叶出口。^[84]就连巡查广州水上船只的海关缉私人员也接受重赂,给走私犯大开方便之门,甚至为他们提供船只。^[85]按理1857年是不应该有任何货物运出广州的,可是这一年,从广州运往英国的茶叶就有19638300磅,相当于1856年茶叶出口额的三分之二。^[86]

其次,清政府由于财政困难重重,不得不仰仗关税收入,因此置广州处境于不顾,而极力想保证各通商口岸太平无事。^[87]上海道甚至向罗伯逊领事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一定保证各通商口岸

局势平静；广州人既然同英国人发生龃龉，那么就必须在广州把问题解决。^[88]其实，就连咸丰帝也对广州停止贸易一事感到不安，三番四次地催促叶名琛结束同英国的敌对行动。^[89]这等于给叶名琛泼了一盆冷水；包令很快就了解到朝廷的态度，冷眼看着叶名琛陷入窘境（如果不是绝境的话），心里得意极了。^[90]马士说：“帝国的其余部分却保守中立，甚至漠不关心，并且国际关系，甚至连同对英国人的关系，都依然平静如常。”^[91]

当叶名琛竭尽全力抵御外侮的时候，偌大一个中国都不给他以必要的帮助和支持；当他失败之后，又把一切过错都推在他身上，这太不公正了。难怪叶名琛在他去世前不久所写的一首诗中慨叹道：“纵云一范军中有，怎奈诸君壁上看。”^[92]

此后，战局就一边倒了。包令向伦敦求援，英国政府同意，^[93]并委任额尔金为特命全权公使，带来一千五百名士兵，加上原在香港的欧洲及印度土著士兵七百五十人，大大加强了包令的兵力。

最后一击

额尔金勋爵于1857年7月抵达香港。途中，他把带来的军队派到印度镇压兵变去。^[94]离开军队，他同样无能为力，故自己也去了加尔各答，到9月底才返回。这时，英、法已经达成协议，结成联盟。^[95]法国特命令全权公使葛罗男爵于10月15日也到了香港。^[96]他们两人立刻与舰队司令一起制订攻占广州的作战计划。

额尔金离港期间，西马糜各厘已经封锁了珠江，给广州城内居民造成生活困难，特别是粮食短缺。为了应付新的威胁，叶名琛问计于幕宾。幕宾们提出了很多办法，比如：让乡下的团练处于临战状态，一旦烽烟再起，就可迅速来援，而香港附近的团练则可向这块殖民地发动进攻；命令各处公局募勇，随时准备上阵；附

近各县要向广州派出几百名火枪手,并运来大米;省河沿岸要配置大炮,以防英军登陆;城墙上要多备灰瓶沙袋,瓦片砖石,以抗击英军攻城,等等。^{〔97〕}

大概这些就是叶名琛的主要备战措施。可是英军的总攻在四个月之后才开始,那时中国方面的防范又松懈了。再者,额尔金和葛罗到香港后近两个月毫无动静,叶名琛没料到敌人会突然发起进攻。另外,香港盛传额尔金想和平解决争端,叶名琛的探子可能把这些消息禀告给他。可是,12月12日叶名琛却突然接到最后通牒,英国人提出在同北京谈判之前,要进入广州城,占领河南和沿江炮台以及其他无理要求。对于入城要求,叶名琛是绝不能同意的,其理由前面已经讲过。至于第二条要求,如果答允了,无疑是剥夺了广州城的防卫能力。叶名琛据理答复了敌人的最后通牒。圣诞节前夕,联军通知叶名琛说他们要诉诸武力了,^{〔98〕}三天后联军就发动进攻,叶名琛几乎没有时间加强防守。我们不要忘记,此时珠江流域讨伐洪兵的战斗正在激烈进行;西江地区的形势特别严重,如前所述,广西义军很有可能再入广东。据报,“亚罗”事件发生前不到一个月,义军在梧州大败一支有七十艘战船的官军水师,以致叶名琛不得不赶快派遣陆路提督崑寿前去收拾残局。^{〔99〕}

在此形势下,如果把部队召回广州,那就意味着官兵在广西要吃败仗。至于广东,从未完全脱离过洪兵的骚扰。“亚罗”事件引起的对外战争爆发不久,叶名琛曾把一些军队调回广州,但在这些军队撤离的地方,马上就发生动乱。^{〔100〕}1857年底,英军恢复炮击广州后才两个月,广州附近的一个城市便落入洪兵手中。^{〔101〕}所以,叶名琛很有可能认为调兵回防广州以抵御一场并非一定会发生的外患,是不可能的,至少也是不明智的。

即使把军队调回广州(这等于放弃大块的粮食产区),军粮仍是

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英军封锁严密,大米无法进口。财政窘迫,停止外贸又意味着断绝了三大财源之一。而到1857年1月24日为止,仅对外作战一项已花费528307两,那时全部贮备只剩下17076两。^[102]从1月26日起,叶名琛只好冒险大量裁减募勇和雇来保卫广州的船只。^[103]在1849年入城危机时,广州除正规部队外,有十万多团练。^[104]1857年,只有为数极少的兵力来保卫它,因为无论城内城郊,团练都已办不下去。叶名琛只能在经济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招收募勇一万四千余人,以补充兵力之不足,见表二十二。

表二十二 驻扎老新城内外各起兵勇数目

驻扎地点	壮 勇	首 领	数 目
老 城	大 沥 勇	—	400
	香 山 勇	林 福 盛	600
	八旗战枪勇	—	200
新 城	平 勇	吴 守	500
	潮 勇	毛 令	500
	潮 勇	把总方耀	500
	大 圃 勇	—	700
	战 船 勇	千总苏海	500
东 路	潮 勇	陈 令	300
	番禺练勇	王 令	2000
	东 莞 勇	千总朱国雄	800
	东 莞 勇	胡 先 炜	200
	东 莞 勇	周 元 勋	1000
南 路	东 勇	张 敬 修	308
	东 勇	张 兴	100
西 路	大 沥 勇	—	2100
	平乐练勇	—	500
北 路	香 山 勇	林 福 盛	500
	安良练勇	—	300
	东 莞 勇	何 仁 山	140
穗北十四要隘			2500
合 计			14648

本表根据 F. O. 931/1495 号制成。除潮勇及八旗战枪勇外,其他所谓壮勇都募自普通农民、小职业军人。

募勇的人数看起来不少,但战线甚长,兵力分散;且中国方面只有火药枪、大刀、长矛,甚至沙、灰、瓦石都成了作战武器。包令以轻蔑的口气说:“以野蛮时代的武器和兵法,同当今倡明的科学所发明的各种装备以及首屈一指的海陆作战战略相抗争,其结果只有一个。”⁽¹⁰⁵⁾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英舰炮击广州,弹如雨下,而并未受到一弹之回击。只有在联军登陆时,中国士兵才有机会还手。⁽¹⁰⁶⁾的确,许多中国士兵勇敢顽强地搏斗,杀死了一百二十八名敌兵。终因力量悬殊,他们很快就被打败,广州失陷,叶名琛被俘。

结 论

说叶名琛不战,实在费解。事实上,叶名琛在主力部队远离广州的情况下,采取了游击战略,企图以持久战迫使敌人坐到谈判桌旁。然而,游击战是要来往游击的,如若广州有失陷的危险,叶名琛就应该率部撤入内地,继续作战。可是他却被朝廷王法所束缚,王法规定,凡官员弃城而走要处斩刑,因此叶名琛只得留在广州,束手就擒。

组织抵抗无效,与缺少得力的将佐有一定关系。以前那些能征惯战的指挥官死的死了,调离的调离了,比如:福兴已调往湖南;沈棣辉于 1856 年已死;崑寿正在广西作战。至于广州将军,不过是个银样蜡枪头。对于广州将军的作战表现,柯克作了戏剧性的,但不能说是完全失实的记载:

打仗时他根本不上城头。打完了仗,他也不把自己那多达七千人的队伍团结在他周围。法国人打进衙门时,他根本不作抵抗,而是从一个房间逃到另一个房间,最后在一个肮

脏的柜子里被抓住,拖了出来。如果不是欧洲人而是太平军抓住了他,他一定会跪倒在他们脚下号哭求饶。^[107]

由于没有好的将佐,叶名琛的队伍只不过是群乌合之众。至于广州的百姓,他原以为他所制订的外交政策是符合民意的,并希望在遭到入侵时,他们定能个个奋起,以人海战术来淹没敌寇。然而事与愿违,城里的百姓只进行了一些消极抵抗。^[108]农村里的百姓倒是群起而来,但为时已晚,无法援救广州。^[109]叶名琛的同僚与他不合作,也是打败仗的原因之一。巡抚柏贵和广州将军见势不妙,便同敌人勾结。早在广州陷落前很久,西马糜各厘写信给包令时就说:“可能我们很快就会同不包括叶名琛在内的中国当局讲和。……柏贵和广州将军等人已表示愿意上折弹劾叶名琛,并答应把折稿先送来让我们过目。”^[110]真是“纵云一范军中有,怎奈诸君壁上看”。讥讽叶名琛歌谣的作者不去挞伐同敌人狼狈为奸的败类,反而攻击一个竭尽全力、守土作战的人,何以如此不公!一张香港报纸上有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问题是叶名琛的威望是否仍然使广州人怀念于他。他无疑是个勇敢、果断的人,广州人一定为有这么一个父母官而骄傲。”报纸最后还说,要想完满解决如何占领广州这个难题,“必须把叶名琛的名声搞臭”。^[111]联军也许采纳了这一建议。第五部分一开头所引的这首民谣,很可能是英国人授意写的。这样做正中那些通敌者的下怀,因为他们巴不得通过抨击叶名琛来转移人们对他们卖国行径的注意。就这样,叶名琛的形象被歪曲了,并且一直歪曲至今。

第三节 结 论

第五部分开头所引的那首民谣,基本点是讥讽叶名琛在对外

战争中无所作为。本章就试图证明这种指控不实。遗憾的是,由于这首民谣通俗上口,它已经被误认为是当时全体广州人对叶名琛的真正看法。其实,联军企图在广州建立傀儡政府时,深感叶名琛仍然很得人心,颇有力量。1858年1月额尔金在写给葛罗的信中谈了他的这种感觉:

不少人,包括巴夏礼先生,对我谈及一个不能掉以轻心的问题。巴夏礼非常熟悉广州情况,又是我们所任命、旨在协助维持广州秩序的三人委员会成员之一。他们都说,叶名琛留在广州会使人心不稳,给重新恢复秩序和信心带来困难。^[112]

于是联军决定把叶名琛送往加尔各答。额尔金给西马廉各厘写信,要他派一艘军舰来执行这个任务,信中说:“显然,把他送到海峡殖民地是不行的,因为这些地区大多数居民都是中国人。”^[113]

历史家们之所以把这首民谣信以为真,是因为有报道说叶名琛相信扶乩,乩语说1857年12月30日以后局势便会正常,所以他根本不作守城准备。^[114]这种说法在目前的许多著作中也颇为流行。但是,在叶的档案中却缺乏这方面的文件可资佐证,从第一章表一和表二加予的分析,说叶名琛迷信到可笑的地步,也是夸大其辞的。其实,占卜同儒家一样,是当时做官人的一种文化传统,《清实录》里不乏这方面的例子。据说所谓12月30日就会转危为安的谶语来自叶名琛的那位爱好扶乩问卜的父亲,^[115]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叶名琛十分孝顺,曾为他父亲建了一座名为长春仙馆的道观,让他在里面潜心修道,档案中就有修建这座道观的计划。于是,随之而来就是叶名琛在联军攻打广州时全凭其

父扶乩所得的神示来制订政策和作战方案的传言。城破之后,叶名琛的父亲便遭千夫所指。下面是贴在城墙上的一副对联:“霜降风高,天下难容老叶;元宵雨暗,人间争怨初春。”^{〔116〕}退一步说,就算小叶也相信占卜,但综观其一向所为,他是一个讲求实效、正视现实的官员,说他的一切行动都受占卜支配,那也是有意夸张而大谬不然的。

另外,指责叶名琛不抵抗的再一理由,就是他毫不理会那一系列英国人开始入侵的警报。^{〔117〕}其实,这些所谓警报都是假的,叶名琛处之泰然,毫不为怪。他的对手包令也碰到同样的麻烦,采取同样态度。包令写道:“流言蜚语天天不断,如果一一听信,那我一定日夜坐卧不安。现在尽管我也休息得不太好,但我能保持头脑清醒,沉着冷静。对于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涌进我办公室里来的谣言,我觉得我是能够鉴定它们到底有多大价值的。”^{〔118〕}我们应该注意到,“头脑清醒、沉着冷静”也是使叶名琛成为一位办事果断的行政官员和干练军人的因素之一。可是,仅仅因为叶名琛最后是失败了,所以他同包令共同具有的这种气质就被歪曲得无以复加,使他受万人唾骂。本章第二节表二十按先后顺序列出了叶名琛为抵抗入侵、恢复和平所采取的重要步骤。除以上分析外,此表也证明了所谓叶名琛在1856—1858年的紧要关头玩忽职守的流行说法是不正确的。诚然,他打了败仗,但是他并不是败于“不战、不和、不守、不降”,而是败于敌人船坚炮利,以及为了对付洪兵而彻底削弱了广州的防卫能力,致使他在1857年底那些决定性的日子里,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傻瓜。^{〔119〕}

1849年,叶名琛奉行强硬的外交政策,得到国人称道,道光帝给他加官进爵,同僚们纷纷寄来贺词贺信,广州人为他树立彩牌。1857年,尽管人人都极力主张要采取强硬的外交路线,但他

们并不能为之出力,所以同样是强硬的外交政策,但失败了,于是叶名琛受到举国上下的责难,咸丰帝免去他的官职,同事们骂他败家子,一些气忿不过的广州人写歌谣讥讽他。最后,北京陷落,皇帝蒙尘,圆明园被联军焚毁,全国上下在忿懣之余,就把叶名琛当作替罪羊。就这样,被歪曲了的叶名琛的形象,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

注释:

- [1] F. O. 17/251 卷,350 号公牍附件,巴夏礼致叶名琛的照会,1856 年 10 月 21 日。
- [2] F. O. 931/1810 号,逮捕三名失职守备的传票,1856 年 11 月 24 日。
- [3] 华廷杰:《触藩始末》,载《近代史资料》期 2。
- [4] 同上。
- [5] 同上。
- [6] 同上。
- [7] F. O. 17/267 卷,第 168 号公牍(1857 年 4 月 7 日),附件,叶名琛 1856 年 10 月 27 日檄文。
- [8] F. O. 839—851 号,商人们组织联街团练的檄文(1856 年)。
- [9] 《格拉兰顿藏稿》第 71 部分,包令致格拉兰顿的信,1857 年 2 月 15 日。
- [10] F. O. 931/1837 号,1855—1857 年各街为守城捐款的报告。
- [11] 《格拉兰顿藏稿》第 71 部分,雷伊致包令的信,1857 年 1 月 14 日。
- [12] F. O. 931/1837 号,1855—1857 年各街为守城捐款的报告。
- [13] 同上 1851 号,保卫广州城的十项建议(1857 年)。
- [14] 同上 1875 号,有关对英战争的十一种文件(1856—1857 年);984 号,给河岸炮台拨款的报告(1857 年)。
- [15] 同上 340 号,总督衙门文件登记册(1856 年)。
- [16] 同上 1482 号,1854 年关于重铸大炮的记录。
- [17] 同上 1129 号,关于英军占领虎门炮台的报告(1857 年 11 月 15 日)。

- [18] 同上 1628 号、1877 号、1847—1849 号、1809 号、1850 号,被俘汉奸的供词(1856—1857 年)。
- [19] 《格拉兰顿藏稿》第 71 部分,额尔金致克拉兰顿的信,1857 年 12 月 16 日附件,1857 年 12 月 5 日备忘录。
- [20] F. O. 17/267 卷,第 179 号公牍并附件,包令致克拉兰顿函,1857 年 4 月 11 日;同上公牍。
- [21] 《拉伦英文手稿》第 1228 种 179 号,包令致其子的信,1857 年 4 月 14 日。
- [22] 同上,1857 年 5 月 8 日信;比较同上 1857 年 5 月 17 日信。
- [23] 同上,1857 年 6 月 6 日、7 月 8—9 日、9 月 24 日、10 月 5 日及 16 日信。
- [24] 《格拉兰顿藏稿》第 71 部分,包令致格拉兰顿函,1857 年 9 月 27 日。
- [25] F. O. 931/824 号,1850 年 9 月 24 日徐、叶合署奏稿。
- [26] 同上 941 号;951 号—953 号;964 号、958—959 号;962 号,萧定安送来之情报(1854—1857 年)。
- [27] 同上 960—968 号,香港报纸译文(1855—1856 年)。
- [28] 同上 966 号;279B.4 号;1821 号,情报(1857 年)。
- [29] 同上 1586 号,情报(1857 年)。
- [30] 同上 971 号,一桩茶叶走私案的证词(1857 年 4 月)。
- [31] 同上 1833—1885 号,1856 年 9 月 7 日、1857 年情报;类似报告见 1842—1845 号、1852 号;1882 号;951 号—953 号;1823—1840 号;145 号;965 号。
- [32] 华廷杰:《触藩始末》。
- [33] F. O. 931/1822 号,士绅檄文(1856 年);1839 号,广州公局的檄文(1857 年)。
- [34] 同上 1823 号,情报(1857 年);1831 号,来自香港的情报(1857 年 9 月 4 日)。
- [35] 《拉伦英文藏稿》中包令致其子信;《巴夏礼档案》中贝特上尉给巴夏礼夫人的信。
- [36] 在香港的中国人普遍认为英国人软弱可欺,额尔金的私人秘书根据亲身经历写成的下面一段文章,可见一斑:“中国人不断进行绑架、行

刺、劫持轮船,想出种种奸狡的法子来困扰我们……。自从取消公行以来,英国人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渺小。如果你走进香港某家古董店,站在柜台后面卖牙雕的油嘴滑舌的店老板就会把你当作嘲笑的对象。他会对你说,你想要的那套牙雕在广州可以买得到。为什么你不能进广州城去买呢?街上的顽童拿英国佬来耍恶作剧,他们的父母则盘算着这个英国人的脑袋值多少赏银。那时候的香港是个既不安全又不舒适的住所。”(奥利芬《额尔金勋爵使华使日,1857、1858、1859》,伦敦,1970年重印,页24)

[37] F. O. 17/277 卷第 78 号公牍,额尔金致格拉兰顿函,1857 年 12 月 17 日。

[38] 柯斯汀:《大不列颠与中国》页 211。

[39] 蒋孟引:《第二次鸦片战争》页 57(北京,1965 年)。

[40] F. O. 931/1857 号,关于攻击英国军舰的建议(1856 年)。

[41] 蒋孟引:《第二次鸦片战争》页 57—58;类似事件在班纳·史密斯和林比《第二次中国战争 1856—1860》(伦敦 1954)一书中亦有记载。

[42] 《巴夏礼档案》,包令致巴夏礼函,1856 年 11 月 2 日。

[43] 同上,1856 年 11 月 5 日。

[44] 《格拉兰顿藏稿》第 57 部分,包令致格拉兰顿函,1856 年 11 月 20 日。

[45] 同上,1856 年 11 月 14 日。

[46]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 1 页 488。

[47] 《格拉兰顿藏稿》第 71 部分,包令致格拉兰顿函,1857 年 1 月 15 日。

[48] 《拉伦英文手稿》第 1228 种 169 号,包令致其子吉加函,1856 年 12 月 22 日。

[49] 《巴夏礼档案》,贝特致巴夏礼夫人函,1856 年 12 月 30 日。

[50] 《格拉兰顿藏稿》第 71 部分,包令致格拉兰顿函,1857 年 2 月 5 日。

[51] 《拉伦英文手稿》第 1228 种 173 号,包令致其子函,1857 年 1 月 24 日。

[52] 同上,1857 年 2 月 15 日。

[53] F. O. 931/1875 号,关于对英作战的十一种文件(1856—1857 年)。

[54] 《拉伦英文手稿》第 1228 种 170 号,包令致其子吉加函,1857 年 1 月

15 日。

[55] 同上。

[56] 《巴夏礼档案》，贝特致巴夏礼夫人函，1856 年 11 月 30 日；1857 年 1 月 31 日、2 月 23 日、3 月 10 日，纽基特和潘敦威尔是英国的两个大监狱。

[57] 同上，星期三晚（无日期）。

[58] 《拉伦英文手稿》第 1230 种 23 号，威妥玛关于缴获中国文件的报告。1857 年 6 月 1 日。正文中的坪洲，英文为 Ping-chou。

[59] 同上。

[60] F. O. 931/1842 号、1843 号、1845 号；1128 号；138. 3. 24 号，情报（1857 年）。

[61] 同上，1814 号，新安县全体士绅的檄文，1856 年 12 月 19 日。

[62] 同上，1846 号，陈桂籍致叶名琛禀（1857 年）。

[63] F. O. 17/267 卷，第 181 号公牍附件，威妥玛致包令函，1857 年 4 月 14 日。

[64] 同上，第 178 号公牍，1857 年 4 月 11 日。

[65] F. O. 931/1846 号，陈桂籍致叶名琛禀（1857 年）。

[66] 《格拉兰顿藏稿》第 57 部分，包令致克拉兰顿函，1856 年 12 月 30 日。

[67] 《拉伦英文手稿》第 1228 种 170 号，包令致其子函，1857 年 1 月 10 日。

[68] 《格拉兰顿藏稿》第 71 部分，包令致克拉兰顿函，1 月 11 日；同上，1857 年 2 月 12 日。

[69] 《拉伦英文手稿》第 1228 种 172 号，包令致其子函，1857 年 1 月 20 日。

[70] 同上；比较同上 1857 年 7 月 16 日及 24 日、8 月 1 日及 7 日、9 月 9 日、10 月 13 日、16 日及 25 日、11 月 25 日函；比较同上 1858 年 1 月 14 日函，《格拉兰顿藏稿》第 85 部分，包令致格拉兰顿函，1858 年 5 月 19 日；《拉伦英文手稿》第 1230 种 262 号，包令爵士传记草稿。

[71] 《拉伦英文手稿》第 1230 种 211 号，雷恩致包令函，1857 年 3 月 30 日。

- [72] 《巴夏礼档案》，温彻斯特致巴夏礼函，1856年12月20日。
- [73] F. O. 931/1882号，发自香港的情报（1857年）。
- [74] F. O. 17/267卷第181号公牍附件，陈吉致陈桂藉函，1857年2月5日。
- [75] 同上267卷，第181号公牍，包令致格拉兰顿函，1857年4月14日。
- [76] 《拉伦英文手稿》第1228种175号，包令致其子吉加函，1857年2月15日。
- [77] F. O. 931/1820号，东莞士绅檄文（1857年）。
- [78] F. O. 17/267卷，第168号公牍，包令致格拉兰顿函，1857年4月7日。
包令这本小册子也放进了这批公文。
- [79] F. O. 931/963号，广东民众的檄文（1857年）。
- [80] 同上1828号，情报，1857年6月19日。
- [81] 蒋孟引：《第二次鸦片战争》页56。
- [82] F. O. 931/757号，徐、叶合署奏稿（1849年）。
- [83] 同上391号；417号；969号、1858号、1860号；1831号，关于走私问题文件（1856—1857年）。
- [84] 同上971号，一桩茶叶走私案的证词（1857年4月）。
- [85] 同上1858号，刹住走私风的建议（1856年底）。
- [86]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1页413。
- [87] F. O. 17/267卷第183号公牍附件，罗伯逊致包令函，1857年4月1日。
- [88] 同上268卷第277号公牍附件，罗伯逊致包令函，1857年4月28日。
- [89] 比较《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5页11，1857年4月23日上谕；卷16页35，1857年9月13日上谕。
- [90] 《拉伦英文手稿》第1228种184号，包令致其子函，1857年5月17日。
- [91]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1页490。
- [92] 全诗见本书第七章。
- [93] 《格拉兰顿藏稿》第69部分，内阁会议文件1—4月。
- [94] 同上第71部分，额尔金致格拉兰顿函，1857年6月22日。

- [95] 柯士汀:《中英关系,1833—1860》页234—235。
- [96] 法国干涉的理由是一名叫马赖的传教士在广西被杀(黄延毓《总督叶名琛与广州危机,1856—1861》,载《哈佛亚洲研究》6卷1号,1941年,页37—127,附录4)。
- [97] F. O. 931/1851号,保卫广州的十项建议(1857年)。
- [98] 柯士汀《中英关系,1833—1860》页235—239。
- [99] F. O. 17/250卷第280号公牒,包令致格拉兰顿函。
- [100] 《格拉兰顿藏稿》第57部分,包令致克拉兰顿函,1856年12月13日。
- [101] 《拉伦英文手稿》第1228种199号,包令致其子吉加的信,1857年10月14日、15日。
- [102] F. O. 931/1879号,三个月的财政报告,具体月份不详(1857年)。
- [103] 同上1612号、1193号、1647号,节省防务开支的报告(1857年)。
- [104] 同上757号,徐、叶合署奏稿(1849年)。
- [105] 《格拉兰顿藏稿》第85部分,包令致格拉兰顿函,1858年1月9日。
- [106] 同上第71部分,包令致格拉兰顿函,1857年12月28日。
- [107] 柯克:《中国》页343。
- [108]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1页565。
- [109] 蒋孟引:《第二次鸦片战争》页100—103。
- [110] 《拉伦英文手稿》第1230种62号,西马廉各厘致包令函,1858年1月3日。
- [111] 同上第67号,《香港日报》1858年1月6日。
- [112] 伦敦印度殖民部图书馆藏《普通公文》编号第2h札,海军部,1858年3月29日;附件,额尔金致葛罗函,1858年1月24日(比较《1858年度秘密来信》L/PS/5卷164)。
- [113] 同上,额尔金致西马廉各厘函,1858年2月11日。就在前一年,曾有过马六甲海峡殖民地的中国人要血洗英国人聚居区的流言,使英国人大为恐慌(《格拉兰顿藏稿》第71部分,额尔金致格拉兰顿函,1857年6月19日)。
- [114] 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

[115] 同上。

[116] 《东莞县志》卷 35 页 11,转引黄延毓《总督叶名琛与广州危机》。

[117] 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陆钦墀《英法联军占据广州始末》,载《史学年报》卷 2 期 5(1938 年)。

[118] 《拉伦英文手稿》第 1228 种 175 号,包令致其子函,1857 年 2 月 15 日。

[119] 也许除了耆英和穆彰阿等少数奉行姑息政策的人之外。

第六部分 捐 軀

第十一章 被囚印度

自1月5日叶名琛被囚于“无畏号”舰起,至2月23日该舰才驶离香港,共四十八天。这么长时间失去自由,换一个心胸不那么豁达的人,精神上定会受到极大折磨。可是,所有史料都认为叶名琛没有把个人的不幸放在心上。他虽然束手被擒,但举止依然庄重高贵,军舰上所有军官都很尊重他。^{〔1〕}《香港纪事报》的一位记者在访问叶名琛后写道:“偶然有人上舰,都向叶脱帽致意,他也欠身脱帽还礼。”^{〔2〕}“无畏号”离开香港驶往加尔各答时,叶名琛情绪甚佳,脾气温顺,只是后来晕了船才显得气色不好。^{〔3〕}当时天气酷热,叶名琛颇感难受,但当翻译阿查礼病倒时,他仍尽心给予照顾。阿查礼说:“中堂大人时刻挂念我的病情,经常到我舱房来探视;为了伺候我,他的随从也忙得不亦乐乎。”^{〔4〕}“无畏号”于3月12日晚抵达加尔各答。三天后便安排叶名琛登岸。

星期一早晨,他穿戴齐整,准时在七点钟吃完早饭,赫尔博特中校到来后,他戴好朝冠走上甲板,向各人鞠躬致意,然后仪表堂堂地走下接他上岸的驳艇中。^{〔5〕}

他暂时囚禁在威廉炮台里。进了房间,一待安顿停当,他就给“无畏号”舰长布鲁克写了一张凭证,说明连日来一直得到他的照顾。但是,像对待包令一样,他不肯在凭证上签字。^[6]就这样,他很客气地把布鲁克打发走了。

他被囚禁在威廉炮台五十多天。^[7]也许威廉炮台同广州的镇海楼颇有点相似,所以引起叶名琛的诗兴,写了下面这首诗:^[8]

镇海楼头月色寒,将星翻作客星单。
纵云一范军中有,怎奈诸君壁上看。
向戌何必求免死,苏卿无恙劝加餐。
任他日把丹青绘,恨态愁容下笔难。^[9]

叶名琛在这里第一次披露了他之所以甘愿成为俘虏的原因。其实,他早在写诗之前就已经实行他的计划了。比如:从香港驶往加尔各答途中,他表面上似乎对所经之地不感兴趣,有人提出给他一把椅子,让他坐在甲板上,他都谢绝了。船舱里如果有人,他就从不向舷窗外探望。但人们发现,他孤身独处时,会坐在船尾的舷窗边,饶有兴趣地注视着军舰经过的地方。^[10]在威廉炮台以及后来在托里贡的住宅里,^[11]他每周都接见许多来访者,其间有军人、印度政府官员、法官、教授、传教士等。^[12]他每天起床极早,起来后就坐立不安,直至收到当天的报纸——《加尔各答英国人报》后才安静下来。这时,他就请阿查礼把新闻翻译给他听。报上常载有关于英国议会辩论的消息,如果有时这类消息一点也没有,叶名琛就会显得很失望。听到巴麦尊勋爵下台的消息,他十分高兴。听说德比爵士想迅速同中国议和,他笑得嘴都合不拢。当然,在读报过程中免不了有问有答,通过这些问答,据说叶名琛真的开始对英国宪法有些朦朦胧胧的认识。^[13]

“我不会使您厌烦吧!”阿查礼说。其实,他足足翻译了两个多小时,自己都厌烦了。

“不!讲下去吧。现在我明白了,这比我以前从香港了解到的要清楚得多,那时我根本不懂。”^[14]

然而,叶名琛并没有多少机会来了解西方,中国也不会从他辛辛苦苦获得的知识中得到什么益处。开头的一阵狂热过去后,加尔各答的英国人对叶名琛不再感到兴趣,来访者越来越少。赫尔博特中校是负责与叶名琛有关一切事务的军官,上级要求他每天去看叶名琛两次,每周交一份报告。他很不耐烦,请求免去这项例行公事。1859年4月2日,上级终于同意了他的请求。八天之后,便传来叶名琛的死讯。^[15]

按理有四方面的人应该知道这一突然而神秘的死亡原因。

首先是医生。潘恩大夫在4月2日应召去给叶名琛看病,他细心观察,反复检查,但没有发现叶名琛患什么病。^[16]另一位医生斯克里文,曾两次随同潘恩大夫去看望叶名琛,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叶死后,有人建议尸体解剖,但阿查礼反对,说这将会遭“强烈反对”,因而作罢。^[17]

其次是赫尔博特中校。他自免去书写周报后,干脆就不再去看看叶名琛。他但愿值勤的印度警察^[18]每晚送来的汇报都是“一切正常”。^[19]他甚至在叶名琛死后连住处有多少仆人都搞不清楚,这完全证明他根本无心过问叶名琛的事。^[20]

第三是翻译。阿查礼是一个精力旺盛、喜欢冒险的年轻人,每天给叶名琛翻译报纸根本不合他的胃口。英国方面为了照顾叶名琛的身份,曾为他租了辆马车备用。这辆马车,叶名琛只是从威廉炮台迁居托里贡时坐过一次,它几乎成了阿查礼的专车。阿查礼坐着这辆马车或远足,或访师寻友,把拉车的马匹弄得劳累不堪,以致出租马车的西尔华利·哈卜来斯公司在1859年3

月31日合同期满后就拒绝续约。^[21]总之,阿查礼也无法解释叶名琛的死因。

第四是那些中国仆人。他们的回答是这样的:

迨至九年二月二十日后带去食物已尽,小的们请在彼处添买。主人不允,且云,我之所以不死而来者,当时闻夷人欲送我到英国。闻其国王素称明理,意欲得见该国王,当面理论,既经和好,何以无端起衅,究竟孰是孰非,及冀折服其心,而存国家体制。彼时此身已置诸度外,原期始终其事,不意日望一日,总不能到该国。淹留此处,要生何为,我所带粮食既完,何颜食外国之物。屡经翻译官将食物送来,一概杜绝不用。小的们屡劝不从,于二月二十九日得病不食,至三月初七日戌时病故。临终并无别语,只说辜负皇上天恩,死不瞑目。^[22]

叶名琛自带粮食一事,有英国方面的两条史料为证。柯克写道,离开“无畏号”上岸之前,叶名琛把厨子找去,厨子告诉他带来了“大量中国食品”,^[23]他十分满意。赫尔博特在汇报中也写道,自叶名琛死后,中国仆役的食用“过去由叶名琛承担,现在要由英国方面支付,所以每日的开销增加了许多”。^[24]过去月支仅490卢比左右,^[25]到1859年4月,增至3046卢比。^[26]

4月初,潘恩大夫曾来探病,他只发现叶名琛有时浑身无力、胃口不佳、便秘以及其他一些消化不良的症状;另外,肝功能有点不正常,这也是很普通的症状。当然,潘恩大夫看出叶名琛十分虚弱,这种虚弱是上面提到的各种症状都解释不了的。不过潘恩说,叶名琛“像平时一样谈笑风生。我说他的病恐怕是因为天气越来越热所引起的,他似乎同意我的看法”。^[27]以后几天,潘恩大

夫继续给叶名琛看病。叶的情况看来有所好转,无需再予诊治。由此可见,叶名琛的仆人说他自夏历二月二十九日得病后不食而死,大体是可信的。

叶名琛像指挥官兵同围城洪兵作战以及 1856—1857 年同英国人打仗一样,镇静自若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是一个极能忍受痛苦的人。从香港到加尔各答的航程是他第一次出海。柯克写道:“从船舱的天窗里传来一阵阵痛苦的呻吟,就好像埃特纳^[28]在受折磨一样。从所发出的怪声判断,这位总督像是要把两广都吐出来似的。不过,我不得不承认他在这次晕船中的挣扎奋斗,确有大丈夫的气概……。他表现出中国人的勇气和坚韧。”^[29]

下面是叶名琛的一首诗,很可能是他在弥留之际写成的。他在诗中把一切都说得很清楚了:^[30]

零丁洋泊叹无家,雁札犹传节度衙。
海外难寻高士果,斗边远泛使臣槎。
心惊跃虎笳声急,望断慈乌日影斜。
惟有春光依旧返,隔墙红遍木棉花。

叶名琛流落海外,成了阶下之囚,必然会从中国历史中寻找楷模,以指导自己的言行。到加尔各答后的头几个月,他以苏武为榜样;后来眼看像苏武那样“留胡节不辱”没有多少用处,于是决定学习伯夷、叔齐,一待自带的粮食吃完,便绝食而死。

注释:

[1] 《拉伦英文手稿》第 1230 种 84 号,《香港纪事报》,1858 年 2 月 16 日。

[2] 同上。

[3] 他的晕船比其随从恢复得快。随从是武巡捕蓝宾、两个侍役、一个厨

子和一个理发师。

- [4] 《拉伦英文手稿》第1230种147号,阿查礼致包令的信,1858年3月17日。
- [5] 同上。
- [6] 同上。
- [7] 伦敦印度殖民部图书馆藏《1858年度秘密来信》L/PS/5第167卷,赫尔博特致毕顿的信,1858年5月3日。
- [8] 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
- [9] 叶名琛被囚于威廉炮台时,有画家来为他画像(《秘密来信》L/PS/5第167卷,赫尔博特致毕顿的信,1858年4月5日)。
- [10] 《拉伦英文手稿》第1230种147号,阿查礼致包令函,1858年3月17日;柯克《中国》页425—426。
- [11] 叶名琛于1858年5月迁往加尔各答郊区托里贡的一所两层楼房里(《秘密来信》L/PS/5第167卷,赫尔博特致毕顿的信,1858年5月3日)。
- [12] 《印度政治与外交文案》,Range 202—203,赫尔博特的报告。
- [13] 柯克:《中国》页429—430。
- [14] 同上。
- [15] 《秘密来信》L/PS/5第164卷,赫尔博特致毕顿的信,1858年3月15日;《印度政治与外交文案》,Range 203,赫尔博特致西姆生的信,1859年2月14日;同上,潘恩致赫尔博特的信,1859年4月10日。
- [16] 同上,潘恩致赫尔博特的信,1859年4月10日。
- [17] 同上,赫尔博特致毕顿的信,1859年4月11日。
- [18] 自叶名琛迁入新址以后,就有五名警察组成的卫队把门(《秘密来信》L/PS/5第157卷,赫尔博特致毕顿函,1858年3月19日)。
- [19] 《印度政治与外交文案》,Range 203,赫尔博特致毕顿函,1858年11月12日。这种情况发生在11—12月间,那时赫尔博特动了手术。
- [20] 同上,赫尔博特致毕顿函,1859年4月15日。
- [21] 同上,赫尔博特致毕顿函,1859年3月29日。
- [22] 《四国新档·英国档》第1275号,1859年8月7日。
- [23] 柯克《中国》页401。

- [24] 《印度政治与外交文案》，Range 203，赫尔伯特致毕顿的信，1859 年 5 月 1 日。
- [25] 同上，Range 202—203。
- [26] 同上，Range 203，西门致赫尔博特的信，1859 年 5 月 5 日。
- [27] 同上，潘恩致赫尔伯特函，1859 年 4 月 10 日。
- [28] 埃特纳是欧洲最高的活火山，位于西西里岛。古罗马诗人魏吉尔（公元前 70—19）在其长诗《伊利亚特》第三章 578 行曾把埃特纳火山的爆发比作埋在山下的巨人安西里德斯的辗转挣扎。——译者注
- [29] 柯克：《中国》页 405。
- [30] 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

BIBLIOGRAPHY 参考资料

A. ARCHIVES 档案

Foreign Office Archives: 英国外交部档案

Public Record Office, London. 藏于伦敦国家档案馆

1. F. O. 931 (Canton Archive and others), Paper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广州档案, 编号外交部第 931 种文件

2. F. O. 17 General Correspondence, China.

外交部与驻华使节的通讯及其他文件, 编号外交部第 17 种文件

3. F. O. 228 Embassy and Consular Reports.

驻华使节与诸领事通讯及其他文件, 编号外交部第 228 种文件

India Office Archive: 英国印度殖民部档案

India Office Library, London. 藏于伦敦印度殖民部图书馆

1. Political General Correspondence, Bundle 2h.

普通公文, 编号 2h 扎

2. L/PS/5 Secret letters from Bengal, 1858.

1858 年度秘密来信, 编号 L/PS/5

3. L/PS/3 General Political Correspondence.

普通公文, 编号 L/PS/3

4. Range 202—3 India Political and Foreign Proceedings.

印度政治与外交文案, 编号 Range 202—3

Matheson Archive: 怡和洋行档案

University Library, Cambridge. 藏于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

1. B2 General Correspondence.

普通信件, 编号 B2

2. B4 Personal Letters.

私人信件, 编号 B4

Peking Gazette: 《邸报》

British Museum. 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

1. Tao-kuang period.

道光朝《邸报》

2. Hsien-feng period.

咸丰朝《邸报》

B. PRIVATE PAPERS 私人档案

The Bowring Papers: 包令档案

The John Rylands University Library of Manchester. 藏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约翰拉伦图书馆

1. Ryl. Eng. MSS 1228 Bowring's letters to his son Edgar.

包令致其儿子吉加之私人信, 编号, 拉伦英文手稿第 1228 种

2. Ryl. Eng. MSS 1229 Bowring's letters to his son Lewis.

包令致其儿子路易之私人信, 编号, 拉伦英文手稿第 1229 种

3. Ryl. Eng. MSS 1330 Letters to Bowring, newspaper cuttings, miscellaneous.

致包令信, 剪报及其他, 编号, 拉伦英文手稿第 1330 种

The Clarendon Papers: 格拉兰敦档案

Bodleian Library, Oxford. 藏于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

1. MSS Clar. Dep. C9 China (1854).

1854 年度手稿, 编号, 格拉兰敦藏稿第 C9 部份

2. MSS Clar. Dep. C37 China (1855).

1855 年度手稿, 编号, 格拉兰敦藏稿第 C37 部份

3. MSS Clar. Dep. C57 China (1856).

1856 年度手稿, 编号, 格拉兰敦藏稿第 C57 部份

The Davis Papers: 德庇时档案

In possession of a descendant of Sir Francis Davis, who wishes to remain anonymous.

为德氏一不愿公开其姓名的后人所藏

The Palmerston Papers: 巴麦尊档案

Temporarily in the Care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of Historical Manuscripts, London.

暂由英国皇家历史手稿委员会保存

Broadlands MSS GC

编号, 博伦斯普通手稿 MSS GC

The Parkes Papers: 巴夏礼档案

University Library, Cambridge.

藏于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

C. SELECTED BIBLIOGRAPHY OF PUBLISHED WORKS 参考书目

西文参考书目

Anderson, M. A. 安达臣

Edmund Hammond; Permanent Under-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 1854—1873. unpublished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56.

《吉门砍文: 英外交部 1854—1873 年间永久秘书》, 伦敦大学博士论文, 1956 年通过

Banno, M. 坂野正高

China and the West, 1858—1861: the Origins of the Tsungli Yamen, Cambridge, Mass., 1964.

《中国与西方, 1858—1861 年: 总理衙门之源起》,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64 年版

Bartle, G. F. 巴图

The Political Career of Sir John Bowring (1793—1872) between 1820 and

1849, unpublished M. A. thesi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59.

《包令爵士 1820—1849 年之政治生涯》，伦敦大学硕士论文，1959 年通过

“Sir John Bowring and the Arrow War in China”,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Library*, 43, No. 2 (1961), pp. 293—316.

《包令爵士与亚罗战争之关系》，载《约翰拉伦图书馆馆刊》第 43 卷第 2 号(1961)第 293—316 页

“Sir John Bowring and the Chinese and Siamese Commercial Treaties”,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Library*, 44, No. 2 (1962), pp. 286—308.

《包令爵士与中国及暹罗之贸易条约》，载《约翰拉伦图书馆馆刊》第 44 卷第 2 号(1961)第 286—308 页

Bary W. T. 巴里

“de, A Reappraisal of Neo-Confucianism, in A. F. Wright, ed”. , *Studies in Chinese Thought*, pp. 81—111. Chicago, 1953.

《对理学之重新估计》，载韦特编《中国思想史》第 81—111 页，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3 年版

Beal, E. G. 卑尔

The Origin of Likin, 1853—1864. Cambridge, Mass. , 1958.

《厘金之起源，1853—1864》，哈佛东亚研究中心，1958 年版

Beasley, W. G. 卑士利

The Meiji Restoration. Stanford, Cal. 1973.

《明治维新》，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 年版

Bendix, R. and Lipset, S. , 并迪士，立石特

eds. *Class, Status and Power: A Reader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London, 1954.

《阶级、地位与权力：社会界限之划分》，伦敦 1954 年版

Biggerstaff, K. 卑加士达夫

“The Tung Wen Kuan”, *China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8, No. 3 (1934), pp. 307—340.

《同文馆》，载《中国社会与政治科学导报》第 18 卷第 3 号(1934)第

307—340 页

Blythe, W. 拔拉夫

The Impact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Oxford, 1969.

《马来亚之中国秘密会党》，牛津大学出版社 1969 年版

Boardman, E. 博文

Christian Influence upon the Ideolog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1851—1864.

Madison, Wis. 1952.

《基督教对太平天国思想之影响, 1851—1864》，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
1952 年版

Bowring, Sir John 包令爵士

Autobiographical Recollections of Sir John Bowring. London, 1877.

《包令爵士自传》，伦敦 1877 年版

Brine, L. 百恩

The Taiping Rebellion in China; A Narrative of its Rise and Progress. London, 1862.

《太平天国之兴起与发展》，伦敦 1862 年版

Bruce, J. P. 卜鲁斯

Chu Hsi and his Masters. London, 1923.

《朱熹与其长者》，伦敦 1923 年版

Brunnert, H. S. and Hagelstrom, V. V. 布隆勒-黑格尔特郎

Present Da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 tr. A. Beltchenko and E. E. Morgan. Taipei (reprint), 1963.

《当代中国政治组织》，柏琴柯、莫根合译，台北 1963 年再版

Buxbaum, D. 拔士班

“Some Aspects of Civil Procedure and Practice at the Trial Level in Tanshui and Hsinchu from 1798 to 1895”,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0, No. 2 (1971), pp. 255—280.

《淡水与新州等地方政府之审讯程序, 1789—1895》，载《亚洲研究》第
30 卷第 2 号 (1971) 第 255—280 页

Cady, J. F. 奇地

The Roots of French Imperialism in Eastern Asia. New York, 1954.

《法国侵略东亚之根源》，纽约 1954 年版

Callery, M. M. and Yvan 加里里、伊凡

The History of the Insurrection in China, tr. , John Oxonford. London, 1854.

《当前中国动乱之源起》，粤信福特译，伦敦 1854 年版

Chang, Carson 张嘉森

The 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 Thought, New York, 1957.

《理学之发展》，纽约 1957 年版

Chang, Chung-li 张仲礼

The Chinese Gentry: 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ese Society. Seattle, 1955.

《士绅阶级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之作用》，华盛顿大学出版社 1955 年版

The Income of the Chinese Gentry. Seattle, 1962.

《中国士绅之收入》，华盛顿大学出版社 1962 年版

Chang, Hsin-pao 张歆保

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 Cambridge, Mass. , 1964.

《林钦差与鸦片战争》，哈佛大学出版社 1964 年版

with Grinstead, E. , see Grinstead.

另著，见 Grinstead

Chang, T'ien-tse 张天泽

Sino -Portuguese Trade from 1514—1644: A Synthesis of Portuguese and Chinese Sources. Leyden, 1934.

《中葡贸易与有关史料，1514—1644》，莱顿 1934 年版

Chao, Tang-li 赵党里（音译）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1858—1870, unpublished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56.

《中英关系，1858—1870》，伦敦大学博士论文，1956 年通过

Chen, Han -seng 陈翰笙

The Present Agrarian Problem in China. Shanghai, 1933.

《中国当前之农业问题》，上海 1933 年版

Agrarian Problems in Southernmost China. Shanghai, 1936.

《中国最南部之农业问题》，上海 1936 年版

Landlord and Peasants in China. New York, 1936.

《中国之地主与农民》，纽约 1936 年版

Chesneaux, J. 辛劳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tr. G. Wettle). London, 1971.

《十九与二十世纪中国之秘密会党》，畏途译，伦敦 1971 年版

ed., *Popular Movement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 1840—1950*. Stanford, Cal. 1972.

《中国群众运动与秘密会党，1840—1950》，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72 年版

Peasants' Revolts in China 1840—1849 (tr. C. Curwen). London, 1973.

《中国之农民起义，1840—1849》，柯文南译，伦敦 1973 年版

Chi, Ch'ao-ting 冀朝鼎

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 London, 1936.

《中国诸经济中心》，伦敦 1936 年版

Chiang, Pei-huan 蒋百幻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1856—1860, unpublished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39.

《中英关系，1856—1860》，伦敦大学博士论文，1939 年通过

Chiang, Ting-fu 蒋廷黻

"The Government and Co-hong of Canton, 1839",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5, No. 4 (Jan., 1932), pp. 602—607.

《广州政府与公行，1839》，载《中国社会与政治科学导报》第 15 卷第 4 号(1932)第 602—607 页

Chien, Yu-wen 简又文

The Taiping Revolutionary Movement. Yale, 1973.

《太平天国运动》，耶鲁大学出版社 1973 年版

Chu, Shih-chia 朱士嘉

A Catalogue of Local Histories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 C., 1942.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华盛顿 1942 年版

Ch'u, Tung-tsu 瞿同祖

"Chinese Class Structure and its Ideology, in J. K. Fairbank", ed.,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pp. 235—250. Chicago, 1957.

《中国阶级之构造及其思想背景》，载费正清编《中国思想与制度》第 235—250 页，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57 年版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 Cambridge, Mass. 1962.

《清季地方政府》，哈佛大学出版社 1962 年版

Cohen, P. A. 郭恒

"The Anti-Christian Tradi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2, No. (1960), pp. 169—180.

《中国反基督教之传统》，载《亚洲研究》第 20 卷第 2 号(1960)第 169—180 页

Cooke, G. W. 柯克

"The Capture of Canton", *The Times*, 27 February 1858.

《占据广州》，载《泰晤士报》1858 年 2 月 27 日

"Yeh's Portrait", *The Times*, 10 May 1858.

《叶名琛其人其事》，载《泰晤士报》1858 年 5 月 10 日

"Ex-Commissioner Yeh", *The Times*, 17 May 1858.

《叶名琛被贬》，载《泰晤士报》1858 年 5 月 17 日

China: being The Times Special Correspondence from China in the Years 1857—1858, with Corrections and Additions. London, 1858.

《中国——泰晤士报 1857—1858 年特派中国记者之报导》，伦敦 1858 年版

Costin, W. C. 柯士汀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1833—1860. Oxford, 1937.

《中英关系, 1833—1860》，牛津大学出版社 1937 年版

Cranmer-Byng, J. L. 郭马秉

"Lord Macartney's Embassy to Peking in 1793, from Official Chinese Documents". Reprinted from the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vol. 4, Nos. 1—2. Hong Kong, 1961.

《1793年马戛尔尼勋爵使华之有关汉文史料》，原载《东方研究》第4卷第1—2号，香港1961年版

Downing, C. T. 唐宁

The Fan-Qui in China in 1836—1837, 3 vols. London, 1838.

《在华番鬼 1836—1837》，全三册，伦敦 1838 年版

Elvin, M. J. 艾尔温

"The Last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History", *Modern Asian Studies* 4, No. 2 (1970), 97—114.

《中国近千年史》载《现代亚洲研究》第4卷第2号(1970)第97—114页

"The High Level Equilibrium Trap: the Causes of the Decline of Invention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Textile Industries", in W. E. Willmott, ed.,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1972.

《高产陷井：中国传统纺织业技术停滞不前之原因》，载威姆编《中国社会之经济组织》，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72 年版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Cal. 1973.

《中国历史之规律》，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73 年版

Endacott, G. B. 恩地格

A History of Hong Kong. Oxford, 1958.

《香港史》，牛津大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Fairbank, J. K. 费正清

"The Manchu Appeasement Policy of 1843",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4, No. 4 (1939), pp. 469—484.

《满清之怀柔政策，1843》，载《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第14卷第4号(1939)第469—484页

"Tributary Trade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Far Eastern Quar-*

terly, 1, No. 2 (1942), pp. 129—149.

《朝贡通商与中西关系》,载《远东季刊》第1卷第2号(1942)第129—149页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 Cambridge, Mass., 1953.

《中国沿海之通商与外交:五口通商,1842—1854》,哈佛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

“Meadows on China: A Centennial Review”, *Far Eastern Quarterly*, 14, No. 3 (1955), pp. 365—71.

《密迪乐对中国之介绍:百年回顾》,载《远东季刊》第14卷第3号(1955)第365—371页

ed.,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Chicago, 1957.

《中国思想与制度》,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Cambridge, Mass., 1968.

《中国之世界观》,哈佛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

and Teng, Ssu-yü, “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 No. 2 (1941), pp. 135—246.

与邓嗣禹合著《满清朝贡制度》,载《哈佛亚洲研究》第6卷第2号(1941)第135—246页

Reischauer, E. O., and Craig, A. M., *East Asia: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Boston, 1965.

与拉受雅、基尔等合著《东亚之现代化》,波士顿1965年版

Fei, Hsiao-t’ung 费孝通

China’s Gentry: Essays on Rural-Urban Relations, rev. and ed. by M. P. Redfield, Chicago, 1953.

《中国士绅阶级:城乡关系》,列夫料修订,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

“Peasantry and Gentry: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 and its Changes”, in R. Bendix and S. Lipset, eds. *Class, Status and Power: A Reader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pp. 631—50. London, 1954.

《农民与士绅：中国社会结构与变迁》，载并迪士、立石特合编《阶级：地位与权力：社会界限之划分》第631—50页，伦敦1954年版

Feuerwerker, A. 福尔维克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in Recent Historical Writings from Mainland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8, No. 1 (1958), pp. 107—116.

《最近中国大陆历史著作中对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之辨析》，载《亚洲研究》第18卷第1号(1958)第107—116页

Fevour, Edward Le 非科

Western Enterprise in Late Ch'ing China: A Selective Survey of Jardine, Matheson and Company's Operations, 1842—1895. Cambridge, Mass., 1968.

《清末西人在华企业：怡和洋行经营鸟瞰》，哈佛东亚研究中心1968年版

Fishbourne, Capt. E. G. 菲庶榜

Impressions of China and the Present Revolution: Its Progress and Prospects. London, 1855.

《中国当前动乱之进展与未来》，伦敦1855年版

Folsom, K. E. 富森

Friends, Guests and Colleagues: The Mu-fu System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 Berkeley, 1968.

《清末幕府制度》，加州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

Fortune, R. 富存

A Residence among the Chinese: Inland, on the Coast, and at Sea: being a Narrative of Scenes and Adventures during a Third Visit to China, from 1853—1856. London, 1957.

《三访中国，1853—1856》，伦敦1957年版

Fox, G. 富士

British Admirals and Chinese Pirates, 1832—1869. London, 1940.

《英国海军司令与中国海盗》，伦敦1940年版

Franke, W. 佛领奇

The Reform and Abo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

Cambridge, Mass., 1960.

《科举制度之改革与废止》,哈佛东亚研究中心 1960 年版

Freedman, M. 弗雷文

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 London, 1965.

《中国东南部之公尝结构》,伦敦 1965 年版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 London, 1966.

《中国之公尝与社会:福建与广东》,伦敦 1966 年版

Gerson, J. J. 哥臣

Horatio Nelson Lay and Sino-British Relations, 1854—1864. Cambridge, Mass., 1972.

《李泰国与中英关系,1854—1864》,哈佛东亚研究中心 1972 年版

Greenberg, M. 奇恩堡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1842. Cambridge, 1951.

《中英贸易与中国门户之开放》,剑桥大学出版社 1951 年版

Grinstead, E. and Chang Hsin-pao 奇恩士特、张敬保

“Chinese Documents of the British Embassy in Peking, 1793—1911”,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2, No. 3 (1963), pp. 354—356.

《英国驻华使馆所藏之中文文件,1793—1911》,载《亚洲研究》第 22 卷第 3 号(1963)第 354—356 页

Gulick, E. V. 故历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Cambridge, Mass., 1973.

《伯驾与中国之开放》,哈佛大学出版社 1973 年版

Hao, Yen-p'ing 郝延平

The Comprador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Brid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Cambridge, Mass., 1970.

《中国之买办阶级:中西桥梁》,哈佛大学出版社 1970 年版

Ilinton, H. C. 韩丁

The Grain Tribute System of China, 1845—1911. Cambridge, Mass., 1970.

《中国漕运,1845—1911》,哈佛东亚研究中心 1970 年版

Ho, A. K. L. 何

“The Grand Council in the Ch'ing Dynasty”, *Far Eastern Quarterly*, 11, No. 2 (1951), pp. 167—182.

《清代军机处》，载《远东季刊》第 11 卷第 2 号(1951)第 167—182 页

Ho, Ping-li 何炳棣

“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 A Study of Commercial Capital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7 (1954), pp. 130—168.

《扬州盐商：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研究》，载《哈佛亚洲研究》第 17 卷(1954)第 130—168 页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Cambridge, Mass., 1959.

《中国人口研究, 1368—1953》，哈佛大学出版社 1959 年版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New York, 1962.

《王朝时代晋身之阶》，纽约 1962 年版

Holt, E. 何特

The Opium Wars in China. Pennsylvania, 1964.

《两次鸦片战争》，宾州 1964 年版

Hsiao, Kung-ch'uan, 萧公权

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eattle, 1960.

《中国农村：十九世纪中央对地方之控制》，华盛顿大学出版社 1960 年版

Hsieh, Kuo-ching 谢国桢

“Removal of Coastal Population in Early Tsing Period”,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5, No. 4 (1932), pp. 559—596.

《清初禁海内徙》，载《中国社会与政治科学导报》第 15 卷第 4 号(1932)第 559—596 页

Hsieh, Ting-yü 谢廷玉

“Origin and Migrations of the Hakkas”,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3 (1929), pp. 202—227.

《客家来源与迁徙》，载《中国社会与政治科学导报》第 13 卷(1929)第 202—227 页

Hsü, I. C. Y. 徐中约

China's Entrance into the Family of Nations: the Diplomatic Phase, 1858—1880. Cambridge, Mass., 1960.

《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交涉过程 1858—1880》，哈佛大学出版社 1960 年版

The Ili Crisis. Oxford, 1966.

《伊犁交涉》，牛津大学出版社 1966 年版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Oxford, 1970.

《现代中国之崛起》，牛津大学出版社 1970 年版

Hu, Ch'ang-tu 胡长度

"The Yellow River Administration in the Ch'ing Dynasty", *Far Eastern Quarterly*, 14, No. 4 (1955), pp. 505—513.

《清季对黄河之治理》，载《远东季刊》第 14 卷第 4 号 (1955) 第 505—513 页

Hu, Hsien-chin 胡先晋

The Common Descent Group in China and its Functions. New York, 1948.

《中国之同宗及其作用》，纽约 1948 年版

Huang, Yen-yü 黄延毓

"Viceroy Yeh Ming-ch'en and the Canton Episode (1856—1861)",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 (1941), pp. 37—127.

《总督叶名琛与广州危机，1856—1861》，载《哈佛亚洲研究》第 6 卷 (1941) 第 37—127 页

Hucker, C. O. 核加

China: A Critical Bibliography. Tucson, Ariz., 1962.

《中国书籍介绍》，亚里松纳州 1962 年版

Hudson, G. F. 克礼逊

Europe and China: A Survey of their Relation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1800. London, 1931.

《欧洲与中国之早期关系》，伦敦 1931 年版

Hummel, A. W. 何姆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Washington D. C. ,1943.

《清季名人录》，华盛顿 1943 年版

Hunter, W. C. 亨达

The 'Fan-Kwae'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1844. London, 1882.

《五口通商以前在穗之番鬼，1825—1844》，伦敦 1882 年版

Bits of Old China. London, 1885.

《旧中国片断》，伦敦 1885 年版

Hurd, D. 向特

The Arrow War: An Anglo-Chinese Confusion, 1856—1860. London, 1967.

《亚罗战争：一笔中英糊涂帐，1856—1860》，伦敦 1967 年版

Keer, J. G. 奇雅

“Description of the Great Examination Hall at Canton”,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ew Series, 5, No. 3 (Dec. 1866), pp. 63—69.

《广州贡院》，载《华北皇家亚洲学会集刊》新编第 5 卷第 3 号（1866）第 63—69 页

King, F. H. H. 倾恩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845—1895. Cambridge, Mass., 1965.

《中国之货币与货币政策，1845—1895》，哈佛大学出版社 1965 年版

Koay, Shiaw-chian 郭孝基

British Opinion and Policy on China between the First and Second Anglo-Chinese Wars, 1842—1857, unpublished M. A. thesis, University of Leeds, 1967,

《鸦片战争时代英国舆论与政策，1842—1857》，利兹大学硕士论文，1967 年通过

Krone, R. 郭特隆

“Eine Missionreise in Saron-Kreise”, *Berichte der Rheinischen Missiongesellschaft*, No. 7 (1853), pp. 97—110.

《在沙朗等地传教》，载《莱茵教士会报》第 7 卷（1853）第 97—110 页

“Die chinesischen Mandarinern”, *Berichte der Rheinischen Missions-gesell-*

schaft. No. 21 (1853), pp. 321—333.

《中国官吏》，载《莱茵教士会报》第 21 卷(1853)第 321—333 页

“Der Besuch in der Ngamun zu Fukwing”, *Berichte der Rheinischen Missions-gesellschaft*, No. 21 (1853), pp. 333—336.

《在福建南陇地区停留》，载《莱茵教士会报》第 21 卷(1853)第 333—336 页

Kuhn, P. A. 孔菲力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1864. Cambridge, Mass., 1970

《晚清之动乱与平乱：军事化与社会结构，1796—1864》，哈佛大学出版社 1970 年版。

Lane-Poole, S. 连普

Sir Harry Parkes in China. London, 1901.

《巴夏礼在中国》，伦敦 1901 年版

Lang, O. 梁奥嘉

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 Hamden, Conn., 1968.

《中国家庭与社会》，康州 1968 年版

Lattimore, O. 拉铁摩尔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Boston, 1962.

《中国之中亚边疆》，波士顿 1962 年版

Leavenworth, C. S. 李勋吾

The Arrow War with China. London, 1901.

《亚罗战争》，伦敦 1901 年版

Li, Chien-nung 李剑农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China, 1840—1928 (tr. S. Y. Teng and J. Ingalls). Princeton, 1956.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邓嗣禹、现哥士合译，普林斯顿 1956 年版

Liu, Yat-wing 廖日荣

The Ch'ing Grand Council: A Study of its Origins and Organizations to 1861, unpublished M. A. thesi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66.

《清朝军机处：源起及组织》，香港大学硕士论文，1966 年通过

Meadows, T. T. 密迪乐

Desultory Notes on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China, and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London, 1847.

《散记中国政制、人民及语言》，伦敦 1847 年版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 Stanford, Palo Alto, Cal. (reprint), 1954.

《华人与其起义》，斯坦福重印 1954 年版

Menzel, J. M. 孟苏

ed., *The Chinese Civil Service, Career Open to Talent?* Boston, Mass., 1966.

《中国文官制度：用人唯慧？》，波士顿 1966 年版

Meng, S. M. 孟思明

The Tsungli Yamen. Cambridge, Mass, 1962.

《总理衙门》，哈佛东亚研究中心 1962 年版

Michael, F. 米高

The Taiping Rebellion. Seattle, 1966.

《太平天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 1966 年版

Morse, H. B. 马士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3 vols. London, 1910—1918.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全三册，伦敦 1910—1918 年版

Myers, R. H. 孟雅士

"The Usefulness of Local Gazetteers for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Szechwan during the Ch'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 *Ch'ing-hua hsieh-pao*, N. S. Vol. 14, Nos. 1—2 (1967).

《地方志对研究近代中国经济史之功用：清末民初之四川》，载《清华学报》新编第 14 卷第 1—2 号 (1967)

Napoléon, B. 拿破仑

Correspondence de Napoléon Ier, publiée par ordre de l'Empereur Napoléon III. Paris, 1858—1869.

《拿破仑第三书简》，巴黎 1858—1869 年版

Nolde, J. J. 劳地

“The ‘False Edict’ of 1849”,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 No. 3 (1960), pp. 299—315.

《1849年“伪旨”》，载《亚洲研究》第20卷第3号(1960)第299—315页

Norris, J. M. 罗利士

Shelburne and Reform. London, 1963.

《绍本改制》，伦敦1963年版

Oliphant, L. 奥利芬

Narrative of the Earl of Elgin's Mission to China and Japan in the Years 1857, 1858, 1859. London (reprint), 1970.

《额尔金勋爵使华使日, 1857, 1858, 1859》伦敦重印, 1970年版

Owen, D. E. 奥文

British Opium Policy in China and India. New Haven, Conn. 1934.

《英国在华在印之鸦片政策》，耶鲁大学出版社1934年版

Peterson, W. J. 彼德逊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Monetary Ideas on the Cash-Silver Exchange Ratio”, *Papers on China*, 20 (Cambridge, Mass., 1966), pp. 23—53.

《十九世纪初货币观与铜银兑换率》，载《哈佛东亚研究中心中国文选》第20卷(1966)第23—53页

Pong, D. 庞百腾

“The Income and Military Expenditure of Kiangsi Province in the Last Years (1860—1864)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6, No. 1 (1966), pp. 49—65.

《太平天国末年(1860—1864)江西省政府之收入与军需》，载《亚洲研究》第26卷第1号(1966)第49—65页

“The Kwangtung Provincial Archives at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of London: a progress Repor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8, No. 1 (1968), pp. 139—143.

《伦敦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广州档案整理工作进展报告》，载《亚洲研究》第28卷第1号(1968)第139—143页

Pritchard, E. H. 毕利泽

“Anglo-Chinese Relations during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Stud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17, Nos. 1—2 (1930).

《十七及十八世纪之中英关系》，载《伊利诺斯大学学报》第17卷第1—2号(1930)

“The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lo-Chinese relations, 1750—1800”, *Research Studies of the State College of Washington*, Vol. 4, Nos. 3—4 (1936).

《中英关系要紧之几年, 1750—1800》，载《华盛顿州立学院学报》第4卷第3—4号(1936)

Roberts, J. A. G. 罗伯兹

The Hakka-Punti War, unpublished D. Phil. thesis, University of Oxford, 1968.

《土客械斗》，牛津大学博士论文, 1968年通过

Schlegel, G. 舒高

Thian Ti Hwui, the Hung League or Heaven-earth-league. Batavia, 1866.

《天地会, 即洪门或天地盟》，巴达维亚 1866年版

Shih, V. Y. C. 施友忠

The Taiping Ideology: Its Sources, Interpretations, and Influences. Seattle, 1963.

《太平天国思想：材料、使用、影响》，华盛顿大学出版社 1963年版

Skinner, G. W. 史坚诺

et. al, (ed.), *Modern Chinese Society: An Analytical Bibliography*. 3 vols. Stanford, Cal., 1973.

《中国近代社会：书目介绍》全三册，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73年版

Spector, S. 史辟达

Li Hung-chang and the Huai Army: a Study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ese Regionalism. Seattle, 1964.

《李鸿章与淮军：十九世纪中国地方主义研究》，华盛顿大学出版社 1964年版。

Stanley, C. J. 史丹利

“Chinese Finance from 1852—1908”, *Papers on China*, 3, Nos. 1—23. Cambridge, Mass. 1949.

《中国经济 1852—1908》,载《哈佛东亚研究中心中国文选》第 3 卷第 1—23 号(1949)。

Stanton, W. 史丹顿

The Triad Society or Heaven and Earth Association. Hong Kong, 1900.

《三合会,又名天地会》,香港 1900 年版

Sun, E-tu Zen 任以都

“The Board of Reven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No. 24 (1963), pp. 175—228.

《中国十九世纪之户部》,载《哈佛亚洲研究》第 24 卷(1963)第 175—228 页

and Francis, J. de, *Chinese Social History: Translations of Selected Studies*. Seattle, 1965.

与法兰士合著《中国社会史选译》,华盛顿大学出版社 1965 年版

Teng, Ssu-yü 邓嗣禹

The Taiping Rebellion and the Western Power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xford, 1971.

《太平天国与西方列强:比较研究》,牛津大学出版社 1971 年版

and Fairbank, J. 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New York, 1963.

与费正清合编《中国对列强之反响》,纽约 1963 年版

Twitchett, D. C. 敫慈

“Problems of Chinese Biography”, in A. F. Wright and D. C. Twitchett, eds., *Confucian Personalities*. Stanford, 1962.

《列传问题》,载敫慈、韦特合编《儒生》,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62 年版

Vincent, J. C. 文胜

The Extraterritorial System in China: Final Phase. Cambridge, Mass., 1970.

《中国治外法权之尾声》,哈佛东亚研究中心 1970 年版

Wakeman, F., Jr. 韦文

Strangers at the Gate,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 1836—1861. Berkeley, 1966.

《门前怪客：华南之动乱，1836—1861》，加州大学出版社 1966 年版

Walrond, T. 窝良

ed.,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James, Eighth Earl of Elgin*. London, 1872.

《额尔金勋爵文书》，伦敦 1872 年版

Wang, S. T. 王绳祖

The Margary Affair and the Chefoo Convention. New—York, 1939.

《马嘉里案与烟台协定》，纽约 1939 年版

Wang, Y. C. 王业键

An Estimate of the Land-Tax in China, 1753 and 1908. Cambridge, Mass., 1973.

《中国地税估计，1753 与 1908》，哈佛大学出版社 1973 年版

Weber, M. 韦巴

The Religion of China, Coofucianism and Taoism, tr. and ed. H. H. Gerh. Glencoe, Ill., 1962.

《中国之信仰：儒家与道教》，加夫译校，伊利诺斯州 1962 年版

Wiens, H. L. 文恩士

China's March towards the Tropics Hamden, Conn., 1954.

《中国向热带迈进》，康州 1954 年版

Wong, J. Y. 黄宇和

“Sir John Bowring and the Canton City Question”,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University Library of Manchester* (formerly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Library), 56, No. 1 (1973), pp. 219—245.

《包令爵士与广州入城问题》，载《曼彻斯特大学约翰拉伦图书馆馆刊》（前身为《约翰·拉伦图书馆馆刊》）第 56 卷第 1 号（1973）第 219—245 页

“The Arrow Incident: A Reappraisal”, *Modern Asian Studies*, 8, No. 3 (1974), 373—389.

《亚罗事件之重新估计》，载《现代亚洲研究》第 8 卷第 3 号（1974）第 373—389 页

"Harry Parkes and the Arrow War in China", *Modern Asian Studies*, 9, No. 3 (1975), pp. 303—320.

《巴夏礼与亚罗战争》,载《现代亚洲研究》第9卷第3号(1975)第303—320页

"The Taiping Revolutionary Movement: a Review Article", *Modern Asian Studies*, 9, No. 4 (1975), pp. 557—566.

《太平天国运动评论文章》,载《现代亚洲研究》第9卷第4号(1975)第557—566页

"The Role of Peter Parker in the Opening of China: A Review Article", *China Quarterly* (1975) No. 63, pp. 539—542.

《伯驾与中国之门户开放:评论文章》,载《中国季刊》第63号(1975)第539—542页。

Wright, A. F. 韦特

ed. *Studies in Chinese Thought*. Chicago, 1953.

《中国思想研究》,芝加哥大学1953年版

"Values, Roles, and Personalities, in A. F. Wright and D. C. Twitchett", eds., *Confucian Personalities*, pp. 3—23.

《价值、岗位与人格》,载自与敕慈合编之《儒生》第3—23页。

and Twitchett, D. C. *Confucian Personalities*. Stanford, 1962.

与敕慈合编《儒生》,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

Yang, C. K. 杨庆堃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Berkeley, 1961.

《中国之宗教与社会》,加州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

中文、日文参考书目(排列按原著英语拼音顺序)

坂野正高:《近代中国外交史研究》,1970年东京出版。

张金鉴:《中国文官制度史》,1955年台北出版。

张纯明:《清代的幕职》,载《岭南学报》1950年第9期。

张培刚:《广西粮食问题》,1938年长沙出版。

张舜徽:《中国历史要籍介绍》,1956年武汉出版。

赵尔巽:《清史稿》,1977年北京出版。

《潮州府志》,1775年版。

震钧:《国朝书人辑略》,1908年版。

陈德芸:《古今人物别名索引》,1937年广州出版。

七弦河上钓叟:《英吉利广东入城始末》,1927年。

贾植芳:《近代中国经济社会》,1949年上海出版。

《江西通志》,1732年版。

蒋孟引:《第二次鸦片战争》,1965年北京出版。

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1966年台北再版。

简又文:《叶名琛浮海记》,载《大风旬刊》,1939年至1940年第57至59期。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1962年香港出版。

千家驹:《广西省经济概况》,1936年上海出版。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68年台北出版。

钱实甫:《清季重要职官年表》,1959年北京出版。

《近代史资料》,1956年北京出版。

《清朝续文献通考》,1905年上海出版。

《清朝文献通考》,1901年上海出版。

《清朝野史大观》,1959年台北再版。

《清朝野史大观》,1915年上海出版。

《清史列传》,1928年上海出版。

周庆云:《盐法通志》,1918年北京出版。

周玉津:《中国租税史》,1963年台北出版。

《筹办夷务始末》,1930年北京出版。

朱熹:《四书集注》,1959年台北再版。

屈大均:《广东新语》,1700年版。

《中华民国分省形势全图》,1914年北京出版。

《中国丛书综录》,1959年上海出版。

《中国国际贸易史》,1961年台北再版。

方诗铭:《第二次鸦片战争史话》,1956年上海出版。

- 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1935年上海出版。
- 傅启学:《中国外交史》,1966年台北出版。
- 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961年北京出版。
- 符葆森:《叶志诜》,载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1966年台北再版。
- 符葆森:《叶继雯》,载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1966年台北再版。
- 符葆森:《叶名沣》,载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1966年台北再版。
- 傅宗懋:《清代督抚制度》,1963年台北出版。
- 《汉阳县志》,1868年版。
- 何貽焜:《曾国藩评传》,1964年台北出版。
- 夏燮:《中西纪事》,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1967年台北出版。
- 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1935年北平出版。
- 萧一山:《清代通史》,1963年台北出版。
- 筱园:《粤客谈咸丰七年国耻》,载《国闻周报》第14卷,第24、26、28、30、32、40期1937年。
- 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载《庸庵文续编》,1898年上海出版。
- 《续修南海县志》,1872年版。
- 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1950年北京出版。
- 胡凤丹:《叶名琛家传》,载缪荃孙《续碑传集》,1910年版。
- 《湖南通志》,1934年版。
- 《湖北通志》,1921年版。
-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1952年北京出版。
- 胡适:《胡适文存》,1933年上海出版。
- 华廷杰:《触藩始末》,载《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2期北京出版。
- 《惠州府志》,1881年版。
- 饶宗颐:《潮州志》,1946年版。
- 容肇祖:《明代思想史》,1962年台北再版。
- 容闳:《西学东渐记》,1961年台北再版。
- 《高州府志》,1889年版。
- 《广州府志》,1879年版。
- 《广西通志》,1966年台北再版。

《广东通志》，1822 年版。

《广东舆地图说》，廖廷相等编，1967 年台北再版。

郭斌佳：《咸丰朝中国外交概观》，载《武大社会科学季刊》，1935 年第 5 期。

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1965 年台北再版。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1963 年台北出版。

《国语辞典》，1948 年上海再版。

郎擎霄：《中国南方民族源流考》，载《东方杂志》第 30 卷，第 1 期，1933 年。

郎擎霄：《中国南方械斗之原因及其组织》，载《东方杂志》第 30 卷，第 19 期，1933 年。

郎擎霄：《清代粤东械斗史实》，载《岭南学报》第 4 卷，第 2 期，1935 年。

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1970 年台北出版。

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1966 年台北出版。

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1966 年台北再版。

李泰棻：《方志学》，1935 年上海出版。

李元度：《汪文端公事略》，载《续碑传集》，1910 年版。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1866 年版。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1937 年上海出版。

梁仁彩：《广东经济地理》，1956 年北京出版。

梁瓯第：《明代的书院制度》，载《现代史学》第 2 卷第 4 期，1935 年。

梁瓯第：《宋代的书院制度》，载《社会研究集刊》第 1 卷第 1 期，1935 年。

梁廷枏：《粤海关志》，1968 年台北出版。

《列强侵略》，1964 年台北出版。

林崇墉：《林则徐传》，1967 年台北出版。

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1958 年台北再版。

罗尔纲：《天地会文献录》，1947 年上海出版。

罗尔纲：《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载《中国社会经济集刊》

第8卷第1期1949年。

罗香林:《中国民族史》,1953年台北出版。

罗香林:《1842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对外交通》,1963年香港出版。

罗香林:《客家史料汇编》,1965年香港出版。

罗玉东:《中国厘金史》,1936年上海出版。

陆钦墀:《英法联军占据广州始末》,载《史学年报》第2卷第5期1938年。

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1966年台北出版。

卢彤:《大中华民国道县形势全图》,1914年北京出版。

马少侨:《清代苗民起义》,1956年武昌出版。

《茂名县志》,1888年版。

孟宪章:《中国近代经济史教程》,1951年上海出版。

缪荃孙:《续碑传集》,1910年版。

闵尔昌:《碑传集补》,1931年北京出版。

南开大学历史系:《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1959年北京出版。

仁井田陞:《中国法制史研究》第3册,《奴隶农奴法,家族村落法》,1962年东京出版。

《番禺县续志》,1931年版。

鲍正鹄:《鸦片战争》,1954年上海出版。

彭雨新:《清史关税制度》,1956年武汉出版。

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後の中英抗争》,1967年东京出版。

佐佐木正哉:《清末の秘密结社》,1970年东京出版。

《山西通志》,1811年版。

《陕西通志》,1735年版。

商衍璠:《清代科举考试述录》,1958年北京出版。

《韶州府志》,1873年版。

沈惟泰:《鸵鸟政策》,载《列强侵略》第2册,1964年台北出版。

《顺德县志》,1929年版。

《顺天府志》,1884年版。

《四国新档》,1966年台湾南港出版。

孙金铭：《中国兵制史》，1960年台北出版。

《大清会典》光绪朝。

《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

《大清历朝实录》，1964年台北再版。

多贺秋五郎：《宗谱の研究资料篇》，1960年东京出版。

谭卓垣：《中文杂志索引》，1935年广州出版。

汤象龙：《道光时期的银贵问题》，载《中国近代史论丛》第3册，1958年台北出版。

汤象龙：《咸丰朝的货币》，载《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第2期，1933年。

《道光咸丰两朝筹办夷务补遗》，1966年台湾南港出版。

陶成章：《天地会源流考》，载罗尔纲《天地会文献录》，1943年出版。

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1967年台北出版。

臧励稣：《中国人名大辞典》，1934年上海出版。

左舜生：《中国近百年史资料初编》，1966年台北再版。

左舜生：《中国近百年史资料初编》，1930年上海出版。

杜建喆、房兆楹：《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1932年北京出版。

《东莞县志》，1919年版。

《辞海》，1947年上海出版。

王尔敏：《淮军志》，1967年台北出版。

《王茂荫与咸丰时代的新币制》《作者不详》，载《中国近代史论丛》第3册，1958年台北出版。

王树槐：《咸同云南回民事变》，1968年台北出版。

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1955年上海出版。

魏建猷：《第二次鸦片战争》，1955年上海出版。

伍承乔：《清代吏治丛谈》，1968年台北出版。

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日记》，1928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组：《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1963年北京出版。

杨家骆：《历代人物年里通谱》，1963年台北出版。

叶志诜：《平安馆藏器目》，载《丛书集成初编》，1936年上海出版。

叶志诜：《叶氏宗谱》，1873 年版。

余秉权：《中国史学论文引得》，1962 年香港出版。

于肇怡：《书院制度及其精神》，载《民主评论》，1959 年第 10 卷第 13 期。

后 记

又是一个圣诞前夕。一年前的今天在越秀山下为译稿作序，一年后的今天在悉尼桥畔写此后记。

译者区铁先生，通晓英文汉语。译稿体现原意，笔者去年能于短短半个月内将译稿校毕，即为明证。

中外概念不同，治学方法亦异。笔者为黄炎子孙，居国外日久，比较之下，倍感区别之大。本书英文版原为外国读者而写，若全部照搬过来，是否合适？我对这一问题深怀疑虑。笔者从穗赴京，将译稿面交中华书局时，即与负责此稿的编辑先生谈及这一问题。后经商定：英文版关于叶氏身世部分介绍过详，外国读者虽感兴趣，而中国学者则或嫌其烦琐，决定予以缩写；书中有些叙述在中国学者看来是常识，如职官制度之类，也尽量从简；原书最后的总结，其实已于各章小结中分别提及，有类蛇足，故予略去。本书英文本出版于十年之前，当时写作中的一些不确切之处，亦借中文本出版的机会加以改正。当然错误还在所难免，伫候国内前辈指正。

译书旨在促进中外友谊与学术交流。拙著中文版之能与读者见面，区铁先生之翻译与中华书局诸位先生之俯允出版、润饰

文字,化了很大劳动,功不可没。这些先生的认真负责态度使我十分感动。在中文本出版过程中,还得到其他一些中国先生们的帮助。在此,我向他们深深致谢。

黄宇和

1982 年 12 月 24 日于悉尼桥畔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两广总督叶名琛

作者 =

页数 = 2 5 1

S S 号 = 1 1 2 2 5 0 2 9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